文化界

刘沅

刘沅，字止唐，生于1767年（清乾隆三十二年），卒于1855年（咸丰五年）。双流县人，后迁居成都。其父汝钦，精于《易》学，亦工诗；其兄刘湘，为清嘉庆进士，曾任工部主事、广西直隶郁林州知州，善诗、工书法。刘沅幼承庭训，博览群书。1792年中举，以后曾三次参加会试不中。1826年，选授湖北天门县知县。刘沅科场失意后，潜心于儒学，无心仕进，又因其母年迈多病，更不愿外出做官，遂改授国子监典簿，卜居成都奉母讲学，并从事儒家经典的研究。他教学成绩卓著，据清《国史馆本传·刘沅传》载："著弟子籍者前后数千人；成进士登贤书（中举）者百余人；明经贡士三百余人。……贤名播于乡曲者指不胜屈。"

在长期从事对儒家经典的教学和研究中，刘沅"解经尽除门户之见，不苟异同，务求当于经义。"力图将儒学从繁琐哲学中解放出来，恢复其本来面目，使"圣人成己成人之道不至淹没"。刘沅认为，"文学传说愈多，圣道弥晦"，真正的圣道圣学在汉代以后，已被弄得面目全非，"唐以后言道者始益支离"。因此，刘沅除按自己的观点对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进行了详细的注解外，还对一切他认为不合孔孟原旨的思想言论，都加以辨正，以"辟流传之误"。在他撰写的《正讹》一书中，对唐代以来的著名儒学大师韩愈、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朱熹、王阳明等人的主要著作都加以评论，凡认为不合孔孟思想真义之处，则加以驳斥，并阐明自己的不同看法，提出了许多独立见解。他还以儒家之说为准则，对佛、道之言不是一概排斥，凡与儒学相一致的地方则加以肯定。他说："吾以圣

人之道定百家，不以百家之谬溷圣贤”，“以中庸之道折衷百家，以圣人之书权衡杂术”。并认为排僧道之所为是应该的，但排佛老学说则是错误的。刘沅的学术思想体系，虽仍未越出宋明理学之范围，但在许多方面能广取各家学说之长而力避其短，视野开阔，自成一家之言。

刘沅一生著述宏富，在哲学、经学、文学和史学诸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其中哲学思想尤为丰富。刘沅的宇宙观基本上是以“太极”为本体的客观唯心主义，但也包含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因素。他认为形成宇宙万物的本源是“太极”，并认为老子的“道”就是“太极”。“太极”是浑然无形、无始无终、无臭无声的，是阴阳的本体，处于无限运动的过程中；而阴阳五行是具体的、有限的，其消长变化是由“理”来主宰，又是由“气”的流行来实现的。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一种“神而莫测”、“能妙万物”的精神力量。但刘沅又把“气”作为天地万物之本源，他说：“天生万物，而所以生万物者，天之为皆乾元一气之所为。”他还以辩证的观点论证了理气、有空、虚实、动静之间的关系。

从上述宇宙观出发，刘沅认为人性是天赋的，天赋的人性是善的。他说：“天之理赋于人为性”，“性，天理而已，天理无不善，人得之以为性。”但他又认为人出生后人性就不纯了，只有圣人才能保全天赋的善性，因此人人都要躬行圣学圣道，修身养性，才能恢复先天的善性。他综合儒、佛、道三家的修养方法，提出了一套以儒家的道德规范为准则，兼及佛道的“存理去欲”、“存心养性”的修养论。其具体方法就是“静存动察”的“内外交修”，以静制动，以性制情，如果一念不善，就必须将其克制于萌芽状态中。

刘沅在认识论上也含有一定朴素辩证法思想。在知行问题上，他反对先知后行，主张知行一起俱到。他说：“知者所以为行，能行则知益真。”在认识的来源上，他认为：“闻见之知，耳目之官也；德性之知，心之官也。”“心之官与耳之官是一是二。物交物者，不知养性，心官失其主而耳目亦蔽也。”对感性认识（耳之官）和理性认识（心之官）之间的辩证关系也有所认识。

刘沅的社会历史观基本上是天命论支配下的唯心史观，但其中也有合理因素。如他在评论东汉光武帝刘秀时，一方面说：“从古拨乱之君，莫不皆由天授。”但又认为：“光武起于布衣，温良谨厚，大度知人，岂秉资异？亦其平日之所居游，观摩有素耳！”承认杰出人物的才智是从后天的实践中得到的。他对商鞅变法也作了一定程度的肯定，认为商鞅“废封建、开井田，未可全非也。”

刘沅对中医学也深有研究，精通中医典籍并极善养生。清代蜀中著名伤寒学家、被尊为火神派首领的郑钦安曾受教于刘沅门下。

刘沅的学术思想被称为“槐轩之

学”，不仅在四川影响很大，省外亦有所传播。清《国史馆本传·刘沅传》说：“咸丰中，侯官林鸿年为云南布政使，至蜀得沅书，读之惊喜。求问时，沅已死，因受业于沅弟子内阁中书刘芬，尽购其书去。及罢官归，遂以其学转相传习，闽人称为川西夫子云。”清末四川保路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颜楷，亦服膺其学，并以槐轩门人自居。

刘沅的著作生前曾陆续刊印成单行本行世。后由子孙及门人集资，汇集刘沅选著 23 种，加以校订，编成《槐轩全书》，刻印发行。

唐宗海

唐宗海，字容川，生于 1846 年（清道光二十六年），彭县三邑乡人。唐宗海出生后，家道渐衰。稍长，赖其母艾夫人替人针黹，供其就学，先从广汉李本生习文，后复从新都王利堂习理学。王治学甚严，且学识渊博。唐宗海聪敏好学，刻苦勤奋，由是学业精进。1862 年，入泮为秀才。1868 年，他鉴于“先君子体羸善病”，深感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而开始“涉猎医书学”。因感医书充栋，检校茫茫，乃取前贤诸书，总其切要，提纲挈领，于 1869 年著成《医柄》一书。后期撰有《医学一见能》，皆是适用于民间之医学书籍。

1873 年，其父唐瑞麟患血症，多方求治无效，延六年而卒。唐宗海深感未早悟医道，由此潜心攻读“血证”。1879 年，其妻冯氏亦患血疾，经他精心调治而愈。

唐宗海受当时新思潮影响，怀着“值古今大变局时”，“以文章报国”之初衷，从 1873 年至 1884 年，凡 11 年，写成《血证论》8 卷。他在该书《序》中写道：“议论多由心得，然其发明处要皆实事实理，有凭有验。”是书集血证诊治之大成，创止、消、宁、补之要法，精辟独到，至今仍不失为临床医家研究血证及活血化瘀之有效医书。此书一出，名闻西蜀，以致居家授徒时，“列门下者，恒数十人”，声誉远播。“乡邻病者则求之，病剧者，中夜叩户，披衣辄往，未尝告倦”，且不计资酬，稍有积蓄，亦以周济亲族、邻里。

1885 年，唐宗海乡试中举。1888 年游学江南，秋季达沪，与夔门邓云笠、云航兄弟交，以医术扬名于沪上，每有疑症问之，辄对答如流。凡人身脏腑经络，相生相克之理，无不通晓；其谈三焦，更能发人所未发；医不能疗者，一经唐宗海诊治，沉痼顿除，人俱惊为神奇，以其医术之精湛，备受推崇。

1889年，唐宗海中二甲进士，授礼部主事。同年，其妻冯氏卒，遂告假归里。翌年春，赴彭县敖场凤楼书院，求教于《易》理造诣极深的川中名儒吕调阳，攻读《易经》，在医理中考证三焦，又撰成《医易通说》。用《易经》解释医理，以之“为医学探源，为易学引绪”，期求将易学与中西医贯通。后唐宗海侍奉母亲赴北京，将所著《血证论》出示于众，医者皆折服，京城友识求诊者络绎不绝，由是医名大噪。此后，唐宗海寓居上海，从事医疗活动和医学著述。这一时期，他与浙江陆润庠（同治年间状元）相互讨论医学、医案的往来书信达200余封，其中有多篇形成医学文章，刊载于陆在杭州主办的《医学导报》上。

自西医传入中国后，国内医学界中一派推崇西医而否定中医，而另一派则崇尚中医，视西医为异端邪说。唐宗海认为，西医初出，详形迹而略气化，中医略形迹而详气化，各有所短亦有所长。力主汇通中西，厘正医道。他摘灵素诸经，录其要义，兼中西之说解之，以中医古代医学理论为基础，吸取已输入我国之西医解剖、生理学等知识，并采用西医之解剖图，撰成《中西汇通医经精义》2卷，于1892年刊行（初名《中西医判》）。该书分人身阴阳、五脏所属、血气所生、脏腑为病、诸病所属、望形察色、诊脉精要、审治处方等28节，为中国最早汇通中西医学的一部著作；次年，唐宗海又撰成《本草问答》2卷、《金匮要略浅注补正》9卷刊行于世；1894年，所撰《伤寒论浅注补正》7卷亦刊出。以上4种书，加上《血证论》，于同年由裛海山房辑成《中西汇通医书五种》丛书刊出，阐述了在中医理、法、方药上的汇通思想，是唐宗海的医学代表作。他力图把中西医统一起来，开创和促进中西医之结合。唐宗海之说，首倡一帜，学者应之，如朱沄文、张锡纯、恽铁樵等，形成中西（医）汇通派。唐宗海是中国中西医汇通派的先驱和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医学著作，除上述诸书外，尚有《六经方证中西通解》和《痢症三字诀》等。唐宗海著书立说的宗旨是“医人不如医医”，著作多裨实用，行销海内外，医名亦远播东南亚一带。

1892年以后，唐宗海往返京、沪、粤间。在京与刘光第等人交厚。1896年，授广西来宾知县，侍母由沪溯江而上，欲经鄂、湘入桂，适抵武汉而母病，遂停顿于此治病，旋其母卒于武汉。翌年，扶母柩穿三峡回川，抵万县，弃舟登陆，取道梁山（今梁平县）、大竹返乡。值川东疫疠流行，唐宗海染病，抵家已不能言，10天后病逝，葬于双流袁家坝。

唐宗海生前曾在家乡三邑创办“农桑会”，并于故里近处租地约60亩，以兴农植桑，至今乡人尚传为美谈。

孙桐生

孙桐生，字筱峰，号痴道人，忏梦居士。生于1824年（清道光四年），卒于1908年。绵州（今绵阳市）人。其父曾任湖北黄安知县。孙从小博览群书，聪颖过人。1851年乡试中举，次年进京会试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1853年散馆，派任湖南安仁知县（未到任）。当年及1855年湖南两次乡试，孙桐生均任第一房同考官。他唯才是举，所选拔的13人中，黄锡焘、王先谦、唐村南等人随后都以文章、功名显赫于世。

1857年，孙桐生调任湖南酃县、安福等县代理知县，他悉心治理、安抚士民，一改过去混乱局面，使百姓安居乐业。桃源县地方恶霸为患，孙桐生奉调前往，他"到任后，按律正法数人，杖毙十余人"，使当地歪风恶习有所收敛。1869年，孙桐生奉调为永州府试用知府，他因秉公执法而得罪上司，终被降职调岳州榷局。1880年他又调任郴州知州，郴州地方豪强凶悍嚣张，竟然杀掉过三任州官。孙桐生到任后，惩治顽劣之徒，政绩卓著，深受百姓称道。

孙桐生在湖南任上时，结识了刘铨福等一批早期红学家。刘收藏有1754年的《脂评本》（即《甲戌本》）和"妙复轩"的抄本，1866年孙桐生从刘手中得到《妙复轩评〈石头记〉》抄本并将其带到湖南卧云山馆反复研究整理，"逐句梳栉，细加排比，反复玩索，寻其义，究其归，如是者五年。"后又私人出资，于1881年刊刻印行，题名《妙复轩评本·绣像石头记——红楼梦》。

1867年夏，孙桐生又从刘铨福处借回脂评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详加研究，并在上面留下40多条评语和批注，这是为胡适在"红学"研究中所认定了的。孙桐生认为《红楼梦》是以康熙年间武英殿大学士纳兰明珠家的事为模型而写的。他在《妙复轩评〈石头记〉》叙中列出了不少证据，作为此说的佐证。他的观点属于旧红学中的"索隐派"，对后来蔡元培研究《红楼梦》产生过影响。

孙桐生整理、刊行《妙复轩评〈石头记〉》，旨在推崇《红楼梦》。他说："少读《红楼梦》，喜其洋洋洒洒，浩无涯矣，其描绘人情，雕刻物态，真能扶肺腑而肖化工"。他"以为文章之奇，莫奇于此而未知其奇也"。孙桐生刊行《妙复轩评〈石头记〉》的动机是"以备他年剞劂之用，庶不没作者、评者一番苦心云尔。"

1882年，孙桐生从湖南卸任回到绵州，正值治经书院落成，他主动担任主讲，对学生"讲道论德"，以砥砺其操修，使其"处为良士，出为良吏。"他担任治经书院主讲10年，大兴绵州学风，培养了

不少人才。

孙桐生一生著述颇丰，计有：《未信编》及其继编和余编、《永鉴录》、《永州府署题名记》、《彬鉴录》、《彬案日记》、《湘中时政记》、《国朝全蜀贡举考要》、《卧云山馆文钞》等10余种。他还收集、整理编刻了《辑选明臣奏议》、《国朝全蜀诗钞》等，校刊了《牡丹亭》、《弹指词》、《忆旧词》、《妙复轩评〈石头记〉》等书。其中《国朝全蜀诗钞》是研究清代四川文艺史的重要文献。

胡　峻

胡峻，字雨岚，别号贞菴。华阳县（今成都市）人，生于1869年（清同治八年）。1891年中举。1895年入京会试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1898年授翰林院编修。在京任职期间，胡峻结识同乡京官刘光第、杨锐及乔树枏诸人，受其变法维新思想影响，致力于探求革新时政之道。

1899年，胡峻奔父丧返蜀，当局聘主少城书院，因守制未就。蜀中学子慕其名，“皆愿执贽请业”，胡峻乃设家塾开馆授课。1902年，川督岑春煊开办四川省城高等学堂，由于该校是当时全川最高学府，总理（校长）一职，必须由资深望重、学行兼优的人担任。岑春煊看中了丁忧在籍，其学识与为人均为士林所推重的胡峻，特三诣其门，敦聘主持高等学堂。值胡峻守制期满，正拟入京复职，但因他对教育极为重视，认为：“一国之治乱，系乎人才之盛衰；而人才之盛衰，视乎国家之教育。”且痛恨科举制度埋没人才，于是毅然出任高等学堂第一任总理，担负起创办四川近代第一所文理兼备的综合性高等学校的重任。

1903年2月，胡峻正式到高等学堂视事。以书院改学堂，事属创举，无成规可循，为了吸取国内外办学的先进经验和方法，胡峻通过岑春煊奏请于朝，被特派为考察日本学制游历官，东渡日本考察学务。在历时4个多月中，对日本教育行政、学制规则、学科程级等，皆一一细心考研；对其国力、民情、局势也处处留心。同时，还为学堂聘请东洋（日本）教习，购置仪器图书。回国后，胡峻又到京师大学堂仔细考察了各项教学、科研和管理等措施。返成都后，他立即就考察所得，斟酌损益，亲手编定高等学堂各类规则及章程课程，延聘名师，从建筑校舍到设备、教具、图书等莫不精心筹划，巨细靡遗。经不懈努力，1903年11月学堂开学，1904年3月，正式举行了开学典礼。

新创立的四川高等学堂，成为全川学校的楷模和先导。各州县派人考察、参观、见习的人络绎不绝，胡峻“无不披沥相告，导以法程。”考虑各州县小学无所示范，又设立私立第一小学堂，以开风气之先，并集合同人设教育研究会，以讲求教育管理之得失。从而对全川各级新式学堂的开办和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胡峻任四川高等学堂总理期间，励精图治，以培养高级人才和中等以上学校师资为目标。由于名师荟萃，学风优良，经费充足，设备完全，加以对学生的考核及各项规章制度都十分严格，高等学堂（包括附设的中等学堂）先后培养了大批人才。

1903年9月，新任川督锡良到任后，对胡峻深为倚重，视为不可多得的人才，所推行之新政，多与咨谋并采纳其议。1906年，锡良延聘胡峻为全省学务公所议长，主持全省学务。到1907年，四川共有各类学校7775所，居全国第二；学生人数24.2万余人，居全国之首。

其时，帝国主义对四川铁路权虎视鹰瞵，使四川人民无比愤慨。锡良鉴于四川民情激昂，力主川路自办。1904年1月，官办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设立。次年1月，胡峻被任为公司总董，在酌定各种条章时，他以先杜绝外款为宗旨。鉴于路款筹集困难，又提议仿湖南租股办法，以租股为主，辅以官股、商股。锡良采纳其议，由公司拟定筹款集股章程55条，采“内地集股，仿捐输而行债票”的办法，由四川人民集股办理。

1905年7月，川汉铁路由官办改为官绅合办，锡良奏派官绅总办各一人，绅总办先为刑部郎中乔树枏，不久即改派胡峻充任，并兼任铁道学堂监督（校长）。胡峻上任后，致力于路政，以“铁路创建、中国无所仿式。……兹事非游历考览，不足为功”，商与锡良，被奏派赴美国考察。到美后，不但“详查轨政得失及集资要领”，于风俗、政教、学校、工业，亦在考察之列，且探求其利弊及富强之因。返国至京师，各部交相荐举，胡峻“皆力辞自引而罢”。旋急回成都，首建铁路改归商办之策。由于四川绅商的一再要求和全国范围内收回利权运动的开展，锡良不得已在1907年3月4日奏报：川路公司遵商律改为商办川汉铁路有限公司，举胡峻为副总理。1908年1月，清廷改派胡峻为驻川总理。他以羸弱之身，担负全省铁路、学务之重任，日夜操劳奔走，经常废寝忘食而在所不辞。

胡峻早年虽怀救国之志，但其思想囿于改良。随国是日非及民族危机的加剧，他渐趋激进，常常为国人“陈说时局忧危，勖以捐私爱公、团结救国大义，更勉学子以民族思潮。”从美国返国途中，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到上海后，经同盟会员邓家彦介绍，与蔡元培等人“深相契合”。1907年秋，熊克武、张培爵等革命党人，密谋在成都起义，因事泄而失败。黄方、杨维、黎靖瀛、张治祥、江永

成、王树槐先后被捕，熊克武等人也被通缉在案。在事态严重、人心惶惶的紧要关头，胡峻首先挺身而出，并邀集老翰林伍崧生等人，代表省中士绅要求当局宽大处理；又亲向护督赵尔丰陈述利害，使被捕诸人免遭杀害。

1908年，川督赵尔巽奉命设咨议局筹办处，胡峻出任协理，负责筹建工作，备极辛劳。1909年2月21日，因积劳过度，心力交瘁，咯血不止而去世。

胡峻工诗文，在京时所写落叶诗曾传诵一时。生前所记日记，毛发细书，精整不苟，9年中积数十册，定名为《苍霞阁日记》，流传于世。

郑钦安

郑钦安，名寿全，字钦安，以字行，1824年（清道光四年）生，邛州（今邛崃县）固驿镇人。其父郑本智，以训蒙为业。郑钦安为独子，5岁即从父读。稍长，博览群书，年16已读完四书五经，随父迁居成都，学医于一代通儒兼名医刘止唐。遵其教导，熟读《内经》、《周易》、《伤寒论》诸书，以明人身阴阳合一的道理及张仲景立法立方的要旨。24岁时，开始在成都行医。

郑钦安在师承刘止唐的医学理论与经验基础上，复博览古今医书70余种，取其所长，不断在医疗中实践总结，医理、医术日精，踵门求治者应接不暇。中年以后，在成都医林中已脱颖而出，独树一帜，为人治病，坚持用《伤寒方》治疗，临症善用四逆汤辈补命门衰火，用姜、桂、附等大辛大热药味逐阴翳浊寒，用量大而准，因治愈不少群医束手之重症、急症而名震一时，被尊为“火神派”首领，有“郑火神”之誉。郑钦安同时也善于补阴、精于白虎、承气诸方，所用药品亦有寒凉的大黄、黄连、石膏。

为将其医术传于后世，郑钦安除诊病外，开始授徒讲学，著书立说。1869年（清同治八年），刊行《医理真传》4卷；1874年（同治十三年）刊行《医法圆通》4卷；1894年（光绪二十年）刊行《伤寒恒论》10卷。三书各具特色，切合临床应用，故皆不胫而走，风靡西南地区，为研习“伤寒”医家视为济世活人之鸿宝。

《医理真传》除综述中医学基本理论知识外，着重于治病先辨阴阳。他在自序中说：“医学一途，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识症。亦不难于识症，而难于识阴阳。”并列举数十条目，详论疾病的内因、外因、阳虚、阴虚、病情实据及用方用药。该书中心论点则谓人身以元阴、元阳为立命之本，而以阳为主导。书中既有辨认一切阳虚症法，亦有辨认一切阴虚症

法，皆各列专卷。

《医法圆通》仍本治病注重阴阳实据及处方活法圆通妙用之旨，“采取杂症数十条，辨明内外，判以阴阳，经方时方，皆纳于内，俾学者易于进步，有户可入。”书首《用药弊端说》举出当时医界积习及错误，而示以用药准绳。又说：“病家好贵恶贱，以高丽参、枸杞、龟、鹿、虎胶、阿胶、六制地黄、鹿茸等品，奉为至宝，以桂、麻、姜、附、细辛、大黄、芒硝、石膏等味，畏若砒毒。由其不知阴阳虚实至理，病之当服与不当服耳。病之当服，附子、大黄、砒霜，皆是至宝；病之不当服，参、芪、鹿茸、枸杞，都是砒霜。无奈今人之不讲理何！”书末更指出善于圆通运用成方，一方即可治多种疾病，如四逆汤一方善用，即可治愈20多种疾病。其中颇多独到之处，条分缕析，为他书所未论及。

《伤寒恒论》一书，其特点不泥于前人陈说，而是紧密结合临床实际，详释方义，析微阐奥，质疑辨误，独抒己见，对原书提出多处纠正。

郑钦安一生注重医德，诊病不分贫富，一视同仁。又常向贫苦百姓送医施药，济困扶厄，深受百姓爱戴。辛亥革命（1911年）前，病殁于成都，葬于成都南门外红牌楼钟家坎。

在1981年北京召开的中、日《伤寒论》学术讨论会上，北京中医学院教授、著名中医学家任应秋，在所著《研究伤寒论流派》一文中认为，郑钦安与曹颖甫、恽铁樵、陆渊雷等同为近代具有代表性的伤寒学家，肯定其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云南中医学院院长吴佩衡、成都中医学院吴棹仙等俱受其影响，德阳名医卢铸之为其高足。

钟云舫

钟云舫，名祖棻，自号铮铮居士、落二居士。江津县（今江津市）人，生于1847年9月17日（清道光二十七年八月九日）。1867年举县学第一，补廪生后，设馆授徒历20余年。他才思敏捷，博通经史，工诗文、词曲，尤擅楹联。为人刚直不阿，嫉恶如仇，常以诗联针砭时弊，笞挞贪官。

清光绪年间，江津县令朱锡藩颟顸贪婪，与巴县县令张铎圈占津邑后八景之一的莲塘修葺遗爱祠，为自己树碑立传，荒芜良田数十亩。钟云舫作诗文、对联予以嘲讽揭露。朱恼羞成怒，罗织罪名欲加迫害。钟云舫被迫远走成都避祸，靠卖文为生。著名的成都望江楼崇丽阁212字的长联即于此时写成。对联悼古伤今，激昂慷慨，烟云满纸，把满腔愤懑尽情宣泄，一时传诵全川。

朱锡藩卸任后，钟云舫始得返回江津。1902年，江津县令武文源任意篡改粮章，加租加征，激起民愤。举人张泰阶联络士绅，联名上控武文源苛征钱粮等劣迹，钟云舫参与起草诉状。时川督岑春煊正行文整顿吏治，故此案武文源败诉，县民鸣鞭放炮，唱戏以祝。次年，岑春煊调任两广总督，由水道过江津，武文源又大受斥责。武疑系张、钟所致，便重贿已升任重庆府尹的张铎，张亦深恨钟曾揭其劣行，于是上禀帖为武辩解，诬钟"受贿百两写呈文"、"煽动闹粮"等，将钟、张二人解押到成都质讯，拘禁于成都府巡检司待质所。钟云舫屡次上诉，但府衙既不审问又不结案。钟悲愤万分，在狱中作《拟题江津县临江城楼》联，该联共1612字，为国内第一长联。这副楹联将神话传说、历史与现实相融合，气势恢宏，对仗工整，用典贴切，享誉当时。

钟云舫被囚3年，至1906年才被交保释放。1908年，与他先后冤拘成都待质所的同乡、革命志士卞孟被害于狱中，钟云舫怆然作挽联："这千年沉渊堕海之冤，化为白气冲霄汉；余一把抢地呼天之泪，洒向朱棺涌血河。"对清廷进行了血泪的控诉。1911年2月28日（宣统三年正月三十日），钟云舫在江津去世。身后，由其门人辑注其诗文、对联成《振振堂集》8卷刊行，收有对联1851幅。另还著有《招隐居传奇》2卷、《火炕莲》1卷行世。

吴之英

吴之英，字伯朅，号西蒙愚者、渔父、老愚，名山县人，生于1857年（清咸丰七年）。祖父吴文哲、父亲吴铭钟都是饱学之士。吴之英幼承庭训，8岁即能治文辞，15岁参加雅州府试，名列第一。

1875年，吴之英以茂才第一批入选成都尊经书院，师从王闿运。他在书院中刻苦攻读，博览群书，对经史词章都有较高造诣，尤精'三礼'，工书法，善骈文。与井研廖平、绵竹杨锐、富顺宋育仁被誉为院中四杰。王闿运曾称赞他："诸人欲测古，须交吴伯朅。之英通《公羊》，精'三礼'，群经子史，下逮方书，无不赅贯。"

1882年，吴之英以优贡入京朝考，名列二等。回川后，受聘在资州艺风书院任教，与宋育仁、廖平等同为讲习。1887年主讲简州通材书院，"以治小学，通经术，习词章三者，启迪后进，时历四年，县中文风为之一变。"1892年，任灌县训导，继兼成都尊经书院讲习。《灌县志·政绩记》载：吴之英"为人和易而峻

洁，学尤深邃，卓然成家，迥迈流俗。居官廉介，训迪学子，文行兼备，获益者多，盖不徒以言教也”。时，吴虞亦从其学习诗文，“侧闻绪论，始知研讨唐以前书”。

1898年，宋育仁长成都尊经书院，引荐吴之英、廖平为书院都讲。同年春，宋育仁在成都发起组织“蜀学会”，鼓吹维新变法，吴之英为该会主讲，并同宋育仁、徐昱等用学会名义创办了《蜀学报》，吴之英任主笔。通过该报的宣传，以开通全省风气，推动变法维新。吴之英先后发表了《蜀学会报初开述议》、《学会讲义》、《矿议》、《赋役篇》、《政要论》、《救弱当用法家论》等文章。在撰文中，他以饱满的爱国热情，针对清廷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弊端，提出了革新内政奋发图强的变法主张。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戊戌变法”宣告失败。“蜀学会”被取缔，《蜀学报》被查禁，宋育仁被罢黜解职回京赋闲，吴之英亦因此受牵连。当杨锐、刘光第等“六君子”在北京被害的消息传来时，吴之英悲愤万分，写了一首长达900余字的七言古体长诗《哭杨锐》，用以表达自己对先烈、对故友的哀思、怀念和景仰。

经过这场惊涛骇浪之后，吴之英逐渐消沉下来，产生了“因感莼鲈思旧乡，挂冠我逐归鸿去”的退隐田园、不闻政事的思想，回到灌县原任，转而悉心研究岐黄之术。他通读了《内经》、《难经》等医籍，并根据自己的体会，写成了《经脉分图十二图》、《会经文次三十八论》。

1901年，清廷同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吴之英深为愤慨，写下了长诗《颐和园歌》，怒斥慈禧的卖国行径。同年，他“泪随肠转，回到家乡”，一面侍奉老母，一面闭门著述。同时，将30年来各个时期所写的诗、词、歌、赋、碑、赞、记、颂、诔祭、书信、论文进行了整理汇编，一一宛转披陈，亲自抄订。他说：“山林枯槁之士，民守一介，非持世通材也。若世不我与，托空言焉，所以信于后世也。”

1908年，吴之英出于为桑梓育才益世的思想，出任名山高等小学堂校长，继而被乡人推举为县教育会会长。1910年，四川提学使赵启霖在成都设立存古学堂，吴之英受聘讲授词章之学，为振兴国学，培育蜀士，呕心沥血。后，刘师培在《国学学校同学录序》中说：“前清宣统二年，四川总督请于朝，则设存古学校……于是，耆德故老吴之英、廖平之伦，潜乐教思，朝夕讲习，善诱恂恂。”

辛亥革命后，大汉四川军政府设立枢密院，廖平为院长，吴之英为院士之一。1912年初，枢密院改组为国学院，聘吴之英为第一任院正（院长）。国学院以“研究国学，发扬国粹，沟通今古，切于实用”为宗旨。吴虞后来回忆当时情景时说，“国学专校，创自民国。其时吴伯朅师，廖平前辈，刘申叔、谢无量诸公，聚于一堂。大师作范，群士响风，若长卿之为师，张宽之施教，蜀才之盛，著于一时。”1913年，吴之英因体弱多病辞职，

临行时捐赠薪金大洋900元，资助学院办学。回乡后，又以多病之躯，继续担任本县高等小学校长，并从事自己著作的整理。

为纪念辛亥保路死难英烈，1913年四川人民在成都少城公园建立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丰碑。特请当时四位著名书法家吴之英、赵熙、颜楷、张学潮各以不同字体书写“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十个大字镌刻于碑上。碑身东面的草篆体的字迹，即为吴的亲笔。

1918年初，县中议修县志，吴之英粗举凡例而尚待入细时，于是年夏病逝。乡人特在县城西乡的梨花岗树立了“伯嘏先生教泽碑”以垂后世。

吴之英著述颇丰，有遗著《寿栋庐丛书》刊行于世，包括《仪礼奭固》、《礼器图》、《礼事图》各17卷，《周政三图》3卷，《汉师传经表》1卷，《天文图考》4卷，《经脉分图》4卷，《文集》1卷，《诗集》1卷，《卮言和天》8卷。此外，已散失的著述有《诸子通倬》15册，《中国通史》20册，《公羊释例》7册，《小学》4册，《以意录》4册，《蒙山诗钞》1册，《北征记概》一册。

傅樵村

傅樵村，又名崇榘，简州（今简阳县）周家场人，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生（一说1875年生），因迁居成都较早，常以成都人自居。其父傅廷玺系清道光年间举人，曾任江安县教谕。傅樵村早年以童子试第十名入学，应赋试榜列第二。他从23岁开始，先后写出《春秋分目》（14卷）、《麟经类考》（48卷）、《西域古今沿革图考》、《西安防务险要考》、《中西新学提要》、《中外商务丛钞》（100卷）、《考订长江水道图》等。

1898年，傅樵村肄业于成都尊经书院，在书院山长宋育仁所办的《蜀学报》中担任采访，他受宋育仁维新思想影响较深，痛感国家要救亡图存，必须效法欧美和日本，提倡科学，振兴实业，革除时弊，开通民智，他决心致力于宣传教育，以唤醒民众。

1900年，傅樵村在成都桂王桥北街创办图书局，出版书籍、地图。同年12月6日他与算学报馆总教习苏星舫创办《算学报》，因销路不畅很快停刊。他并不灰心，次年又创办《启蒙通俗报》，当时，民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认字的人不多，报纸是刚出现的新生事物，人们还没有看报的习惯。傅樵村在《启蒙通俗报》出版以后，还代理北京、上海等地的报纸。随后，二酉山房，算学书局，安定书

屋等处也仿效傅樵村代办京沪等地报纸，中外各报始畅行成都。傅樵村的图书局还设立了两处阅报公所，预备了数十样报章，供人们阅读。

1903年，傅樵村到日本大阪参观“万国博览会”，他在会上购买了“中国读史大地图”20幅，以及誊写板，真写五色板等，带回四川，从这时开始，成都地区开始印刷彩色印件。

1905年，傅樵村被委任为“彩商会议所”商董，开办“富记彩票行”，承销彩票。

1906年，傅樵村又在图书局办了印刷公社进行石印和铅印，他还将《启蒙通俗报》改为《通俗日报》，每天出1张半，他自己从事编辑。1909年，傅樵村又创办了成都第一家画报——《通俗画报》，这样，使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人也能从报刊上获得一些知识。同年，商务局总办沈某委托傅樵村办东洋车行业，傅氏于是在福德街创立“工业馆”，雇木铁匠100余人，制作了100余辆东洋车（即人力车、黄包车）。最初，四川总督不许洋车在市内行驶，只能沿城墙边的道路行驶，但一两年后，东洋车即遍行成都城内。

1911年，傅樵村赴湖北期间，《通俗画报》因鼓吹保路运动，于7月被清廷查封。10月初，傅樵村返川后，恢复了《通俗画报》的出版，并鼓吹民权，不久又因遭兵乱再度被迫停刊。次年6月，又以合资形式复刊，傅樵村任编辑和绘图员。

傅樵村一生最重要的著述是《成都通览》，他收集了有关成都各方面的资料，一人独自写成此书，1909年9月出版第一册，次年出齐。全书共8册，约30万字，以志书体例成书，内容极为丰富，包括成都的地理、沿革、气候、河道、场镇、学校、工商、农业、邮政、古迹名胜，物产、民俗、方言、儿歌等，是研究清末成都社会历史的重要文献。

傅樵村因经营彩票不善，经办彩票发行的人又从中舞弊，造成“富记彩票行”的严重亏损，当时，成都知府王棪之弟王羡门设下圈套，逐渐将他的印刷公社吞并，他的报纸和所办的学堂也随之停办。

1915年，傅樵村离开成都到松潘赴任知事，他徒步而行，沿途查访，到任后，他又考察民情风俗，名胜古迹，写出了《松潘游记》一书，不到一年傅樵村即离任回成都。他担任过成都红十字会长，1917年，川、黔军阀成都混战后，百姓死伤甚众，傅樵村负责赈济工作，事后还出过1本画册，由他作序。1919年秋，傅樵村逝世于成都。

周达三

周达三，名永德，华阳（今成都）人，1856年（清咸丰六年）3月28日生。

明清之际，四川连遭兵燹，经济文化备受摧残，出版业濒于灭绝。清乾隆年间才有江西籍书商陆续来成都开业。其中周达三之祖父周舒腾（江西金奚谷人）在学道街创设的“尚友堂”是最早的一家，主要经营江浙刻本的经、史类书籍及丛书类。生意兴隆，颇受成都读书人的欢迎。随后周达三之父周承远也在同一街上开设一新书店“九思堂”。其时周家家境宽裕，使周达三从小就有一个较好的读书环境。

清同治初年，周家开在学道街的“尚友堂”和“九思堂”皆因一场大火毁于一旦，从此家道中落。少年周达三只得弃学从商，于1866年在其父的学徒王述斋开设的“志道堂”学习书业。他对目录版本学颇下功夫。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创办尊经书院，聘著名版本学家缪荃荪来成都协助编纂《书目问答》。周达三趁此良机向缪荃荪求教，受益不浅，学问猛长，目录版本知识在成都同行中首屈一指。加之他待人谦恭有礼，因此文化界人士特别是尊经书院师生多乐于与他交往。“自光绪五年至二十六年，凡隶‘尊经’籍者，无论先后皆从达三游，自旦至暮宾客常满。”

“志道堂”在周达三经营下业务发展顺利。数年后，王述斋又在学道街另开“志贤堂”和“翰缘堂”两书店，“志道堂”改名“志古堂”作总号，全权委托周达三负责经营。

“志古堂”在周达三主持下，出书500余种及10种发蒙初学教科书。因其选题谨严，校勘精细，印装质量讲究而声誉较高。大型丛书《玉海》和《十七史商榷》、《劝学篇》、《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盛世危言》、《文史通义》、《湘军志》等等都是由周达三本人亲自校勘后出版的书。“志古堂”所出版的书籍多与张之洞在尊经书院提倡的尊经、读史、通小学的精神相一致，因此，备受尊经书院师生青睐，张之洞见“志古堂”所出书籍质量上乘，便资助周达三银子300两让其校刻难度较大的“说文解字”。周达三如期高质完成，这部书在学院考试期间，广为传用，“志古堂”名声亦与日俱增。周达三还为总督吴棠监刻“望三益斋”（吴的斋名）本《韩诗外传》和《杜诗镜铨》两书，皆以校刻俱精而闻名于世。

戊戌变法期间，“志古堂”顺应历史潮流，出版了一批康梁著作及《盛世危言》、《劝学篇》等鼓吹变法图强的书，在青年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吴玉章在回

忆录中写道:他当初之所以"成为康梁的信徒,一心要做变法维新的志士",就是因为读了"志古堂"出版的有关康梁论著的新书。

"志古堂"在周达三的苦心经营下,业务发展迅速,由原来的一家平常小书坊,发展为有职工70多名,具备较强的校勘、刻印、发行能力,在省内居于大型出版书店之列。

周达三不慕虚荣,淡泊名利。所生四子以诚、廉、朴、谦四字取名。并以"刻己为俭,俭人为刻"教子。他经营"志古堂"半个世纪,"为肆重致富数万金",但在经济上一清二白。光绪年间刘秉璋任四川总督时,其幕友力劝周达三纳资捐官,被他婉词谢绝。民国初年,政府欲授予他荣誉职衔,他坚辞不受。

清末周善培任四川劝业道,锐意改良,创设成都总商会。他登门恭请周达三出任商事裁判职,周达三任职10年,尽力调处商界纠纷,力求公平合理解决。至他晚年以德高望重被总商会推为会长。

周达三长期任"志古堂"经理,言传身教为木书业培养了不少人才,这些人分布在木书业各店和高等学校,形成一支骨干技术力量,较有成就者如袁西坪、汪德久、陈怀清、黄致祥等。黄致祥1930年开设"茹古书局",继承了周达三优良的作风,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周达三于1922年10月27日病逝。生前好友、著名经学家廖平为周达三撰写了墓志铭,文中写道:"此三十年蜀学之盛比于齐鲁,虽诸贤之自立为不可及,而达三补苴提挈之功不可没也。"

黄吉安

黄吉安,名云瑞,别号余僧,祖籍安徽寿春,1836年(清道光十六年)生于成都。早年应童子试,30岁以前曾在军营中做文书,后在一些县衙任幕僚。1896年,他因不愿与县令同流合污,从璧山县衙离职回到成都。

黄吉安辞职回乡后,潜心于戏曲创作,他最初是写扬琴曲本。当时成都的北派扬琴艺人因上座率差,生活十分贫困,黄吉安常将自己新编的曲本赠送给他们,演出后,颇受听众欢迎。后来,南派扬琴艺人也争相采用黄吉安写的曲本,使两派技艺特长互为增辉,发展了扬琴艺术。黄吉安还将某些曲本的题材改写为川剧剧本,赠与玩友社演唱,成了当时玩友界较流行的本子。

1902年,四川警察传习所总办周孝怀在川推行新政,改良戏曲,特聘黄吉安

到“戏曲改良公所”专门创作和整理戏本。他的作品陆续刊行流世，人们将他创作的剧本和曲本统称为“黄本”。他一生经历了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重大事件。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对他影响很深。他编写的《朱仙镇》、《黄天荡》、《林则徐》、《三尽忠》等剧作，热情讴歌了岳飞、林则徐等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对于卖国求荣之辈他极为憎恨，在《江油关》一剧中，他冲破史实的局限，将马邈这一角色“处了死刑”，他认为不杀马邈“何以辨忠奸，判曲直?”他还为揭露洋烟害人而写了《断双枪》，为破除迷信写了《邮水投巫》，为宣传放脚而写《凌云步》等剧作，都是感时为事而作。

黄吉安创作认真勤奋，常通宵伏案，每完成一个本子，他就拿到戏班去征求艺人们的意见，请他们对场口处理和唱词的韵律等予以订正。他的剧本文词比较通俗，合辙押韵，而且多是一韵到底，故很受艺人欢迎。他创作的剧本及扬琴曲本，有很多都无偿的赠送给生活艰难的艺人。著名的川剧团体“三庆会”演出的很多剧目的剧本都是由黄吉安赠送的，如《柴市节》等，一直是“三庆会”的窝子戏。他一生创作相当丰富，川剧剧本80多个，扬琴曲本20多个。较有代表性的川剧剧本有《柴市节》、《林则徐》、《百宝箱》、《黄天荡》、《江油关》、《木兰从军》、《朱仙镇》、《三尽忠》等；扬琴曲本有《清风亭》、《活捉三郎》、《香莲闯宫》等。由于他创作多产，质量也高，被人们称为川剧中的莎士比亚。黄吉安除写剧本和曲本外，也写诗歌，一生集有《余僧诗稿》6卷，共570余首。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他愤而写下《庚子六月闻谣》一诗：“姑听讹传未足凭，烟云变态几番增。望洋搔首澜谁挽，破浪同心风可乘。”迫切希望与爱国志士一起力挽祖国厄运。他还在《清心歌》一诗中呼吁国人学习岳飞、于谦等先驱的爱国精神，为中华的崛起而奋斗。

黄吉安1924年逝世。他一生在川剧、曲艺界的影响广泛、深远。1952年，在全国戏曲会演上，著名表演艺术家贾培之、周企何演出了黄吉安的代表作《柴市节》一剧，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好评。他的另一代表作《百宝箱》经整理改名为《杜十娘》，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四川省戏曲研究所从他的遗作中选出了有代表性的18个剧本，编辑成《黄吉安剧本选》，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60年正式出版。

骆成骧

骆成骧，字公驌，资州（今资中县）人，生于1865年（清同治四年）。9岁时即就读于成都锦江书院。17岁应州试，试文为知州高培谷及特聘来资州襄理考试的杨锐、范溶等人所赞许，特置首选，旋以岁试第一调成都尊经书院深造。因其刻苦勤奋，学业大进，为书院主讲王闿运所器重。

1893年，骆成骧以第三名中举。翌年，入京会试落第，困留北京，后经友人推荐，代馆教八旗官学。1895年，会试得中，接着参加殿试。光绪皇帝临轩策问，骆成骧在其长篇策对中，论证答问甚详。全文谈古论今，针对时弊，提出了整军练兵、惩治贪官、厉行节俭、兴修水利等项"自强之计"。其文词旨切直，而缮录试卷，又一破常格。策入，副考官、侍郎李若农等争置第一；正考官、尚书徐桐抑置第三。时值甲午战败，以康有为等为代表的变法图强的维新运动，正在全国蓬勃开展。光绪帝面对清室危亡，颇思改革自强，趋向变法维新。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极端仇视变法、借"祖宗之法"不能擅改为由，横加反对阻挠。骆成骧的殿试策，引经据史，论证变法自强不但符合"祖制"，且又势在必行，这正合光绪帝的心意。当徐桐将前10名荐卷呈皇帝亲阅时，光绪帝即被骆文所打动，特"钦定第一"，骆成骧遂成为清代四川惟一的一位状元。骆之名由此蜚声蜀中，有关他被点状元的传闻，也众说纷纭，从而助长了"新学"在四川的流行。

骆成骧中状元后，授翰林院修撰。其时康有为也因参加会试并发动"公车上书"滞留在京，曾去四川会馆拜望骆，并与之谈及变法问题。骆成骧后来在《祭蔡松坡督军文》中曾写道："甲午乙未，隐忧谁恤，我告南海，渐之勿急"。

1898年春，骆成骧与杨锐等同乡京员创设"蜀学堂"于北京，讲习新学。同年夏，调任京师大学堂提调。1900年简放贵州秋围主试，途经湖南，即闻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又适逢母丧，遂告归故里。服阕回京后，改放广西正主考。1906年得官费派往日本攻读法政，学习期间与留学诸友译16国宪法条文，汇编为《宪法议院法渊鉴》，又辑《议院法》附于后，并为之作序。1908年回国后，应广西巡抚张鸣岐之聘，主持桂林法政学堂。1910年奉调任山西提学使，"履任后，毅然以兴学为务，虽僻壤必亲往察核。州县虚应者必黜，大吏为请亦弗动，使署乃肃然，奉命毋敢陨越。"又建议修改学部章程数十条，全省学务为之大变。

1911年辛亥革命倾覆清廷，骆成骧乃携眷返蜀，寓居成都。1912年夏，被推任四

川省临时省议会议长，因不愿介入日渐兴起的政党之争，不久即辞职，退而办学。从1912年底起，他出任四川高等学校校长直到1916年该校停办。任职期间，为了把高等学校延续下去，作为开办四川大学的基础，当1912年教育部下达取消高等学校的决定后，骆成骧仍力争于1913年招收了两届正科新生213人，直到1916年学生全部毕业为止。1915年9月，又以四川高等学校名义，向当时四川省巡按使陈宧呈文，痛陈四川应尽快设立大学的6条理由，提出在四川高等学校的基础上改立四川大学，先设4科，招收12个班。高等学校停办后，骆成骧以该校管理处处长名义，管理校产，保护校址，处理善后。1922年管理处改称四川大学筹备处，乃留任处长，继续为筹办四川大学而奔走筹划。与此同时，骆成骧还在四川法政、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等校任教，并筹建了设在成都的资属中学。1923年，又继廖平执掌四川国学专门学校。

骆成骧一生以清廉自守，不求高官厚禄，清贫一世，有"穷状元"之称。1914年王闿运任国史馆长，邀骆至京任史馆纂修，数月后即告归。留京时，正逢张锡銮以镇安上将军节制东三省军务，请骆去东北主持民政；回川过鄂时，黎元洪得袁世凯电，命其主持四川民政，骆皆一一辞绝。本其遗老立场，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十分不满。1915年8月，袁世凯一手策划在京组织筹安会，为制造全国拥戴其称帝的"民意"，亟欲得海内名人劝进，以骆成骧负人望，乃遣成都县知事往之游说，冀推骆为川、滇、黔三省筹安会会长。骆闻言大怒，"瞋目叱之，令（知事）悚惧退。"次年，又为四川巡按使陈宧代拟讨袁电稿三则，劝袁退位，并宣布四川"独立"。陈的通电倒戈，对袁精神上的打击十分严重。在举国一致的声讨中，袁眼见众叛亲离，大势已去，于6月6日忧愤而亡。骆成骧闻袁世凯死讯，大喜过望，对人说："吾得为景帝杀一贼，于此可以觇成骧之志矣。"

骆成骧晚年力倡"强国强种"的体育运动，被推为成都"武士会"会长；又募集资金，建国术馆于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尤喜射箭，创"射德会"，常言：射以观德，不仅止于御敌强身也。

1926年，骆成骧病逝于成都。有诗文集《清漪楼遗稿》等行世。

曾懿

曾懿，女，字伯渊，又名朗秋，生于1852年（清咸丰二年），华阳（今成都市）人。父曾咏，清道光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江西吉安府知府诸职。母左氏，名锡嘉，贤淑多艺。

曾懿天资明敏，淑婉纯和，幼承家

训，经史诗词，过目成诵，其父钟爱备至。父卒之时，曾懿年方10岁。其母左夫人遵夫遗嘱："父母在堂，愿卿归侍。"遂携子女还蜀，奉亲居住华阳乡下。曾懿兄弟姊妹10人，其长兄、仲兄为官在外，大姊已嫁，时在母身旁者，以曾懿为长。她年将及笄，承志家风，伺母之余，教诸妹以针黹，授幼弟以诗书，无不曲体亲心。后奉母卜居浣花草堂。其母素雅多才，工诗画，时以书画自娱，曾懿随侍笔砚，遂通绘事，并以丹青运于女红，所绣山水、花卉、翎毛，无不酷肖，精细入微，故名满蜀都。

左夫人爱重其女，曾懿年20尚未许字，必欲择一快婿，遂得江南名士袁幼安。袁幼安（又名学昌），江苏阳湖人，才学出众，无文不综，且酷好金石，与曾懿婚后，同心和协，风雅唱随，朝夕讲求，乐以忘忧。因此曾懿学问益进，绘画精于山水，书法专于篆隶，至于诗词，则各体俱备。

自光绪辛巳（1881年），曾懿从袁幼安宦游闽、皖、赣诸省，凡20多年。此间，曾懿虽身居官廨，操持内政，诸事繁纷，然不废学问，特别在文学和医学方面，造诣更深，卓有所成。

1903年春，曾懿随袁幼安宦安徽桐川，将昔日所作诗稿辑为《古欢室诗词集》4卷。诗词新清，声情悠越，感遇深远，有李清照之风，可歌可诵。

曾懿早岁多疾，家藏医书十分齐备，暇时留心研习医理，攻读《内经》、《伤寒》及时贤诸书，渐至通医。时值川西一带温病流行，庸医不识寒、温之别，泥执古方，以治今人之病，每误人性命。曾懿甚为感慨。她从研读近世温病家的著述中悟到：古医典不可不读，但不可一概拘泥，古医方不可不循，但应当重在运化；对古方古法，应当"潜心体察，掇其精华，摘其所偏，自能豁然贯通，变化无穷"；对不同的病症，应当辨证施治，针对用药。特别是伤寒、温病，更当首先加以鉴别，不可以疫为寒，寒疫混淆，造成误治。她尤受益于清代名医吴鞠通《温病条辨》一书。曾懿一生经四次温症，皆赖运用此书的理论与方药，得以转危为安。曾懿既通医，家人、亲朋、邻居有疾，每为诊治，辄多效验。凡数十年，理益精而验益丰，她不仅治愈了许多疑难疾病，而且对温病、妇科、幼科等疾病的诊治有不少新的认识。为有益于世，她将伤寒、温病二症病情之异及治法之别，分辨明晰，详辨数章，温病按风温、春温、温热、瘟疫、温毒、暑温、湿温、温疟、秋燥、冬温之异，分别论治，又将温病传入中焦，下焦之救逆法，一一载明；又从《温病条辨》、《温热经纬》诸书中，摘录有关方药，明澈显要，使之一目了然；并将生平经历医效古方、时方及自制诸方，选其灵验素著者，分成伤寒、温病、杂症、妇科、幼科、外科等类，于1906年著成《医学篇》8卷。次年秋刊于湖南长沙。书出，不胫而走，受到医界的重视。复于1933年由苏州国医学社重辑再版，名《曾女士医学全书六种》。医

学界认为，中国历代女医家较少，尤罕见女医家有著述者，曾懿这部有创见的著作，是中国近代较早的一部传世医书。

同年，曾懿又著《女学篇》1卷（并附《中馈录》1卷）。

曾懿随夫宦迁，“涉大江，越重洋，遨游东南各行省”，耳闻目睹清廷腐败，列强虎视，“夹我属国，跨我港湾，攘我主权，干我内政”的社会情状，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十分忧心。其时革旧维新之论日兴，曾懿以为国家兴亡，重在教育，“我国幅员之广，包罗四万万人之众，而女多于男”，“陶融女子，还以读书明理为第一”。因此她大力提倡女学，其主张括而为三：“教育子女，各尽义务，所以培植国民之基础也”，此其一；“勤俭劳苦，家给人足，所以筹划家政之根本也”，此其二；“医学卫生，以保康强，所以强大种族之原理也”，此其三。此三项主张贯穿于《女学篇》中。

曾懿认为，中馈之务，亦为女学之不可略，遂将家用食物制造诸法，介绍于《中馈录》中。

以上《医学篇》、《女学篇》、《中馈录》，后又合称《古欢室医书三种》，实遵曾懿“医学救国”、“女学救国”之旨。

1907年以后，曾懿随夫入京。晚年居诸子家，诗画之外，仍以医自娱。1927年冬，病卒于北京北池子23号次子袁励準家中。

颜　楷

颜楷，字雍耆，华阳县（今成都市）人，生于1877年6月4日（清光绪三年四月二十三日），祖籍山东曲阜。世代官宦，曾祖父颜朝斌，曾任湖北提督，祖父颜海飚、父亲颜辑祜（字伯勤）亦任过知县。

颜楷幼承庭训，聪颖好学。14岁时，随父寓北京。年16，考中南学（清廷贵族子弟学校），列名第二。引起主办南学的军机大臣翁同龢的注目，惊其年幼，特令坐桌侧，亲自出题复试。看到他文字双绝，大为叹赏，十分高兴地说：“为南学得一隽士矣！”后来，颜楷又从知名学者王闿运就学于湖南衡州东州书院，也受到王的器重。一次同游江渚，王独目楷说：“返朴还淳，其在此子！”王闿运主讲四川尊经书院时，曾收颜伯勤为院外生，故父子同师，一时传为佳话。

颜楷之父在京时和川籍京官刘光第、杨锐交谊颇深，刘、杨经常与其父往还，颜楷以晚辈随侍在侧，聆听议论，深受维新思潮的感染。“戊戌变法”失败后，颜楷目睹六君子悲壮就义的惨痛局面，不禁放声大哭，回到家里仍气愤不

已。他痛感国事蜩螗,万分悲愤,寝食俱废,几乎精神失常。其父怕招致祸患,乃将他送至甘肃舅父家暂住,不久,又送回四川,入华阳县学。

1902年颜楷考中举人,1904年在开封会试又考中进士。翌年被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帝国大学研习法政。二年后回国供职翰林院,授编修加侍讲衔。1909年,广西巡抚张鸣岐因与颜楷是"南学"同窗,奏调颜到广西协办新政,以巡抚衙门总文案兼办法政学堂和监狱学堂,为推行新政培养人才。

1911年5月,颜楷从广西回成都欢度婚期,时值四川保路运动兴起,由于他通晓法律,清望较高,其父又和行将上任的四川总督赵尔丰是同寅,亲友耆绅们都纷纷前来争取颜楷参加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领导争路运动。他在伍肇龄、邵明叔、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人的敦促下,抱保路救国之宗旨,在"文明争路"的原则下,接受邀约加入股东会。

6月17日,1000多人参加了在成都岳府街川汉铁路公司召开的在省股东代表临时大会。会议由颜楷主持,会场上激昂慷慨的场面使他深受感染,激起了他爱川爱国的强烈情感。会上,正式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8月5日各地股东代表在成都召开股东大会,选举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会,颜楷与张澜分别被推选为正、副会长。此后,颜楷屡次同就任四川总督的赵尔丰力争,疾呼:"筑路系国家安危,积资为川人血汗,不能不拼死力争。……"到23日,股东大会决定自24日起,全城开始罢市罢课,一切捐税概停缴纳,并通知全川各县一齐实行。次日,市面停业,气氛十分紧张。8月27日,颜楷、张澜代表股东大会到总督衙门去见赵尔丰,要求撤换与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勾结的川汉铁路公司宜昌分公司经理李稷勋,毁约、保款、保路以平民愤。赵尔丰主张开市、开课,相持不下,又发生一场争论,仍然不得结果。

9月7日上午,督院开列名单帖请铁路公司股东会正副会长和同志会主要负责人,到督院开会,声称北京有好消息来,立待磋商。罗纶、张澜、彭兰芬、王铭新、邓孝可、叶秉诚、江三崤、胡嵘等人,纷纷到院,蒲殿俊随后赶到。这时,颜楷正在青羊宫陪父下棋,庙外被前来逮捕的军队包围,但表面上仍然是帖请开会。颜楷以中年儒者的姿态,安定闲适地乘轿由武装10余人押送入督院。门前卫兵喝令下轿,颜在轿内怒斥卫兵:"你知道我是什么身份?"吩咐传名片进去。由于翰林有天子门生地位,有权直接拜会总督,颜楷乃乘轿进入督院。这时,先到的人,已全部被缚,蒲殿俊、颜楷后到,也被拿下。接着,赵尔丰一面派兵到颜楷、蒲、罗等人家中搜查,一面下令紧闭城门,断绝对外交通。全城人心大愤,数以千计的群众,涌到督院请愿,要求释放被捕的人。赵尔丰令军队开枪,打死打伤群众数百人,制造了震动全国的成都血

案。惨案发生后,各县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军"围攻成都,形成了大规模全川反清武装起义。10月16日,赵见大势日益恶化,将张澜等人交保释放,但仍扣留颜楷、蒲殿俊、罗纶、邓孝可4人不放。直到11月15日才把关押两个月零九天的颜楷等4人释出。11月27日成都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蒲殿俊作了18天的"都督",便因赵的部队在东较场闹军饷哗变,成都秩序大乱,蒲以无法控制局势下台,由尹昌衡出任都督。

此后,颜见大局粗定,即开始闭门读书,不问政事,尹昌衡和军政府的要人们再三恭请他出任"宣慰使",但他辞谢未就。赵尔丰被斩杀以后,一些恨赵的人,主张戮其子孙,颜楷坚决反对,并将赵的孙儿收养在家住了数年,后送回原籍。

颜楷早年,受维新变法影响,中年以后,思想逐渐变化,既崇尚儒学,又趋向佛老。尝名所居为"四师精舍"。在其所作铭文中说:"德行槐轩,文学湘绮,名儒曲园,师相瓶生。此四先师者,皆予小子,请业受知,再传承学者也。"槐轩即四川名儒刘沅,湘绮、曲园即著名学者王闿运、俞樾,瓶生即翁同龢。颜楷以此四人为师,服膺其学。辛亥革命后,他无意仕途,不再参与政治,转而从事教育。1914年,出任四川公立法政学校校长,他注重教学质量,成绩斐然。1918年辞职回家,同夫人周辛士鬻字鬻画,养亲赡家,安贫乐道。又与刘仲韬合办"乐善公所",捐办赈济事业。1927年3月7日因病逝世。他逝世前的题照诗曰:"半百光阴一瞬过,知非知命意云何?扬尘沧海寻常事,身外存身总不磨。"正反映了他晚年的世界观。

颜楷从16岁读"南学"起,即开始习书法治印,临碑功力深厚,后期书法更臻成熟精妙,凝练刚劲,浑厚雄放,自成一家,名著全川。他公开卖字以后,叩门求书的人络绎不绝。今成都人民公园内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南面题字即其手笔,笔势挺拔遒劲,至今受到人们赞赏。

漆南薰

漆南薰,名树棻,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生,江津县(今江津市)人。自幼聪颖好学,"稍长、重气节,慷慨有大志"。在江津中学堂读书时,于家中墙上奋笔题写岳飞的爱国诗篇,抒发救国之志,并用以自勉。后因反对学校当局迫害学生而被无理开除,转赴成都入成都府中学堂。他学习成绩优秀,对政治的兴趣很浓。

1915年漆南薰赴日本留学,先后就

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和第四高等学校。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部，受教于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在其影响熏陶下，逐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大学三年级起，即潜心搜集大量有关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资料，通过分析研究，撰写了《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的毕业论文，深受导师河上肇的赞许。

1924年，漆南薰学竟归国，任教于上海法政大学，继续深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在毕业论文的基础上，于1925年写成了一部约30万字的专著《经济侵略下之中国》。全书以揭露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中国的罪行为理论中心，在中国政治经济学界第一次根据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基本原理，科学地提出了“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这一本质问题，揭示了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旧中国遭受列强残酷蹂躏的根本症结，开创了近代中国经济史上的新篇章。当郭沫若在得到此书手稿后，手不释卷，“读了一昼夜，一口气便读完了”，并惊喜望外，欣然为之作序。

《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于1925年10月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特别是青年学生，争相购买，不到1月，全部销完。到1929年，已刊行到第六版。许多进步青年，在此书的引导影响下，毅然投身革命。

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漆南薰积极参加群众反帝爱国运动。同年，他还应郭沫若之邀，参加创办《洪水》半月刊。

1926年初，漆南薰回到重庆任《新蜀报》主笔。在返川途中看到的是一幅幅令人触目惊心的景象：军阀把四川变成了“军械的世界，鸦片的世界”，使他“伤心惨目”，更激起了他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无比愤恨。在《新蜀报》工作期间，他几乎每天都为该报写1至2篇富有战斗性和鼓动性的社论或时评，热情宣传革命，并以犀利的笔触，揭露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相勾结的种种罪行，道出了人民大众的心声，被誉为继萧楚女之后的一位“有声有色的报人”。

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担任“北京惨案重庆后援会”的委员，投身于群众抗议运动的组织工作，并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揭露惨案真相，分析惨案发生原因，驳斥段祺瑞政府嫁祸于人的谬说，旗帜鲜明的提出了实行国民革命的口号。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漆南薰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愈来愈深刻地认清了国民党右派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他在1926年夏季以后发表的大量文章中，系统地阐述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此同时，他作为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左派)执委会常务委员，与共产党人亲密合作，并肩战斗。他同中共重庆地委负责人杨闇公、刘伯承、吴玉章、冉钧等保持密切的联系，代表共产党同他直接联系的就是刘

伯承。在当时重庆和四川的每一项重大政治活动中，他都挺身而出，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同共产党人和其他国民党左派人士一道，大力动员、组织群众开展一系列革命斗争。他是重庆五卅惨案周年纪念会的负责人；是重庆新闻界雪耻大会的执行委员；是重庆“七二惨案”周年纪念大会的宣传主任；是万县“五九惨案”全川外交后援会总务部执行委员。他还兼任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向时俊师（第五师）政治部主任和由吴玉章、杨闇公等创办的重庆中法大学兼职教员，在军队和学生中进行政治教育工作。

漆南薰十分重视对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写了许多阐述革命理论的通俗文章和小册子，以唤醒民众，并经常深入人群中进行讲演。反动军阀对他恨之入骨，指使歹徒恐吓、阻挠，他泰然处之，不予理睬。妻子凌树珍为他的安全担忧，他风趣地说：“一百年的老公鸡就死一回，怕什么！”

1927年3月24日，英、美帝国主义为阻止北伐军胜利进军，炮击南京军民，制造了死伤数千人的“南京惨案”。重庆各群众团体在中共重庆地委领导下，决定于3月31日在打枪坝举行“重庆各界反对英帝炮击南京市民大会”，漆南薰被选为大会总主席。会前已经获悉，反动军阀要下毒手，特别扬言要杀杨闇公、漆南薰等人。漆南薰毫不畏惧，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对妻子说：“不打倒军阀，活着也没有意思。‘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为打倒军阀而死，重于泰山，死有何憾？”31日晨他与五师政治部教官封岳崧一起赴会，途中一位师部副官匆匆赶来劝阻，漆南薰回答说：“我们是得去的，纵有危险，也不打紧。”当漆南薰登上主席台正准备主持大会时，被早已潜伏在会场中的暴徒开枪击中，随后他跳城墙时，又被埋伏的暴徒抓住，以枪托击昏后，用马驮至浮图关蓝文彬师部，经验证确实，拖至两路口用刀肢解，惨遭杀害。

张森楷

张森楷，原名家楷，字元翰，号式卿，晚号端叟，别号石亲。生于1858年10月24日（清咸丰八年九月十八日），合州（今合川县）人。自幼读书勤奋，才思敏捷，被称为“神童”。18岁时，以成绩优异得四川学政张之洞赏识，奖给《輶轩语》和《书目问答》二书，并获选入州学；一年后入成都尊经书院深造，与合州同学丁治棠、戴子和、彭耀卿分别夺得经、赋、文、史各科魁首，时称“合州四隽”。

他长于史学，题家中书斋为“通史堂”，决心以30年辛勤耕耘，期于有成。他做学问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惜时如金，二是锲而不舍，即使百事纷扰，旅途客栈，均有囊橐在身，内装书籍稿本，纸笔墨砚，以便不断读书写作。他曾自拟一副对联警语，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十二时中莫欺自己，廿四史内当比何人”。

张森楷21岁就读于锦江书院，通过八载萤窗功夫，完成《通史人表》296卷，《廿四史校勘记》337卷。1886年，他任合州振东乡校主讲，执教7年，苦无教材，先后编撰了《文字类要》、《同声字谱》、《选韵无双谱》、《通俗正名杂字书》、《声律典丽》等教科书125卷。此外，史学研究上也有重要成就，完成了《左史长义较》1卷，补订完《通史人表》从汉到晋64卷；对《廿四史校勘记》作了第4次修订。1892年，受川东道黎庶昌器重，纳入僚幕从事著述。1893年张森楷中癸巳恩科举人。在参加礼部考试时，将《通史人表》及《廿四史校勘记》例言石印本，分送京、沪、江南博学之士，恳切求教。他将学者们所提意见，辑为《师友赠言录》，置于《通史人表》卷首。1895年，受聘尊经书院襄校。他在尊经书院讲学三年间，将《廿四史校勘记》的北齐、北周、北史、隋、唐部分补齐。著名学者宋育仁极为推崇张森楷，约他编纂《历史邦交录》，成书100卷。1898年，张森楷任雅州府学教授。次年，《廿四史校勘记》补订完成，同时完成的还有《历代艺文经籍异同出入存佚表》10卷。张森楷任邻水玉屏精舍主讲期间，对《通史人表》作了进一步修订。

张森楷生当列强瓜分中国，民族危机空前深重时代，他深怀忧国忧民之心，希望通过启迪民心，发扬光大祖国灿烂的历史文化来求索救国之道。为此，他编著《通史六鉴序例并求友引》、《经子时务杂钞》10卷。但是，经过戊戌变法的失败，八国联军占京津，使他感到空言难论，于是把希望转向实业救国。早在1894年，张森楷由京抵沪，见申报商业栏中罗列丝目，“唯蜀为最劣”，因“有改良蜀丝意”。他究其根源，认为改良蜀丝，“则非先从事种桑养蚕不可。”

1900年，张森楷与井研县施燮傅及同乡曾雨珊酝酿成立“四川蚕桑公社”。经筹商后，张森楷于1901年历鄂浙等省，考察蚕学办法，延聘教习、工师，择购桑秧、蚕种、仪器。1902年蚕桑公社正式成立。1906年，川督锡良将四川蚕桑公社更名为合州大河坝蚕桑公社，张森楷为蚕桑公社拟定章程26条，内载《招股》、《筹款》、《购器》、《种桑》、《养蚕》等目。为在全川推广新式种桑、养蚕技艺，他又开办“四川民立蚕桑中学堂”，并亲往日本考察蚕桑事业。回国后，大力推广新法养蚕，培成桑种，送人树艺，试验蚕种，送人养饲。他在四川各地推广的“鲁桑”（一名“湖桑”），是由浙江海宁、石门等处购回培植成功的。

在张森楷的苦心经营下，合川地区

蚕桑事业蒸蒸日上，各地“来学者百数十，校舍不能容”。风气一开，全省出现了一派蚕丝生产的兴旺局面，“桑社如笋，桑株如荠，丝厂如林，岁进千余万。自光绪三十年，蜀省一岁丝，综计售银四千六十九万余两，关税所课银值六十一万余两”。

1911年，川督赵尔丰逮捕了保路同志会、咨议局、铁路公司负责人蒲殿俊、罗纶、张澜等。张森楷挺身而出，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全力营救被捕的蒲、罗诸人。

1912年，川汉铁路股东会议会举张森楷任铁路公司总理。在任职期间，他严禁滥支路款，清查历年路股收支情况，使不轨之徒无从营利。因而，他又成为一些人的攻击对象。这帮人利用他们一手把持的股东会，罢免了张森楷铁路总理职务，并进而诬告张森楷“亏挪路款，献款熊逆”，由四川都督胡景伊下令通缉。张森楷义愤填膺，不得已连夜出走，上京申诉。1914年初，他在北京将《二十四史校勘记》中《史记校勘记》辑出，重加校订；又完成《史记新校注》133卷。1915年，北京总检察厅饬令四川法庭为张森楷提起公诉，依法追究彭芬等人诬告罪行。

1917年，张森楷受合川县知事郑贤书聘请主编《合川县志》，历时五载而告竣。1924年，应宋育仁聘，赴成都撰《四川通志》的《历代地理沿革表》和《历代职官沿革表》。

1925年，张森楷受成都大学校长张澜聘，任成都大学史学教授。任教期间，他深感岁月蹉跎，著述未竟，遂于1927年6月，辞教授职，携所著《史记新校注》等稿本北上。先到天津，后至北京，以严肃认真态度再次校订《史记新校注》。为了使自己的著述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不分昼夜地工作。经过两个月的呕心沥血，《史记新校注》133卷终于定稿。不幸的是，张森楷因劳累过度，一病不起，1928年6月23日，逝世于北京。

康子林

康子林，一作芷林、紫麟，原名康学清，邛州（今邛崃县）固驿镇人。生于1870年（清同治九年）。其父因经营栈房生意不振，遂移居成都四圣祠街。不久父母双亡，家境贫困。康子林8岁时就随其在川剧“老庆华班”中唱花脸的长兄康学元入戏班学艺，从师于名旦彭元子。后又拜“宾乐班”小生何心田、“明珠班”小生傅莱生为师，改习文武小生，在小生行的技艺方面打下坚实基础。

康子林12岁登台，17岁成名。他在成都及川西各县搭过“瑞华”、“宾乐”、“长乐”、“二明珠”及“春林”等班社。由于他技艺高、戏德好，在群众中声誉很高。

1902年，警察传习所总办周善培在川改良戏曲，对从艺人员进行全面考核，康子林名列第一，获大银质奖章。清末，他在观众中已享有“戏圣”的称誉。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一时成都百业凋敝，戏曲界人士生计艰难。次年康子林同萧楷成、杨素兰、李甲生、唐广体、唐德彝等人发起，组成了川剧班社“三庆会”。把戏剧界的从业人士组织、团结起来。康子林被推为副会长（后又任会长）。对戏剧艺术和戏班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良措施，经济上实行民主的分账制，使入会演员能按艺术水平的高低领取薪水，并使入会者老有所养，少有所教。还在会内展开口德、品德、戏德的教育。艺术上建立剧场排练制度，建立以业务骨干为主兼有社会人士参加的“精研会”，探讨如何提高川剧艺术。

康子林技艺精湛，唱腔音色清脆，高低随心，刚柔相济，他在《扫华堂》和《离燕哀》中的一些唱段成了戏迷们在街头巷尾哼唱不绝的流行腔调。他的表演基本功和武功也堪称一绝。无论踢“正尖子”、“偏尖子”（以腿踢额）他都能意到功到，控制自如。他能站在弓马桌上，先踢正面尖子，随即跃下撕一卡子，然后额头与脚尖相碰，旋即弹跳而起，轻捷如猿猱。他的翎子功能使头上翎子绕动自如，无不随心所欲。他还能运用脑项之弹力将头上的紫金冠抛高一尺以上，徐徐向后飞入打杂师手中。他在《断桥》中饰许仙，被青儿撵得跑掉了鞋，鞋在空中翻了个跟头，又被他用脚尖接住套在脚上。他在《三变化身》中的变脸，能在“三变”的基础上发展成九变……凡此种种，为塑造人物所练就的技艺和绝招是当时同辈人中很少有人能企及的。

康子林戏路很广，文生戏以《情探》、《扫华堂》、《评雪》等为最著；武生戏则以《八阵图》、《铁笼山》、《太平仓》、《三变化身》等有名。他也演须生，如《降霄楼》之正德皇帝，《杀狗》之曹庄，《渔父辞剑》之渔父，其表演水平亦非他人所能及。他一生塑造了100多个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如儒雅秦少游，迂腐吕蒙正，负义之辈王魁等，无不形象鲜明，各具特色。他为了成功的塑造生动的人物形象，曾在郊外冒大雪练演吕蒙正这个人物。

康子林除了高超的演技外，还喜读书，他无论经史子集，文艺书刊，都涉猎不少。他所画的淡墨山水也为行家所称道，还能鉴别名画的真伪。他还善唱四川曲艺，他的很多优美唱腔皆从扬琴和竹琴的腔中化新而出的。他喜欢武术，能讲出“内外八法”“七十二拿”的理论，并会几手长拳。他还懂中医，能为他人切脉治病。

康子林在品行上也为人所称颂，他生活简朴，不嗜烟酒。对人谦和诚恳，主

张"君子以道为朋"。在艺术上他不争名利,常为小生萧楷成配戏。演《双洞房》时,他甘当二小生;演《渔父辞剑》时又甘当配角渔父。他还非常热心培养川戏接班人,他倡导在"三庆会"中开办了"昇平堂",为川剧培养了一大批很有才华的演员,如白玉琼,黄开文,晋明权等。他传艺时从不保守,有求必应,既热心授艺,更严于教人,周慕莲、贺云章、刘宗林等戏剧名角就是由他精心培养出来的。

1929年冬,川军潘文华部的军需处长冯石竹在重庆大玩班社。欲以500大洋的色银将康子林"挖"到重庆献艺,康子林不为私利所动,后来才达成"三庆会"全体人员赴重庆演出的协议。演出合同期满后,冯石竹见"三庆会"的演出十分叫座,有利可图,竟不顾康子林年届六旬且早已染病在身,坚持要康子林继续演出《八阵图》和《三变化身》等武功繁重的剧目,康子林只得勉强为之,后来竟因之一病不起。1930年6月24日,康子林病故。蒲殿俊赠送的挽联:"功盖三庆会,名成八阵图",高度评价了康子林的一生。

宋育仁

宋育仁,字芸子,晚年号道复。生于1857年(清咸丰七年),富顺县人。出身于没落地主家庭,5岁丧母,11岁丧父,后随伯父读书于汉州(今广汉),18岁补诸生(秀才)。

1875年,张之洞督学四川,创办尊经书院。第一批选入尊经的高才生有富顺宋育仁、井研廖平、绵竹杨锐、名山吴之英、汉州张祥龄等12人,宋、杨二人尤为突出。尊经书院山长王闿运曾说:"入蜀办学八年,英才辈出,其尤者宋玉、扬雄。"1880年至1885年之际,廖平写出《今古学考》和《公羊春秋补证后序》,主张尊今抑古,托古改制;宋育仁亦写出《周礼十种》,其中《周官图谱》为托古改制提供了蓝图。

1881年,宋育仁因伯母丧回乡守制,时资州知州高培谷创办艺风书院,聘宋主讲。宋在书院三年,渐有文名;所著《周礼十种》等书也见知于士大夫中。当时一些"争揽名俊"的开明官僚,如光绪帝的师傅、户部尚书翁同龢,工部尚书潘祖荫等也很赏识宋育仁。1886年宋进京会试,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时翰林院掌院为顽固派理学家徐桐,极不喜欢宋育仁这类有革新思想的"狂才",宋在翰林院郁郁不得志。时值中法战争后,洋务派的"新政"破产,宋育仁对他们所标榜的"求强求富"产生怀疑并对之进行批判,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自己的改

良主义政治主张。1887年，宋育仁所著《时务论》初稿完成，并开始流传于士大夫中，受到一些人的注意和赞赏。陈炽读《时务论》后，赞宋“管子天下才，诸葛真王佐。”此后，宋育仁与黄遵宪、陈炽等改良派人士交往甚密。陈炽《庸书》写成，宋为之序，比陈为贾谊、王符；宋育仁《采风记》写成，在官书局刻印，陈亲为之校订。

1889年，宋育仁授翰林院检讨。时慈禧玩弄归政光绪骗局，光绪帝举行亲政、加冠、大婚三礼。宋育仁献《三大礼赋》2万余言，颇得光绪的称赞，由翁同龢引见，宋对光绪产生“知遇之恩”之情，至此，宋实质上成为“帝党”一员。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宋育仁与朱疆村、王半塘、刘伯崇避难西山，相互唱和，得词300余首，名为《庚子秋词》，对清末词风之变，有一定影响。以后，宋育仁“慨学唐诗者之迷于气运”，作《三唐诗品》，时人比之钟嵘《诗品》。宋于语言文字之学功夫亦深，写出《说文部首笈正》、《夏小正文法今释》诸书。

1891年，宋育仁典试广西，在途中深感改革不能空谈，应从实际入手，写出专论外交的《时务论外篇》。1894年，宋以参赞名义随公使龚照瑗出使英、法、意、比四国。他来往于巴黎、伦敦，与著名政治家麦格、牛津大学博士麻利公爵、日本政治家望明小太郎、名记者下田歌子等往还；出入于英国议院、学校和社会工商界，著意考察西欧诸国的社会风俗、文教制度、政治生活等，写成《采风记》4卷。他对于西欧国家两院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英国君主立宪 制度颇为赞扬，认为与他在《时务论》中提出的“君民共治”思想是吻合的。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宋育仁时在伦敦。他上书清廷提出：“目前困倭之谋，异日防俄之计”。10月平壤陆军溃败，黄海海战失利。时宋育仁代公使职，他与使馆参议杨宜治、翻译王丰镐等密谋，拟购英国兵舰、鱼雷快艇，招募澳大利亚水兵，组成水师一旅、托名澳大利亚商团，以保护商队为名，自菲律宾北上直攻日本长崎。谋既定，与美国退役海军少将夹甫士、英国康敌克特银行经理格林密尔等商定：由康敌克特银行借款200万英镑、战款100万英镑，买定兵船快艇共10艘，运输船2艘，募得水兵一旅，由原北洋水师提督琅威里率领，“炮械毕集，整装待发”。但是慈禧和李鸿章等坚主和议，1895年3月，中日和议成，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潜师之谋废”。宋育仁“托膺私泣，望洋而叹”。8月回国，在途中写成《借筹记》，记述“潜师之谋”始末并揭露清廷各派系官僚集团误国内幕。

宋育仁回国后，即参加了由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等出面组织的第一个改良主义政治团体“强学会”，被推为都讲，主讲“中国自强之学”。强学会遭顽固派的反对，不久被迫解散。

1896年初，翰林院编修张伯熙保奏

宋育仁回四川办理商务、矿务。3月，宋回四川，在重庆设商务局，兴办各类实业公司，先后开办洋车、洋烛、玻璃、烟卷、药材、白蜡、竹棕、青麻、煤油、煤矿、锑砂等公司。宋提出兴办公司的目的是："保地产、占码头，抵制洋货，挽回利权"；各类公司所办企业的原则是："不招洋股，不借洋款，不动官款"；"官归官本，商归商本，分设官厂商厂，彼此各不相涉"；"官商股分开，各公司自主，商务局不过问"。这些主张和政策，推动了四川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一时在重庆、成都、泸州、嘉定、江北、遂宁等地，民族资本实业纷纷开办，颇有成效。次年，宋育仁还在重庆创办了四川最早的报刊《渝报》，介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宣传改良主义政治主张，提出改革学校教育制度的建议。1898年，宋育仁到成都组织"蜀学会"，兼长尊经书院，并与吴之英等创办《蜀学报》，介绍英国议会章程，西方工商业法规、西方教育制度。翻印《天演论》、《原富》、《法意》等书，宋亲自为《法意》作注，写出《法意钞案》。在他们的影响下，四川各地纷纷创办新式学校：如成都开设"中西学堂"，江津创办"西文学堂"、"算学堂"，遂宁创办"经济学堂"，蓬溪设"崇实学堂"等。此外，威远还创办"农学会"，兴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

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宋育仁虽远在成都，却密切关注这一运动。他与杨锐、陈炽函电往来频繁并提出建议；但是，他也深感忧虑：认为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未从根本"。变法失败后，慈禧下令大捕改良派及倾向维新的官员，宋育仁虽未直接受到株连，但也被立即罢职，回京赋闲。

《辛丑条约》签订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面对反抗怒潮，不得已于1901年发布所谓"变法"上谕，表示要改革"治法"，谋求"富强"。对清廷抱着一定幻想的宋育仁，也上书提出改革财政和改革教育的建议，但他所期望于清廷的改革全成泡影。1908年，宋育仁离京，在湖广总督杨士骧幕中"带职五部"，曾企图在湖北地区进行一些改革。此时，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已蓬勃开展，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在这急剧变化关头，宋育仁以一个改良主义思想先驱者的立场，对资产阶级革命抱着怀疑和迷惘的态度，因而消极颓唐，遂再度赴京。此后蛰居京城，不问时事。

辛亥革命后，宋育仁的老师王闿运任国史馆长，邀宋任国史馆修纂。时袁世凯窃取政权，进行复辟帝制的活动，表示要让"学者兴论，自由研究"。宋育仁站在清朝遗老的立场，与遗老荣乃宣等在京公开宣讲，主张恢复帝制。但宋要求恢复的是清王朝，他指出袁为清朝旧臣，应"效周公辅成王故事，辅佐幼君"，触及袁的痛处。袁大怒，以宋"妄言生事"为罪名，拘宋于京师步兵营中数月。1915年，袁世凯唆使梁士诒等组成"全国请愿联合会"，演出"劝进"丑剧，并派

沈曾植说服宋育仁参加"劝进"活动。宋育仁"愤而佯狂",痛斥袁为王莽。袁遂以"危害民国"罪名令押解宋回原籍"编管"。

1916年,宋育仁回川,时廖平长四川国学学校,邀宋主讲。后宋继任国学学校校长兼四川通志局总纂,主修《四川通志》。宋在国学学校主讲经学,写成《诗经毛传义今释》、《尔雅今释》、《孝经正义》、《礼运确解》等书。纂修《四川通志》时,对史学进行研究,写成《论史学方志》。门人范天杰、胡淦等汇集宋的经学、文学、史学等各书,编为《问琴阁丛书》,约占其著作的1/10,其他著作大都亡佚。此后10余年,宋退隐成都东郊"东山草堂",1931年,《四川通志》初稿写成,宋也于是年去世。

廖　平

廖平,字季平,生于1852年3月29日(清咸丰二年二月九日),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人。廖平初名登廷,字旭陔,号四益,继改号四译,晚年更号为六译。这些名号的更改,反映了他的思想和经学研究的变化过程。

廖平家贫困,少时即参加劳动,艰难从师,颇知发奋,终身勤勉,好学不倦。

1873年,张之洞简放四川学政。第二年举行院试,廖平应考,被录取为第一名,成为秀才。1876年,再应科试,正场题"狂"字,廖平以"獗犬"之义,解《论语·子路》"狂狷"之文,以优等食廪饩,调成都尊经书院深造,学业随之增积长进。

1879年,廖平中举。他在尊经书院攻读,沉浸经术,认为经学虽自小学(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开始,但不得以小学终结。关键在探经之义,达于致用。并从王闿运治《公羊春秋》。1881年,廖平始注《谷梁春秋》,次年成《谷梁集解纠谬》2卷和《公羊何氏解诂十论》。持古文经为周公旦所创,今文经为孔子所创之说,以此分别两家的异同。

廖平认为,经今文学派,尊崇孔子,主《王制》;经古文学派,尊崇周公,主《周礼》,两家可"同治中国"。两家的分歧,在于礼制。著《今古学考》2卷,严于今古之分。其说多前人未发之论,自成一家之言,这是廖平经学的第一变。

1886年,廖平继上年《公羊解诂续十论》之后,三续《公羊解诂再续十论》,定经今古文学异同之防,刊《今古学刊》,自谓历经通人指摘,不能自坚前论,为尊经今学者,作《知圣篇》,辟经古文者,作《辟刘篇》。1887年,作《续今古学考》,自驳旧说。

1889年，廖平赴京会试成进士，朝考三等，钦点即用知县。他以高堂亲老，不欲远出省外为由，请改教职，部铨龙安府（治所在今平武县）教授，历署射洪训导、绥定府（治所在今达县）教授，任中被劾免职。后继任尊经书院襄校，嘉定（今乐山）九峰书院、资州艺风书院、安岳凤山书院山长等职。

廖平于会试后，曾应张之洞之召，转赴广州。康有为与黄季度同访廖平于广雅书局，竟夕晤谈，廖示康有为以《知圣篇》和《避刘篇》。别后，康有为致书，谓廖平好名骛外，轻变前说，急当焚毁。后廖平访康有为于羊城（广州）安徽会馆，畅论所学，遂释前疑。于是康有为本廖平之论，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书，为后来变法提供了思想基础。张之洞致书廖平，谓康有为为廖平的嫡传弟子，梁启超为再传弟子。

这段时间，廖平在经学观点上，以为《周礼》出于王莽之时，有许多为刘歆迎合王莽之意而作。于是专主今学《王制》为孔子之学，古学《周礼》为刘歆羼乱之学。这就是所谓尊今学而抑古学，是为廖平经学的第二变。

1898年，戊戌变法以后，廖平倡言《礼运》大同之说，以《周礼》为春秋以前帝王治中国之书。《王制》为春秋以后治中外万世之书。因此，以经今古文学为孔学大统与小统之殊。又据《诗·商颂·长发》第四章"受小球大球"与第五章"受小共大共"之文，《书·顾命》之天球河图，纬书以河图为九州地图，凡《诗》、《书》中之小大连文者，小字皆在大字之上。于是定天球为天图，小球大球为地图，先小后大，即由内推外之义，而小共小球为小九州，大共大球为大九州。

廖平以为经今古之分，一为方千里之小九州，一为方六千里之大九州。而《周礼》与《王制》大小不同，"一内一外，两得其所"。其说集于《地球新义》、《王制集说》、《皇帝疆域图》等。

自《地球新义》一出，见者骇而哗然。张之洞以"风疾马良，去道愈远"为戒，廖平不以为意，改经今古学之名为大小之学，这是他经学的第三变。

1902年以后，因习学内典梵宗，多所感悟，以为儒家之《书》净是人学，而《诗》、《易》则遨游六合之外，乃是天学。引老道慈释以入儒经，又援《内经》以释儒学，以为《内经》上经言气之通天为天学，下经言气之变化为人学。更改过去所作《诗》、《易》旧稿，另成《孔经哲学发微》一书，专事推阐天人之说的演进大凡。

1903年，廖平以绥定府教授兼绥定府中学堂监督，被四川学政吴郁生以"离经叛道"、"逞臆说经"，揭参去职。他不以为意，仍坚持经学为孔圣天人之学。这是廖平经学的第四变。

1909年，四川提学使赵启霖见廖平"三传同出子夏"之说，认为是乱圣经而穿凿附会，褫其教育之权，令各学堂毋得延请教学授徒。1911年，廖平任《铁路

月刊》主笔，对于四川的保路运动，有所献替。

辛亥革命后，四川军政府成立，聘廖平为枢密院院长，对川中军政要项，多所谋献。1912年，在四川国学馆讲授经学。翌年，出席全国读音统一会，在北京与经古文学大师章太炎，对语晤谈，太炎称其"语甚平实，未尝及怪迂也"。

1914年，廖平出任四川国学学校校长，3年后去职。1918年，复任国学校校长（后更改校名为"公立四川国学专门学校"），至1922年辞职。

1918年，廖平就六经分天人小大，融合小大于天人之内，以《礼》、《春秋》、《尚书》为人学三经，《王制》、《周礼》为之传；以《诗》、《易》、《乐》为天学三经，《灵素》、《山海经》、《列子》、《庄子》、《楚辞》为之传，并各有皇帝五霸四等。又以六经皆孔子所作，六书文字，亦前古所无，皆出于孔氏。廖氏之学，愈奇愈玄，人亦不敢信其言之妙，这是廖平经学的第五变。

1919年，他忽患风湿麻痹症，手足偏废，仍旧不断讲学著作，考论学术，时时以左手作书，以应慕名而求墨宝者。1921年，兼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华西协合大学教授，以经史之学，教授诸生。

1924年，廖平回到井研故家，遂不复出，仍以著述为事。其学经五变以后，以《诗》、《易》为天学，《易》义玄远窈杳，通鬼神之情，显天地之奥。孔子论《诗》，揭"思无邪"，以为无邪与"思无疆"、"思无期"同例，无邪犹言无涯，是亦天学，凡人难知。晚年多病，好尚医术，成医书20多种，驳《难经》之变乱古法，创新说以济人，申古医三部九候之论。复引医经以说儒经，读王冰《素问》，以此为孔门《诗》、《易》师说，穿穴四诗及《易》之上下经义，专言五运六气，性与天道，这是他经学的第六变。

廖平的学说，一生中凡六变，晚年号六译，即因此故。

廖平的著述甚丰，除经学论著外，兼及医术、堪舆，撰有《四益馆经学丛书》，后又增益为《六译馆丛书》。1932年，为联系出版他的著作，拟亲赴成都，不料走到乐山，忽发大病，急转回家，半途卒于河咀坎场。

刘咸炘

刘咸炘，字鉴泉，号宥斋。1896年11月29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生于成都，祖籍双流县。祖父刘沅，为清代四川著名思想家和理学家，其学术思想称为"槐轩之学"。父刘枫文，亦有文名。

刘咸炘自幼受家学熏陶，先后由其从兄刘咸荥和父亲教读。他聪颖勤奋，笃学好问，15岁时，即研读《文心雕龙》。此后治学更加精勤，阅读了大量书籍，包括四部之重要典籍，旁及欧美名著。每读一书，必作札记，并在书上作眉批，进行点、校、评、识，他所遗留的23000余册中西藏书，绝大部分书中的书眉、副页都有他写的批语。1914年，其父卒后，由其从兄，成都尚友书塾创办人刘咸焌授业，开始研究古文的格调及班固的《汉书》，嗣后又研读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深受章氏“六经皆史”之旨的影响。1916年，刘咸炘任尚友书塾塾师，时刘咸焌任塾长，教学课程和书塾章程则由刘咸炘一人制定，并负责四部中的史、子两部教学。1926年后，刘咸炘又先后兼任成都敬业学院哲学系主任及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他在教学的同时，潜心于学术研究，著述宏富，在史学、方志学、目录校雠学、文学、书法诸领域都取得较大成就，且别具卓识，自成一家。

刘咸炘治学，先从目录学入手。他深知“目录学为读书引导之资。凡承学之士，皆不可不涉其藩篱。”他认为，“所谓目录学者，古称校雠学，以部次书籍为职。……古之为此者，意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与西方所谓批评学者相当。”其目录校雠学著作有：《目录学》、《续校雠通义》、《校雠述林》、《校雠丛录》、《内楼检书记》、《旧书录》、《旧书别录》等。林思进说，刘咸炘“于校雠考订之学，精核微至者，殆不可朽”。

刘咸炘对史学的研究成果颇丰。22岁时即撰成《汉书知意》4卷，对昔人讥评班固之言，纠辨甚详，于《汉书》的义例颇有创见。后来他陆续写出《太史公书知意》、《后汉书知意》、《三国志知意》，都是照《汉书知意》体例而成。此外，还撰有《史学述林》、《学史散篇》、《缃史记》等。对于史学的见解，刘咸炘发挥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论点。他批评后世史家“重朝政而轻民风，详实事而略大势，史识所以狭也。”

刘咸炘对地方志尤为重视，他虽推崇章学诚在方志学上的成就，但并不盲从，在许多方面阐述了自己独立的见解。他说：“一代有一代之时风，一方有一方之土俗，一纵一横，各具面目。方志自有方志之精神，与国史异也”。他身体力行，结合政事、民俗，贯通立论，撰成《蜀诵》、《双流足徵录》两书。对刘咸炘之识见，史学家蒙文通赞誉说：“斯宥斋之识，已嘐嘐度骅骝前，是固一代之雄乎！”并对《双流足徵录》给予高度评价：“宥斋刘氏为《双流足徵录》，所以补旧志之阙者，多至七卷，事半旨远，数百年来一人而已。”

文学方面，刘咸炘对散文、诗歌、词曲、文学评论等造诣亦深。著有《文心雕龙阐说》、《文式若干卷纲目》、《诵文选记》、《文说林》、《诗系》、《诗本教》、《诗初学》、《词学肆言》、《读曲录》等。他曾写有《辞派图》一文，抨击时人一味模仿唐

宋八大家或高谈汉、魏、南北朝八代文体，重形式而轻内容之风尚。1919 年“五四运动”后，他还提倡写白话文，主张向鲁迅、胡适等人学习，并用白话文进行创作，集成白话短篇小说集《说好话》7 篇。在所写《白话文平议》一文中，驳斥了守旧派对白话文的攻击。

对于先秦诸子及经学，刘咸炘也深有研究。他认为：“诸子之学有二类，一曰人道，二曰群理。人道论为人之本而究及宇宙，群理则止及治群之术而泛及政事。如道家、儒家皆主人道，而墨翟、商鞅则惟及群理。”撰有《孟子章类》、《庄子释滞》、《吕氏春秋发微》、《读易私记》、《大小戴记小笺》等。

刘咸炘又善书法，尤精篆、隶。写有书法专著《弄翰馀渖》，对中国书法源流及其发展变化、历代各书法名家之得失，都有精辟的论述，至今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1926 年，刘咸炘 30 岁时，写成《宥斋自述》，简明扼要地叙述了他的学术宗旨和渊源。他说：“吾之学，《论语》所谓学文也。学文者，知之学也，所知者，事物之理也。所从出者，家祖考槐轩先生，私淑章实斋先生也。槐轩言道，实斋言器；槐轩之言，总于辨先天与后天；实斋之言，总于辨统与类。凡事物之理，无过同与异，知者，知此而已。先天与统同也，后天与类异也。槐轩明先天而略于后天，实斋不知先天，虽亦言统，止明类而已。又止详文史之本体，而略文史之所载，所载广矣，皆人事之异也。吾所究即在此。”

1932 年 8 月 9 日，刘咸炘在成都病逝。在其短短一生中，他勤奋笔耕，著作等身，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据其门人徐国光、王道相所编《双流刘鉴泉先生遗书总目》统计：“全书凡二百三十一种，一千一百六十九篇，四百七十五卷，三百五十册。”1934 年，王道相出资将刘的各类著述汇编成丛书，刻印出 44 种，总名《推十书》。此外尚有遗稿 288 册（其中钞本已刊稿 106 册，未刊稿 182 册），今藏四川省图书馆。

国内知名学者对刘咸炘的学术成就极为推崇。唐君毅说：“鉴泉先生书，以木版刻于成都，虽流布未广，然读其书皆服其博学与卓识。”梁漱溟曾对人说：“余至成都，唯欲至诸葛武侯祠堂及鉴泉先生读书处。”并在其所著《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觉悟》一书中，转载刘咸炘所写《动与植》一文，作为附录。陈寅恪认为刘咸炘是四川最有识见的学者。浙江学者张孟劬读了刘咸炘的著作后称赞说：“目光四射，如珠走盘，自成一家。”1982 年有日本学者到四川省图书馆查阅刘咸炘的著作，继后，联邦德国学者也曾托人查询《推十书》，其学术影响，已远及国外。

吴芳吉

吴芳吉，号碧柳，自署白屋吴生。江津县人，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生于重庆，父经商。吴芳吉自幼聪颖，7岁入重庆大梁子左营衙门小学读书。其父经商破产，并因官司被捕入狱，母亲不得不带他回到江津。1906年，他入江津白沙聚奎书院就读，年仅10岁竟自作状词，步行去重庆为父辩冤。县吏见其年幼，情词恳切动人，便释放了他父亲，让其全家团聚。

吴芳吉勤奋好学，成绩优秀，13岁时作《读外交失败史书后》一文轰动乡里。1910年，吴芳吉被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录取。后因清末政局动荡，学校迟迟未能开学，直至民国建立，他才赴京入学。

清华学校开学后，校内学子对洋人蔑视中国人极为反感。一次一美籍教师无理辱骂何鲁和黄秉礼二同学，激起公愤，各省同学按籍选代表与之交涉，吴芳吉代表四川学生。但校方维护洋教师利益，开除了所有学生代表的学籍。事态扩大后，教育总长范源濂出面，改令代表写悔过书后复学，吴芳吉认为“为人代抱不平，无可悔过。”愤而离校回乡。归途中，贫病交加，甚至靠乞讨度日，辗转5个月，备受艰辛，抵家后便大病一场。病愈后，他写了70首诗寄给好友吴宓，吴宓回信赞扬他的诗才并给以鼓励。此后吴芳吉即醉心诗歌创作。

1915年，吴芳吉赴上海右文社校对《章氏丛书》，回四川途中至忠县，被北洋军疑为护国军间谍而捕获，险遭杀害。脱险后他写了《弱岁诗》19首，历述数年耳闻目睹之列强侵暴，政治黑暗，兵匪横行，人民的苦难和自己坎坷遭遇。他在《痛定思痛行》中写道“从来世运有通塞，未有如今繁且亟。此生讵知偶然来，会当刷羽振六翮”，他以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以大节自励。两年之后他在《戊午元旦试笔》中写道：“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他决心以诗为号角，为投枪，唤醒民众，射向敌人。

吴芳吉回乡后在重庆《强国报》任过编辑，在永宁中学教过书。家中曾两度遭洪水，贫困中，好友吴宓、谷醒华、汤用彤等10余人慨然解囊为他代偿债务。

1919年秋，吴芳吉任上海《新群》杂志诗歌编辑，在新文化运动高潮中，他发表了《小车词》、《婉容词》、《两父女》等新歌，一时广为流传。他的诗，语句竭力使用俚语方言，文体、音韵则借鉴西方改革诗体，但乐府诗的歌行格调、抑扬顿挫、清新素雅的特点则加以保留。他认为时代精神，人的思想、生活都发生了变化，

诗体也应该改革。他表示："读古人之诗，非欲返作古人，乃借鉴古人之诗以启发吾诗；读外人诗，断非谄事外人，乃利用外人之诗以改良吾诗。"由于他不介入当时上海文学界的派系斗争，而遭到攻击，骂他是"疯子诗妖"，说他的诗"非驴非马"。他由于是外乡人得不到支持，1920年8月被迫离开上海，到长沙明德中学任教。

吴芳吉在湖南期间与友人创办了《湘君》文学季刊，成立了红叶会。他的好友吴宓已在清华大学任研究院主任，从北京来电邀吴芳吉赴清华任教，吴芳吉以被清华无理开除为由加以谢绝，而应聘于西北大学。1927年起，他先后任教于成都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后受友人江津县长谷醒华之邀，回乡任教于江津中学，他以德化人，谆谆善诱，使校风为之一振。

1932年4月，吴芳吉应加拿大友人文幼章之请，赴重庆为基督教青年会演讲，他为听众朗诵了他以十九路军抗日为题材新写的诗《巴人歌》。因他当时已患肺病，加之情绪激动而晕倒于讲台上。

1932年5月9日，吴芳吉病逝。他生前辑有《白屋吴生诗稿》，逝世后，挚友吴宓等人编印了《吴白屋先生家书》、《白屋嘉言》、《白屋家书》。但自那以后，白屋诗被冷落近半个世纪。近年恢复民族文化，《星星》诗刊重新发布了《婉容词》，1982年10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白屋诗选》。《成都大学学报》、《成都晚报》、《社会科学研究》及香港《大公报》等，相继登载文章介绍、研究吴芳吉，台湾还出版了他的诗文集。列入四川省古籍整理规划项目的《吴芳吉集》，已于1994年由巴蜀书社出版。

陈彦衡

陈彦衡，字新铨，又名鉴，宜宾县人，生于1868年12月22日（清同治七年十一月初九）。其父陈云笙系清咸丰举人，曾任山东胶州知州，陈彦衡生长于四大徽班崛起、京剧兴旺普及的时代，他自幼耳濡目染，嗜好音律，在山东时向弹琴名手金子绳学七弦琴诀窍，违父意暗中学艺，无心仕途。

光绪年间，陈彦衡在直隶候补官位时，常到京中和园观摩"伶界大王"谭鑫培的戏，聆听名琴师梅雨田之胡琴。陈有过人之记忆，能急速谱出，反复练习，后从梅雨田深究胡琴（梅氏跟谭鑫培拉琴多年）。陈系"文人通音律者"，得梅氏真谛，技艺猛进。他向尊师建议，照昆曲谱办法，用工尺记下谭腔。于是梅陈二

人合作，记录了不少谭腔，开京剧用工尺谱之先例，梅兰芳后来在《梅兰芳文集·谭鑫培唱腔集序》中忆及："我在幼年时就认得陈彦衡先生，他和我的伯父梅雨田先生经常在一起研究胡琴和谭老的唱腔，有时候把一些精彩的唱段写成工尺谱，作为研究的根据，后来又加以整理成为专集，刊行问世……京剧之有较完美的曲谱，这是一个创举"。

陈彦衡为研究谭鑫培唱腔，到谭府为其拉琴吊嗓。谭氏之《碰碑》、《空城计》和《鱼肠剑》快板小腔甚多，陈为谭伴奏皆能托得水乳交融。他们谈艺时，陈谈及一些音韵问题，也使谭氏"惊佩"、"心折"。1915 年，谭鑫培从沪返京后，逢"正乐化会"发起义务演戏，陈为谭伴奏《桑园寄子》、《碰碑》，陈能轻松地应付谭氏的突变抽大腔换短腔，成为名震京师的"胡琴圣手"。

陈彦衡的琴技积数十年之功力，每日朝暮皆练。他伴奏的特点是：指音清楚、干脆，手腕有活力而灵巧，左手按弦有刚有柔，拉慢板时气韵满足，偶加花则突出精彩，拉快板时越快越双，骤如风雨。托唱腔能浑合一致。他的胡琴在"入"、"收"和对特殊破格腔的过门如何"还"，皆有道理和规矩。舞台演出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还擅打小鼓，师承李五，兼学刘顺的点子，其特点是腕子活、点子脆，眼快手灵，"搓儿"快捷如风，他学谭鑫培《击鼓骂曹》中的堂鼓套子技艺精湛。

陈彦衡广采博收，还记录了一些名角的腔调：王九龄的《除三害》，龙长胜的《战太平》，名旦时小福的《武昭关》，余紫云的《梅龙镇》，以及王瑶卿晚年的新腔《六月雪》、《玉堂春》和《骂殿》等，皆一一记谱收存。陈彦衡在胡琴上掌握各家之长，他在名琴师孙佐臣、陆五的技艺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他一生改革创造了 20 余部花过门，每演必获满堂彩。陈彦衡治学严谨，他跟名琴师方二立所学许多昆曲戏和笛子曲牌，皆一一记录，并注明为方二立所传。他跟北京名唢呐演奏家锡子刚学会百余支唢呐曲牌，这些曲牌用于京剧之何处，其渊源的考证，皆一一记录在册。

陈彦衡培植后学，最令人称道的是胡琴和老生唱腔。陈广为传播谭鑫培的老生唱腔，如名票王君直、王又宸等"五谭"皆得陈之指点，余叔岩、言菊朋为其门下高足。特别是言菊朋所编的破格新腔得益于陈氏，晚年言菊朋自成"言派"。此外，在陈氏门下学谭成绩优异的人，有罗小宝、吴铁庵、杨忠宝、刘仲秋等。在旦角中，受陈氏教益最多者当推早年的梅兰芳。

陈彦衡胡琴方面的学生多达千人，入室弟子有北京名琴师王少卿、李佩卿、高联奎、陈鸿寿、杨宝忠等。票友中一些有名的琴师也在其门下。陈于 1932 年秋从上海回川后，在重庆、成都亦收徒教琴。陈在成都由诸票房发起，在春熙大舞台拉琴五天示范，其子陈富年粉墨登

场,演出甚为成功。陈氏父子应张澜之邀请,募捐演出《彩楼记》、《祭塔》,观众报以轰雷般掌声。陈在劳累中多次感冒,病情加重,于1933年12月18日医治无效逝世。

陈彦衡戏曲著作有《戏选》(1917年上海出版)、《说谭》(1921年北京出版)、《燕台菊萃》(1930年上海出版),前后记录了谭鑫培所创剧目11种工尺谱,后由其子陈富年整理,经中国戏曲研究院编选,合刊为《谭鑫培唱腔集》。他还著有《旧剧丛谈》,论述谭鑫培及其同时代演员的表演艺术。

徐 炯

徐炯,字子休,号蜕翁,华阳县(今成都市)人。1862年(清同治元年)2月生于书香门第。因其家庭影响,旧学功底深厚,19岁中秀才,继补廪生,随后入学著名学者王闿运主持的成都尊经书院。他倾心宋明义理之学,广交院中谨严之士。

1893年,徐炯考中举人,先后两次入京会试不第。时适国政腐败,内忧外患并举。他在京期间常与川籍京官乔树枏、赵熙等人纵论国家大事,颇多卓识见解。后他又结识"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与之过从甚密。他由此对国势症结认识益深,进而忧时愤世,放弃仕途,返回故里,决心投身教育事业,以期救国救民。

徐炯返川后,在成都江南会馆设立了专攻文学的私塾,以宋代程颐、朱熹为教育典范,要求学生"知廉耻,辨义利,躬行实践,见诸事功"。针对清末世风日下,人心陷溺的时局,他提出教育以"正人心,厚风俗为急先之务。"他还把《资治通鉴》定为入塾士子的必读之书,书中注释涉及音训和地理处,务使学生明白了解,因而承学之士率多通才。如进士苏兆奎,举人朱青长、徐耀庚等,成为秀才贡生者则难以计数。当时每逢学官考试,徐炯的门生中考的红报总是贴满江南会馆的照壁。其学门之旺,为省垣之首。

中日甲午之战后,中国危机四伏。徐炯将所办私塾扩为"泽木精舍",意为独立不惧。"泽木精舍"形同康有为在广州所设的"万木草堂"。徐炯还鼓励学生出国留学,四川近代首批留日学生中徐孝刚、周道刚即出自徐炯的门下。另外,如熊克武、廖学章、尹昌衡、魏时珍、张群、戴传贤、李植、谢持等等曾先后求学于"泽木精舍"或是从师于徐炯。

清末,四川创办了通省师范学堂,徐

炯任监督(校长)兼师范学堂附属小学校长。当时没有部颁教本,徐炯亲编修身教科书,内容以忠君、爱国、尊孔、尚武为宗旨,并糅合进戊戌变法以来的维新改良主义思想。还以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抵御外侮的不屈气节为题材,号召青少年加以效法。课文写得生动、流畅,很能投合不少青少年学生的心理,产生了不小的启蒙作用。徐炯还认为百年树人,应端其始,亲自为小学生授课。他提倡学生参加劳动,并身体力行,与学生一道修路种树,打扫校园。

徐炯虽已无心于仕途,但对国事却极为关注。1898 年戊戌政变后,"六君子"惨遭毒手,他愤慨非常,就在课堂上启迪学生:"……杀六君子的这一刀,却把大清三百年的国脉砍断了!"后来他又写了一篇影射慈禧太后的文章《古今有女娲否》,道出国人心头的怨愤,为此,他险遭四川按察使沈秉堃的毒手,被迫避祸于陕西凤翔尹昌龄处。陕西布政使樊增祥见了徐炯后一席叙谈,大为折服,称徐炯"儒而侠者也!"当即令其孙拜徐为师。陕西当局还接受徐炯的建议派学生出洋留学,并聘他为留日学生监督,率该省第一批学生赴日本留学,张季鸾即是其中之一。

四川文教界对官方逼走徐炯,致使"蜀材秦用"甚为不满,遂力求总督锡良想法将徐炯要回四川。徐炯从日本返国后被请回四川,仍主事通省师范,同时还担任四川省教育总会会长。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当时一些省份如陕西、浙江的满族军民曾遭到屠杀。成都的驻防旗兵连同眷属约 5 万人,住在少城内。清廷在四川的政权被推翻后,满族人无不惊恐,人心惶惶,少城城垣上大炮环列,炮口向外,欲作拼死一搏,形势一触即发。徐炯为使成都市民免受战祸之苦,挺身出面斡旋调停,到将军衙门对满族首领晓以厉害,并将家属送交满城作为人质,以弭满人疑虑。经他日夜于风寒中在对峙双方间的奔走协调,使问题得到妥善了结,亦保全了满族人的生命财产,解决了他们的救济、身份、谋生等问题,也使成都避免了一次战祸。

民国建立后,徐炯两度赴北京出席教育会议,在会上提出"尊孔读经"的建议,被否决。他从北京回川后,见党争甚烈,乃辞去教育会长和通省师范学校校长职。胡景伊任四川都督后,欲以国会议员饵徐炯,被他拒绝。后他再上北京任教于中国大学,其间他曾赴山东曲阜,谒孔庙。当他再回四川时,已由袁世凯亲信陈宧主持川政。陈多次造访,他均借故避而不见。1915 年,他曾列名于拥护袁世凯当皇帝的《劝进表》,拥袁称帝的"筹安会"在四川成立分会,特邀他作代表,及开会时筹安会负责人前往迎迓,他已不知去向。1916 年护国战争期间,曾劝说陈宧反袁独立。

1920 年,徐炯创立"大成会"(取孔子集群圣大成之意),开办大成学校。他

自任校长，并移住校中，与学生同起居，共劳作。以“高尚、谨严，宽宏”三道德规范颁布为校训，他亲自撰写讲义，主编《大成会丛录》。

徐炯一生主要精力致力于教育事业，学生数以万计，自己学而不厌，亦诲人不倦。衰晚之年，犹每月必一集老少门人学子于大成会上检查各人的读书札记。他病逝前仍手不释卷，点读《陈兰甫东塾读书记》，学生陶亮生劝其小憩，他答曰：“我不能坐以待毙”。

1936年，徐炯病逝于成都。身后门人为其刊出《霁园遗书》。他生前还喜欢川剧，并写过剧本《拷赃》，收入《大成丛录》。

沈绍九

沈绍九，名湘，浙江绍兴人，1865年（清同治四年）生。光绪年间随祖父入川，遂定居成都。他家几代均以“游幕”为业，沈绍九为继祖业，青年时期习“刑名”之学。30岁前曾任四川彭县、金堂等县幕客。

19世纪末，沈绍九改行医术。初，沈绍九学医，局限于清代名医陈修园（福建长乐人）一家著述，立法处方，几乎全仿陈氏，以故为人治病疗效较差，苦无起色。时有浙人敬云樵，亦为游幕来川，学问渊博，医理高深，为其指出：陈氏之书通俗易学，为习医者之捷径，诚可读。但习医者绝不可拘泥一家之说，尤为要者，当研习《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以求本溯源，然后博及群书，融通百家之说，舍短取长，灵活运用，方可临症自如，立于不败之地。沈大悟，如迷途指津，顿开茅塞，因执弟子礼，经常聆听敬老先生教诲，在其指导下攻读经典原著及唐、宋以下各大家著作，医技日进。又有成都名医范静涛，精于温病，名满锦里。沈绍九偶与范老邂逅，向其请教医学问题，范有问必答，画龙点睛，极有要领。沈绍九钦佩不已，至此以师事范老为良愿。范老朝夕指授，沈绍九废寝学习，医术大进，医名日显，终至成都四大名医之首。

1903年（光绪二十年）夏秋，成都时疫大行，病者高热、大渴、谵语、昏迷，病势剧猛。沈绍九仔细观察病情，认为是暑热内陷所致，遂按《疫疹一得》之法，用辛凉重剂为治，方中石膏一剂用数两，救活了许多危重病人。

1905年，沈绍九约集同人，并自出巨资，在成都顺城街安乐寺内，创设了成都首家送医送药的医馆，成都许多名医都定时到馆义诊，每年就诊者约万余人次。医馆连续举办达30年之久，深得成都病家赞美，为蜀中医界一大盛举。

1932年，成都霍乱流行，死亡接踵，沈绍九诊察许多病人肢冷脉数、阳气将脱，而形瘦舌干、心慌，阴亦垂绝。他认为此病在回阳救逆的同时，亦当注意抑肝阳养肝阴，据此他采用理中汤乌梅丸加减，使许多病人从垂危中得以生还。

沈绍九以辨证精微、善识怪症著称。吕某患失血，吐出白即刻变为赤色，诸医不识此症。沈绍九道："《灵枢·决气篇》言，'中焦受气取汁，变化为赤，是谓血'，此人肾虚，中阳不足，不能化赤，故吐出物先为白，得天之阳气后，始化为赤，何怪之有？"沈予方而愈。

沈绍九又以方药配伍巧妙闻名。成都刘仰山，患"不寐"历年，夜只入睡二小时，形枯骨出，行动恍惚眩晕，便结溲黄，耳鸣恶心，百治无验。沈诊为气郁痰火所致，方拟仲景半夏泻心汤加减。刘本为城南妇科医师，持方惑道："师言此疾因气郁痰火所致，何以方中有半夏、生姜、白芥子诸燥性药？"沈答道："辛、苦并用，此方之妙。方中苦味药物芩、连可制姜、夏之燥，莲心，竹茹又可制白芥子之燥，合而用之，既能开豁浊痰，又有导心气下行，使阴阳得交，自然成寐而眠安。"果如言。刘之痼患得除，亲书"起死肉骨"匾额相赠。

沈绍九精于脉学，时人传言"能断生死"。万某之妻钟氏，患不思食症，身体衰弱，久治无效，沈予方药，服后大效，再诊其脉，沈道："症虽减而脉如前，脉不应症，此隐忧之候。"叮嘱病人万勿食生冷食物，好自调养。病者未遵，竟以食地瓜为嗜，月余复发病，沈诊其脉道："脉已涣散不收，着根无力，脾阳倾败，危在旦夕。"翌年果卒。沈绍九言，"生死乃自然界之规律，我何能断，只不过于脉理多潜心探研而已。"他在脉学上起于《内经》、《难经》，而对《叶子雨脉学》最为推崇。

沈绍九因人之症治病，攻补皆擅。晚年他对人说："近年有人谓我喜用温补，不知来我处就诊者，多系纵情声色、下元亏损的官商大贾，故多用温补之剂；我在中年行医时，就诊者多为劳动者，许多病则以寒凉攻伐取效，这是因人因时因症制其所宜。"

沈绍九气高自负而慷慨好义，尤重故旧交情，济人于难、周人以困。某夫妇相继病殁，遗幼子女各一，沈绍九将其收养成人，并为之婚嫁。某友病将绝，口不能言，以手指其妻相托，沈挥泪承诺于榻前，后友之丧葬，妻子之存活，一力承担，直至其子婚娶，生计解决而后已。平时对官宦商贾，诊金必较，而于贫病者，则施医送药，称之"千家吃药，一家还钱"。

为倡医学，育植人才，沈绍九择收门人，呕心沥血，严加指教，以故桃李满室，人才济济于蓉，如唐伯渊、曾彦适、张澄庵等，皆为一代名医。

1936年，沈绍九病逝于成都锣锅巷自宅。其医疗经验由唐伯渊、杨莹洁整理为《沈绍九医话》一书，1975年由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王光祈

王光祈，字润玛，笔名若愚。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生于温江县鱼凫镇。祖父王泽山为清咸丰举人，赵尔巽之师。父亲王展松曾在清廷任职，后弃职从商。王光祈为遗腹子，出生后已家道中落，后靠赵尔巽(时任四川总督)资助得以到成都入学。1908年，他考入有名的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与郭沫若、李劼人、周太玄等同学。王光祈思想活跃，学习努力，立志以复兴国家民族为己任。1911年，他参加了四川的保路运动。

1913年，王光祈中学毕业，曾受聘在一家报社作主笔。次年，在亲友的资助下，赴北京考入中国大学攻读法律，并悉心研究《国际公法》和《中西外交史》。同时在赵尔巽(时任清史馆总裁)的帮助下在清史馆任书记员，以微薄收入维持半工半读的生活。1916年秋，周太玄到北京，任《京华日报》编辑，在周的推荐下王光祈也到该报社任职，并因新闻联系而结识李大钊，受李的思想影响很大。

1918年7月，王光祈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中国大学。是年12月，陈独秀、李大钊发起创办《每周评论》，王光祈是该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还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文章抨击剥削阶级和社会的不公正。提出劳动者应当要求自己的权利，要实行“生产机关公有”，教育平等，要求青年献身于“为公众谋利益的事业”。1919年3月，邓中夏，许德珩等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王光祈加入并担任小组书记。他在京城宣讲《什么是善》和《青岛交涉失败的原因》这个主题时，听众极为踊跃。

1915年秋，李劼人应聘任成都《四川群报》主笔。次年，由李的介绍，王光祈兼任《群报》驻京通讯记者，他及时向成都寄发剪报，新闻，介绍北京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积极从事反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斗争。据李劼人回忆说：王光祈写的文章“又快又多而有力”。这些消息和文章对四川的反复辟斗争起了重要作用。1918年夏，《群报》因言论激烈而被查封，李劼人等又创办《川报》，王光祈仍担任该报驻京通讯记者。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王光祈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的游行队伍。并连夜赶写长篇通讯及时发回四川，在《川报》登出后，四川学生联合会立即组织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声讨卖国政府，呼吁全国各界拒绝巴黎和会签字。

1918年6月30日，王光祈和李大钊等在北京发起组织了“五四”时期会员最

多、影响极大的进步团体“少年中国学会”，由王光祈任书记。次年7月1日，该学会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先后有120余人加入学会。王光祈不仅是“少年中国学会”最主要的发起人和最早的组织者，也是“五四”时期学会的实际负责人。毛泽东、赵世炎、恽代英、张闻天都是该会早期成员，也都是由王光祈介绍而加入的。但王光祈当时还没有成熟的政治主张，主要受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幻想建立一种乌托邦式的乡村乐园。他在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人的支持下，于1919年底在北京组织了“工读互助团”，由于条件限制，只吸收了30余人，成立3个组。他们一面从事体力劳动，一面在各学校听课，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王光祈幻想通过工读互助运动的广泛发展和联合，达到改造整个社会的目的，实现“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崇高理想。由于他的热心宣传，武昌、南京、天津、湖南等地也相继组织、仿效实行。“工读互助团”虽名噪一时，影响很广，但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是根本行不通的，加以在经济上存在着许多不可克服的困难，团员们的思想认识又极不一致，1920年3月以后，便陆续地自行解体。王光祈深为痛苦，他决心远涉重洋，到德国学习考察。

1920年6月，王光祈作为上海《申报》、《时事新报》及北京《晨报》特约驻德通讯记者抵达法兰克福，开始研习政治经济学，并利用晚上时间译写通讯稿发回国内报刊，以稿费收入维持生活。1922年起，王光祈放弃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德国柏林开始学习小提琴和音乐理论。1927年春，他考入柏林大学音乐系。1932年，王光祈又受聘于波恩大学，任东方学院中国文学讲师。1934年王光祈以《论中国古典歌剧》的论文获波恩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在德国从事音乐研究达13年之久，是中国第一个用比较研究方法从事中西音乐史和中西乐制研究的人，在“比较音乐学”这一领域内作了开拓性的工作，奠定了中国“比较音乐学”的基础。他较全面系统地向国内介绍西方音乐文化，并向国外介绍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贡献。他的音乐论著多达50多种，在国内出版的专著有18种、论文24篇，在国外出版的外文论著已查到的有14种，他还编译了《国防丛书》5种，《近代中国外交史料》7种等。他竭诚地希望通过音乐唤起民众，实现他爱国主义理想。他在《东西乐制之研究》自序中说：“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重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因此之故，慨然有志于音乐之业。”他说他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目的是“发湮扶微，张皇幽渺，使吾国音乐亦得与欧洲各国各占一席，一洗外人讥我为无耳民族之耻”。1934年2月，波恩大学有一日本教授拟作《满洲国与日本》的侵

华报告，并带有影片，准备在讲演后放映，王光祈组织留德同学写出抗议书在会上宣读，并全体退出会场以示抗议。

王光祈旅居德国期间，经济来源全靠自己卖文，以致积劳成疾，于1936年1月12日不幸病逝于波恩。消息传到国内后，成都、南京、上海等地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徐悲鸿在南京为他画了追悼会的遗像，蔡元培致悼词。他的骨灰运回国后，由李劼人主持，于1941年葬于成都沙河堡。1983年10月，经有关部门批准，将王光祈墓碑迁至四川音乐学院，并修建了碑亭。

刘师亮

刘师亮，名慎三，号谐庐主人，1876年(清光绪二年)生于内江椑木镇。自幼丧父。刘师亮从小聪慧，喜诗文，由于家境贫困，12岁才在本镇刘家祠入学，1892年因经济拮据而辍学。他一边助其兄经营黄糕生意，一边自学典籍诗文，1896年起，他以教书卖文为生。1901年他到自贡为一盐商做账，颇受器重。民国建立后，盐商们要减轻盐税，推举刘师亮为代表上成都向当局请愿，随后他即迁家成都，在四川总商会会长樊孔周的资助下开办浴室“双龙池”。

辛亥革命后，四川军阀割据，横征暴敛，使他深感愤慨，便以笔抨击时弊。1927年，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割据成都，都标榜自己为革命军，战祸连绵，百姓流离。刘师亮写下《竹枝词》痛斥军阀们草菅人命的罪行，有一首写道：“全国都称革命军，谁真革命远无闻，问他命革多和少，秋草斜阳乱葬坟。”

1928年2月，刘师亮去重庆，一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他目睹惨状，写下《演禽言十五章》，道出百姓的痛苦，揭露社会的黑暗。

1929年5月，在友人的帮助和支持下，刘师亮创办了《师亮随刊》，第一期发行2万余份，每10天左右1期，畅销成都及邻县，颇受市民阶层欢迎。他在发刊词中写道：“若问本刊真意义，改良社会大公司，……唤起人民可自豪。……当车我敢舒螳臂，死到阴司鬼亦雄”。他在《随刊》上发表谐文《自身难保》、《东西派》、《人民代表》、《革命招牌》等，对军阀勾心斗角、敲诈勒索、投机取巧等行为予以揭露和讥讽。他的《时谚声律启蒙》以四川土语时谚写成，妙趣横生，对丑恶的社会现实给以无情的鞭笞，在随刊上连载后赢得众多读者，后来集为单行本多次再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师亮随

刊》特发3次《反日特刊》赠送读者以唤起民众，刘师亮在《反日特刊》上发表诗文："枕戈待旦诛强日，投笔从戎慨世风"，他还在《春联》中写道"多难兴邦，惟有民生难解决；同仇抗日，纵亡种族莫投降"，表现了刘师亮在国难当头时的爱国主义精神。

1933年刘湘占据成都，执掌川政，刘师亮因《师亮随刊》锋芒太露而得罪了刘湘。次年3月，刘湘派人捣毁了《师亮随刊》编辑部和他开设的宜园茶园，并罗织刘师亮的罪状准备将其捕杀，刘师亮在友人帮助下逃往上海避祸。在上海，他在复旦大学教授严霁卿和《新闻报》编辑严作虹资助下，于1935年1月创办发行了讽刺时弊的《笑》刊，不久，《笑》刊也因触犯了国民党禁忌，仅出1期便被查封。随后他写出了1部记述近300年来之汉留史实的著作《汉留史》，因当局的阻挠，只出版了少量精装本。

1935年9月，刘师亮回到成都，次年秋，他又恢复了《师亮随刊》，但其身心健康大不如前，《随刊》也失当年锐气，声誉不如从前，最后亏损过重被迫停刊。1939年春刘师亮因心脏病不治逝世。

刘师亮的遗作经搜集、整理后被出版，除《汉留史》外，主要作品有：《师亮谐稿》、《师亮对联》、《师亮诗草》、《时谚声律启蒙》、《警世钟》、《师亮杂著》、《东游散记》；剧作有《胭脂配》和《错吃醋》等；还有《师亮竹枝词》，诗作1000余首。

张善子

张善子，原名正兰，单名泽，字善孖，晚年改称善子，因素爱画虎，自号虎痴，人称虎公或虎翁。内江县人，生于1882年7月12日（清光绪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张善子在家行二，其八弟张正权，即后来蜚声世界的国画大师张大千。

张善子10岁时入私塾读书，课余时即随母学习绘画，少年时其绘画已在家乡小有声名。他"自幼还喜任侠击剑"，为人正直。稍长，曾进内江师范学堂学习，"获优证毕业"。后曾任教于内江小学与内江中学。

1900年前后，张善子因反对清廷腐朽统治，遭到缉拿，被迫于1903年东渡日本，他先入明治大学经济科学习，后因爱好绘画，又入该校美术专修科。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张善子旋即加入。1907年，张善子由日归国后，参加了同盟会组织领导的革命活动。并曾任四川省咨议局议员。

辛亥革命后，张善子曾任蜀军第二师第二旅少将旅长。后因反对袁世凯复

辟称帝，张被抄家、通缉，不得不再次出亡日本。1919 年，张善子从日本返川，曾先后担任乐至、南部、阆中、乐山、蓬溪、遂宁、三台等县盐场知事。1924 年，张善子由三台任内直调北京，历任总统府咨议、财政部佥事、国务院咨议、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等职，后又外放察哈尔省，担任丰镇、清凉城清丈局长，商都县长等职，“俱著政声”。1927 年，张善子因愤于官场腐败，毅然辞去一切职务，归隐上海，与八弟大千同以书画售世维生。

张善子之画，“其山水比唐六如、邓穆倩，人物如陈老莲、张大风，走兽法李龙眠、赵松雪，无不精妙”。但他在一生中，最喜画虎，也最擅画虎，这是他在年轻时就立下的志愿，欲借纠纠虎威，来振奋羸弱之国风，提倡尚武之精神。为此，他曾在住地长期豢养一只活虎，以对虎写生，捕其形神，致使其绘虎愈益高妙。

1930 年，张善子出于对黑暗政治的愤懑，采用《西厢记》里的 12 句艳词，合画 12 只老虎，取名《十二金钗图》，以讽刺当时腐败横行、苛政猛于虎的社会现实，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1934 年，张善子的一张丈二巨幅《黄山神虎》在北平展出时，震惊艺坛，宋哲元见后爱不释手，强以 2000 圆大洋购去，还连呼值得。自此，“蜀人虎痴”更是名闻全国。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住在苏州的张善子誓死不当亡国奴，率领全家人匆匆西上。他曾在西撤路上说：“丈夫值此机会，应国而忘家。此次我来郎溪，生平收藏存在苏州网师园内，皆弃之如土。以今日第一事，为救国家于危亡，万一国家不保，人虽富拥百城，又有何用？恨吾非猛士，不能执干戈于疆场，今将以吾画笔写出吾之忠愤，来鼓荡志士，为海内艺苑同人倡！”

同年秋，张善子撤退到武汉时，得知国共第二次合作已经形成，极为兴奋，当即在长二丈、宽一丈二尺的白布上，奋力创作巨幅国画《怒吼吧，中国》。当撤退到宜昌后，张善子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方才完成这幅巨作。只见图上 28 只斑斓猛虎，代表中国当时的 28 个省，正奔腾扑向一丝落日。张善子还在图上题诗：“雄大王风，一致怒吼，威撼河山，势吞小丑！”

1937 年底，张善子抵达重庆，被聘为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1938 年初，张善子又赴昆明，埋首绘画。此期间，他以我国历史上的爱国英雄和爱国故事为题材，连续创作了《弦高犒师》、《苏武牧羊》、《精忠报国》、《文天祥正气歌》等许多优秀的画幅，宣扬抗日救国，并在各地举行《正气歌人物图巡回展览》，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蒋介石还曾在张善子绘的文天祥像上题字：“正气凛然”。

1938 年底，张善子回到重庆，他接受国民政府的委托，准备出国宣传募捐。为了出国工作之便，他还在重庆天主教堂受洗。取圣名叫安琪。新年前夕，张善子携带自己和大千的作品共 180 多

件，在于斌主教和梅雨丝神父的陪同下，动身出国。

1939年1月，张善子抵达法国，随即在巴黎举办声势浩大的《张善子、张大千兄弟画展》。精湛的中国艺术，令法国观众赞不绝口，伦勃朗总统也亲往参观，赞张是“近代东方艺术的杰出代表”，并向张授勋以示纪念。

1939年4月，张善子抵达美国，立即在纽约及美国各地举行画展和讲演，宣传介绍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呼吁世界人民支援中国的神圣抗战。在这些画展和讲演会上，张善子还常常当众挥毫义卖。张善子的美国之行，轰动美国朝野。各种传媒纷纷连篇累牍地报道张的有关消息，一致尊称他是“世界杰出的绘虎大师”。罗斯福总统夫妇也多次邀请他赴白宫作客，并为张的在美活动提供方便。因此，当罗斯福代表美国宣布废止《美日商约》后，张善子曾精心绘制数幅巨虎图，赠给罗斯福总统等人，罗斯福对之视为奇珍，特别吩咐将画挂在白宫内林肯像侧。

张善子出国宣传时近两年，共举办100多次画展，他个人所作的宣传讲演不计其数，前后所募得捐款共达美金20多万元，其中仅个人义卖画虎就得款10多万美元。张善子把这笔款全部汇给国内的有关机构，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自己未从中染指分毫。其高风亮节与精湛的技艺，受到海内外人士极大尊重。美国纽约佛恩大学特赠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华盛顿黑人大学、芝加哥艺术学院、哥伦比亚艺术学院等校也纷纷聘请他担任名誉教授，以致罗斯福总统夫人亦尊称他是“世界艺术教授”。

1940年9月，张善子抱病归国，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与高度评价。回国后，张善子日夜举行报告会，汇报出国宣传工作，介绍世界抗战局势。由于长期过度劳累，张善子终至一病不起。1940年10月20日，病逝于重庆歌乐山。

龚道耕

龚道耕，字向农，别号君迪、蛛隐，晚年因患耳病，又自号聩翁。1876年（清光绪二年）生于成都，祖籍浙江会稽。龚家世代志于读书，龚道耕幼小聪慧，3岁能默读唐诗，13岁补县学员，17岁中副贡，26岁中举，援例授为内阁中书。

清廷明令废科举、兴学校后，他先在冯蒿菴主持的四川学务处工作，后又襄助其父创办成都县小学。民国成立后，先后任过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眉山县立中学、成都县立中学等校校长，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成都师范大学代理校长。

1929年卸任师大代理校长职后，主要在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担任文科教授，同时在成都一些中学执教，直至逝世。

龚道耕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办学认真，任劳任怨。民国初年的四川，军阀争据，战乱频繁，社会极不安定。在这种情况下，主办教育，矛盾重重。龚道耕在担任成都师范大学代理校长期间，因学校经费特别困难，自己曾带头降低每月的薪俸，后因学校债务牵连几乎破产，但他仍然执着如一地办学，不曾稍萌倦退之念。1915年，龚道耕曾参加全国师范教育会议，1928年，又参加南京教育会议。两次会议上，他都对教育改革提出很多建议。

龚道耕一生重视人才培养，诲人不倦。在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他热爱学生，也深受学生爱戴。

他讲课时旁征博引，繁简得当，于稗官小说、朝野掌故、逸闻轶事，都能说出源流，不失前后。他教育学生要刻苦钻研，不务空谈。告诫学生不要在琐细处故弄玄虚，或以一家之言为满足。学生在课堂或到家询问疑难，总是细心辅导，往往一谈就是几小时，临走时仍言犹未竟。他的学生中后来在学术上有成就的不少，对他都始终信服、尊敬。

龚道耕一生治学勤奋，态度严谨，经史子集，无有不习，年未及30，即著书几十种，其平生钻研最深的，则在经学。他最尊崇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将自己的客堂取名为"希郑堂"，以表明志向所在。

清代自乾隆、嘉庆以来，言经学者，有汉宋之争。道光、咸丰以后，言汉学者，又有今文、古文之别。龚道耕尽读清儒诸家之书，采纳诸家之说，持论不偏不倚。清末民初，经学大师廖平在四川的影响很大，以致有些研究经学的人，言必称廖，而不读汉郑玄注疏，日言三科九旨，五际四始，附会牵引，无所不至。龚道耕对这种治经方法，很不赞同，曾经想著书加以斥责，可惜仅写了概略，而因故中断。他著有《经学通论》一书，阐述经学流变，书中主张治经要"博观而慎取"，晚年著《礼记义疏发凡》一书，也曾说治经要"破汉宋门户之见，合义理考据为一家，庶于经义或有所当。"从而可知他平生治学的宗旨所在。

龚道耕一生虽重在研究经学，然其爱好却是多方面的，他早年治小学考据，从事校辑。17岁作《经典释文叙录集证》，其后著有《仓颉篇续补》、《字林重订补遗》。他还广习诗文，文以八代为规范，诗学唐人温庭筠、李商隐，有《研六庼诗文初稿》、《蛛隐庐文存》、《丁未述征集》等遗稿。中年以后，专力治经史，曾补校《旧唐书》，名曰《旧唐书札迻》。其他已印未印的遗著，目录计有68部，较为重要的有：《尚书释文考证》、《礼记旧疏考证》、《三礼述要》、《经学通论》、《史记正义佚文》、《中国文学史略论》等。他批校过《水经注》及其他书籍，考证都较翔实，订正也较精确。他还和原四川大学文学院长向楚共同倡议，由成都渭南

严氏刊印出版《音韵学丛书》，并共同为这套丛书立体例，制序文。他早年出游上海，曾同邓守瑕向丹徒马相伯学习西语，并对西洋历史时事，用心阅览，详细作笔记。

原成都县的县志，多年未曾续修。1938年，县人共推龚道耕主持重修县志，后因故中断。1941年，他由四川大学休假回家，又再次被邀请，乃承担此任。他沿用志名，参以史例，并参考前贤名著之体，拟定了一个纲目体例，共名为图四、记一、表六、录八、传九。可惜因猝然去世，未能完成修志工作。

龚道耕一生治学面广，著作勤，但所著多未定稿，因素性不喜表曝，教学生也以草率成书为戒。1940年受聘教育部为部聘教授，暑假中得假进修一年，由四川大学疏散地峨眉山返家，一面整理所有手稿，一面积极为完成《礼记义疏》一书作准备，同时撰写自传生平的《观生梦忆》。不料于1941年12月骤得脑溢血病去世。

向宗鲁

向宗鲁，名承周，生于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巴县人。家贫幼慧，12岁入巴县达育高等小学堂。1908年，考入巴县中学堂，次年转入两年制的川东师范学堂。博闻强记，成绩突出，很受当时教师、重庆名流龚春岩、梅黍雨等人的赞赏。

1911年，向宗鲁因川东师范教师的支持，筹得助学金，到成都考入存古学堂（后又改称国学院、国学学校）。1914年，廖平任该校校长，很器重向宗鲁，免去他的学费，并资助他每月大银两元作伙食。廖平是今文学派的巨子，学说变更无常，有不少自出心裁、惊世骇俗之论。向宗鲁很尊敬廖平，却并不赞成他的许多观点。经常发疑问难，据理争辩。廖平坚持己见，但也赞赏向宗鲁实事求是的精神，往往为之心折。

向宗鲁治学，继承、发展了清代顾（炎武）、阎（若璩）、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汪（中）、王（念孙）诸大师的业绩，用闳取精，衔华佩实。学校藏书不少，向宗鲁恣意博览，不仅是经史诸子，而且词章杂学，小说短书，莫不淹贯。同学都佩服他积学。

向宗鲁在成都求学时期，生活极为艰苦，寒暑假回重庆，往往步行。但是他爱书若命，只要遇到难得的典籍，不恤饥寒，百计购买。廖平治学，到后来愈喜欢作深沉之思，他认为没有用的书，往往束之高阁，渐而至于贱价售卖。遇到廖平卖书，向宗鲁总是设法去买。廖平知道

此事后，每次要卖书，一定告诫左右的人，说："不许让向承周知道。这个书呆子求书心切，典卖被帐也要买。头上被蚊子咬得已经像乱葬坟了！"向宗鲁苦学好书，于此可见一斑。

国学学校毕业后，向宗鲁曾在巴县木洞小学和江北中学教书。1922年，武昌裕华纱厂厂主苏汰馀等3家聘请向宗鲁到武汉为家庭教师，受业者不过10余人，束脩收入颇为丰厚，暇时也较多，遂得恣意自学，和武昌徐行可（恕）、蕲春黄季刚（侃）交游。徐行可藏书甚多，黄季刚博通群籍，小学词章，高出当世。他们对于向宗鲁都极为推崇。向宗鲁的《说苑校证》即成于此时。此外还校理了《文选》、《史通》、《淮南子》等书。在武汉住了10年，中间只是1927年曾应重庆陶冏士的邀请，在思诚国学专修学校短期任教。

1931年，向宗鲁回川，曾应聘到四川大学中文系作教授，不久即回重庆，任重庆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35年重庆大学中文系合并入四川大学，向宗鲁留在重庆修《巴县志》，兼教重庆高中。

1937年，向宗鲁受四川大学之聘，复来成都，在中文系教授校雠学及《文选》、《淮南子》、《管子》等专书研究。1939年，川大疏散到峨眉山。1940年，向宗鲁兼任中文系系主任。1941年11月，卒于峨眉。

向宗鲁逝世后，他的《校雠学》一书，由其弟子屈守元整理，1944年12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这部书仿《三辅决录》、《阳羡风土》诸书旧例。"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见《史通·补注》）正文提纲，是优美整齐的骈体文字；注文遍引群籍，论证正文提出的见解。有编选近世骈文的选本，曾把此书《正名》一篇选入。

向宗鲁的绝笔之作《月令章句疏证叙录》，由其弟子王利器整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说苑校证》20卷，《佚文》1卷，《附录》1卷，是向宗鲁流寓武汉10年中所作。这部书经屈守元按照原书体例，据他批注本的资料，补足失去的4卷（卷17到20），于1987年7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列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中。《说苑校证》的写作，正是向宗鲁壮盛之年，又得到藏书家徐行可的支持，所以这部书校勘资料既很完备，疏证工作又极精审，是一部古籍整理的典范著作。

向宗鲁校《周易正义》，曾写成《周易疏校后记》1万余言，对于注、疏、释文三合本的编印，今传宋刊八行、十行注疏本及清代阮元翻刻本的优劣，《周易》各种单疏本的评价，都作了扎实细致的研究。不仅是经学上的重要论文，也是校雠学上的典范著述。此文1941年6月发表在《华西学报》第六、七期合刊上。经屈守元重新整理，又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1983年第三集上发表，引起古文献学界的重视。

向宗鲁晚年手批的《淮南子》和他曾经校过的《史通》，都已经过录整理，正待刊行。此外，如《文选》、《管子》、《春秋正义》、《水经注》等，以及其他许多论文，皆已散失。

向宗鲁守正不阿，发现他的学生有是非不分、行为卑劣者，他总是责备说："这样，读中国书来作什么！"他讲课朴质精审，最恶哗众取宠之风。门下之士成名者不乏其人。川大第五班学生杨明照考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第九班学生王利器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都以他们从向宗鲁处学来的基本功夫使燕大、北大导师大为惊异。1941年，当时的教育部以川大中文系人材辈出，特命开办文学研究所，由向宗鲁主持，并用他的名义招收研究生。规模粗具，招生考试录取工作始毕，而向宗鲁于11月便不幸病逝。

李宗吾

李宗吾，名世楷，富顺县自流井（今属自贡市区）人。生于1879年2月3日（清光绪五年正月十三日）。1887年入私塾，1899年就读自流井三台书院，次年转炳文书院，中秀才。他读书成癖，尤爱历史、传记，勤于思索，擅长知人论世。1902年，李宗吾与同乡雷民心等投考四川高等学堂。因该校总理胡峻赴日本考察，迟至1904年春开学。李宗吾考试成绩优异，被分入优级理科师范班学习。他除学习专业课外，也潜心探索中国学术思想。这期间，他受同盟会员雷民心、张培爵等影响，加入了同盟会。1907年底，李宗吾以最优成绩毕业，学部特授举人。1908～1911年，他在富顺中学先后任教习、监督（校长）。

辛亥革命中，李宗吾虽是同盟会员，并未参与实际工作。1912年，他受四川军政府副都督张培爵电邀，任四川审计院第三科科长。审计院裁撤后，财政司委他为公认肥缺的重庆海关监督，他力辞不就，再委他为四川官产竞卖经理处总经理，他坚持要求将月薪200元减为120元，才肯就职，时人深为怪异。因官产不能竞卖，他又改任四川官产清理处处长。在官僚、政客的阻挠下，官产亦不能清理，此机构遂被裁撤。至此，李宗吾回到自流井，构思他的《厚黑学》等著述。

1914年，省教育司委任他为富顺县视学，到任10个月，又奉命改任省立二中（设在江油县）校长。在职两年，卓有成绩。1916年调任省视学，曾出川考察各省教育，力主建立考试制度。鉴于贫苦有志青年入学无门，他主张实行开放政策，允许社会青年以同等学力资格参加各级学校毕业考试，合格即授予同样

资格毕业证书。1918年,他任省长公署教育科副科长。1920年,他又一次辞职回乡,潜心钻研他的"厚黑学"。北伐战争开始后,李宗吾受革命热潮感召,再次入省府任编纂委员,直至1938年解职归家。此后,他隐居自流井汇柴口,埋头著书立说,再也没有出仕。

李宗吾的《厚黑学》酝酿于四川高等学堂,最初以连载文章形式,发表于民初《公论日报》,后来印出单行本,并陆续补充了《厚黑经》(用四书句法)、《厚黑传习录》(仿宋儒语录体)。抗战初期,他曾在成都《华西日报》连载《厚黑丛话》。他自称是与儒教孔子、佛教释迦牟尼、道教老子并列的"厚黑教主"。

厚黑学主旨是说:古往今来大凡建功立业、称王图霸的英雄豪杰、帝王将相,无一不是面厚心黑之人;或厚或黑,只占一端的人足以称雄一世;厚黑兼具的人,更可叱咤风云,独霸一方。人物的大小强弱,取决于他的厚黑程度而定。他先举三国历史人物加以证明。

他认为,"三国英雄,首推曹操;他的特长,全在心肠黑,他杀吕伯奢、杀孔融、杨修,杀董承、伏完,又杀皇后皇子……并且明目张胆地说:'宁我负人,无人负我!'心肠之黑,真是达于极点了。"刘备的特长是脸皮特厚。"他依曹操,依吕布,依刘表,依孙权,依袁绍,东窜西走,寄人篱下,恬不知耻。"他生平喜哭,遇事对人痛哭一场,立即转败为功。孙权是厚黑兼备的典型。他"和刘备同盟,并且是郎舅之亲,忽然袭取荆州,把关羽杀了,心肠之黑,仿佛曹操;无奈黑不到底,跟着向蜀请和,……他与曹操比肩称雄,抗不相下,忽然在曹操驾下称臣,脸皮之厚,仿佛刘备;无奈厚不到底,跟着与魏绝交,……他虽是黑不如操,厚不如备,却是二者兼备,也不能不算是一个英雄。"曹操、刘备、孙权三人,各具特长,势不相让,因此形成天下三分之局面。

上推至楚汉战争,亦可证明厚黑学之奇效。他认为,项羽不厚不黑,所以失败。刘邦既厚且黑,故成霸王之业。韩信能受胯下之辱,脸皮很厚。无奈他心肠不黑,楚汉相峙时,不听蒯通背汉自立之劝告,念念不忘刘邦"解衣推食"的恩惠,不忍心下毒手,终至长乐宫身首异处,夷及三族。范增千方百计想替项羽除掉刘邦,心肠可谓黑,无奈他脸皮不厚,一受离间,便大怒求去,结果将老命也葬送了。

因此,一部二十四史,必须持着厚黑学观点才能读得通。厚黑学理,原则简单,用时却很微妙,他说,"大凡行使厚黑之时,表面上一定要蒙上一层道德仁义,不能赤裸裸地表现出来。……果然这样做,包管你干出许多惊天动地的事业,为举世所钦仰。"

在《厚黑学》中,他还大胆抨击了古圣先贤。他认为,三代以上有圣人,三代以下无圣人,"这是古今最大的怪事"。圣人不仰仗君主的威力,就得不到尊崇;君主不依靠圣人的学说,也不会那么猖

獗。“君主钳制人民的行动，圣人钳制人民的思想”，兼而用之，才完成专制统治。

李宗吾的《厚黑传习录》包括三部分：一是求官六字真言，二是做官六字真言，三是办事二妙法。求官六字真言是“空、贡、中、捧、恐、送”六字，概括意思是，求官门路不外钻营、吹牛、捧场、讹诈、送礼五端。做官六字真言是“空、恭、绷、凶、聋、弄”。概括意思是，发文要空洞，不着边际；办事要模棱两可，留有后路；对上司要卑恭屈节，胁肩谄笑；对下属、百姓要仪态威严，训话要显出桀桀大才；利害交关时节，要凶狠；对人不能怜悯；对舆论要装聋作哑，笑骂由之；为官目的在弄钱，要善于搜刮，不择手段。

李宗吾的《厚黑学》虽被社会上视为一种愤世嫉俗的游戏文章，但它在客观上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奸诈权术和旧官场的丑恶现象，在全国影响颇大。

除《厚黑学》而外，李宗吾尚有《中国学术之趋势》、《考试制度之商榷》、《心理与力学》等著作，对中国学术源流，中国考试制度弊端，心理变化的力学规律等作了深入探讨。

1943年9月，李宗吾中风逝世。

昌　圆

昌圆，法号道静，原姓武，生于1879年（清光绪五年），郫县三元场人。世代务农，家境贫寒，15岁时受雇于花园场竹隐寺。以诚朴勤劳为寺主所看重，作当家长工。

1899年，昌圆在郫县三元场金龙寺披剃落发，拜觉诚和尚为师。昌圆尊师重道，师每外出常用小车接送，并随带小锄修补道路。1910年，觉诚圆寂，昌圆主持金龙寺，将觉诚留下的白银7000两作为布施，以济贫穷。并到新都宝光寺完成了他的“具戒”典礼。1915年他入“华严学校”学经，最初听普殊长老讲《华严经·超信论》不解其意，如坐云雾中，由于他刻苦钻研、持之以恒，逐渐通晓了经论意义。在华严学校期间他每逢休沐日，必回金龙寺料理事务，100余里路程全靠步行，昌圆从未耽误过学业，三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他还替学校认购过桌椅，并尽力资助授课法师。

民国以来，郫县城乡兴办学校，多以寺庙为校址地，一般寺庙对此反感，加以阻拦。昌圆则不以为然，特划金龙寺一半办学，并捐资修葺房舍，购置图书教具，为教学提供方便。在他的支持下，金龙寺学校学生成绩名列全县前茅，县政府赠以“尊佛崇儒”金匾。乡人倡议重修“释迦桥”，昌圆出资并承担募化任务，代

管资金。土匪欲劫捐款将昌圆绑票，昌圆乘隙出逃，将追赶的歹徒杀倒在地，奔回县城。

1919年初，昌圆重返新都宝光寺钻研佛经，年底代表宝光寺出席成都佛教会议，众请其讲演，昌圆即登座说偈，讲述“卜缠”，说理透彻，众皆信服。席间有僧建议：“由佛教会兴学以育僧才”，昌圆遂积极响应。是年文殊院聘昌圆任学监，三年之中与学僧同起居共甘苦，以身作则，深得学僧好评，前来皈依受戒者络绎不绝。

1922年起，昌圆先后在郫县、成都、罗江、怀远、崇宁、彭县、温江等地创办“佛教会”、“佛学院”、“讲经室”传播佛学知识，宣扬佛法。

1926年，昌圆任“郫县佛学会会长”。1928年四川省佛教会办教务传习所，昌圆任学监，同年任大慈寺方丈。1929年任爱道堂念佛堂堂长，并开始在省垣讲经说法，主讲《金刚经》，成都党政军以及社会上层人物纷纷前来听讲，一时声誉满城。

1930年，昌圆任四川省佛教会常务委员，时逢川军二十八军在川西南各县强征寺庙田产以充军饷。昌圆不辞辛劳，奔走于温、郫、崇、新、灌各县聚集川西南僧尼，抗征庙产，组织“川西南被害僧尼赴蓉请愿团”向当局请愿，竭力争抗，几经周折，当局终于允许留少许田产供僧尼生活。年底，昌圆前往南京，参谒太虚法师。太虚以昌圆学识精深，荐为全国佛教会副会长。

1931年，昌圆组织了崇庆普净佛学社，创办成都爱道学校、成都地藏庵尼僧学校、温江爱道学校。

1936年，昌圆继禅安和尚任四川省佛教会主席，7月郫县佛学社举办盂兰会，昌圆回郫县讲《盂兰盆经》。提倡钻研佛经、宣扬佛法。

同年9月，四川省佛学院创立，昌圆任院长。后因战争原因佛学院停办。1940年，国家征兵，昌圆以佛教会名义呈文当局，请求沿蒙藏僧伽例，僧人免服兵役。

1942年，昌圆筹办“郫县寺庙住持传习所”。1943年，郫县兴办“慈善事业委员会”，昌圆为主任委员。1944年秋，昌圆赴灌县灵岩寺，培修补葺寺庙。同年12月22日，昌圆坐脱（逝世）于莲宗院。

昌圆学佛，初宗“华严”、“弥陀”，晚年专修“净土”。生活俭朴、常教人“少欲”、“崇敬伦常”，皈依弟子数万人，得戒弟子7000多人，剃度比丘僧30余人，比丘尼40余人，得法弟子“定九”、“普坤”、“仁宽”、“隆光”等数十人，弟子之盛，堪称蜀中之冠。

陶行知

陶行知，原名文浚，后改知行、行知。1891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十六日）生于安徽省歙县谭源村。家境清贫，勤敏好学。1910年考入金陵大学文科，次年倡议并主办《金陵光》中文报。1914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写毕业论文《共和精义》，阐述了教育立国的理想。同年秋天，借债去美国留学，先在伊利诺大学学市政，获政治硕士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获“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

1917年，他抱着“要使全国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的奋斗目标从美国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南京安徽公学教授等职，并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和《新教育》杂志主编，反对“沿袭陈法，仪型他国”，对教育革新颇有贡献。1923年，陶行知发扬五四运动精神，与朱其慧等人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奔走于冀、蒙、苏、浙、皖、赣、豫等地，推行平民教育，并倡导“到乡村去”。恽代英曾写信给毛泽东，提出“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

1927年3月，陶行知辞谢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校长不就，毅然在南京郊外的劳山晓庄，创办了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通称晓庄师范），实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与社会生活相结合。他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理论，逐渐形成生活教育理论体系，这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是一个创举。1929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1930年4月，国民党统治者惧怕晓庄师范的革命性，以“勾结叛逆”为借口，武力封闭晓庄师范，学生30多人被捕，其中共产党员14人在南京雨花台惨遭杀害。陶行知受到通缉，被迫避难日本。

1931年春，陶行知秘密回到上海，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推动《申报》的革新起了重要作用。他发表《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长文，从民族出路的高度，提出了节制生育、优生优育的问题和措施。发表一系列杂文，猛烈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提出“安内必先攘外”的联合一致对敌的主张。创办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编辑出版《儿童科学丛书》和《儿童科学活叶指导》，开展“科学下嫁”活动。1932年创办山海工学团，首创“小先生制”，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1934年2月，创办《生活教育》杂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由于国难深重，

他参与发起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组织国难教育社，支持组织新安旅行团。1936年，陶行知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之一。7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毛泽东复信表示支持。同时受全国救国会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美亚非26国，为动员海外华侨和各国人民支援中国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伦敦，三次谒马克思墓，并写诗赞扬马克思主义。在他出国访问期间，沈钧儒等“七君子”以“爱国罪”被捕入狱，陶行知也再次被通缉。

1937年“七七”事变后，推行战时教育，《战时教育》创刊。在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影响下，孩子剧团成立。1938年8月陶行知载誉回国路过香港，创办中华业余补习学校，推动香港同胞共同抗日。10月，应聘为国民参政员，赴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议。12月，生活教育总社在桂林成立，当选为理事长，接着，建立晓庄研究所。

1939年7月20日，陶行知在重庆附近的合川县草街子凤凰山上创办育才学校，选拔有特殊才能的难童，在普修课的基础上，设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音乐、戏剧、绘画、舞蹈等组，因材施教，培养人才。

育才学校受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校内建立了直属党支部。在育才学校，党支部的负责同志向陶行知公开，党内的一些重要会议也请他参加。在国内形势非常紧张的时刻，周恩来、邓颖超曾到北碚与陶行知商谈应变工作，并亲临育才学校作形势报告，给全校师生增加了同反动势力作斗争的力量。

面对严重的困难，陶行知提出做一个“集体的武训”。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募集经费上，争取国内外朋友多方面的经济援助，也组织部分师生参加募集经费活动，还动员育才音乐组、戏剧组义演，绘画组举行画展。南方局派袁超俊多次直接从经济上支持育才学校，以克服困难。后来，周恩来派人送给陶行知一套南泥湾垦荒大生产的照片，还送给陶行知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毛衣。这对陶行知启发很大，他组织育才师生学习南泥湾精神生产自救，开荒42天，建立农场，解决了部分生活困难。他在讲话中谈到，中国是穷国家，要用穷办法办内容丰富的穷教育。在共产党的领导、支持和帮助下，陶行知冲破了反动派设置的重重障碍，使育才学校坚持办了下去。

1943年10月16日，陶行知发表了《创造宣言》，鼓励育才师生向创造之路迈进。一批少年学生出现了“创造热”，创作了好些剧本、歌曲、美术作品，写出了10多篇研究报告和科学论文。育才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名扬中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

1945年，南方局在育才学校举办农干班，为开展农村工作培养干部。

在南方局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

陶行知为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解放事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积极参加创建中国民主同盟的工作，是民盟的领导人之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全力投入民主运动并致力于民主教育，在重庆创办了社会大学。从1946年1月15日开学之日起，社大就成为当时重庆民主革命斗争一座营垒，成为对革命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一个基地。1947年3月2日，社大被国民党武装封闭，随即转入地下，继续坚持学习，坚持斗争，直到解放。

1946年4月，陶行知离开重庆赴上海。7月25日，陶行知在上海因受政治迫害，劳累过度，刺激过深，患脑溢血不幸逝世。

赵　熙

赵熙，字尧生，别号香宋。1867年10月10日（清同治六年九月十三日）生于荣县。1884年入县学，1887年入乐山九峰书院。后历教专馆，受业弟子以周善培为最知名。

1891年赵熙中举，次年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1893年，应重庆府聘主持府考。事毕返里，与举人曹佺“投牒”知县孟积伸，“指斥吏役苛索之弊”，遭孟积伸“牌斥”，“几酿大狱”。1894年赴京应保和殿大考，名列一等，授翰林院编修。在京期间与同乡京官刘光第、乔树枏、杨锐等过从甚密。

赵熙到京不久，即爆发甲午战争。时朝臣有战和两派，赵熙极赞同座师翁同和主战议论。同年秋，乞假还蜀。次年应重庆府聘出长东川书院。三年间，培养了不少知名之士，向楚、江庸、冉慈，龚秉权等尤著。

1898年“戊戌”之变，赵熙因母丧“守制”不能预政，实力主维新。认为“变法”“功过有不容没者”。刘光第因变法遇害，赵熙特保存其《甲午条陈》及诗文手稿，刘子长述等三人均收学门下，又撰《刘大夫传》加以表彰。

1899年，入京复职，翌年京津兴起义和团，随之有“庚子”之变。对清廷利用“扶清灭洋”口号，“奖”团民“当强敌”，深表不满。八国联军陷京，慈禧挟光绪逃陕，赵熙身处危城，洋人搜掠，官军骚扰，《纪事》诗自注云“官军所聚，尸气四达，虽复焚烧不绝，转使人思义和团也”。

1901年，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朝议“废科举，兴学校”以“自强”。赵熙亦主“讲学兴农”，谋“自立于久远”。时泸州倡办川南经纬学堂，延赵

熙任监督，因请假还蜀。学堂“规模宗旨，求新于旧”，“用外人日讲之例，参湖北分教之法”。来学青年百余人，谢持、黄树中(复生)、黄方、黄笃、陶冏等，后均成为辛亥起义骨干力量。

1903年，赵熙返京，擢授翰林院国史馆协修，旋升纂修。1906年父丧返里。1909年服除进京，转江西道监察御史。上专摺请将杨锐“宣付史馆”，又函促锐子庆昶进京缴诏陈情，并代为草奏，意图昭雪。

宣统冲龄登位，摄政王载沣暗弱无能。赵熙先后上疏弹劾庆亲王奕劻、川督赵尔巽、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号称“三大案”。奕劻任首席军机大臣，贪浊纳贿。御史蒋式惺、赵启霖、江春霖等相继弹劾，或被斥外转，或革职，或斥回原衙门行走。在此情况下，赵熙甘冒丢官杀头危险，再次弹劾奕劻，接着又弹劾盛宣怀借债卖路二十余款，铁骨铮铮，“直声”震动朝野。

为了揭露奕劻父子的丑行，赵熙在北京广和居饭庄“题壁”两首七律诗。该诗通俗易懂，又尽讽刺尖刻之妙语，因而迅即广为流传。饭庄主人懼祸将它刮除。

赵熙早负诗名，尤精五律，入京后受刘光第开示，得陈衍切磋，诗名益著。他同陈衍等结诗社，赵熙送杨昀谷入蜀，有《下里词》60首，叙一路所经，一夕而成。人叹其敏捷，章士钊推为“善颂西川第一人。”

1911年春，赵熙游嵩洛。又应汤寿潜、程德全约游杭苏，得纳交词学大师朱孝臧。返京后四川保路风潮起，奏情查办赵尔丰残杀无辜。

1912年赵熙客上海，曾东游日本。返国后，为蜀军北伐，出面协助向日本大仓洋行购买军械。后溯江还蜀，寓重庆礼园。时蜀军政府要员中有东川书院、川南经纬学堂弟子，故备受礼敬。1913年熊克武、杨庶堪在渝倡讨袁之师失败，杨等亡命上海，他“几陷不测”。次年遂返荣县故里。

1916年蔡锷率护国军入蜀，并任四川督军，赵熙应邀曾游成都。1918年朱德任滇军旅长驻泸州，赵熙赠诗有“读书已过五千卷，一剑曾当百万师”之句。

赵熙游成都时，同蜀中名流宋育仁、方旭等结锦江词社。“六百日中”填词200余首，“哀录”成《香宋词》，由林山腴“锓版”。赵熙素喜地方戏，所撰川剧《情探》，尤脍炙人口。

1919年杨庶堪任四川省长，约赵熙游成都，寓城西梁园。“文酒之会”所为词，题曰《花行小集》。

次年，杨庶堪礼聘赵熙主修《四川通志》，以政局有变而罢。1922年任《荣县志》总纂，1928年成书，次年付梓，被誉为巴蜀名志之一。1929年，在荣县创办文学舍，学生来自蜀中各地。讲义印行者，有《唐歌行》等。

1936年春，陈衍、张元济等游蜀，与赵熙、林山腴等会于乐山乌尤寺。陈、张

去后，向楚等又请赵熙赴重庆度70寿。酬唱之作，辑印为《慈香小集》。

赵熙又以书法著称，出入颜、王、苏，参以篆隶，行楷尤有功力。今成都人民公园"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西面碑名即为赵熙题写。抗日战争期间，应冯玉祥请，书字义卖助军。赵熙兼擅画艺。着墨不多，疏澹有神。山水竹木外，偶作人物画，《财东看山图》一幅尤妙。

赵熙晚年益嗜诗。其诗于八代、三唐、两宋，无不兼收，一生作诗3000余首。对四川军阀及国民党反动统治，颇多讽刺。陈衍称其诗"清奇浓淡靡不备"，汪辟疆誉为"清而能腴，质而近绮"。赵熙"尝五至京师，五出入夔巫"，因家近峨眉，"爱峨眉竺"，"尝七八游，故其诗咏峨眉及夔巫山中景物诗独多"，往往"一景物每数咏之，以极其变。"1948年9月27日赵熙病逝。

刘子如

刘子如，派名华璋，1870年（清同治九年）生于綦江县金灵乡（今重庆南桐区）一农家。自幼父母双亡，无家可归，13岁流浪重庆街头，被临江门外红庙的当家和尚收养。后由一家木刻字铺收为徒。成年后受雇于美商洋行，他加入了加拿大在华传教的基督教英美会（后来的美道会）。

当时一美资缝纫机胜家公司在上海经营业务，刘子如被派往上海，在这家公司学习经商业务以及缝纫机维修技术。这家公司见他有经商才能和技术，人也可靠，便派他回重庆开辟缝纫机销售市场。刘子如回重庆后展开大力宣传，并开办缝纫学校，缝纫机逐渐在重庆打开市场，并日益兴旺，后逐步在全川及贵阳等地开设了分公司分销处。至1910年，刘子如已成为重庆地区的巨商之一，他还在蓉渝两地开设过华璋草帽公司，与人合伙在重庆办过"三多"、"三才"机制砖瓦厂。1937年初，他又向政府申请在重庆设立胜家无限公司。

刘子如以基督博爱之心，愿将取之于社会的财富，办有益于民众的实事，因他自己亲身经历的苦楚，决心创办孤儿院。1914年2月，他请重庆基督教会及重庆总商会的负责人共襄善举。当即得到各团体赞助，他将胜家公司缝纫女校捐作孤儿院所。取名重庆孤儿院，接收男女孤儿生40名，他本人每年认负25名孤儿生的全部费用。这是重庆有史第一座教养兼施的孤儿院。1917年夏，孤儿院迁入大溪沟新院舍，至1925年，刘子如先后捐给该院银洋4.8万元。孤儿

院董事皆为重庆社会名流。民国时期该院培养孤贫院生数以千计。

1915年，刘子如为首发起募捐，在重庆小十字为美道会新建福音礼堂、妇女学校、高初两校、教会阅览室、小十字教会钟楼等等。他本人捐款达1.4万多元。他在任教会负责人时，还积极主张收回教权，华人自主传教，在“基督教”前冠以“中华”二字，教会经济也由华人自己负担，故在“美道会”前加上“自养”二字。1921年元旦起，美道会正式定名为“中华基督教重庆自养美道会”。还确定宣扬基督真理，改造社会人心为该会宗旨。

刘子如还曾捐赠成都华西协合大学1万元以修建大礼堂，对成都永兴巷孤儿院、四圣祠，江西省南昌青年会、九江儒励学校和重庆教会所办的学校等，刘子如均有巨额捐赠。

1921年5月，刘子如为首发起创办了重庆市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并逐步设立暑假学校、国民小学、幼稚园、巡回书库、无线电学校、救济会等。

1924年春，刘子如接受欧美诸国教会邀请，出国考察各国教会所办慈善事业，历时1年，访问了亚、非、欧、美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欢迎。他回国后写了《新新游记》一书，历述各国见闻，发表观感，希望国人为振兴中华而奋发图强，并向四川政府当局提出许多富有建设性的建议。他又向重庆孤儿院、美道会、青年会等捐款1.49万余元。

1931年春，刘子如又办了綦江县青山孤儿院，抗战时期该院学生最多达500余人。在该院接受启蒙教育的学生建国后有不少担任了县、区、乡各级领导干部，中小学教师、校长。

1937年，抗战爆发，刘子如从上海返川同其他爱国人士一起组织了“抗敌后援会”。他还担任了赴前线慰问士兵的战地服务团团长，率130名团员到第三战区，在慰问伤员过程中曾被敌弹炸伤。他在前线工作达3年之久，用费全是自负，未受公家分文，为此受到国民政府颁给的“服务前线，卓著成绩”的“海陆空军褒状”。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刘子如斥责国民党“自毁长城”。新四军领导人陈毅感其爱国热忱，亲自题赠大幅照片：“送给站在抗日最前线的刘老团长”。刘子如返重庆后，自感年迈力衰，不能再从事社会活动，遂告老还乡。回乡后，将部分田产捐赠青山孤儿院，一部分赠贫困亲友，仅给老妻留下部分生活费。1948年刘子如病逝。

乔大壮

乔大壮，名曾劬，字壮殴，别署伯戢、劳庵，号波外居士，华阳县（今成都市）人，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生于北京。祖父乔树枏官至学部左丞。乔大壮早年丧父，14岁能诗文，后入京师图书馆任管理员，得以博览群书。清末，乔大壮与其弟曾佑入北京译学馆，被外文教习辜鸿铭所看重，专习法文。卒业后曾被清廷派往欧洲留学，因故未成行。之后，乔大壮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图书审定处佥事，和鲁迅对桌共事达4年之久，很受鲁迅先生影响，《鲁迅日记》中屡有记载他与乔大壮交往之事。鲁迅书房中的一副集《离骚》句的对联："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即是鲁迅请乔大壮写的（今存北京鲁迅博物馆）。乔大壮与许寿裳、陈衡恪等也相处甚笃。他法语功底很深，曾与人合作翻译波兰显克维支的小说《你往何处去》（法文本）及其他法文作品。

乔大壮24岁学治印，兼攻书法。其篆刻运刀挺拔，着力清劲，有豪雄之致；而书法则博采众家之长，秀逸婉畅，寓刚于柔，至晚岁更趋严谨古秀，形成自己独特风格。

1927年，乔大壮曾去南昌，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秘书工作。南昌起义后，他回到北京。

1935年，乔大壮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讲授印艺。系主任徐悲鸿对他的学问文章极为推崇，尊他为"词宗"，并为之画全身素描像。乔大壮还与唐圭璋、向仲坚等结词社，因作词清丽、书法秀逸、印章奇劲而被时人誉为"三绝"。唐圭璋称他为"一代词坛飞将"。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乔大壮任实业部主任秘书，全家随实业部迁重庆。战时物价飞涨，生活艰辛，他为补贴家缴，常为人治印。乔大壮还担任过重庆中央大学词学教授，国民政府经济部、军训部、监察院的秘书、参议、参事及广西绥靖公署参议等职。

抗战胜利后，乔大壮随中央大学回南京，曾因校方解聘教授而与之据理力争。1947年夏，他赴台湾，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次年2月兼任系主任。后来，又被解聘。1948年他回到南京时，中央大学也正大肆解聘教员。因无处安身，他又去上海，住女儿家中。其时，内战日趋激烈。他儿子抗战入伍，后又加入内战行列。乔大壮虽反对内战却又无可奈何，错综复杂的心境使他无法解脱。

1948年7月3日，乔大壮乘火车去苏州，留下绝命书和遗言后，投水自尽。这在当时社会上震动很大。

乔大壮留下的词章、书法、篆刻作品

有:《波外楼诗》4卷,《波外乐章》4卷,《乔大壮遗墨》、《乔大壮印蜕》(收560石);翻译有小说《你往何处去》、剧本《马兰公主》(均与徐炳昶合译)。

吴 虞

吴虞,原名姬传、永宽,字又陵,亦署幼陵。原籍新繁县(今属新都县),1872年12月19日(清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生于成都文庙前街一地主家庭。

吴虞早年曾受过系统的封建教育,1891年入成都尊经书院,从经学家吴之英学习诗文,受其影响很大。1898年戊戌变法后,吴虞转而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当时人称他是"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

1902年以后,吴虞与王祚堂等人,创设"溥利公书局"、"开智阅报社"、"法学研究会",并建议设立"东文学堂",筹办公费留学等。

1905年秋,吴虞留学日本,就读于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四班,他学习了资产阶级政法学说后,思想更趋进步。他认真钻研了欧美各国宪法、民法和刑法,特别熟读了卢骚、孟德斯鸠、斯宾塞尔、远腾隆吉、久保天随诸家的著作,并同孔子的儒家学说相"比较校勘",从而产生了反孔非儒的思想。留日期间,他还积极参加四川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

1907年,吴虞毕业回国后,曾任成都县中学、嘉定府中学、官班法政教习;并在报刊上发表反孔非儒的文章,他撰编《宋元学案粹语例言》引明朝李贽语,清学部曾令四川学政赵启霖查禁,并要开除他的教职,后经人调解了事。清朝专制主义的压制,使吴虞发出了要求言论自由的呼声。1910年10月他发表了《辩孟子辟杨墨之非》一文,指出:"天下有二大患焉:曰君主之专制,曰教主之专制。君主之专制,钤束人之言论;教主之专制,禁锢人之思想。"他批判了孔孟思想之"专制",要求各学派"辩论"、"竞争",使"真理益明,则国亦由兴"。他最后说:"吾愿抠衣执鞭,以从其后,而鼓舞言论自由之风潮也。"他支持四川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活动,不仅出钱参与办立宪派的报纸《蜀报》,而且是该报的撰稿人。

辛亥革命前一年,吴虞因不满其父在家庭问题上的丑行而与之发生冲突,被其父告到官府,成了轰动成都教育界和"上流社会"的"家庭革命"的大事。尽管经官审断,输理的是他父亲,但却认为这是"非理非法"的"忤逆"行为。吴虞为了辩白是非,油印了一篇《家庭苦趣》,散发各学堂。这下,吴虞又犯了家丑不可外扬罪,招致许多责难。他的家庭悲剧,

致使他以后积极地反对孔教和家族制度，批判封建礼教，尤其是非孝。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吴虞因写文章“反对儒教及家族制度，批讲法律”，清廷下令逮捕他。吴虞逃到乡下，住其舅、哥老会首领刘黎然家。在刘的庇护下，才使他没有成为清廷的阶下囚。

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吴虞对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和清廷的放肆卖国，表示了极大的愤怒；对市民罢市、学生罢课，寄予巨大的同情。他在诗中写道：“瓜分豆剖事如何？恩怨难平恨转多。到此并成家国泪，洒来红遍好山河。”

随着武昌起义和清王朝被推翻，吴虞重新获得自由。他回到成都后，曾一度担任《西成报》总编辑、《公论日报》主笔、川西道署代理内务科长、《四川政治公报》主编等职。

由于辛亥革命的半途而废，尊孔复古逆流滚滚而来，吴虞又遭到袁世凯的军事独裁统治的迫害，成了“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在成都“上流社会”里受到歧视。

辛亥革命后，四川军阀混战从未间断。吴虞亲历军阀混战的痛苦，他的妻子曾兰也因逃避战火而患重病去世。这使他感到连起码的“人权”、“自由”、“幸福”都得不到保障，法律也遭到任意践踏。吴虞写文章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发出了令人深醒的感叹：“社会状况之恶劣，岂偶然哉！岂偶然哉！”

袁世凯称帝，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结果做了83天皇帝梦就死了。吴虞得知袁世凯死的消息，“为之大喜”，当天即写诗6首，以表兴奋之情。袁世凯所以敢于恢复帝制，帝制复辟派“归咎于共和之不适用”于中国。吴虞据理驳斥，写了《情势法》一文，认为是法制不健全造成的。他提出要健全法制，“庶民贼独夫有所惩惧”，以防袁世凯称帝丑剧重演。

面对尊孔复古逆流，吴虞进行了勇敢的斗争，他的文章在成都不能发表，就寄到外省去发表。他写的《辛亥杂诗九十六首》，是寄到日本东京为陈独秀选载于《甲寅》杂志上。成都教育界的守旧派攻击他是所谓“名教罪人”、“非圣无法”，他写了《明李卓吾别传》，为《进步》杂志登载，肯定明朝这个“名教罪人”、“非圣无法”的人，与守旧派针锋相对。他还写了《康有为君臣之伦不可废驳议》，揭露立“孔教”为国教，是将孔孟之道作为复辟君主专制制度的工具。他还提出要改革教育，指出：“今日欲改革学风，提倡教育，似当以校长有相当之学术为第一要义，此又必待留学有完全之人，而后学校有振兴之望。”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以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1916年迁到北京出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对封建思想展开批判，这就是1915年开始形成的新文化运动。吴虞看了《新青年》登载易白沙《孔子平议》一文，认为找到了“同调”。他写信给陈独秀说：“读贵报

大论，为之欣然。”在信中还告诉陈独秀，他“尚有《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儒家重礼之作用》、《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消极革命之老庄》、《读荀子》诸篇，其主张皆出王充、李卓吾之外。暇当依次录上，以求印证。”陈独秀回信同意发表他的文章，说：“尊著倘全数寄赐，分载《青年》、《甲寅》。嘉惠后学，诚盛事也。”吴虞从此积极投稿《新青年》。他高举打倒孔家店的旗帜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封建旧礼教、旧道德，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批判，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胡适称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

1917年吴虞又回到了成都教育界，在四川法政学校担任法制史、国文课教员。1918年在四川法政学校、外国语专门学校及国学专门学校教国文和文学史。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守旧派大肆对吴虞进行攻击，要驱逐吴虞出成都教育界，但吴虞却得到青年学生的支持。

“五四”运动以后，吴虞跟不上革命形势的发展，逐渐掉队。1921年夏，他被北京大学聘为国文系教授，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方大学京校、中国大学等校任教。他在北京，生活上有狭邪之行，并作了一些恶俗不堪的艳诗，大授人以口实，一时声誉扫地。在他受到嘲弄后，思想消沉，不参加政治斗争。因此，他在北京最后的年月里日益落寞无闻了。

1925年吴虞又回到成都，先后任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这时的吴虞并未放弃反孔非儒的主场，仍坚持以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旧礼教和文化专制主义。1928年5月，他发表了题为《对于祀孔问题之我见》的讲演，基本上还是五四时期批判孔学和旧礼教、旧道德的内容。

吴虞在成都最后任教的几年中，仍遭到守旧派的排斥和打击，到1933年终于被迫去职。此后就退隐，潦倒在家，1949年4月27日病逝于成都。

吴虞的著作是“五四”时代的畅销书，他在文学上的造诣也很深。吴虞的诗文和日记，已编辑成《吴虞集》和《吴虞日记》，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傅增湘

傅增湘，字润沅，复字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老人，笔名尚有姜弇、书潜、清泉逸叟，长春室主人等。1872年10月9日（清同治十一年九月八日）生

于江安县一官宦家庭。幼年即随父宦游出川，1880年定居天津受学，1888年应顺天乡试中举。19岁时，入保定莲池书院，受业于著名古文家吴汝纶。1898年中二甲第六名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1902年应袁世凯之聘，先后入保定新军幕府和直隶总督幕府。次年散馆考试，以一等第一名授翰林院编修，旋任顺天乡试同考官。

傅增湘早年致力于教育事业并卓有成绩。从1905年起，他先后在天津创办了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天津女子公学和高等女子学堂等新式学堂，并任北洋女子学堂总办。1908年在北京筹建了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奉派为学堂第一任总理（校长）至1910年，1909年兼署直隶提学使，在任3年中，大力推行小学教育，尤重视乡村小学的建设。为培养小学师资，又在保定、天津、滦州、邢台4地创设初级师范学堂。

辛亥革命爆发后，傅增湘曾参加以唐绍仪为首的北方议和代表团南下上海。和议不成，辞职返津。旋因母丧，回川居家守制。1914年被选为全国约法会议议员。后又任袁世凯政府肃政使至1916年。1917年出任北京政府王士珍内阁教育总长，下两届内阁均留任。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因反对镇压学生和拒绝副署罢免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的命令，愤而辞职。此后，便以全部精力，潜心典籍，从事图书收藏和校勘古籍，研究版本目录之学，成为中国现代著名藏书家和校勘、版本目录学家。

傅增湘大规模收藏古书是从辛亥革命后开始的。他勤于访求，经常流连于北京琉璃厂、隆福寺等著名书肆。每年还要专程赴江苏、浙江、安徽等省的著名文化兴盛之区访书，除书肆外，兼及藏家。每获知某地有善本，必求一得，倘若资金不足购书，也必求一见，借书阅读、校勘。所得薪金，除生活费用外，全部用以购书，甚至借债收书，或卖旧换新。他把自己殚精竭虑于收藏书籍比之为"蚁之集膻，蛾之扑火。"这样日积月累，收藏日渐宏富。1916年，他收得端方旧藏南宋绍兴二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刊本《资治通鉴》后，与祖传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相配，"俪为双鉴"，号藏书之所为"双鉴楼"；又取苏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诗意，自号"藏园居士"。1928年购得南宋淳熙十三年宫廷写本《洪范政鉴》后，便以此书代替《资治通鉴音注》，与绍兴本通鉴合成"双鉴"，更名重一时。

经过数十年努力，双鉴楼以所藏的珍贵善本和孤本书著称于世。计宋金刊本之善本书约150种，4600余卷；元刊本善本书数十种，3700余卷；明、清精刻本、名钞、名校本更多。收藏总数达20万卷以上，成为继清末陆心源皕宋楼、丁氏八千卷楼、杨氏海源阁、瞿氏铁琴铜剑楼之后的海内藏书大家。

与前代藏书家相比，傅增湘不仅能藏，能读，而且把读与校结合，以校勘和传播为己任。其校书生涯始于1893年，

讫于1944年4月，前后历50余年。他曾说："独于古籍之缘，校雠之业，深嗜笃好，似挟有生以俱来，如寒之索衣，饥之思食，如无一日之可离。"以至校书成痴，"半生精力尽耗于斯"。从1911年起，他以校书为日课，给自己规定每天校书30页。白天时间不够用，就熬到深夜，"数十年来曾无经旬之辍"。

傅增湘校勘态度谨严。其手校诸书所据多是难得之善本，底本亦选佳本之精洁者。每校一书，"必兼采数本，一本或复勘再三"，反复推求诸本之优劣及嬗递源流，工笔楷书，卷末多附题记，详记校勘所得。综计傅增湘一生所校群书共1.63万余卷，近800种，撰写题跋500多篇，校记数十种。

为校勘群书和研讨版本目录学，傅增湘在数十年中遍访国内各著名图书馆和南北藏书家所珍藏的古籍，并作详细记录。为了解日本收藏中国古籍的情况，曾于1929年秋赴日本考察，遍观日本各地所藏重要宋、元善本。长期的校勘和博览，使傅增湘谙熟版本源流及各本真赝得失。他每得一书，就撰写题跋一篇，每见一善本，也写一书录，以辨版本之异同，校字句之伪误，甚至穷搜刻工姓名，避讳字样等资料，以资鉴别版本之佐证。其学识博大精深，往往发人所未发，详人所不能。他的版本目录之学备受当代学者推崇。

为传播典籍，以利于学术研究，傅增湘不惜巨款甚至举债刊刻了《双鉴楼丛书》12种，影印了《周易正义》、《资治通鉴》、《太平广记》等多种珍藏的善本秘籍问世。还为商务印书馆等提供古籍善本数十种影印出版，以广流传。他对故乡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以"生为蜀人，宜于故乡薄有建树"，亲手编定《宋代蜀文辑存》100卷，辑录文集已佚诸人之文2600余篇，作者450余人。1944年为筹集此书印刷费用，售去所藏的宋、元及钞校善本100种。又精选善本书12种，由当时名工雕版，编成《蜀贤遗书》。为传播蜀人著作，以彰乡邦文献，倾注了心血。

傅增湘一生著述宏博。特别是在校勘、版本目录学方面成果卓著。其重要著作有：《藏园群书题记》、《双鉴楼善本书目》、《藏园续收善本书目》、《双鉴楼珍藏宋金元秘本目录》、《藏园校记》等。代表作为《藏园群书经眼录》，又名《藏园瞥录》，由其孙傅熹年整理编定为19卷，共180余万字，著录作者30多年访书、购书、读书过程中所见各公私藏书之精品，收录了善本书4500余种，并加按语进行比较和评价。此书凝聚了作者毕生精力，为现代一目录学巨著。

傅增湘还是一位出色的古文家。在他的诗文稿中，所存游记颇具特色，既能博征文献，又重实地考证，笔力雄放，工于比拟，情景交融。所作《双鉴楼藏书杂咏》，文采斐然，堪称七言组律诗中的佳作。30年代他曾受傅作义之聘，任《绥远通志》总纂，编成6志、360门，共116

卷。

1944年春，傅增湘患脑血栓偏瘫卧床。1948年秋，北平解放前夕，胡适曾两度来访，劝说傅增湘去台湾，傅增湘坚予拒绝。1949年10月20日，傅增湘病逝于北京。

傅增湘卧病后，首先把平生校书1.6万余卷，全部捐赠北京图书馆。逝世后其子遵遗命将珍藏"双鉴"捐献国家。所余图书中，秘库所藏宋、金、元刊善本和重要明刊善本，及名人钞校本数百种，到1956年止，也分3批全部让归北京图书馆。另有部分外库书籍，包括一部分明清善本，共3.4万余册，根据傅增湘生前愿望捐赠四川。

胡政之

胡政之，原名霖，笔名冷观，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生于成都一个官僚家庭。幼年受过良好的旧学教育，后入安徽省高等学堂期间接受西学教育，因阅读进步报刊，对日后的思想起到很大影响。1907年自费赴日留学，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法律。这期间与学商的中国学生吴鼎昌相识，并因吴认识了孙中山。后又在东京结识了张季鸾。1911年，胡政之毕业回到上海。

胡政之先在上海开办律师事务所，继而得张季鸾帮助参加了民立图书公司。1913年，他受聘任上海《大共和日报》总编辑兼任中国公学法律教员。张季鸾因反对袁世凯入狱，出狱后在胡政之所在的《大共和日报》作日文翻译，胡张二人又在上海公学执教法律、外交，在患难中感情日笃，为日后事业打下基础。

1915年，袁世凯的宠臣王揖唐出任吉林巡按使，胡政之在其属下任秘书长。1916年王辑唐调任段祺瑞内阁内务部总长，成为安福系头目之一，胡任内务部参事，此为胡政之与安福系关系之始。同年，胡政之担任了王郅隆接办的《大公报》经理兼总编辑。在此期间，他代表《大公报》采访1919年举行的巴黎和会，是巴黎和会中惟一的中国记者。会后，他遍游英、法、德、瑞士等国。1920年回国。时值直皖战争爆发，皖系战败，皖系的"安福俱乐部"失势，安福系的机关报《大公报》不振。胡政之离开《大公报》，与林白水合办《新社会报》，自任总编辑。不久，胡与林意见不合离去。

1921年胡政之在上海创办了"国闻通讯社"，经济支柱是皖系军阀卢永祥。直皖战争中失势的安福系，想东山再起，便联络北方的奉系军阀与南方的国民党，组成反直的临时政治组织於上海。

"国闻通讯社"便在这种政治斗争的需要中问世了。素与安福系关系颇深的胡政之物色李子宽、张琴南入社,社务行政由卢永祥主持,胡政之领导业务。

1924年,江浙的齐卢战争爆发,卢永祥丢失了浙江地盘,"国闻通讯社"的经济支柱受震。依附卢永祥的人纷纷离去,胡政之见势掌握了大权,"以社养社",在该社成立了一个广告部,靠为《国民日报》招来广告维持开支。不久,他采纳了同仁李子宽的建议,于同年8月创办了《国闻周报》,附属于"国闻通讯社"。《国闻周报》1926年由上海迁天津,该报至1937年停刊共出版13年,成为一个国内较有影响的时事周刊。

1925年11月,《大公报》停刊,吴鼎昌出资5万买下了该报的产业,与胡政之、张季鸾组成《大公报》新记公司。吴在金融界着意进入政界;而胡张二人早年是留日的同窗,回国后又有开创新闻事业的夙愿。因此,《大公报》便成为了他们实现宏图大志的园地。于是三人以"约法五章"为办报的"宪法","决不旁骛"。吴任社长,胡任总经理,张任总编辑。新记《大公报》的编辑记者皆由"国闻通讯社"人员担任。至此,"国闻通讯社"、《国闻周报》都成了《大公报》附属企业。此时,胡、张二人大施才干,将《大公报》办成了全国有名的大型报纸,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日本和美国都有影响,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的窗口。以后《大公报》在1941年,获得了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荣誉奖章。这其中,胡政之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的。

《大公报》以精美的印刷、精良的版面、迅速准确的国外消息、犀利的言论、生动活泼的专栏和副刊博得广大读者的喜爱。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随着战局的变化,先后开辟了新版:上海版、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和重庆版,发行量到1938年已逾10万份,到1942年已有重庆、桂林、香港3馆,成立了董监事办事处。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公报》的黄金时代。新记《大公报》较客观的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40年代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状况,是中国当时影响深远的报纸之一。

胡政之有一套办报的独特经验。他很重视《大公报》的专栏和副刊,开辟有哲学、医学、文艺、经济、图书、文史和科学等各种周刊,20年间从未间断。他也重视该报选用的特派员和通讯员工作,注意在来稿中聘请有才华和名气的作者担任特派员、特约通讯员,该报的特写、通讯比别的报纸多,是其一大特色。范长江被《大公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后,胡政之资助他到西北旅行,该报连续发表范长江的陕北通讯《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陕北共魁刘志丹》、《陕北甘东边境上》、《从瑞金到陕北》等篇,客观上起到了使读者了解红军长征全貌的作用,影响很大。

胡政之自进入新闻界写出了不少影响大的游记和通讯,如《新年旅行三省

记》(1925 年)、《粤桂旅游日记》(1927 年)、《东北之游》9 篇(1928 年)、《再游东北》(1929 年)、《新都印象记》3 篇、《1929 年蒋、冯、阎大战之际在南京会晤蒋介石》、《阎白访问记》、《再度访阎记—1931 年北方政局变化中的阎锡山》等。

胡政之于 1946 年春以社会贤达的名义参加了旧政协,旋任国大代表,主持复刊后的香港《大公报》。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曾想建立一个中国的报业托拉斯,几经周折未能实现。1949 年 4 月 14 日病逝于上海。

罗　淑　马宗融(合传)

罗淑,女,原名罗世弥,1903 年 12 月 19 日(清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一日)生于成都。其父罗树屏原籍直隶河间县(今属天津),清末宦游入蜀,后辞官到成都居住。1912 年,他在简阳县石桥镇老马湾购置了六七口盐井,开设熬盐的"聚兴灶",将全家从成都迁至老马湾定居。罗淑在这充满封建剥削和压迫的偏僻山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目睹盐工、农妇和脚夫们挣扎在饥饿线上的悲惨生活,在她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对劳动人民深切同情的种子,同时也为她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罗树屏喜好读书,重视子女的教育。罗淑在父亲的熏陶下,自幼喜爱诗词。1919 年罗树屏在当地开办家塾,罗淑是家塾中惟一的女生,她聪颖好学,擅写一手清秀的赵字。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罗淑不愿再读四书五经,她渴望学习新知识,探求新的人生。此间,她通过其兄罗世安与远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马宗融相识,并一直保持书信往还。1921 年,罗淑进入简阳县立女子学校学习。1923 年毕业后,转入成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第十班,1927 年升入该校高级中学师范科第二班。她冲破学校的清规戒律,热心社会活动,成了学校当局难于对付的"社会革命斗士"。

马宗融,回族,1890 年 9 月 1 日(清光绪十六年七月十七日)生于成都。中学毕业后,入成都一所德文学校学习。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学校停办,他和同学罗世安一同赴日本东京学习日文。次年因参加留日学生反对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示威游行,被驱逐回国。1919 年,马宗融又同罗世安一道赴法国勤工俭学,初在巴黎当印刷工人,不久入里昂大学学习文学。在法期间,曾与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合办《工余杂志》,并在国际联盟和里昂中法大学担任过秘书等职。1927 年回国后,为上海商务印书馆撰写过《法国革命史》,给《东方杂志》等刊物译过一些短篇小说。1929 年春

夏之交在上海结识巴金,从此两人成为挚友。不久,马宗融回到成都。

1929年夏,罗淑以优异成绩在一女师毕业,9月与马宗融一道奔赴法国,次年他们在法国里昂结婚。马宗融在里昂中法大学任秘书,罗淑在该校补习法语,嗣后进里昂大学学习教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课程。她特别喜爱法国巴尔扎克、雨果、左拉、罗曼·罗兰和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并在尔后的创作中深受其影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罗淑、马宗融夫妇归心似箭。他们不顾在法国当外交官的罗世安劝阻,带着不满3岁的女儿,于1933年回国,到上海定居,并在市郊南翔立达学园高中部农村教育科任教。第二年因学校搬迁,他们辞去教职,迁入市区拉都路敦和里居住。罗淑家居从事翻译和文学创作。她翻译发表了普希金的《棺材商人》、苏贝维勒的《耶稣降生的槽边的牛和驴子》、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何为》(即《怎么办》的节译本)、罗曼·罗兰的《贝多芬笔谈》、玛尔格里特的《白甲骑兵》和雷米的《决心》等。

1936年,罗淑把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生人妻》交巴金审阅,巴金给她取了"罗淑"的笔名,将该文发表在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季月刊》一卷四期上。"作者以女性的敏感和同情描画了这一对夫妇的悲剧命运纯朴真挚的感情……突出妻子的倔强和从而爆发的抗争;不仅写出了农民的深重苦难,也表现了他们最初的觉醒。"(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由于写得深切动人,作品发表后,深受朋辈作家的重视和文艺界的好评。罗淑还陆续写了短篇小说:《桔子》、《刘嫂》、《阿牛》、《地上的一角》、《鱼儿坳》、《贼》、《井工》等和散文《捞粪草》、《轿夫》、《弄堂里的叫卖声》,"大都是表现旧中国惊人的贫困和那些在饥饿威胁下痛苦呻吟、默然挣扎的农民盐工的生活。罗淑一步人文坛就显示了她的未来的光荣的成就。"(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些作品为当时文坛开辟了写盐工生活的崭新创作领域,倾注着她对故乡劳苦大众的热爱和同情,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

这一时期,马宗融受聘在复旦大学教法语和文学批评。他曾为《太白》杂志撰写了一组风俗志,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外国文学评介,并给中法文化基金委员会翻译了一本法文哲学著作。1936年底,马宗融赴桂林广西大学任教,全家同去桂林。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们一家辗转于10月底回到成都。马宗融受聘任四川省政府顾问,并在四川大学文学院执教。他和罗淑一道积极投入抗战文艺运动,是周文等人发起成立的成都文艺界联谊会的重要成员,并与文艺界朋友一道筹划《华西日报》的新文艺副刊。马宗融在成都文协的《笔阵》上发表了《克服你如桨的笔》。罗淑此时已临近产期,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但仍

未放下手中的笔，在《群众》、《国防文艺》、《文艺阵地》等刊物上发表了小小说《八月十三日早晨》、《被难者》，杂文《谁在和谁打》，短文《〈流民三千万〉观后感》、《在车厢里》等，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日寇铁蹄下的苦难和抗争。

1938年2月9日，罗淑生下儿子绍弥后，因患产褥热于2月27日去世，葬于成都老西门外沙湾马家宗族墓地。罗淑逝世后，巴金、靳以、李健吾、黎烈文等都曾著文纪念这位卓有才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进步女作家。她留下的作品由巴金编辑整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生人妻》、《地上的一角》、《鱼儿坳》3本集子。196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生人妻》、《地上的一角》合编为《生人妻》。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罗淑选集》。

罗淑的去世使马宗融异常悲痛。1938年冬，他转赴重庆北碚复旦大学任教，后又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和重庆回教救国会的副理事长，开展抗战文艺和民族团结宣传。1940年，他以回教救国会的名义，请老舍、宋之的合写了反映回汉团结抗日的四幕话剧《国家至上》，并为该剧的创作提供素材。同年4月7日，该剧由中国万岁剧团在重庆国泰大戏院演出成功，反响强烈。为培养回族人才，他不辞辛劳，多方奔走，在北碚复旦大学校内开办回族先修班。同时，他还与李劼人合译了法国作家左拉的《太阳》、《梦》，翻译了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春潮》，出版了散文集《拾荒》，发表了《阿拉伯文学对于欧洲文学的影响》、《文艺与民主：用文艺作为武器来争取民主的实现》等论文。

抗战胜利后，马宗融于1946年随复旦大学返回上海。他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参加罢教和游行请愿，不顾个人安危，把进步学生藏在家里，为被捕学生奔走呼号，并在校务会议上慷慨直言、拍案怒斥国民党。为此，他被学校当局解聘。

1947年秋，马宗融赴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任教，与中文系主任许寿裳、中文系教授乔大壮等十分要好，常在一起抨击时政，互诉衷肠。1948年2月19日，许寿裳惨遭暗杀，7月2日，乔大壮又在苏州投河自尽。两位好友先后惨死，对马宗融打击很大。因借酒浇愁，饮酒过量，他得了肾炎，全身浮肿。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他热切盼望返回大陆，迎接解放。1949年2月，马宗融带病回到上海，由于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和护理，于4月10日病逝。他所收藏的图书全部捐赠复旦大学，遗下的子女由巴金收养照顾。巴金在《怀念马大哥》一文中对马宗融作了这样的评价："他说过：为了维护真理顾不得个人安危，他自己是这样做到了的。我看见中国知识分子的正气在他身上闪闪发光。"

周均时

周均时，原名烈忠，字君适。1892年11月8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十九日）生于遂宁一商人家庭，幼年时即随父来渝，落籍巴县。在重庆正蒙公塾就读期间，深受在该校任教的杨沧白等人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1906年赴上海，考入中国公学英语科，1909年转入南洋大学船政科。辛亥革命后，周均时随船政科学生拨归上海商船学校。毕业实习时，他驾驶“保民轮”出色完成船行青岛港的任务，取得船主资格，开创中国人在本国担任轮船船主的先例。

1913年，周均时返川参加成都稽勋局留学生考试合格，赴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深造，攻读力学、弹道学等学科，并留心考察德国兵工技术和组织管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周均时曾一度到波兰乡间自修。他性格豪放，嫉恶如仇，面对一些外国人轻侮中国留学生的言行，常当面驳斥，据理力争，毫不示弱。他说：“吾理足而不争，岂不弃人权！若理不足妄欲求胜，徒自辱耳。”

1920年周均时返国回川，他向当时四川督军熊克武、省长杨庶堪提出大力开发地方实业的建议。1922年，四川地方政府派周均时重返西欧进行考察，以便购买机器，延聘人才，为在川设厂作准备。后因川局突变，军阀混战，周均时遂留居德国，再次入柏林工业大学，从冯娄耶钻研爱因斯坦相对论原理。1924年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中欧公司”，成立造纸、锯木、玻璃、毛织四大厂。但由于当时社会上迷信洋行积习很深，加之时局动荡，业务渐不景气，公司被迫停业。抗战期间，周均时曾在重庆办“巴山冰厂”，成为当时全川最大的冷冻企业。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周均时即投身教育事业。他相继受聘任上海暨南大学高等物理与数学教授、南京东南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数学教授、重庆大学理学院物理系主任。他学识渊博，教学认真负责，讲授生动，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深受学生欢迎。30年代初，曾接受刘湘之聘、任重庆工业试验所所长兼武器修理所技术指导。抗战爆发后，一度以高级技术员名义，指导国民政府兵工署的兵器制造工作。

1940年夏，周均时被任命为内迁至昆明的同济大学校长，这是当时国内惟一的一所使用德语的工科大学。他上任伊始，即尽心筹划，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校舍、经费、设备、师资、学生诸方面存在的问题；大力整顿校风，提倡合作精神，尽力改善教师待遇和学生的学习、生活条件；又加强学生德文补课，增加实习机会，组织力量抢修好17部工具机和4000

余件工具供学生实习，还订造机器、充实教学设备和添购附设医院药品。后因日机不断空袭昆明，威胁师生安全，周均时提出分期迁校办法。经教育部批准后，该校于1940年10月开始内迁入川，周均时任迁建委员会主席，经与各方联系，终于在宜宾和南溪两地借到公产房屋作临时校舍。他亲自担任高等数学矢量课的教学，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提高教学质量竭尽心力。后因校内"C·C"派学生制造风波，周均时乃于1941年冬辞职。此后，周均时曾担任中国公学、私立重华学院董事长，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长。1944年，他与何鲁、税西恒等进步人士一道，参与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蜀都中学的筹建工作，并出任副董事长。该校是中共地下党的重要活动据点，进步思想浓郁，培养了不少革命人才。

周均时治学严谨，对物理、数学、弹道学、力学、船政等学科均有较深造诣。他与姚启钧合译的德国韦尔斯特著《高等物理学》一书，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被京、沪、渝各大学采用作教材。

抗战期间，周均时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他对国民党所推行的消极抗战路线进行过尖锐的抨击。抗战胜利后，周均时投身于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争取和平民主的爱国民主运动，并于1948年1月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该组织重庆地区负责人之一。1948年冬，他与何鲁、税西恒等，约集重庆文教界的进步人士召开应变问题座谈会，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并组成"文教界应变联谊会"，对推动重庆文教界的民主爱国运动，起过积极作用。

1949年，周均时参加了以杨杰为首的"七人小组时局讨论会"，并筹组民革川东分会地下组织，秘密进行策动国民党地方部队反蒋起义的革命活动。因被打入民革内部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侦悉，于8月24日在重庆被捕，囚于白公馆监狱。他在狱中拒绝提审，痛斥特务横行。同年11月27日深夜，重庆解放前夕，被敌人杀害。

王白与

王白与，名本霖，字白与，祖籍西充，1902年10月15日（清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四日）生于蓬安县柳滩乡一书香世家。祖父为清末举人，任过蓬州玉环书院山长。王白与5岁即入学私塾，成绩优异，后入顺庆（今南充）联中。中学结业后，他赴北京考入陆军测绘学校，随后，他又考入北京大学，因其勤奋好学文

采出众而颇具才名。当时，寓居北京、担任《晨报》主编的蒲殿俊对他深为器重。

王白与从北大毕业后回到四川，先是以为成渝两地报刊撰稿维持生计。1927年，他因文笔出色而被重庆《新蜀报》聘为总编辑。他任总编时，该报“凡有关民族兴替，国家兴亡的重大问题，莫不站在时代之前大声疾呼。”而对“足碍社会之进展者”则“不畏威胁，不受利用，痛加贬斥。”

王白与还担任过刘湘二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他创办了“新闻学研究所”，吸收热爱新闻事业的有志青年人所学习。他支持、爱护进步青年，中共党员王俊两次被捕都是被王白与保释出来的（王俊后被向育仁杀害）。《新蜀报》记者，中共党员吴宜之被捕后，王白与也曾积极设法营救过（吴后自杀以抗议当局的暴行）。

1933年刘湘主持川政时，王白与担任四川省政府编译室主任兼川康善后督办公署政治部主任，他积极建议革除祸害四川人民多年的“防区制”。

1934年，王白与创办了《华西日报》并任社长兼总编辑。他提出的办报准则是求真理，扬善抑恶，报纸自己应洁身自好，应把民众利益放在首位，因此他办的《华西日报》曾风靡一时，销路甚广。

1935年，刘湘根据冯玉祥的建议，针对蒋介石在峨眉办中央训练团的做法，在成都办了川康善后督办公署军官研究班，与蒋分庭抗礼。王白与担任研究班主任，他以严重的民族危机为例，在研究班宣讲团结救国的道理，呼吁一致奋起救亡图存，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论调。1938年刘湘病逝后，王白与脱离了国民党政界，《华西日报》也因受到当局的刁难使他不得不撒手。

1941年至1943年间，王白与在成都创办了岷山艺术学校并任校长。他又担任过《新蜀报》总经理。他在《新蜀报》上开辟专栏。抨击国民党政府实行“田赋实征”的罪恶实质。他还与何鲁等组织粮民索债团，发动全川农民向政府索还征借粮债。

1944年王白与和一些进步青年创办《大义周刊》，因宣扬进步言论，很快被当局扼杀。

抗战胜利后，王白与利用担任朝阳学院、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等校教授的身份，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要他们明辨是非，站到人民一边。

1946年2月，国民党当局在重庆制造“校场口血案”后，王白与在《国民公报》上公开署名，发表《四川老百姓起来》一文揭露蒋介石玩弄假和平、准备制造内战的阴谋。为此，他得罪了当局，被迫离开重庆去上海。

王白与在上海期间担任了“民主同志联谊会”秘书组长。他亲笔起草的“民联”纲领和宣言表明“要充分发动人民力量，制止内战，争取真正的持久的民主与和平”。并拥护共产党提出的没收官僚资本的主张。王白与还和民主同盟负责

人张澜、邓初民等保持着密切联系。

王白与擅长诗词书画，工魏碑、隶篆。他的书画室“食力斋”中收藏的文物颇为丰富。字画方面有自宋元以来的名家杰作，如元代名画家倪赞的江南太湖山水册，明代李流芳的绢本水墨画，周臣的《观瀑画》，唐寅、谢时臣、钱谷等人的山水、花鸟团扇册页。还有明代大书法家文征明的《虎山桥》行草斗方，清代的成亲王、龚晴皋、郭尚先等人的墨迹为数也不少。王白与收藏的近现文物珍品还有：徐悲鸿的墨竹，齐白石的群虾图，郁曼陀的仕女画，张晖的桂花图等。他还保存了于右任、黄炎培、蒲殿俊等知名人士赠给他的书法墨迹。王白与还收藏了100多件艺术、史料价值都极珍贵的拓片，如东汉“袁安、袁敞碑”、“石门铭”的宋元拓片，雅安高颐阙明代拓片等。他所收藏的一些影印书刊和书信稿，是研究四川近现代史不可多得的贵重史料。四川解放前夕，王白与为了使这批珍贵文物免遭战火的毁灭，将其全部从成都运回家乡西充，解放后由他的亲属将这批文物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1949年春，王白与回到四川，和其他“民革川康分会”的同志一起秘密进行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工作，准备以武装起义迎接大西南的解放，后因计划泄露，8月20日王白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押于重庆白公馆监狱，他在敌人威逼利诱面前毫不动摇，11月27日从容就义。

萧楷成

萧楷成，亦作楷臣，名模，又名金华。崇庆州（今崇州市）人。1878年（清光绪四年）生。其父萧伏山曾任崇庆州署马粮，又于成都南门某卡任职司事，因喜玩票而被罢职，遂“下海”为艺人，从生净两行，驰名成都及川北一带。兄萧金臣随父学艺，生净兼唱，做工讲白亦好。萧楷成自幼受父兄熏陶，稍长，家贫辍学。10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又改嫁，乃外出寻兄，流落戏班。11岁登台唱娃娃生，艺名“玉娃子”。1894年，拜名鼓师秦仙帆习场面，继得名师刘育三指点，改习小生，成为戏班的台柱演员。

1912年，萧楷成与川剧名角杨素兰、康子林、唐广体等在成都共同创办由艺人自己经营的川剧班社“三庆会”，推选出杨素兰和康子林任正副会长。萧楷成虚心向康子林学习，学得不少康派精华，融于自己的表演之中。二人密切合作，终成莫逆之交。

1913年，“三庆会”成立了培养会员子弟的昇平堂，萧楷成任堂长，主持教

务。唐荫甫、晋明权、玉飞琼、白玉琼、筱灵芝、筱玉梅等都是这个科班毕业的高材生，名旦周慕莲也在昇平堂进修过。

1921年，康子林继任“三庆会”会长，提出了许多改革措施，都得到萧楷成的鼎力支持。他们组建研精社，专门研究表演艺术。萧坚持自学文化，常向赵熙、尹昌龄、冉樵子等名家请教，上演他们的剧本，还向国画家张大千、书法家杜柴扉学习书画，以陶冶情操和气质。

康子林要求“三庆会”打破名演员只演主角，不演配角的陈规，提倡根据剧情发挥特长。萧楷成和他带头示范。如在《离燕哀》中，康主演徐苕郎，萧配演任尚义；《渔父辞剑》中，萧主演伍子胥，康即配演渔父。在他们带动下，“三庆会”的演出，主配角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萧楷成和康子林合演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戏，如《醉隶》、《铁龙山》等。其舞台艺术的代表作则首推《酒楼晒衣》，戏中角色都是小生，皆为商人，均能随机应变，但性格迥异。他们二人的表演突出了两个商人暗斗明不斗，心斗口不斗的复杂心理。川剧名演员周企何老年回忆说：“这是几十年没有再看过的好戏！”

1930年夏康子林病逝后，唐广体和萧楷成继任“三庆会”正副会长。不久，唐广体突患脑溢血逝世，由萧楷成继任会长，贾培之副之。萧楷成主持“三庆会”期间，继承了康子林“顾群”办团思想，常资助经济困难的演员，并注重提高演员的艺术修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三庆会”在成都上演连台戏《济公活佛》100本，一本演出三天。萧楷成主演济公，常将新闻编成唱词，在每本戏中插入演唱，以宣传抗日救国。他还整理《托国入吴》的剧本，设计唱腔和服装，主演勾践，细致地刻画勾践忍辱负重的复国之志。当时在成都的冯玉祥观看后，立即写信给萧楷成，感谢他的表演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精神。

萧楷成主张舞台表演要“无我是他，传神感人”，演员要把自己的心理、感情、精神都化为剧中人，直到忘我，这样才能“传神感人”，引起共鸣。他强调要从人物性格和剧情出发处理安排唱腔，以情带声，以声入情。他嗓音洪亮，唱功字正腔圆，一泻千里。

萧楷成戏路很广，小生戏代表剧目除《酒楼晒衣》外，还有《托国入吴》、《越王回国》、《十美图》、《刀笔误》、《三难新郎》等；生角戏《杀家告庙》、《别宫出征》、《渠江打子》，丑角戏《醉隶》、《渔父辞剑》等也负盛名。20世纪30年代，上海百代公司为萧楷成唱的不少戏灌制为留声片传世。他还培养了不少川剧人才，如温玉林、王成康、司徒慧聪等，陈书舫、白丽娟、李蕙仙也得到过他的悉心指教。

1946年冬，萧楷成四肢瘫痪，息影舞台，其“三庆会”会长之职由贾培之担任。1950年7月20日，萧楷成在成都病逝。

贾树三

贾树三，回族，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生于成都回族聚居的皇城坝。1岁半时父母双亡，由姐姐抚养。3岁时双目失明，他行五，名“瞎五儿”。及长，学唱竹琴及川戏，成名后人呼“贾瞎子”。

贾树三自幼聪明，6岁，他沿街叫卖雪梨膏，学会街头各种叫卖声。10岁，他从一个卖草药的李姓学唱道琴，后拜回族中人称“马三国”的马小成为师，他背起道筒沿街卖唱，生活难于维持，后请人牵着出外跑滩，流落江湖。

20世纪20年代中期，贾树三回到成都，正式向外号叫“蔡须须”的蔡觉之学唱竹琴。当时成都竹琴同洋琴（解放后改称“扬琴”）一样，五六人坐唱，各唱各的角色，如遇人物繁多的戏，五六人轮流换唱，有条不紊，尽坐地传情之妙。后来由于艺人内部分化，他只好一个人去卖唱为生，一人兼唱多角，各显人物性格，一个人唱一台戏。同时他得到文人墨客以及戏曲界中人士的帮助、关怀，为其改正唱词，研究唱腔及至生活上照顾。贾树三又对人谦恭，虚心求教，致使他的唱腔艺术精进。至20世纪20年代末，他在琴迷、友人帮助下，在少城东城根街锦春茶楼上设下固定的书场。他每天准时上场开唱，风雨不改，他对听众负责，每于华灯初上，书场座无虚席。抗日战争中，日机疯狂轰炸，他到老西门外茶店子去唱，地方虽远，但贾派竹琴听众仍趋之若鹜，一天跟他两场。当时，名士谭创之送他一联：

唱罢离合悲欢，回首依然贾瞎子；

拍开风花雪月，伤心谁问李龟年！

成都“五老七贤”之一的尹昌龄也赠他一联：

盛时之元音已杳，今又逢师旷重来，绝技出瞽盲，最好是《处道还姬》、《李陵饯别》、《当阳送客》、《子胥渡芦》，串生旦丑净而各肖神情，慷慨激昂惊四坐；

历年之国步多艰，只赢得长沙痛哭，幽情寄弹唱，恍如闻“渐离击筑”、“雍门抚琴”、“越石吹笳”、“祢衡挝鼓”，从忠孝节义以扶维教化，发扬蹈后足千秋。

贾树三唱腔原是竹琴老调，后来他吸取了扬琴中[立四柱][一字]及[苦平]中之犯腔，他还能将二度、四度转调难度较大的唱法干唱（竹琴无其他乐器伴奏）出来，唱得自然，如行云流水，发展了竹琴唱腔，成为“贾派”。他所教的“贾派竹琴”学生中有成就的计有：周玉龙、周玉林兄弟，赵云龙、赵幼书父子，裴墨痕等。

川剧中的高手天籁、周企何，京剧的刘荣升，电影明星谢添，以及当时成都文化界知名人士，都常去听贾树三唱琴。他们去不仅仅是为了娱乐，是从他的说

唱中得其艺术深味。他在坐地传情中，善于创造出新，在声腔中去表演人物思想感情，唱出人物性格来，有韵味，经得起咀嚼，自成“贾派”高格调。

建国后，贾树三被选为成都市曲艺改进会委员，积极响应人民政府号召，编唱新词，自编《买公债》，与裴墨痕改编《王贵与李香香》等。1951年1月26日，这位名震巴蜀的竹琴艺术大师病逝。

195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杨槐编辑的《贾树三竹琴选集》，评介贾树三竹琴唱腔艺术，收有唱本18出。

周　文

周文，原名何稻玉，字开荣，周文、何谷天、树嘉、司马疵等都是他的笔名。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生，荥经县人。早年曾在家乡读私塾。因幼年丧父，为生活所迫，16岁就外出谋生，先到一个驻西康的军阀部队当文书，曾随部队辗转川康藏边境，后又被介绍到刘文辉办的川康边政训练所当学员。他目睹军阀们相互残杀与残酷压迫剥削人民的现状，深感社会的黑暗和不平，于是决定离开四川，到外地寻求真理和出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周文经朋友介绍，到安徽省教育厅工作。他利用《安庆晚报》，创办了《雀名》副刊，发表了一些抨击时弊的文章，因而结识了当地的一些左翼作家，开始走上革命道路，担任了左翼文化总同盟安徽分会组织部部长。1932年，他到上海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任“左联”组织干事。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用何谷天的笔名在当时文学界影响较大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雪地》，受到文艺界的赞扬。1934年春，他被选为“左联”常委，任组织部部长。在紧张、艰苦的工作之余奋力创作。次年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父子之间》和《分》。1936年～1937年，又有短篇小说集《多产集》和《爱》、中篇小说《在白森镇》和长篇小说《烟苗季》相继问世。他发表的大量作品，以白描手法真实地表现了川康边境的风土人情和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这种反映现实生活的创作特点，为文坛所注目，曾被人称为多产作家。

1936年，经鲁迅介绍，周文担任了中共中央派驻上海的冯雪峰的秘书兼交通，负责与各方面秘密联络，奔波在上海和西安一线上，为党做了大量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中共党组织的安排，周文离沪到成都，担任中共成都文艺支部书记，开展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在当时“到大后方开辟文艺活动”的口号下，大批川籍作家和外地作

家云集成都，出版报纸副刊，办文艺杂志，很快掀起了成都抗战文艺热潮。周文对地方刊物积极支持，在《新民报》办起了《国防文艺》周刊；与沙汀、任钧、刘盛亚等先后办起了《战旗》、《战潮》、《文艺后防》期刊，并支持《工作》、《散文》、《群众》、《惊蛰》等文艺刊物的工作。经过曲折的斗争，促成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四川分会的建立。周文被选为该会常务理事，分管总务部，并主编文协四川分会机关刊物《笔阵》，又兼任《四川日报》、《新民报》副刊编辑。此间，他还写了许多短篇小说、杂感、评论、文艺通讯和童话。1939年，周文将旧作选编成《周文短篇小说集》，于次年出版。

由于周文在成都文艺界的活动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中共党组织指示他撤离。1940年周文到延安，曾任陕甘宁边区大众出版社社长，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秘书长，晋绥边区《抗战日报》和《大众报》社社长，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秘书长、宣传部部长等职。1946年，他奉调到重庆，担任《新华日报》社副社长。

1949年，周文出席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国文联委员、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同年秋，调任中央马列学院秘书长。1952年"三反"运动中，因坚决与坏人作斗争，他被迫害致死。后经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76年1月27日为他平反，恢复名誉。

周文一生所发表的作品，有小说、散文、童话故事、文艺论文等，但主要是小说。建国后，这些作品多数编选入《周文选集》。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从一开始就受到鲁迅的教导和直接帮助，这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周文的作品，以实际生活为题材，不装饰华丽的词藻，用朴实的笔墨，如实地写他在其中生活过和体验过的熟悉的地方和人物，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塑造各式各样的典型人物形象，深刻展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边荒一隅和底层被压迫人民的悲惨生活和精神面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由于他富有独特的生活经验，使他成为中国独具风格的现实主义作家。

周文在文艺大众化方面也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他不但在自己的创作中一开始就注意了大众化问题，而且早在1933年就把苏联名著《毁灭》和《铁流》改写成章回小说通俗本，成为广大劳动群众喜爱的读物。他在延安筹办大众读物社，主持陕甘宁边区《群众报》、《大众习作》期间，更是身体力行，大力提倡推行大众化，作出许多成绩，受到毛泽东的手书表扬。

林思进

林思进，字山腴，晚年自号清寂翁，生于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华阳县（今成都市）人。先世自福建长汀迁蜀。父毓麟，性孤介峻洁，少年时，即厌科举，居乡里数十年，博涉群书，旁通金石书画，尤工于诗。有《澹秋集》行世。

林思进幼承家教，复从父执前辈乔树枏、严雁峰、王增祺、廖平等问学谈诗，多方得受教益，14岁，毓麟逝世，母邓氏亦知书，教督甚严，学业日进。1903年中四川乡试举人。

林思进早年与同县胡峻、陆绎之、黄云沧等人结为深交，彼此切磋学行，共砺救时之志。在他中举后的第二年，便和胡峻等人，先后东渡日本，考察其政教风俗，由是视野日扩，交游愈广。当日以声气相求的，还有梅际郇、杨庶堪、蒲殿俊、刘行道、刘昌廷等。后来，他有诗追忆这时的情况说："平生少年日，正见甲午役。……输倭二百兆，门户台湾斥。朝野始皇皇，变法思利百，蜀学从此新，风气洞然辟，相望东西川，才彦妙接迹。峨峨胡编修，广己在困绁。梅杨蒲刘间，要我通轸结。当时意气盛，共济期群策……"（《丁丑秋感二十首》之十八）辛亥革命前后，这些人在四川的政治和社会的变革中，都是有作为、有影响的人物，而林思进与他们的政治见解虽有不同，而情谊则不间存没，殷殷如故。

在日本1年多，遍历三岛，得诗数十首，多感慨时事之作。如《乙巳八月七日江户纪事》、《芝区望海感时兴咏》、《归怀》、《清水阁望西京》诸诗，皆慷慨激越，忧时虑国之忱，溢于言表。1907年林思进回国，经过朝考，授内阁中书。尝与赵熙、陈衍、曾习经、冒广生、罗惇曧、温肃、潘博等南北名士数十人，结为诗社，假借文酒之会，议论时政，激扬风气。辛亥上巳，林思进主社，修禊于南河泊。林纾为作《南河修禊图》，诸人题诗其上，为京师文坛一时盛事。鉴于清政窳败，义军蜂起，他便在这年的夏天，以侍母为名，告假南归，绝意仕进，杜门不出。

民国建立，友人蒲殿俊、杨庶堪等迭主川政，屡次挽他做官，他都婉辞拒绝，坚不肯出。但却孜孜不倦地始终注意于文化教育事业。还在清光绪末年下诏废科举、兴学校时，胡峻开办四川高等学堂，刘昌廷改锦江书院为传习师范学堂（后定名为成都府中学堂），他就力赞其事。至是议设四川省图书馆，他便自请任图书馆长，在任馆长7年中，他极力精简人员，樽节经费，多方采购海内官本和私家精刻，得书20余万卷，自编书目15卷，西文书籍也大量收藏。其规模在当时国内尚少，而为省门公家藏书，奠定了

基础。

1918年，辞图书馆长职，随即就任华阳中学校长，在此期间，除自己讲课外，他对选聘教师，规划课程，树立学风，以至扩建校舍，购置图书仪器，改善学生生活诸方面，莫不精心筹划，计日程功。不到几年，华阳中学便和成都县中、成都联中鼎峙省垣，成为全川中学的榘范。

自此以外，他在数十年间，历教成都各高等学校，如民国初年的国学院，后来的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等。他胸怀坦荡，乐推人善。对学生则是循循善诱，因材施教，经他培养指授，有所成就的学生，不下千百。海内尊为老宿。

林思进论学，主于闳通，无取门户之见。有诗："吾自操觚来，雅不门户喜。是是与非非，丹素各有美。"(《长夏排闷，率尔言怀》)不赞成追逐时好，人主出奴，是非丹素。

他平生尤其致力于诗古文辞，自订《清寂文录》8卷(未刊)，尝精熟《史记》、《汉书》、《昭明文选》以至韩愈、柳宗元、归有光、姚鼐之文，长于碑表传志，大篇则叙论纵横，短章则情韵不匮。曾纂修民国《华阳县志》，撰《华阳人物志》16卷。骈文多为少壮时作，刻为《清寂文乙录》1卷，情致闲雅。诗作凡数千首，刻《清寂重堂诗录》5卷，继刻《诗续录》、《吴游集》、《悼孙集》、《村居集》凡7卷。义宁陈三立读到他的诗，曾经评论说："才思格律，入古甚深。五古几欲追二谢，七言攀高岑，洵杰出之作者。目前所知蜀中诗，似与香宋异曲同工也。"香宋，是赵熙的别号，近代凡提到四川的诗家时，总是以林、赵并称。二人交谊最深，始终无间，作诗却取径不同。但都能自树一帜，不为同光诗风所囿。兴华李详有《以山腴舍人诗集寄如皋宗敬之》诗，说："海曲能文宗敬之，寄君数卷舍人诗，蜀中耆旧今仍在，吴会英和那得知。南郭日寻考功墓，西郊遥忆杜陵祠。世人只识同光派，共听涛音向总持。"他受到海内名流的推重，由此可见一斑。

词，是他70岁左右才专力作起来的，一二年间，得词300余首，刻为《清寂词录》5卷。多有感时伤乱，关心民生疾苦之作。赵熙曾写信称赞他的词说："不莽不纤，语有内心，如公大可传矣。"

建国后，林思进被聘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53年8月1日病逝于成都。有《清寂堂集》行于世。

贾培之

贾培之，本名廷福，温江县人。1884年(清光绪十年)生于成都。家贫，早年进机房学织缎，工余以哼川剧自娱，并参加"玩友"组织的"板凳戏"(围鼓)。他喜爱川剧并潜心好学，甚至向业余川剧爱好者学习。

清末，在周孝怀倡导下，成立了改良川剧的团体"进化社"，贾廷福是其最早成员之一。并取艺名"怒霆君"，后又改为贾培之。

1912年春，贾培之与笃友浣花仙合作在成都清音茶园唱"皮影戏"《霸王别姬》、《檄文诏》等戏，赢得广大观众赞誉。他拜丁肇武、周辅臣为师，演技不断提高，成为专业演员。当时，在成都以康子林、萧楷成为首组成的"三庆会"名声如日中天，吸引了成都的高水平观众，而这批人往往又爱拿贾培之、浣花仙与"三庆会"作比较。1927年，经康子林等多次邀请，贾培之加入了"三庆会"。贾培之虚心好学，演技与日俱增，受到同行们的尊重。1930年，康子林去世后，萧楷成任"三庆会"会长，贾培之任副会长(1948年继任会长)。

贾培之在"三庆会"中的德行也很好。在尽量缩小名角与普通演员的收入上，在担当角色的选择上，在清除舞台庸俗表演方面，他都处处身体力行作出表率。"三庆会"在川剧史上率先实行艺人老有所养，死有所葬，会内凡有丧葬事宜，贾培之都要亲自料理。

贾培之、康子林还在"三庆会"中首创川剧历史上排导、后台管理制度的雏形，要求演员上台之前先认真对台词，默戏。贾培之本人也带头执行。他们还邀社会上有学问的名流如尹昌龄，冉樵子等人为"三庆会"作义务编剧，邀请四川大学和华西协合大学的教授为演员们讲解剧本，以提高演员的演出水平，贾培之还对传统的川剧老腔老调进行了创新改革，邀请曲艺艺人教曲艺音乐，将三弦、琵琶、扬琴等民间音乐揉进川剧之中。

"三庆会"曾一度处于困境，有些演员退出"三庆会"，有些戏班曾拖黄(淡季)时高价收买演员，挖"三庆会"的墙脚。贾培之则主动提出降低自己的工价钱，跟大家一样拿"份子"。他断然拒绝别人以重金聘请他去内江、乐山等地搭班子的邀请，与全会的艺人共渡难关。

贾培之不以自己在"三庆会"中的地位和名声自居，对于艺术界的后辈，他毫无保留地传授自己的技艺，经济上则千方百计地接济他人。他曾将为百代公司录制唱片的报酬买了10石米送给戏班内的贫困户和街坊上的穷人。

著名画家张大千之爱上川剧成为戏

迷，主要是因听了贾培之所唱的《马房放奎》和萧楷成 唱的《托国人吴》后而深受影响的，后来张大千和贾培之成为知交，并为他画了很多画。

贾培之一生对艺术致臻以求，练就一副出色的嗓音，唱腔刚劲有力，高而不炸，重而不浊，尤善胡琴腔。讲白雄浑敦厚，吐字清楚，喷口有力，无论高亢激昂的慷慨陈词或舒缓委婉的谈心说理，都能字字入耳。他的戏路也很宽，能演花脸、老生、红生和以唱做见长的袍带丑。他在川剧舞台上塑造出各种性格的人物形象。其中最出色的是《柴市节》中的文天祥。他的戏被百代公司灌制成唱片的有《柴市节》、《马房放奎》、《霸王别姬》、《战万山》、《离燕哀》、《挑袍》、《临江会》、《伍申路会》、《三尽忠》、《进宫问病》、《阳河堂》等戏。为了提高业务水平，“三庆会”内还组织了“精研社”探讨戏剧艺术，贾培之总是虚心听取他人的意见，使自己不断有所收获。他和康子林被并称为民国时期川剧界的“圣人”，名列民国时期《蜀伶选粹》中之首位。

新中国成立后，1950 年贾培之担任新生三庆剧社社长和大众剧院院长。1951 年又任重庆市实验川剧院院长。1952 年贾培之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戏曲会演，他主演的《柴市节》获荣誉奖。9 月 30 晚他出席了毛泽东主持的国庆招待会，10 月 1 日参加了国庆观礼。11 月 21 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还亲自观看了他演出的《柴市节》。

贾培之晚年还致力于戏曲改革，曾在现代戏《王贵与李香香》中饰李父，在新编历史剧《陈胜王》中饰陈胜，颇得好评。1953 年，他担任了西南川剧院副院长。并先后当选为成都市和重庆市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4 年 11 月 28 日，贾培之因心脏病医治无效，在成都逝世。

张凌高

张凌高，璧山县人，生于 1890 年 2 月 21 日（清光绪十六年二月三日）。其祖父、父亲均为银匠。他 5 岁入私塾，1904 年入重庆教会学校求精中学堂就读。1909 年毕业后，任永川县城内福音堂小学校长，一年后返求精学堂任教员。1914 年考入成都华西协合大学文科。1919 年“五四”运动期间，被推为学生代表与校方交涉，发动同学举行了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卖国政策的罢课游行。当年 7 月，张凌高从华大毕业，被派往资中县任代理牧师，并创办华美中学（后改称盘石中学）。次年，由四川美以美会选送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研究院学习，于 1922

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其间，还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在美国召开的美以美会世界大会。

1922年9月，张凌高从美返国，任资中县美以美会牧师，并兼任进德女中校长和盘石中学英文教员。他开办了成年妇女补习学校，又支持倡办了“商务印书馆资中县经销处”，还想方设法为教会办的宏仁医院增添设备。1926年经华西协合大学毕业同志会推荐，张凌高被华大理事部聘为首任华籍副校长。1927年和1930年，他曾两度担任卫理公会西川年议会主席，1931年升任华大校长。他根据国民政府公布的私立大学和专门学校立案条例，着手进行华大的立案工作，特聘前川东道视学程芝轩来校主持该项事务。1932年3月，张凌高再次赴美，入德鲁大学研究院深造，并赴大西洋城参加美以美会世界大会。1933年，他以《采纳美国福利方法用于华西》的论文，获哲学博士学位。

同年9月，张凌高回国赴南京，在教育部完清了华大立案手续后回川，继任华大校长。他延聘了林思进、庞石帚、周太玄等一批名教授到校任教，将校内行政管理人员逐渐换成华人担任，并完善了校董事会组织，吸收各界名流为董事会成员，聘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张嘉璈为董事长。以“博爱牺牲服务之精神，培养高尚品格，教授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适用社会需要”为办学方针。他奉行欧美流行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着重于实业、实验和生活教育。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强调实用性，注重对学生进行社会服务能力的训练。又调整和扩大院系，健全了学位制和奖学金制。通过一系列的改制和措施，学校规模逐年扩大，办学条件有了较大改善，教学科研质量有所提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沦陷区各大学纷纷内迁。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医学院和东吴大学生物系，先后迁至华西协合大学。张凌高动员全校各单位热情接纳，使各校师生均得到妥善安排。他还向四川省政府和华大纽约联合托事部争取到拨款，协助五大学修建校舍。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华大的师资和教学设施，与五大学共渡难关，张凌高倡议根据各大学师资专长，采取统一安排，分别开课的联合办学方法。同时，各医学院又建立了联合医院，云集了一批著名的医生和教授，使教学和医疗水平得到较大的提高。1942年，全国性的权威医学刊物《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由各大学联合主办创刊。在此期间，华大还增设了家政、农艺、护士等系，以及牙科研究部，生物化学、边疆、经济、教育、历史等研究所；化学楼、牙医学院中央楼等相继落成。华大学生由1936年的335人增至1945年的1300余人。同时，张凌高还聘请了一批转移到四川的著名学者，如陈寅恪、顾颉刚、钱穆、徐中舒、蒙文通、梁漱溟等到华大任教，并选派一批教师出

国留学。

1947年,张凌高因所患肺气肿和哮喘等病加重,加之校内派系纷争,穷于应付,又受到外籍教务长罗锦成的多方牵制,遂辞去华大校长职务,担任名誉校长。次年2月,在张嘉璈的劝说下,出任民社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并选为民社党中央常委,兼管川康两省党务。1949年10月,他以病情严重无法兼顾党务为由,向民社党中央提出辞呈。11月,向成都各大报社送交了辞职并让四川民社党各市县党部停止一切活动的《张凌高启示》,请报社发表。

1951年,张凌高在镇反中被关押,1954年被判刑。1955年3月5日病逝狱中。1986年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了对他的刑事判决。

宋诚之

宋诚之,又名忠廷,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生于华阳县(今属成都市)一个书香世家。1909年考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读书。后考取北京清华学堂公费留美学生,因家庭阻拦,而未能赴美。然其酷爱英语,遂入外国语专门学校及外交署译材养成所,因其勤奋努力,有"肉字典"之称。1911年毕业后,他先后在成都基督教青年会英文学校,岷江法政学校,华西协合中学等校任英语教员。

1917年宋诚之考入成都华西协合大学英文系,半工半读。1924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25年他到英国学习,1928年毕业于牛津及剑桥两大学研究院。返国后,先后受聘于成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光华大学等校任英国文学教授。他在讲授英国文学时,条分缕析,深入浅出,他以茶话会形式,在寓所组织座谈、讨论,使学生对所学知识加深理解,英语口语会话能力亦随之提高,深受学生欢迎。他不仅在一生的教学中,培养了不少英语专业人才,而且在沟通中英文化,介绍英国文学等方面作出了贡献。译著有《布郎林及腾里生诗解》、《英文诗选》、《英文圣经文学全部大纲》、《圣教伟人祷文》、《立身处世谈》等,在1932年至1945年间先后出版。

宋诚之青年时期,由于学习英语,与教会人士多有接触。1919年,他加入基督教圣公会。1928年任中华基督教圣公会西川教区会长,1934年起担任西川教区会督。由于他自幼熟读经史,对儒家思想,孔孟之道很有心得,在英国留学期间,曾潜心攻读英国文学和神学,后又从事基督教工作,从而将中国传统文化

与西方文化及基督教义紧密结合。

宋诚之重视培养教牧人员的工作，1930年他在成都皮房街圣公会教堂创办了高级神学院。除教授宗教课外，还要求学生必须学习中国文学和历史知识等。他聘请了当时的名教授林山腴，余苍一、刘咸荥、赵少咸、朱青长等讲课，取得了良好效果。这些学生毕业后，都分别担任了基督教圣公会西川、东川两教区各地的会长。

宋诚之关心青年学生和教友，他经常在教会或家中举办英文查经班，帮助他们学习圣经和外语。为了提高学生对古典文学及历史知识的兴趣，他主动安排每周星期日晚上，为学生讲解《史记》、《汉书》等著作。抗日战争初期，每周星期五下午还组织英文讲演，邀请华西协合大学外籍教师主讲英国文学，他亲自任翻译。参加的学生非常踊跃，整个礼拜堂座无虚席，甚至窗外也站满了学生听讲。

抗日战争期间，1938年夏，宋诚之不顾炎热，应香港教会的邀请，两次赴香港讲道，同时积极宣传抗战。1941年夏，他应邀到澳大利亚介绍中国抗战情况及抗战中的教会工作，争取澳大利亚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时值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国际形势严峻。在澳大利亚时，他数次遭到日本间谍的警告，企图阻止他宣传抗日。他立下遗嘱，并灌成留声片，邮寄回国，嘱咐家属，勿忘国耻。1941年7月27日，日军对成都狂轰滥炸，居民死伤无数，皮房街圣公会礼拜堂被炸毁，当日讲道的江先生亦被炸死。他在澳大利亚得此消息后，非常愤怒，即以此残酷的现实控诉日军罪行。他积极筹募捐款，回国后立即修复该教堂，使教会工作得以及时恢复。

1947年，宋诚之再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文学院任客座教授，讲授《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和《论民族英雄与英雄崇拜》，宣扬中华文化，增进了中澳人民之间的友谊，不少报纸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鉴于宋诚之在神学方面的造诣，加拿大威克里佛大学于1948年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他既爱教又爱国，在讲道中多次提出中华圣公会应当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自立的教会。解放战争后期，他虽对共产党缺乏了解，但他相信共产党既要为全国人民谋福利，就一定能容得下知识分子。慨然拒绝了赴英定居的邀请。

建国后，宋诚之继续在华西大学任教。1950年因健康原因辞去中华圣公会西川教区会督职务。1952年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撰写了《基督教入川史》。1955年5月17日病故。

陈炜谟

陈炜谟，字叔华，笔名有熊、契阔、楚茨、熊昕、斯华年、容舟等。泸县云锦场人，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10月16日出生于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家庭。自幼随父读书，后考入泸县中学，在“五四”运动中受到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深刻影响。

1921年秋，陈炜谟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次年他与林如稷、陈翔鹤发起成立浅草社，开始文学创作，主编过《浅草》季刊两期和《民国日报·文艺周刊》。他是一个“热情、忧郁，多才多艺”，文思敏捷，可以立等交稿的人。他的创作有小说、诗歌、散文，还写了一些评论和文艺理论文章。由于从小经历了四川的军阀混战和黑暗落后的现实，他在《浅草》发表的4篇小说，以深刻的现实性显露了他的才华。

《浅草》停刊后，陈炜谟与陈翔鹤、冯至、杨晦于1925年秋另外组织沉钟社，创办《沉钟》周刊和半月刊。由于选修“中国小说史略”课，受到鲁迅的影响，自谓在政治上决不“依附某一种旧势力”，在创作上坚持现实主义，“既不想在假面具下讨好人家，亦不想在长光镜上欺骗自己”，自称是“为人生的艺术”派，他不但在刊物的编辑上起了突出作用，而且发表了不少小说、评论和译作。他将在大学期间的主要小说编为《信号》、《炉边》，分别于1925年和1927年由北京诚学会和北新书局出版，共收小说12篇。尚有《轻雾》、《烽火嘹唳》、《甜水》、《在轨道上》等篇未收入。这些小说一半多是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另外将近一半则取材于四川农村。《烽火嘹唳》、《狼筅将军》揭露了四川军阀混战、兵匪合流所带来的深重灾难；《小阿农的升天》、《夜》反映出农村女儿童的悲惨命运；《旧时代中的几幅新画像》揭示出地主阶级自私、吝啬和没落衰亡。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给浅草社、沉钟社以很高的评价，称赞陈炜谟是“未尝自馁”的作者，并在书中选入《狼筅将军》、《破眼》、《夜》、《塞堡》4篇小说。这不但是浅草社、沉钟社作家中选入作品最多的，也是全书所选作品最多的三个作者之一。

1927年夏，陈炜谟由北大英文系毕业，先后在河北女子师范学校、哈尔滨铁路一中、中法大学孔德学院任教。其间在杨晦主编的《新中华日报》、《华北日报》副刊发表通信、译文（英国散文、随笔）等几十篇，编有《契阔通信》、《旧话》两个集子。

1930年冬，陈炜谟因病回泸县疗养，次年春病愈后任县中学文科主任，同

时在川南师范、泸县女中兼课，利用课余翻译俄国梭罗古勃的中篇小说《老屋》(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主编过《泸县民报·江阳新声》，并支持泸中学生创办《青笋》文艺半月刊，积极提倡新文艺。

1933年秋，陈炜谟赴重庆大学外文系任教，后升为教授。至抗战爆发，他在上海《论语》、《宇宙风》、《人间世》、《谈风》、《西风》，重庆《春云》、《新蜀取》副刊等发表散文、杂文20余篇。重要的有《挽鲁迅先生》、《二未堂随笔》等。1937年冬，重大围绕抗战发生了新旧两派之争，旧派得势后他愤而辞职，先后在重庆联中、中国公学高中部、广安载英中学任教。后他辞去教职专事翻译写作，译有《日本的威胁》、《毛纳在中国》、《中国的统一战线》，可惜正中书局只出版了《日本的威胁》一本。

1940年夏，陈炜谟回到泸县，先后在泸县中学、桐荫中学、育群女中、树风中学任教，积极宣传抗战，并开始构思写作反映抗战现实的长篇小说《兵荒马乱》(后改名《乱离曲》)，长达60万字。

1946年秋，陈炜谟到四川大学外文系任教，参加"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协会成都分会"，被选为常务理事，积极投入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运动。他先后主编《民意报晚刊》的副刊《星期文艺》、《成都快报》的副刊《文会》和《文会周报》，发表散文、评论等几十篇，其中最有价值的是《问耘堂随笔》、《从窄处写》两组文论和著名讲演《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等，并完成了《小说纲要》和另一部长篇小说《爱·悔·恨》的创作。

建国后，陈炜谟曾任四川大学外文系系主任，后调中文系从事新文学和文学理论教学，编有系统的《文艺学》讲义，被誉为"杰出的革命的文艺理论家"，"中文系新文艺课程的奠基人之一"。他先后担任川西文联、四川省文联常委，成都市人民代表，《川西文艺》、《四川大学学报》编委。他在报刊发表纪念鲁迅的散文和文艺理论等文章近30篇，病重期间还完成了《关于〈红楼梦〉评价的几个问题》、《论考据学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两篇论文。1955年9月30日陈炜谟逝世。

他逝世后，由林如稷选出他解放后的文章8篇编为《陈炜谟论文集》，195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陈炜谟已出版的著作还有《英语学习手册》、《英语前置词》，译著有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高尔基的《在世界上》、《我的大学时代》等。

邵子南

邵子南，原名董尊鑫，字少南，资阳县人。1916年5月14日生。其父行医，原想让邵子南成为中医，以继承家业，因此，尽让其专读医书，后在邵子南叔父的劝告下，邵子南才得以入学，他勤奋好学，有志于文学。

邵子南17岁初中毕业后，父丧，家境贫困，他先后当过船夫，拉过黄包车、干过苦力，又流落重庆讨过饭，还上过峨眉山当和尚，到松潘金矿上做过工。

1936年初，邵子南到成都，在一家亲戚开办的银号做见习生，在他全力攻读文学作品时，深感四川的闭塞。同年10月，他到了上海，结识了欧阳山、丘东平、于逢等进步作家，在他们的影响下，邵子南开始创作。在茅盾的帮助下，他以邵子南为笔名，在1937年3月5日出版的《中流》第一卷上发表了了他的短篇小说《青生》，描写矿工的生活。后来，他又连续在《中流》、《文季》、《作品》和《中国导报》等刊物上发表了《某夜》、《搬米》等数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他流浪生活中的见闻，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苦难。当时，他在上海的生活十分困难，有时甚至饿饭，但他仍然持之以恒地学习和写作。抗战前夕，他与欧阳山、丘东平等人集体创作了中篇小说《给予者》，塑造了卫国献身的英雄形象。

抗战爆发后，邵子南经胡乔木介绍，到太原进了八路军总部的随营学校。1937年11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翌年初到了延安。后在组织的安排下参加了西北战地服务团文艺队。1938年7月，邵子南回到延安，田间、柯仲平等诗人发起街头诗运动。他还在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途中写下了街头诗《告诗人》、《无题》等。1940年战地社油印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组织》和长诗《会上的诗章》。

从1939年到1944年，邵子南在晋察冀根据地坚持抗日斗争，此间他创作的诗有：《模范支部书记》、《五十九个》、《好样儿》以及为纪念皖南事变的《茂林挽歌》，这些诗主要描写晋察冀边区军民的抗日斗争和边区建设的战斗历程。他编辑的《诗建设》经常开展诗歌评论活动，他还写出了一批群众喜爱的通俗文艺剧本。1944年2月，他荣获了晋察冀边区模范工作者奖。

1944年10月，邵子南调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他曾参加过《白毛女》歌剧的创作。次年10月，调陕甘宁边区文协从事写作，他按照延安文艺座谈会确定的文艺方向创作了《李勇大摆地雷阵》、《牛老娘娘拉毛驴》等抗日题材的短篇小说。

1946年4月，邵子南到重庆，担任《新华日报》社采访部主任，当时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对他的工作作了充分的肯定。内战爆发后，邵子南和田海燕办起了《故事杂志》，以鬼怪故事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派，该杂志只出了3期，1947年1月被迫停刊。2月，国民党以武力查封了《新华日报》，邵子南撤回延安，6月任新华社晋绥总分社副社长。次年6月随解放军南下，曾担任过武工队长、地方武装团政治部主任、竹溪县委书记。

重庆解放后，邵子南任新华社西南分社副社长和西南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后又任重庆市文联副主席兼党组副书记、中国作协重庆分会副主席、重庆市政协委员，并当选为市人民代表。

1952年后，邵子南主要从事专业创作。他到西南钢铁公司的工厂体验生活，兼任厂党委委员和大轧车间党支部书记。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不少的作品，如《木工做机器的故事》、《我是一个泥水工》、《哥哥回来了》等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周金宝》（未完稿）。这些作品描写工人的生活和斗争，反映了复杂的社会矛盾，较早地触及到了官僚主义的问题。他还写有反映战争题材的作品，如《我们是不同的》、《谷荣事》（未完成）、《夹河关》、《一个共产党员成了神的故事》等。他还编写了《赵巧儿送灯台》这部优秀少年儿童文学作品。

1954年春，邵子南参加了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团赴西藏慰问人民解放军，他根据这次赴藏的旅途见闻，写出了短篇小说《在峡谷中》和长篇报告文学《克服困难的人们》。

1955年12月24日，邵子南因患白血病医治无效，在重庆逝世。

王达非

王达非，峨眉县青龙场人。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4月26日生于一个土布商兼自耕农的家庭里。早年离家出走，1926年毕业于成都省立第一中学。

1928年冬，王达非随友人到南京，想终身以报为业。次年到上海，经常给报馆投稿，得机遇进入一家报馆印刷厂当制版工人。为求知，他常出入于图书馆，到大学旁听，完成了在中国公学的学业。

1933年秋，王达非经同学介绍到重庆《商务日报》当编辑，后来担任主笔。他在撰写工商经济方面的短评、社论期间，与主笔漆鲁鱼（从江西中央苏区回川的中共地下党员）交往日深。1936年夏，王达非在漆鲁鱼、黄宇齐、陶敬之的

帮助下创办了《齐报》，并自任总编辑。他尽力将该报办成消息迅速、宣传爱国、促蒋(介石)抗日的报纸，受到读者欢迎，但仅存半年被当局查封。1937年春，王达非应成都《新民报》之邀，任该报总编辑。同时还任《四川日报》主笔及《国难三日刊》的总编辑。1938年秋，王达非经杜俘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王达非在成都发起组织新闻记者座谈会。次年，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四川分会成立，王当选为常务理事。该会团结进步新闻工作者，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受到总会的表扬。

1939年4月，王达非约集同仁，创办《时事新刊》，自任总编辑，张雪岩(川康绥靖公署邓锡侯的机要秘书)任发行人。王用川康绥署的电台抄收新闻电报，消息来源迅速广泛，加之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态度鲜明，大量发表反映时势的报道、社论和短评，发行量大增，高达1万份，时在成都甚为可观。1940年3月，特务机关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肇事地点在《时事新刊》附近。该报现场采访记者朱亚凡和两名工作人员遭特务逮捕指控，不经审问就地杀害，《时事新刊》被查封。王达非作为该报的发起人和主持人，面临危险，后在邓锡侯的掩护下王逃至重庆。

王达非在重庆经邓锡侯驻渝代表刘堑南介绍，进入利昌进出口贸易公司任秘书室主任。王从此便以工商业者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党的工作。不了解真情的进步人士和党内同志，误以为王投入地方军人怀抱，充当资本家的代理人。王达非强压被误解的痛苦，以革命为重。1941年冬，"利昌"迁成都，善于经营管理的王达非大展才干，公司蒸蒸日上，王得到邓锡侯的信任，代行该公司总经理职，与董事长蓝尧衢开辟猪鬃出口业务。这时，《华西日报》董事长潘文华特聘王达非担任总经理兼总主笔。1941年冬，王到成都接办《华西日报》后，约请杨伯恺任主笔，吴汉家任总编辑，他努力将该报办成一张进步的报纸，受到读者喜爱。但在1945年5月被蒋介石下令改组，王等人被迫退出。

这个时期，王达非已成为成都工商界有名的实力人物，除主管"利昌"外，还担任了成都市银行、豫康银行、裕丰银行、复昌猪鬃公司、元昌实业公司的董事、监事等职，组织开办了益昌贸易公司、国基工程公司和适用美术公司。他相继参与发起成都工商实业各种社团，有经济座谈会、工商联合会、川康出口贸易研究会、全川银行联合会、川西工业协会、手工业联合会和平实学会等。

1945年秋，国共两党的《双十协定》签订后，党指示王达非在成都办报。1946年春，王达非与吴汉家、安新贤等发起创办《工商导报》，王任总经理兼总主笔，吴、安分别任总编辑、发行人，张西诺任采访部主任，同年5月1日出版，该报方针是："促进工商从业人员团结与进

步”，以“在商言商”为斗争策略，利用工商业务各种组织社团开展活动。该报有迅速的综合报道，时有独家新闻，安排有商业特点的诸多栏目，生动活泼的副刊及星期增刊，受到读者喜爱，扩版1张半，发行量1万多份，成为川西销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报纸。

1947年，王达非通过关系购买到高功率的收发报机，抄收美英法等国电讯，对《工商导报》迅速刊载许多重要新闻发挥了优势。1948年7月某夜，军统局特务头子徐远举查抄王家及该报宿舍，硬说收发报机是通延安的秘密电台，富有斗争经验的王达非早有预料，购机时即请人撤去发报装置，这时据理力争，才保住报社不被查封。王虽被拘押，不久即被地方实力派保释。

1948年秋，王达非借经商活动赴上海，接上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关系，同年10月到香港。1949年1月从港秘密返回成都3周，安排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关于《工商导报》如何坚持阵地、注意斗争策略将报纸保存下来。

1949年秋，王达非从香港到已解放了的北京，次年调华东局统战部，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党派处编审科副科长、上海市第八办公室综合组长，他不计职位，工作出色，受到主持市委统战部工作的潘汉年的器重，因工作来往日渐密切。

1953年肃反运动中，王达非因“潘汉年冤案”受株连，1955年6月9日被捕入狱。1956年10月，王因膀胱癌病危保外就医，12月10日含冤病逝。直到1982年，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后，王达非才得以彻底平反。

李炳英

李炳英，名蔚芬，生于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中江县人。幼年随伯父就学于广西。1907年肄业于上海中国公学。翌年赴日本宏文学院学化工专业。与熊克武、但懋辛、李培甫诸人交谊甚厚。在章太炎门下听讲《庄子》等书，遂参加了同盟会。

辛亥革命后，李炳英回国，在天津编辑京津同盟会主办的《民意报》。后曾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四川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教。民国初年在川军熊克武部任秘书，与吴玉章、刘伯承交往，其间还出任过南充县知事。熊被蒋介石软禁后，李炳英在李培甫帮助下，转入教育界，教中国语言文学。除在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担任教授外，又兼教成都公学、成都县中等校。

1937年秋，李炳英任四川大学中文

系主任。次年，李炳英支持、参加了反对川大校长程天放推行所谓“党化教育”的罢课学潮。1939年，川大迁到峨眉山，一时特务横行，进步师生频遭迫害。李炳英在中文系经常遇到麻烦。1940年，他辞去系主任职务，推荐向宗鲁继任。向宗鲁1941年逝世，李炳英在1942年便毅然离开川大。

1943年至1944年间，李炳英曾在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任教，兼教成都协进中学。1946年，出任成华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建国初，李炳英受聘就任川北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52年，川北大学调整为四川师范学院，李炳英任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54年，调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57年患食道癌在成都槐树街寓宅逝世。

李炳英治学谨严，教学、科研非常认真。他讲课深入浅出，逻辑性既强，知识面也广阔而扎实。他崇尚清儒朴学，精通释典，又有较高的英、日语言水平。在川大长期担任诸子概论及《史记》、《庄子》专书研究。他写的《史记讲义》及《庄子补注》，翻译的日本武内义雄《诸子概说》，并从日本泷川龟太郎《史记今注考证》中摘出的《史记正义佚文纂录》，都经川大排印，对培养后进，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很有影响。

建国后，李炳英教古代散文选。他选注的《孟子文选》，能用新的观点、方法整理古籍，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孟子文选》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重印多次。

李炳英在建国前后，都担任过教学行政工作，他极为重视网罗、选拔人才，礼聘名师。在川大任中文系主任时名师宿儒，济济一堂。20世纪30年代末期川大中文系师资力量之强，至今犹为人所称道。特别是他从重庆聘来了向宗鲁，并请他下榻在自己的寓所，为川大中文系的学术风尚，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他在成华大学作文学院长时，和中文系主任庞石帚同心协力，着意扶植了一批青年教师，先后延聘了屈守元、胡芷藩、周虚白、魏炯若、王利器、姜叔武、郭君恕、雷履平，白敦仁诸人，后来都成为高校教师中的教学、科研骨干。他常说：“我们老了，要及早把工作交给下一代。”建国后，他在川北大学、四川师范学院也是如此。刘君惠、王文才诸人，也是他极意延聘、培育的。

李炳英在旧社会中，所往来的老友，很多是同盟会老会员。解放前夕，他任四川省参议员，曾借起草宣言的机会，大胆揭露当时反动政权扼杀民主、剥削人民的现实，遭到反动政权的侧目。建国后，李炳英长期担任民革四川省委委员、南充市委主任委员，并主持南充地区民革工作，在南充又加入民盟。1953年当选为四川省人大代表。四川师范学院刚成立，图书资料极为匮乏，他把他所收藏的许多善本书刊，包括百衲本《史记》、《古逸丛书》、《全唐诗》等数千卷，捐赠给学院图书馆。

谢趣生

谢趣生，盐亭县麻秧乡人，生于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幼时曾入私塾，勤奋好学，尤喜绘画。后入玉龙高等小学校。1925年，谢趣生考入成都华阳中学，1928年又考入成都师范大学艺术专修科。谢趣生在学生时代就喜欢收集中外名画，并仿照临摹。他临摹的张大千的画被张大千看了后评价说："所绘毕肖，足以乱真。"其艺术天赋可见一斑。1931年起，谢趣生在成都一些中小学担任美术教员，曾经回家乡盐亭教过中学，。其后返回成都，在《新新新闻》报社任漫画编辑，同时也在成都艺专兼任教学工作，主持《每周漫画》，以漫画为手段反映社会现实。当时成都的著名工商企业，如"聚兴诚银行"、"及时钟表公司"等都聘请他绘制各种广告陈列于橱窗，颇为引人注目。他还与著名记者王怡安等筹办《秋之漫画》，为锦华馆的《川报》创作漫画。

抗日战争爆发后，谢趣生满怀民族义愤，以画笔为武器，积极进行抗日宣传。1937年9月，他与乐以钧、梁正宇、车辐等17人，在成都组织了民间抗日美术团体"四川漫画社"。他还与另一名画家张漾兮分别在《新民报》和《新新新闻》上开辟了漫画专刊，主编"每周漫画"。1938年元月，"四川漫画社"在成都举办了首次抗日救亡漫画展览会，展出作品有150余幅，由于这是成都第一次漫画展，因此参观的人相当多，每幅画从形式到内容都令观众赞口不绝，称之为"射向日寇的炮弹"。他们还把这些反映抗日的漫画送给各电影院，做成幻灯片放映，宣传效果很好。随后，他又同车辐选出一批作品带到川西的双流、乐山等地巡回展出，并沿途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

抗战的艰苦阶段中，东三省及广大沦陷区的难民流入四川，谢趣生目睹流浪在成都街头的难民儿童过着衣食无着的凄惨生活后，就在成都祠堂街举办了他的个人漫画展览，义卖他的全部作品。接着他又邀约"四川漫画社"的同仁在春熙路青年会楼上举行画展，义卖作品。他将两次义卖活动所获的收入，全部买成救济物资捐给难民儿童。

1940年9月后，日寇飞机多次轰炸成都，给成都人民造成严重伤亡。为愤怒谴责日寇的法西斯罪行，鼓动人民的抗日信心，谢趣生与张漾兮等又创办了《战时后方画刊》，以通俗、明快、犀利的画笔，进行抗战宣传。

1944年11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支部在成都成立，谢趣生积极参与

"民盟"的进步活动。他创作了一系列的优秀作品,如:《全民总动员》、《向"胜利之途"迈进的日本军阀》、《梦魂》、《前方流血,后方流汗》等,其针对性和战斗性都极强。

谢趣生在创作时 曾使用过何其非、免之、谢逸等笔名。由于他的作品锋芒毕露而得罪了国民党当局,一度有特务到《新新新闻》报社去抓他。但因有人事先透露了风声,他便及时转移到他夫人戴华琪正在教书的仁寿县。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针对当时腐败、黑暗的政治局面,创作了讽刺性极强的漫画《两岸猿声啼不住,官机已过万重山》。

1951 年,谢趣生下农村体验生活,他根据大邑县劳动模范冷月英的身世,创作了连环画《冷月英互助组》,表达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新社会人民生活的赞扬。建国后,他任四川美术学院教授直到逝世,他还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常务理事,并是四川省第一届文代会主席团成员。他一生的作品相当多,最有影响的是《鬼趣图》和《招魂曲》两部连环画。1959 年谢趣生因病逝世于重庆。

黄济川

黄济川,生于 1861 年(清咸丰十一年),内江县人。出身于贫苦小贩家庭,少年时读过几年私塾,16 岁开始学木匠并以此为生。27 岁时,痔疮发展严重,穿孔 7 处,四处就医未愈。后遇富顺县民间医生钟心裕游医到此,经钟用挂线疗法治愈。他深感钟老师医术精湛,决心拜钟为师。初,钟不收。他便追随钟师往返于资州、隆昌、富顺、泸州、巴县等地,为钟师挑运行李,寸步不离服侍,逾年余如一日。钟见他学医之心坚决,人又忠厚朴实,才慢慢教其治肛瘘技术(尚留有治疗痔瘘方药未传授),五年满师后,他便回乡开业。

几年后,他闻钟师途经内江。为报答师恩,乃远道迎接钟师来家奉养。约半月余,钟师离内江前,他为其饯行。在饭店拾得旅客遗失的一张 300 两的银券,他立刻追上失主,当面归还。钟师为他这种拾金不昧的美德所感动,遂留下将其治疗痔瘘方药及一些外科秘方传授给他。由于黄济川虚心刻苦学习,终于继承了钟师祖传医术。学成临别前,钟师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医乃仁术,救人危急,不以名利为务。吾亲生四子,亦未传授,尔其慎之,勿违我意。"黄济川铭记师教,未轻易传人,在内江、泸州、资州、巴县等地行医十余年,解除了不少病人的痛苦,声誉遍及内江周围几县。清末,他定居成都,先后在祠堂街少城公园(今

人民公园)附近、东华街何家祠公馆开设痔瘘专科诊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济川在痔瘘方面的医疗成就更加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了让他的痔瘘医术得到更好的发扬,拨出专款帮助,于1955年5月1日创建了"黄济川痔 瘘专科医院",他亲任院长。

黄济川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由于多年刻苦钻研,长期实践,凭他超人的记忆和博采众长为己有的学习精神,使他不仅擅长痔 瘘科,而且还能治疗一般中医外科疾病。他能娴熟应用挂线手法治肛瘘,尤为医家称道。他认为,挂线治疗肛瘘成败的关键就是准确妥寻内口,如果不注意管道的走向,用力强行穿刺则易造成新的创伤和假道,使治疗失败。他发现蚯蚓弯曲地钻土,便在探索漏管时,应用了曲行的原理。因此,他十分强调挂线前应先触摸管道的走向。若管漏弯曲呈钝角,直探针不易通过,则可将针按漏管走向弯曲,或牵动臀部肌肉和皮肤,使管道变直,利于探针通过。若漏管弯曲成锐角,使用前法仍不能通过探针时,即可使用探针从肛瘘内口挂出,用挂子从肛瘘外口探入,在管道转弯处探头与挂子相遇,用挂子将探针钩出,完成挂线手术。他总结出的这套挂线经验,至今仍被普遍采用。

治疗痔瘘,枯痔散的煅制是又一关键。为了煅制枯痔散,黄济川学习"水晶丹"、"连梅药水"等的制作,使枯痔散治疗方法更加完善。他曾多次到重庆、泸州等地拜师访友,虚心请教,放下架子,向自己的学生学习。由于他精于枯痔瘘散的煅制,注重病人全身检查,严格选择病例,使短期内将枯痔散的用量达到痔核坏死量,同时在用药后早期使用黄豆、绿豆等内服外敷,因而效果既好,又基本无砷中毒。因此,请他治疗的人平均每日约130余人,最高达170余人。仅1955年度内门诊就达53519人。凡是经他治疗的痔瘘病人,最快的3天脱落,瘘症最快者17天可治愈。

黄济川虽然已耄耋高龄,但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系列政策和建设成就感召下,决心把精湛的医术和宝贵的经验传之于世。1954年3月,在四川省中医代表会上,他毫无保留地带头当众公布了治痔绝招一"枯痔散"和"药线挂线法"等方药和治疗经验。由于他的带动,先后有不少中医也公开了自己的家传秘方。会上,黄济川获"痔瘘专家"的殊荣。他先后被选为四川省人大代表、省医疗卫生先进工作者、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常务委员。1956年他在北京参加第一届中华医学会全国代表大会时,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对他说:"老中医经验丰富,要多带徒弟"。他遵照指示,除坚持治理病人,诲人不倦地培养学生外,还不辞辛劳,常应邀外出去西昌、雅安、乐山、内江等地讲学。他培养的学生遍及全国,其中不少人已成为各地治疗痔瘘的骨干力量。

为了使黄济川的痔瘘医术广为传播，国家在他垂暮之年，组织力量，将他几十年的临床经验进行整理，编著成《痔瘘治疗法》一书出版，并广为发行，在国内和东南亚影响较大。1960 年 11 月 3 日，黄济川逝世于成都。

萧龙友

萧龙友，名方骏，别号“息翁”，建国后改号为“不息翁”。祖籍三台县，1870 年 2 月 13 日（清同治九年一月十四日）生于雅安。与施今墨、孔伯华、汪逢春，被称为“北京四大名中医”。

其父萧端澍，为清光绪戊子（1888 年）科举人，曾先后任武昌、大冶两县知县。萧龙友自幼严受庭训，文史功底颇深。

萧龙友童年时，因母亲多病，即留心医药。弱冠后赴成都尊经书院习词章科期间，博览群书，于中医书籍多所涉猎，渐悟岐黄之奥，从而加深了对中医的兴趣，尔后因其母患“血崩”久治不愈，更加促使他对历代名医的论述进行深入研究。1892 年，成都霍乱流行，萧龙友不惧传染。陪同陈蕴生沿街巡察病情，救治患者，活人甚众。

1897 年，萧龙友考中丁酉科拔贡，旋即入京充任八旗教习，后分发山东，先后任淄川、济阳两县知县。时值变法维新之始，萧龙友因热心变法，并以办教案与外国神甫作斗争而颇得民心。

辛亥革命后，萧龙友移居济南。他感叹自己力志医国，而浮沉宦海十数年，于国事无济，四顾茫茫不知所措。其妻遂道：“既不能出所学以医国，何不行其术以医人？”于是萧龙友“以医为隐”，因有 1912 年冬《息园医隐记》之作。

1914 年，萧龙友奉调 人京，历任财政、农商两部职事，并被执政府内务部聘为顾问。职事之余，仍悉心研习医药，同时因被聘为考试中医襄校委员，而取得医师资格。

1924 年，孙中山因为国大计带病北上，病情日趋严重，饮咽不能，诸医不能断其病由，友人请萧龙友诊病。萧龙友为孙中山诊视后，断为病之根在肝，并坚不开方药。后经解剖，证实孙中山所患乃系肝癌，已是不治之症。此事传出，萧龙友的医名倍增。

1928 年，萧龙友看透了官场与时弊后，毅然抛弃官职，正式开业行医，仍名所居为“息园”，自号：“息翁”。

时有德国医院（现北京医院前身）德籍医师狄博尔，对萧龙友的医术十分敬佩，每遇大脑炎、黑热病、子宫瘤、糖尿病、噎膈病等难病，多 请萧龙友前往医

院会诊。萧龙友用中医药予以诊治，常获良效。

萧龙友在中医学术上有许多精深独到的见解。他主张治病首重四诊，四诊必须详察合参，四诊中又最重问诊；辨证施治，务求准确；立法处方，皆须因人、因时、因地、因症制宜，反对拘泥一法，滥加套用；讲究药物性味，尤重地道药材，不轻用名贵峻补之药；配伍精良、巧妙，处方一般十来味；又主张食物疗法，谓之"药补不如食补，寓药于食，可谓善补"。他对中医各家学说不执偏见，"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主张博采众长；还主张改进中医药，力倡中西结合，对新法接生、预防接种等均颇赞同。他还十分强调医德，曾作《医范十条》。他又重视医史，强调"治医必学史"，不知史者无以为良医。

萧龙友医术全面，善治虚劳杂病，在儿科疾病方面，也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小儿惊风"这一笼统的习惯说法，极易混淆病证，颇为不妥。他在《非惊论》中指出："幼科有急惊、慢惊二证，即古医所称阳痫、阴痫之证也。谓之惊风，不唯惊字全无干涉，即风字亦未可混称，乃自有惊风之名，而滥以丸子相投，从此小儿遭其劫者，不知凡几矣！"他在儿科用药上经验宏丰，曾将自己长期运用、行之有效的儿科"圣药"蒿虫散，毫无保留地写进了他为钱今阳《中国儿科学》所作的序中："……一捧硃砂一捧雪，其功全在青蒿节（虫生在蒿之节）。纵教死去也还魂，妙用不离亲娘血（即乳汁也）。……此龙友数十年之秘方，特为抄出。"

在忙于诊务的同时，萧龙友为发展中医教育和中医药事业竭力奋斗。1934年，他与孔伯华、瞿文楼等创办"北平国医学院"，他任院长，孔任副院长，饱受曲折、苦心经营10多年，培养中医人才达数百人。同年，又与孔伯华、汪逢春等医药界名宿，发起筹建"北平医药同仁会"。他还积极支持"北平国医改进分会"、北平国医分馆和上海《光华医药杂志》的工作。

萧龙友对旧政府一贯轻视中医的政策十分愤慨，力倡中医教育。他认为，"医学关国家兴废存亡，非同小可"，"不重中医国 必危"，重西轻中的作法是"数典忘祖"，只有"提倡中西并用"、"兴学育才"，才能"保种强国"。他大声呼吁"须请明人改学堂"，并激昂请命："谓余不信，请以十年为期，国家如有意兴学育才，十年之后，中医如不能有成，鄙人愿受妄言之罪"。

建国后，萧龙友年已八旬，他将"息翁"改名为"不息翁"，以表达他为中医事业奋斗不息的决心。在1954年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时，萧龙友首次提案设立中医专科大学。1956年，中国第一批（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所中医学院成立。萧龙友闻讯，异常兴奋，奋笔疾书"中医学院成立感言"一文，载于《健康报》，慨言"我的夙志终于得偿"。

从1954年起，萧龙友历任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医研究院

顾问、名誉院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中央人民医院顾问等职。1960年10月20日，萧龙友病逝于北京。

陈豹隐

陈豹隐，又名陈启修，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生于中江县。其父陈品全是清代翰林，曾任广西桂林书院山长。幼年的陈启修在中江读私塾，12岁离开中江，随家迁居广西，就读于法国人办的初中。毕业后，于1907年赴日留学，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享受清廷官费留学待遇。预科毕业后，于1913年直接升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科。一年级时，用白话文翻译了日本小林丑三郎著的《财政学提要》，由上海科学会编译部于1914年出版发行，为初建的民国介绍欧洲资产阶级政府的财政理论和理财办法。1916年底，陈启修和留日同学王兆荣、周昌寿等正式发起、组织了有名的丙辰学社，被推举为主要负责人。筹建丙辰学社过程中，陈启修与李大钊交往。丙辰学社于1917年创办《学艺》杂志，各种思想兼收并蓄，发表了各种思潮的文章，参加了“五四”运动前后的百家争鸣。陈启修留日期间，国内革命形势蓬勃发展，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清王朝垮台，此后军阀混战，有志青年纷纷探索中国出路。这时候，孟德斯鸠、卢梭、黑格尔、康德、笛卡儿等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日本广为传播；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通过日本人幸德秋水、河上肇、宫川寔、山川均等的翻译，在日本流行。他在日本受到各种革命思想影响，对马克思学说感受很深。

1917年，陈启修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后滞留日本，参加了留日学生反对北洋军阀的爱国活动，然后以留日学生救国团代表的身份回国，先在上海活动，后来与黄日葵代表留日学生到北京活动。1918年，陈启修受聘为北京大学法商学院教授兼政治系主任。他在北大最初讲授具有英国正统学派和德国官房学派色彩的财政方面的课程，讲稿经过整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财政学总论》、《地方财政学》，在国内广为流行，再版过多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陈启修经常与李大钊等在公开场合作爱国报告，“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参与、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通过“五四”运动，陈启修的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北京大学开设新课，1920年开设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概论”；同年9月，他与李大钊合作，在北大政治系举办“现代政治”讲座，讲授十

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以及中国劳工状况等内容；1921 年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资本论》研究组担任导师，指导学生学习《资本论》。这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讲授的新课程和学术报告，深受北京学术界和广大学生欢迎，讲课的教室一再由小换大，后来在北大最大的教室讲课，仍然挤满了听众。周培源缅怀往事，于 1980 年 4 月 2 日在《人民日报》著文，称道陈启修为曾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知名学者之一。

1923 年 12 月，陈启修受北大派遣，经莫斯科赴法国和德国考察，然后回莫斯科东方大学任教一学年，其间，参加了国民党和共产党。1925 年陈启修回到北大。1925 年底至 1926 年，他先后在中共北方区党委举办的党、团员积极分子训练班、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讲课，讲授中国财政经济状况、经济常识、苏俄状况等课程。并在北伐军总政治部任职，兼任广州《民国日报》主笔。随着北伐军事的进展，于 1926 年底到了武汉，在武汉国民政府任职，创办武汉《中央日报》，任主笔。

大革命失败后，他于 1927 年底流亡到了日本，与共产党失掉联系。他易名为陈豹隐，发愤著述，从事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翻译，从 1927 年底至 1929 年，在国内出版、发行了约百万字的译著。其中，由上海昆仑书店于 1930 年 3 月出版、发行的《资本论》第 1 分册（内容为《资本论》第 1 卷第 1 篇），成为我国最早的《资本论》中译本；所译日本河上肇著《经济学大纲》，是河上肇的讲稿，经整理成书，具有全面、系统、通俗、易懂的特点，因而受到广泛欢迎，20 世纪 30 年代，再版过多次，发行量大，影响面广。

1930 年，陈豹隐从日本回国，先后在北平的东北大学、北平大学及北方的一些学习会讲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哲学、现代政治学。1931 年和 1932 年暑期，两次应冯玉祥邀请，赴山东泰山讲《资本论》，讲学内容密切联系中国实际。这一时期，南京政府对中央苏区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在思想领域发动了“文化围剿”，形成中国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一场思想斗争。我国经济学界展开了中国革命性质及革命对象的论战，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极力宣传各种资产阶级的价值学说，集中攻击马克思经济学核心部分的劳动价值说。陈豹隐在讲学中结合论战课题全面、系统地讲述资本的发生、发展及其必然趋于死亡的过程，捍卫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说。他批判过正统学派的劳动价值说、日本左右田的社会评价说、德国 Gosson 的界限效用说、Bailay 的效用关系说、Gide 的折中说、Gassal amonn 不要价值的价值说，以及“复兴农村论”和“工业救国论”。当时称道他为我国经济界的“北陈”，成为南方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攻击的重点。讲学内容成书为《经济学讲话》、《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现代政治学》。他一生译、著丰富，出

版、发行的书籍约70种，这3本书是其代表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陈豹隐于日军占领北平前到了南京。1938年在武汉受聘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顾问，遴选为国民参政员。1938年底至1945年，陈豹隐在重庆期间，为一些抗日战时训练班讲授经济学，从事过战时经济研究，先后在重庆《大公报》、重庆《中央日报》发表过一些发展战时经济的论文。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陈豹隐留重庆。1946年初与马哲民等创办重庆西南学院，讲授经济学。1947年秋，受聘为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讲授经济学。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所授经济学始终以劳动价值说为核心。

1949年底，重庆解放，随着院系调整，陈豹隐于1952年由重庆大学调任成都四川财经学院筹备委员会委员兼教务长。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授，并先后任四川省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常委。1959年，他带病参加四川财经学院科学讨论会，作了《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看法》的发言，用辩证观点，分析商品生产的起源、发展、阻碍和飞跃，认为：商品并非资本主义的特有范畴，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着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制度扬弃了私有制对商品生产的阻碍和毒害，使商品生产进入了一个大飞跃，更有利于扩大生产劳动的社会化，促进社会生产向更有效的协作和分工迈进，应该名正言顺地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这项论断，20年后，与中国1979年开始执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政策不谋而合。1960年9月9日，陈豹隐因脑溢血病逝于成都。

刘盛亚

刘盛亚，笔名SY、轼俞、士怀、成敏亚等。巴县人，生于1915年2月6日。其父刘运筹早年留学英、德，曾在南京、北平、成都一些大学任教授。刘盛亚在中学时就酷爱文学、历史，富有正义感，写过一些同情被压迫者的短篇作品。1933年在南京金陵中学读书时，在《国闻周报》上发表反映辛亥革命时爱国志士彭家珍炸良弼事件的《轰》；次年在北平文治中学时，又以旧社会艺人的悲惨遭遇为题材，创作短篇小说《白的笑》，载于郑振铎和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从此他和进步文艺开始有了接触和交往。

1935年8月，刘盛亚出国留学，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攻读历史学。课余之时，曾到一些城市考察，目睹德国法西斯迫害人民、毁灭文化的残酷现实，异常愤恨，写下不少反纳粹的进步作品寄回祖

国发表。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盛亚于1938年春毅然回国，放弃了即将取得的学位，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成都，他和周文、王白野一起创办了文艺旬刊《文艺后防》，“以作家的眼光，以文艺的形式，针砭时弊，讴歌抗战，鼓舞大后方的人行动起来，为挽救民族的危亡而尽力”。

1939年至1940年，刘盛亚先后执教于四川省戏剧学校和四川大学。学生都乐于和他接近，进步学生办刊物，排戏剧都得到他的大力协助。除上课外，他还为一些刊物撰稿，担任《捷报》等报刊的副刊编辑。这段时间他写了揭露德国法西斯的散文《卐字旗下》和中篇小说《小母亲》，分别刊于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和全国文协会刊《抗战文艺》。这些作品题材新颖，战斗性强，将一幅幅德国法西斯血腥统治下的图画展现在读者面前，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41年初，刘盛亚先后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理事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秋天，他到了重庆，创作长篇小说《夜雾》，并从事外国进步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由于他和郭沫若之侄郭培谦是亲戚，过从较密，因此，经常受到郭沫若的教导。

1942年8月，在郭沫若主持下，刘盛亚和胡子昂、于立群、郭培谦等筹建群益出版社。由冯克熙（胡子昂之婿）任总经理，刘盛亚任总编辑，兼《中原》月刊编辑。该社除出版郭沫若的著作外，还出版了阳翰笙的《天国春秋》、《草莽英雄》、夏衍的《水乡吟》，陈白尘的《岁寒图》等。刘盛亚的《夜雾》也于1944年在该社出版。当时正值抗战最艰苦的年代，流亡来川的文化人较多。刘盛亚社会关系多，他就“以四川人的主人身份”，为文艺界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如中华剧艺社演出《屈原》、《棠棣之花》、《翼王石达开》等剧目，都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一些进步文化人士贫病交加，也得到他亲切照顾，他甚至为他们营葬。如中华剧艺社前台主任沈硕甫、著名戏剧家贺孟斧等去世以后，都由刘盛亚出面，将他们葬在他南岸住地附近的瓦窑湾。

1944年，刘盛亚离开重庆，到乐山武汉大学任教。尽管生活清苦，环境恶劣，但他还是在教学之余与学生共同创办《星期文艺》刊物。同时还写了反映当时教师生活的小说《彩虹曲》，在成都的《华西晚报》上连载。1945年秋，他到成都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并常常为报刊撰稿。1947年下半年，被聘为进步报刊《西方日报》副刊主编。当时国民党反动政权正面临崩溃，疯狂镇压民主力量，而刘盛亚却毅然投身民主运动，积极参加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斗争，直到解放前夕，由于特务追捕，才转移到雅安。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刘盛亚到重庆文联工作，从事专业文艺创作。不久，他参加赴朝鲜慰问团，这时，他的旧作《再生记》在重庆《新民报》上连载，受到

批判。他在朝鲜得知此事后本着严于律己的精神，情绪未受影响，依然朝气蓬勃进行战地采访，写出《新居》、《程宝君》、《高射炮手》、《英雄城》等作品。他常说："作品是属于人民的、社会的，应当到广大读者中接受考验"。1951年至1957年，他担任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主席团委员兼创作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政协委员、民盟四川省文教委员会委员。尽管工作繁重，但他还是深入生活、勤奋创作。他写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为新中国的成就欢呼，为社会主义的胜利歌唱。当时的作品如《星》、《悬岩灯标》、《木工黄荣昌》等，都受到好评。

1957年，这个曾被郭沫若戏称为"南方神童"的刘盛亚，不幸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送往峨边农场劳动。在农场时他还很乐观地对人说："这回撤销了我的一切职务，只有全国作协的会员证还没有收去。总有一天，党会叫我回去。我还是要为人民而创作"。但是，繁重的劳动摧毁了他的健康，1960年4月4日，年仅45岁就病逝于农场。

1961年，有关部门为刘盛亚摘去右派帽子。1979年，四川省文联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编印了《刘盛亚选集》。

向　楚

向楚，字先侨，号觚公。1877年（清光绪三年）生于巴县。1896年入县学，1897年入重庆东川书院，所为诗古文辞，深得山长赵熙嘉赏。1898年"戊戌政变"，"六君子"遇害，深感徒言"变法"，不能达救亡图存目的。次年秋，随赵熙赴北京，读章炳麟《旭书》及《国粹学报》等，更引起思想共鸣。

1901年，泸州创设川南经纬学堂，向楚任教习。1902年中举 。次年应两广总督岑春煊聘任督署教读，兼两广师范学堂教习。讲课能排除粤语障碍，自编讲义又能融会新旧思想，学生甚受启发。1904年，辞聘游汴，还蜀后在重庆开智学堂、正蒙公塾任教，与"公强会"的杨庶堪及陶闿交厚。

1906年重庆成立同盟会支部，推杨庶堪主其事，向楚即加入同盟会。同年，永宁中学聘杨庶堪任历史、英文教习（后任监督），向楚任国文教习，每于课堂及自习指导时，详论古今形势，介绍《民报》、《国粹学报》及明末顾炎武、黄宗羲著作，唤起学生民族思想觉醒及对国内外形势认识。学生中先后加入同盟会的，有张颐、杨伯谦、陶子琛、叶麟、曾缄等。1907年向楚重赴北京，授内阁中

书。次年秋，因陶闿函促返渝。时杨庶堪、杨霖、朱蕴章分任重庆府中学堂、川东师范学堂、巴县中学堂监督，皆同盟会骨干。向楚任府中及师范学堂教习，而府中学堂尤为同盟会同志大本营。杨庶堪负全面责任，向楚等担任文字宣传。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22日，在同盟会领导下，重庆成立蜀军政府，向楚任秘书院长。军政府创立，开支需款甚急。向楚带士兵两人，接收"大川"、"浚川源"两官家银行，晓谕行方交出账册，冻结资产。两行库存共270余万元，蜀军政府经费问题，遂得迅速圆满解决。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向楚为蜀军政府撰元旦门联："奉新元为正朔，扬大汉之天声"。典雅堂皇，识者争相传诵。

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成果后，各省纷起讨袁。1913年8月4日，重庆成立讨袁军，熊克武、杨庶堪分掌军民两政，向楚任民政总厅总务处长及讨袁军总司令部参议兼秘书。9月，讨袁军败，熊、杨离蜀。向楚后行，家被抄没，变名林松年，东下过梁山，客门人家，土匪夜至，误认为账房管事，挥刀砍其颈，晕厥几死，伤愈亡命抵上海。1914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谋再举讨袁。次年，杨庶堪衔命抵沪，介绍向楚加入中华革命党。杨与陈其美等策动"肇和"兵舰起义，向楚亦参与。1916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聘向楚任国文部教授，讲授文字声韵学。1917年，广东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被选为海陆军大元帅，任向楚为大元帅府秘书，亲书"蔚为儒宗"以赠。

1918年，孙中山任杨庶堪为四川省长，向楚为政务厅长。杨、向偕返四川，途经武汉，北洋系督军王占元大捕革命党人，乃化装轮船工人，寅夜上英国轮船，始脱险抵渝。重庆镇守使署退还癸丑抄家折款，向楚以四川财政困难，拒受。11月，就任省署秘书长及政务厅长职。后杨因与四川督军熊克武矛盾激化，1920年冬，托向楚代行省长职，通电辞职赴沪。向楚留任蝉联政务厅长6年。任内，他本着培养人才，教育救国目的，选拔优秀学生，资送出川深造或出国留学，如杨允奎、刘洪波、周传儒、贺麟、罗念生等，后皆成为知名学者。

1924年初，吴玉章任成都高师校长，聘向楚任国文部教授兼主任，他在成都高师主讲文字、声韵学等课，学生中知名者有姜亮夫、罗孔昭、文百川、陶亮生、徐仁甫、殷孟伦等。

1927年至1931年，向楚历任国立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主任，公立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院长，并一度代理四川省教育厅长。卸任代理厅长时，节余公款10余万元。经办人员循旧例，建议转私人账户，他严予斥责，命全部移交。1931年，三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始专任文学院长兼中文系教授。文学院在成都旧皇城内，1932年川军混战，争夺煤山制高点，文学院陷弹雨中。他急与交战双方交涉停火半小时，亲率

男女学生安全转移南较场。

1932年，巴县重修县志，聘向楚为总纂。1935年他告假返渝，两年稿竟。1939年刊讫。发凡起例，因时制宜，比旧志增益实多。向楚自撰之《事纪》、《蜀军革命始末》，因书所亲历而保存不少辛亥革命前后珍贵史料；《礼俗》之《方言》章，因他通晓巴蜀方言，故寻求巴郡方言语根，辨析特精。其他各篇，增补搜辑，于本末沿革，引据无不矜慎。

1937年，向楚重返川大任教。次年冬，随校迁居峨眉。1941年，川大成立文科研究所，兼任所长。他主持院、所，开设课程甚多，自说文、尔雅、八代三唐诗、唐宋与桐城派文，咸有独到见解。于老、庄、荀三子，尤为烂熟。所撰古声韵论文，如《古四声通说》、《戴东原(声类表)释例》、《古音韵部分析》、《分韵等位歌》等，均多年研究心得结晶，经他和龚道耕倡议并共其立体例，代制序文，成都谓南严氏刊成《音韵学丛书》。其中《音学辨微》、《释大》等序，皆向楚所撰。他于群经，贯串透彻，所撰《廖平》一文，对其六变之源，擘肌分理，能识其大者远者。

向楚50岁后，益肆力诗古文辞。为诗古近体兼工，近体中七律尤佳。为纪念当年同盟会牺牲及幸存友好，常为诗文表彰。1930年所撰《〈题铁血斑斓图〉》，尤为绝唱。

向楚为学，兴趣甚博，词曲、书、画、小说均深有研究。又精于书法，行楷皆工，复谙画史画理。抗战期间，国内书画家群集成都，成都老书画家原组织有《蓉社》，继又有《蜀艺社》，均推向楚任社长、副社长。他与黄宾虹、张大千本为旧交，新识中独与董寿平善，为董作诗特多。

1949年成都解放前夕，川大校长黄季陆去台湾，向楚代理校务。胡宗南部盛文退兵成都，欲驻军川大，向楚竭力拒阻，校区乃免兵祸。成都解放后，军代表接管学校，向楚办理移交，巨细靡遗。

建国后，向楚先后被选为四川省人大代表及省政协委员。1952年，院系调整后，调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积极参加辛亥革命文史资料撰写和社会活动。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写了热情洋溢的组诗。同年11月逝世。

杜自明

杜自明，满族，1878年(清光绪四年)生，成都人。其父精于武艺，擅长医术。杜自明自幼即随父习武，长年从不间断，能演十八般兵器，宗少林派武功，尤以猴拳见长，曾任过镖客和国术教官。在长期武术实践中，他还学到了一般伤

科治疗知识，加之得到祖传的一些骨伤科秘方，渐渐便谙熟洗髓易筋之妙，于1902年在成都正式开业行医。

由于他勤奋好学，善于吸收各家之长，到中年时期，便以其高超的武艺和医术而扬名于成都武术界和骨伤科行业。他治愈了很多跌打损伤患者，深受病人敬重。1931年，成都女子师范学校教学楼垮塌，受伤学生达百余人，经杜自明率助手精心抢救和护理，无一死亡和残疾。但是在旧社会，由于政府不重视医学，更排斥中医，不发给他行医执照，杜自明也就做了大半辈子不被政府承认而受群众爱戴的医生。

建国后，杜自明受到共产党的关怀和信任。1951年他应成都市卫生局之聘，担任成都铁路工地的特约医生。1953年参加成都铁路局中心医院工作，并受聘为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特约医生，后来他又创办了骨伤科诊所。1954年当选为成都市人大代表和市人委委员。

1956年，杜自明奉调到北京中央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执医，他以精湛的医技为患者治病，并积极培养新一代骨科人才，同时还参与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工作。向他求医的病人中，既有著名的舞蹈家、戏剧艺术家以及体育健将，如白淑湘、陈爱莲、郑凤荣、李富荣等，也有慕名而来的外宾，每天求诊者总是门庭若市，应接不暇。当杜自明把解放军铁道兵副司令员李寿轩的旧疾腰腿痛病（即脊椎骨性关节炎）医治好后，李寿轩赞不绝口，下令从八个铁道兵师各抽一名军医来北京向他学习。他还曾应邀到芭蕾舞蹈学校等单位去指导练功和防治伤损。由于他的出色贡献，受到了党和政府的表彰，享受国家一级专家待遇，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他常感慨地说："共产党重视祖国医学，关怀中医。像我这样一个在旧社会不许开业行医的人，被给予了许多崇高的荣誉，让我带这样多的徒弟，这是我从前连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怎能不使我万分感动。"

杜自明对理筋、正骨、整复脱臼、矫正畸形等，均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最擅长手法治病，辅以药物，疗效显著。他将伤症的临床分类以其受伤的原因不同，分为硬伤与软伤两类。硬伤又分卡、砸、崩、碰、骨折等；软伤则分为忍、摁、闪、凝四科。对伤症的治疗，他认为虽然药物和体功操练不可缺少，但最重要的是手法。他治疗硬伤的手法有牵、卡、挤、靠四种，治疗软伤的手法有理筋分筋、点穴按摩、滚摇升降、弹筋拨络、一指点压等多种。他认为凡是骨伤，常常是错综复杂的，必须根据患者的病态现象，以辨证论治作指导，在临床上灵活运用。他根据祖传秘方和自己数十年临床经验，并参阅古医籍，炮制出了接骨散、活血散、玉真散、内伤丸、活络丸、除湿酒、活血酒等七种有效方剂。

杜自明晚年，在助手的帮助下，整理出版了《中医正骨经验概述》一书，并拍有治伤教学片一部，系统地总结了他行

医60年的丰富临床经验。《中医正骨经验概述》自1960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以来，已几经再版，销售一空。1961年11月15日，杜自明病逝于北京。

王朴诚

王朴诚，原名王联福，成都四大名医之一，精儿科、人称“王小儿”。中江县人，生于1879年7月13日（清光绪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家贫，少时随父逃荒到成都。先从余养泉学习四书五经与《内经》、《伤寒》等医书。1894年经余介绍到丰都县“福源长”药店当学徒，继从丰都名医陈焕卿学医学药。在学习过程中，他对咀片炮制，膏丹丸散的制造，胶酿花露的熬炼，参茸胶桂的鉴别，以及药材的收贮保管晒晾等，无不一一苦心钻研，辛勤操作，并虚心向老师请教；及至夜间，焚膏继晷，读书写字，进修医学，从来不知疲倦。因此，他的意志和体质都得到了锻炼，并且在医药知识上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1903年，他23岁的时候，回到成都，在上西顺成街开业行医，凡50余年。

王朴诚对小儿的传染病和胃肠病最为专长，疗效很好，而且一贯待人亲切，关心病人，服务周到，所以深受群众爱戴。他治贫苦患者之病，不仅不收诊金，反而随诊附送自制的成药，不取药费。他痛恨医家保守秘方，所以，凡自己获得的验方无不供人传抄，以广传播。民国初年，牛痘接种还没有在国内普遍推广，虽然民间有人痘接种的吹苗法，但危险性大，于是王朴诚让自己的夫人肖约素学会种牛痘的方法，广泛地为孩子们接种牛痘，保全了许多儿童的生命，甚得群众称赞。王朴诚诊病不规定时间，病人随到随看。他说，一个孩子生病，全家都着急，兼之小儿一般发病快，变化快，特别是高烧、惊厥之类，必须尽快地诊治处理，不可稍误。又说，病家大多数是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和小职员，一天不干活，一家人就要断炊，做医生的要为他们着想。他最反感对病家故作傲慢之态的医生，对文人相轻的陋习也十分厌恶，他的高尚医疗道德，受到病家和医家的普遍好评。

1956年春，王朴诚在76岁高龄时，应聘赴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内科所，担任儿科的临床研究工作。

王朴诚行医近60年，治疗经验十分丰富。他在京抢救了不少危重的患儿。有一次，北京儿童医院请他会诊。患儿任小红，还不到两岁，患了大叶性肺炎，神志不清，颜面苍白，口围青紫，呼吸困难，晨起口角抖颤，两手抽搐。王朴诚根

据这些征候和他的独特的诊断方法，发现患儿的指纹沉滞发紫，就认定是积滞化热，气不宣泄，兼之气血不和，为风邪所中，故发而为惊。于是先后给以导滞泄热、柔肝熄风、滋水和血之剂，顿使患儿转危为安，经两天，患儿病体痊愈。某医院有一患儿得了麻疹合并中毒性脑炎，沉睡不醒，牙关紧闭，颈部强直，大小便失禁，病情危笃。请王朴诚会诊，诊治六次，孩子眠食俱佳，喜笑如常，扶床学步，全不见什么病痛了。其他如久治不愈的小儿过敏性紫癜病、婴儿鹅口疮、消化不良、支气管喘息、小儿麻痹症、肾炎等患儿，经他诊治，都取得奇特的疗效。因此，他在北京的 名声很高，病家称赞他“小儿王”。

王朴诚一生忙于诊务，晚年孜孜不倦地培养学生，把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下一代，他还嘱咐长子王伯岳完成自己的心愿，写出一部理论与临床相结合的儿科著作。1961 年 6 月 6 日，王朴成在北京病逝。

王文成

王文成，字彦聪，受洗名保禄，安岳县天林场人。生于 1880 年（清光绪六年）9 月 8 日，世代务农，家境贫寒。

王文成幼时被其父卖到当地一家寺院为僧，后由某外国神甫赎出，送入天主教成都教区修院读书，此时年仅 11 岁。24 岁从神哲学院毕业后，担任小修院教师。1909 年入成都教区主教公署工作，两年后被祝圣为神甫，曾往简阳、温江、南充等地传教。

1929 年 12 月，经天主教教皇庇护十世批准，从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所属的成都、重庆、宜宾教区中划出顺庆（今南充）、万县、嘉定（今乐山）3 个国际教区，王文成被选为顺庆教区主教。1946 年以前，梵蒂冈认为中国的天主教不具备祝圣正权主教的条件，因此 1930 年 2 月教皇代表刚恒毅大主教在重庆祝圣王文成为主教时，宣布王文成为土耳其厄尔惹拿赫勒区正权主教，代理顺庆主教。

1933 年王文成赴罗马“朝圣”，拜见了教皇庇护十一世，参加了教皇祝圣越南、印度和中国吉林省主教的典礼。他还应比利时安德肋修院院长之请，为该院祝圣神甫及为修生升品，升品修士中有原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陆徵祥。

抗日战争爆发后，罗马教廷驻中国代表要求中国的天主教徒容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王文成断然反对，提出教徒应当兵抗日，为国效力，他捐献财物支援抗战。他还批评国民政府消极抗战。抗战胜利时，王文成举行“大礼弥撒”表示庆

祝，在宗教界留下良好影响，被誉为“爱国的主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马教廷对中国奉行敌视政策，干涉中国内政，激起中国天主教界广大信徒和神职人员的强烈不满。1950年11月，以广元天主教神甫王良佐为首，签名发表《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当时，王文成认为，宗教是“超政治”、“超国际”、“与罗马教廷分裂是裂教”，他拒绝在《自立革新宣言》上签名。

随天主教界爱国反帝运动深入发展，揭露了梵蒂冈教廷敌视新中国的种种罪行，王文成迫于当时形势，于1951年1月签名发表了拥护革新宣言，要与梵蒂冈割断一切关系。此举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映，梵蒂冈驻华圣使黎培里为此写信对王大加训斥：“若系你自愿脱离，就是裂教，如系被迫，你冒生命也要补偿。”王迫于黎的压力，曾一度反复，向黎表示“忏悔”。当人民政府依法驱逐黎培里时，王文成一度想不通，认为黎仅是“言语不慎”触怒了政府，他拒绝在拥护驱黎培里声明上签名。1957年7月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王文成担心中国天主教走上“裂教”道路而反对此举。提出要成立就得报罗马教廷批准。

王文成对梵蒂冈所持的态度遭到广大天主教徒的反对，他才逐渐有所转变。1958年3月，成都、武汉等地首次自行选举主教，罗马教廷竟以“绝罚”相威胁，王文成深表不满。他同意将主教的“誓言”中忠于梵蒂冈的誓词，改为忠于社会主义祖国的新誓词。同年7月，王文成又亲自出面祝圣成都教区主教李熙亭，在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办教上走出第一步。

在农村的反封建斗争中，王文成主动把教区在香港的存款取回来退押，并动员所属教堂的神甫支持土改。他在南充教区亲自主持修建主教公署，开办“临江修院”、“圣心女修院”、“慈幼院”，积极兴办教会学校，培训神职人员，他一生共祝圣了21名神甫，受到天主教界人士的敬重。

建国后，王文成历任天主教南充教区主教，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四川省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届四川省政协委员等职。1961年1月28日，王文成因脑溢血病发医治无效，在南充逝世。

任鸿隽

任鸿隽，字叔永，1886年12月20日（清光绪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于垫江县。原籍浙江归安县（今吴兴县）菱湖镇。

任鸿隽6岁入塾,12岁时考入垫江县书院。1904年又考入较新式的重庆府中学堂师范班,受老师杨庶堪等人的影响,开始接受新知识和新思想。同年,冒籍巴县参加院试,以第三名考中秀才。次年中学毕业后,执教于重庆开智小学和私立重庆中学堂。1907年初,赴上海求学,入中国公学高等预科甲班,与胡适、杨铨(杏佛)、张奚若等人同班。该校是同盟会的重要活动据点,任鸿隽在此深受反清革命思想的熏陶。

1908年初,任鸿隽东渡日本留学。初入同文中学,次年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攻读应用化学。同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后曾任同盟会四川分会书记、会长等职,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活动。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任鸿隽先后撰写了《川人告哀文》、《为铁路国有告国人书》等文章,为保路运动的蓬勃发展推波助澜。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后,任鸿于11月返回上海。此时上海已光复,聚集在此的四川革命党人,召开川籍同盟会员会议,由任鸿隽任主席,发起组建蜀军,以备北伐。会后,为支援四川反清起义,任鸿隽曾偕另一革命党人前往武昌,与湖北军政府交涉,达成让蜀军借道返川的协议。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任临时政府大总统,任鸿隽被任为总统府秘书。他曾为孙中山起草《告前方将士文》、《咨参议院文》、《祭明孝陵》等文。同年2月,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4月临时政府迁往北京,任鸿隽执意去职留学,经胡汉民、蔡元培等人的再三挽留,遂留唐绍仪内阁任秘书。6月,唐绍仪内阁倒台,任鸿隽赴天津任京津同盟会机关报《民意报》编辑,在该报连载根据朱芾煌的日记撰写的《共和建设别记》,揭露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的内幕,使袁氏十分震怒,下令停刊。10月,经临时政府稽勋局选派,任鸿隽与杨铨同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于1917年获化学学士学位。同年又入哥伦比亚大学,翌年获化学硕士学位。

任鸿隽在留美期间,对中国留学生的各种活动非常热心,曾主编《留美学生季报》。1914年夏,他和一批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及哈佛大学就读的中国留学生,聚集纽约绮色佳城,基于"在现今世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的共同认识,为实现科学救国,决意募集资金编辑科学杂志,并筹建科学社。1915年1月,《科学》月刊正式出版。同年10月25日,全体社员通过由任鸿隽、胡明复和邹秉文草拟的科学社社章,社名定为"中国科学社",规定科学社的宗旨是"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遂宣告成立。任鸿隽与赵元任、胡明复、秉志、周仁被选为第一届董事会董事,杨铨为编辑部长,公推任鸿隽为董事会会长兼科学社社长。任鸿隽不仅是中国科学社的发起人,而且是始终

致力于科学社事业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他和丁文江、杨铨、竺可桢、李四光等，被视为发展中国现代科学的拓荒者。

1918年10月，任鸿隽由美国回国。中国科学社的办事机构也从美国迁回国内，设事务所于上海和南京。为调动社会力量，募集资金，扩大科学活动，任鸿隽不辞辛劳，奔走南北各地，遍访各方名流，争取到各界开明人士的支持。他在上海期间，曾多次拜访孙中山，孙将正在著述的《建国方略》中有关科学部分，嘱任鸿隽校读，并对科学社组织颇为赞赏。

此后，中国科学社在任鸿隽主持下，逐渐发展、扩大，除在美国设有分社外，又先后在国内设有9个社友会，并创立了一系列科学文化机构，主要有生物研究所、图书馆、自然历史博物馆、科学咨询处、科学教育委员会、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发行了《科学》杂志、论文专刊、科学丛书及丛刊、《科学画报》等多种书刊。其中《科学》杂志是中国最早、存在时间最长的综合性科学刊物，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任鸿隽是该刊物的主要发行者和撰稿人。他在1915年发表于《科学》第一期的《化学元素命名论》的科研论文，是中国近代化学的最早一项科研成果之一。

1919年春，任鸿隽曾回到四川，在各学校、商会演说，鼓吹科学，草拟了四川高等教育的发展计划，建议仿美国各州立大学之例设立四川大学，送呈省长公署。又向当时的四川督军熊克武提出创办钢铁两厂，相辅而行，以建立四川钢铁工业之基础的建议。是年冬，经熊委派赴美国采购机器设备并调查炼钢方法。1920年夏任鸿隽回国，时值四川军阀混战，建厂计划搁置。任鸿隽乃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之邀，赴北京任北京大学化学教授兼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1922年冬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1924年任国立东南大学副校长，1925年3月去职。同年7月，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秘书，后相继任秘书长、副干事长。1929年当选为董事并兼任干事长，主持实际工作，直到1935年秋。在任鸿隽任职的10年间，中基会拨款建北京图书馆，成立社会调查所，组织编译委员会，在大学设置"科学教席"，与尚志学会合办静生生物调查所，并对中国科学社、地质调查所、黄海化工研究社、中国营造学社和许多公立、私立大学提供经费补助，还设置了科学研究补助金，开展土壤调查等等。其间，任鸿隽还曾担任由教育部与中基会于1925年共同组成的图书馆委员会的委员，并一度代胡适作图书馆委员会书记。1927年担任大学院科学教育委员会委员，协助蔡元培筹建中央研究院。1929年曾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未到职。

1935年8月6日，教育部简任任鸿隽为国立四川大学校长，9月2日到校

视事，9月23日国民政府正式予以任命。他就任川大校长后，决心励精图治，按照“现代化”和“国立化”的办学方针，把川大办成一所规模宏大，有国内第一流学术水平的综合性大学，成为西南地区的文化中心。为此，他排除阻力，大刀阔斧实施整顿和革新，采取了任人唯贤，广纳国内名师执教；大力推行教学改革，充实各种教学和科研设备，提高教学质量，活跃学术气氛，发展学术社团；注重体育运动，增强师生体质等一条列改革措施。不到两年，学校在 各方面都出现了可喜的新气象，教师阵容强大，知名教授、学者云集，教学内容和方法得到较大改进，学生学得颇有生气，学校教育质量有显著提高，并开始形成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特色，被誉为川大建校以来的“黄金时期”。

鉴于设在成都市中心皇城内的校址狭窄，校舍简陋，为适应现代化大学的需要，任鸿隽经周密调查，并多方设法筹集资金，在成都东门外环境优美的望江楼附近征地2000亩，用以建设新校舍。1937年6月16日，由任鸿隽主持，在望江楼川大农学院举行了新校舍奠基典礼，图书馆、数理馆、化学馆同时破土动工。新校址的选定，为川大后来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不久，任鸿隽辞职离开川大，回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任编译委员会委员，旋即出国考察。

1938年7月，任鸿隽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同年底，应蔡元培之邀，赴昆明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化学研究所所长和院秘书长等职。1942年辞去中央研究院职务，再度出任中基会干事长。1944年1月，继任中国科学社社长、监委会书记以及理事会会长，主持已迁重庆北碚的科学社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随同中国科学社返回上海。1946年再度赴美考察，次年4月回国。此后定居上海，专力于科学社的事业。

1949年，任鸿隽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翌年8月，出席中华全国自然科学者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常务委员。他曾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科技图书馆及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市科技协会副主席。在此期间，他将中国科学社主办的各项事业逐步移交给人民政府或国家的有关科研机构。1960年5月4日，中国科学社宣告结束。1961年11月9日，任鸿隽病逝于上海。

任鸿隽一生的著述和译著颇丰，散见于各刊物上的文章约200余篇，内容涉及化学、物理、生物、教育、科学发展史、科学家传记等。主要著作有《科学概论》。译作有《教育论》、《汉译科学大纲》、《最近百年化学的进展》、《大宇宙与小宇宙》、《爱因斯坦与相对论》、《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与李珩、吴学周合译)等。

任鸿隽在文学上也具有相当修养，古诗文造诣颇深。在日本留学期间，曾

师从章太炎讲习国学，回国后又加入著名文学团体—南社，并著文阐述对中国诗歌发展的看法和主张。留美期间，为改良中国文字与文学问题与胡适展开过激烈辩论。胡适“文学革命”的口号就是在和任鸿隽、杨铨、梅光迪等人的反复争论中提出的。胡适曾说：“吾数年来於文学之兴趣，若无叔永、杏佛（杨铨），定无《去国集》；若无叔永、觐庄（梅光迪），定无《尝试集》。”任鸿隽自编选有《古青纪游诗》1册，其余所写诗文，均未蒐辑刊行。

李　红

李红，原名李善基，后改名李寿民，建国后更名李红，笔名还珠楼主。长寿县人，生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4月6日。

李红父亲李元甫曾任清末苏州知府，后弃职还乡，开私塾养家。1914年李元甫去世，李红一家迁居苏州。李红童年时随父宦游各地，走遍大江南北，尤喜登山，泰山、华山、祁连山、点苍山等都有他的足迹，而在峨眉山、青城山住得最久，他日记中多次提到“三上峨眉，四登青城”的观景心得。

李红未受正规教育，除念过几年私塾外，因家道中落，全赖自学。他聪颖强记，多务杂学，对诸子百家、佛典道藏、医卜星相、琴棋书画、气功武术，皆能知晓贯通，堪称奇才。广泛的游历和渊博的学识，对他日后创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李红19岁时，北上天津奉养老母。1924年他因擅长瀚墨而被延揽入军界，曾在营造商侯少白的推荐下在天津警备总司令傅作义手下任秘书，与同事段茂澜（字观海，段祺瑞侄子）相交甚密。因常与上司顶撞，在职不到一年便离去，经友人介绍到《天风报》社当校对、编辑，后又进天津邮政局当职员，余暇以“木鸡”、“寿七”等笔名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游记、杂记、食谱之类的文章。

1929年，李红经人介绍，兼做天津大中银行老板、同乡孙仲山的家庭教师，教授孙家二小姐经洵和三少爷经涛的书法、古文，他与孙经洵彼此相爱。但孙仲山对此极为不满，买通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将李投入监狱。经段茂澜保释后，孙仲山又以“拐带良家妇女”的罪名，再次将李红送进监狱。1930年11月，天津市地方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孙经洵出庭据理力争，终获胜诉，李红无罪释放。此案轰动一时。李红深感孙经洵的情意，思恩图报，发奋赚钱。恰好次年《天风报》断稿，总编以丰厚稿酬请李红立刻写一部小说顶上。李红取张籍诗“还君明珠

双泪垂"之意定笔名为"还珠楼主",夜以继日,辛勤笔耕,从此便有了引起现代武侠小说流势巨变的传世之作《蜀山剑侠传》。

《蜀山剑侠传》系李红成名之作,又是现代武侠小说"奇幻仙侠派"的代表作。这部巨著虚构了现实之外的峨眉派肖剑侠与邪派恶人的激烈斗争的故事,糅合儒、佛、道思想,描绘了一个奇幻绝伦的剑仙世界,离奇玄异,大受欢迎。随后天津励力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旋即风行全国,李红欲罢不能,直到他移居南方时,仍陆续依次一集集地写下去,直接由上海正气书局出书,随写随出,一直出到55集329回,共计350万字。据说李红还打算写满1000万字,但未能如愿。这部小说是他前后花了20年的心血凝成。

1932年,李红与孙经洵结婚。因与岳父孙仲山矛盾甚深,李红写过社会小说《轮蹄》加以讥讽。

1939年,李红拒绝和日寇合作办刊,在北平被日本宪兵拘捕入狱,经斗争两个月后获释,遂迁居上海。因生活困难,李红更加奋力创作武侠小说。他请了两位秘书,口说代录,同时写好几部,最多时一天应付八家报刊催稿。《蜀山剑侠传》、《青城十九侠》、《云海争奇记》、《蛮荒侠隐》、《黑森林》等长篇剑仙小说接连问世,风靡全国。李红先后共写了37部,其著作之丰,在北派现代武侠小说家中首屈一指。

李红酷受戏曲,尤喜京戏。1927年,他与名旦尚小云结拜订交。李红还为一些剧团编写了不少京剧剧本,其中《汉明妃》、《昭君出塞》、《墨黛》等成为尚派名剧;名丑叶盛章的独门绝活《酒丐》也出自其手,而尚小云将他著的《青城十九侠》编成京戏上演。

建国初,李红在上海天蟾京剧团任编导。1953年离沪北上,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京剧团。后又任北京京剧团三团编导。此间他整理、创作和改编了《雪斗》、《白蛇传》、《南山化蝶》等剧本,基本停止了武侠小说的创作。1956年,李红参加作家艺术家西北参观团赴大西北访问,写下歌颂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西北纪行》等散文和诗歌。随后不幸中风偏瘫,于1961年2月21日病逝于北京。

郭步陶

郭步陶,名成爽,字步陶,别署景庐。隆昌县云顶寨人。1882年(清光绪八年)生于一个宦室之家,早年中秀才,以后两次举考皆未中。1904年,郭步陶到

上海考入南洋中学，1910年毕业。继入大同大学英文专修班学习，后在沪《通讯晚报》任见习记者，重庆驻上海《太平洋报》采访。1912年起到《申报》任编辑6年。1918年任《新闻报》主笔。

郭步陶在南洋中学时，是诗社“南社”的成员之一。进入新闻界后，正值上海几家大报为“南社”成员所主持，他与宋教仁、于右任、柳亚子等一起聚会，讨论国家大事。这时，他还从事文学写作，针对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的现实，创作有《三韩亡国演义》、《苦女儿弹词》。

郭步陶在《新闻报》编辑部主笔政，忧国忧民，或写社论，或作短评。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三省，蒋介石下令“绝对不抵抗”，郭步陶写出《伸张民意急呼御侮》的社论，连写许多御敌的时事政论文章，并汇集成册，于1934年、1935年相继出版了《不受侵略论文集》、《不受侵略论文续编》和《不为奴隶歌》等集子。

郭步陶从1910年至抗日战争爆发的28年间，皆在上海报界工作，并从1930年起相继在上海文学专科学校、正风文学院、新中国学院、中国公学大学部、复旦大学和沪江大学担任文学、史学、新闻学的教师和教授，并潜心研究史学、文字语言学和新闻学。这一时期著述丰盛，出版的文史及新闻学专著有：《史记入门》、《中国文字形、音、义浅说》、《毛诗中维字研究》、《文法解剖》（“ABC丛书”之一）、《中国实用修辞学》、《中国新闻事业》、《时事评论作法》、《编辑与评论》等，此外还参加《中华大字典》的新编校正，与人合编《音韵辞典》等。

郭步陶的《编辑与评论》一书，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中国编辑与评论的第一本专著，是他长期研究与教学经验之结晶，被誉为中国新闻界的“第一部杰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上海沦陷，12月日寇在沪强行实施新闻检查。郭步陶愤而辞去《新闻报》职，携妻到香港，相继任《申报》编辑、香港《星岛日报》总编辑，并兼任岭南大学新闻系教授，创办中国新闻学院，自任院长，坚持爱国立场，培养新闻人才。1941年春“皖南事变”发生，郭步陶撰文谴责蒋介石破坏抗日、迫害友军，后来又在报上声讨广州市长吴铁成的卖国投降行径，为此他几乎遭特务毒手。1942年底香港沦陷，他被毁家逐走，与妻到江西永兴县（妻贺珍原籍）寄居4年，在江西省立女师、省立中学、县立中学等校执教，并写有沦陷区人民在日寇铁蹄下家破人亡悲惨遭遇的诗集《爱国诗选》，写成专著《中国修辞学讲义》、《中国文法研究》。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步陶应邀回上海组织《新闻报》复刊，并执教于复旦大学、新中国学院。1949年初辞去《新闻报》及学校之职，回到隆昌云顶寨。

1950年郭步陶任隆昌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特邀代表，以后相继当选为隆昌县人民代表、县政协委员。1953年8

月,受聘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1956年夏北上,任辽宁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从事东北近代史研究。1962年10月病逝鞍山。

李劼人

李劼人,原名李家祥,笔名老懒、懒心、抄公、云云、菱乐等。1891年6月20日(光绪十七年五月十四日)生,成都人。少年丧父,家贫。

1908年,李劼人得亲戚资助,考入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与同学郭沫若、王光祈、周太玄、蒙文通、曾琦等过从较密。他深受其师、同盟会员刘士志、杨沧白和文学教师刘豫波的影响,酷爱中外文学名著。

1911年的保路风潮中,李劼人加入了学界联合会、保路同志会、学生同志会等组织,参加了罢课、罢市、游行示威活动。他从中积累丰富的创作源泉。

1912年,李劼人中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困而辍学。王光祈曾聘他到《晨钟报》任采访,他的处女作讽刺小说《游园会》就是在该报上发表的。

1913年末至1915年,李劼人先后在泸县,雅安两县政府第三科(教育)作科长,他目睹了官场的腐败,无心仕途,决心用笔揭露社会的弊端和不幸的人生。这期间他写出了《儿时影》和《夹坝》等作品。

1915年至1919年,李劼人任《四川群报》主笔、编辑,这期间他共发表短篇小说100多篇,其中有揭露社会黑暗、鞭挞官僚丑恶行径的系列小说《盗志》40余篇。1918年下半年,他与人合作创办《川报》,自任社长兼总编辑。他在该报上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杂文、小品,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五四"运动前后,《川报》发表登载了不少王光祈等人所写传播"五四"精神的大量文章、通讯、电讯,推动了四川"五四"运动的发展。李劼人还在《国民公报》上发表讽刺投机钻营者的小说《做人难》和《续做人难》。

1919年6月5日,"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在成都成立,李劼人担任该会书记兼书报保管员。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总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后,他被推荐为《少年中国》月刊的编译员。并担任了"成都分会"出版的《星期日》周刊的主编,他在该刊上转载了李大钊的《什么是新文学》、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

1919年8月,李劼人与杨叔捃结婚后几天,即与王怀仲、胡助等10人赴法勤工俭学,与徐特立、向警予等同船。到巴黎后,他参加了周太玄、李璜主持的"巴黎通讯社"的工作。他写下了《法国

工厂写真》、《列宁在巴黎》，他还为国内的《川报》、《国民公报》、《少年中国》、《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报刊撰写通讯、评论、小说等。在巴黎时，赵世炎对他的思想有重大影响，他说赵的言谈"使我愈益明确坚定了我这二十几年来的行动方向"。

李劼人留法期间，曾在蒙彼利埃大学和巴黎大学攻读文科，研究法国古典文学、法国文学史、法国近代批评文学、雨果诗学等。他以大半时间从事翻译和写作，翻译了莫泊桑的《人心》、都德的《小物件》、《达哈士孔的狒狒》，卜勒浮斯特的《妇人书简》、福楼拜的《马丹波娃利》以及左拉、罗曼罗兰、龚古尔兄弟等作家的小说和戏剧，分别在《少年中国》、《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文学周报》等刊物上发表。他还以自己留法的亲身经历为依据，写下了他第一部中篇小说《同情》，在《少年中国》连载，192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少年中国学会"发生分歧后，李劼人拒绝了康白情、曾琦等三K党派和国家主义派对他的拉拢。

1924年，李劼人离法回川。他一面教书，一面潜心写作和翻译，他写出了《大防》、《捕盗》、《只有这一条路》、《编辑室的风波》等短篇，译出了福楼拜的长篇小说《萨朗波》、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彼得与露西》、龚古尔的小说《女郎爱里沙》及法属中非黑人作家马郎的长篇小说《霸都亚纳》及法赫尔的长篇小说《文明人》。

1926年，张澜出任国立成都大学校长，聘李劼人任教中文系兼大学文预科主任，他积极支持校长张澜。1928年2月，成都"二一六"惨案发生，他同情共产党人和死难烈士，为诗人孙鸥编选诗集《血泊》并写后记，以资纪念。1930年夏，他为抗议军阀政府迫害革命师生和张澜，辞去成大教授职务。在指挥街寓所开设"小雅面馆"。

1933年3月，李劼人出任民生机器修理厂厂长，后因与资方意见分歧而去职。1935年夏他又担任嘉乐纸厂董事长。但他的主要心思乃在写作方面，他以自己在辛亥革命中的亲身经历和见闻，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加以熔铸。先后完成长篇巨著《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上、中、下三卷)，构成四川20世纪初的社会史、风俗史和人心史。郭沫若称这三部小说是中国"小说的近代史"，"小说的华阳国志"，赞誉李劼人是"写实的大众文学家"，"中国的左拉"。

1939年5月，嘉乐纸厂长王怀仲被炸死，李劼人兼任了厂长和总经理，这期间他重译了法语小说《人心》、《小物件》、《马丹波娃利》和《萨郎波》，还译了《单身姑娘》等。抗战胜利后，他写了长篇小说《天魔舞》，主要揭露四大家族的爪牙大发国难财，特务迫害知识分子，以及蒋汪合流等，这是一部暴露抗战时期国统区黑幕的力作。

抗敌文协会成都分会1938年成立

后，李劼人一直担任理事长，并多次以纸厂收入从经济上支持文协会及其会刊《笔阵》，他还捐款资助中共地下党油印新华社的广播稿。他主张文协就是要跟延安走，他带头参加文化界争取民主自由的签名运动。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掩护过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1948年秋，陈翔鹤在成都处境日危，由他安排在乐山嘉乐纸厂直到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李劼人历任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副主席，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成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西南军政委员会文化委员，西南文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重庆分会副主席、四川省文联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等职。从1955年到1963年，他的三部巨著《死水微澜》的修改本，《暴风雨前》的修改本，《大波》第一、二、三卷修改本相继出版。他计划在《大波》第四卷完成后，创作一部从甲午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编年史小说，还准备写历史小说《张献忠》等，他在《大波》第四卷写了12万字左右时，因病于1962年12月24日逝世。

1981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李劼人选集》共5卷7册。1982年全国文代会上，他的《死水微澜》被评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优秀作品。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了他的三部巨著。

李劼人在成都的故居“菱窠”，已建成“李劼人纪念馆”。

杨开渠

杨开渠，自号顽石，生于1902年10月27日（清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浙江诸暨县人。1920年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电机科，毕业后到杭州大有利电气公司任职员。1927年北伐军攻占杭州，他从军入东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队，不久即重回电器公司，于这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选为电气公司工会副会长，积极为党工作。后因白色恐怖，于同年7月逃亡上海，旋东渡日本，在东京经短期补习日语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农实科，靠译著的稿费维持生活与学习。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被留在育种研究室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激于民族义愤，他辞谢了教师近藤万太郎的挽留，于这年冬天回到杭州、任浙江省地方自治专修学校教员。1935年1月到重庆的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农艺科任教授，开始了水稻的研究。1936年由园林学家李超然（李驹）教授推荐，被四川大学聘为农学院农艺系教授，主讲《稻作学》，并主

持稻作研究室，直到解放。其间因经济困难，于1942年开始在川康农工学院兼任教授和农艺系主任。

1950年8月担任四川大学农艺系主任，院系调整后于1952年兼任农学院副院长。1956年8月四川大学农学院迁雅安独立建院，命名"四川农学院"，杨开渠被国务院任命为院长。因患癌症于1962年2月2日逝世。

杨开渠是中国再生稻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935年，他到四川后，见有农民利用"抱孙谷"增收，便开始研究再生稻。对稻秆各节上休眠芽的形成、死亡、萌发生长、再生蘖幼穗分化过程及其规律；秧田播种量、栽植密度、收割期、留桩高度、肥料等技术措施对再生稻芽的萌发、穗的分化、开花结实及产量的影响；不同品种再生芽的萌发及其产量差异等都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多篇关于再生稻的研究论文，后又集成《再生水稻研究》于1957年10月在中、苏、朝、越四国水稻科学技术会议上宣读，受到与会专家一致好评。他对再生稻的研究，不仅在中国开拓了水稻研究和增产稻谷的一个新领域，奠定了中国再生稻研究的基础；同时，他也是世界上研究再生稻最早的学者之一，所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为当时世界上研究再生稻的最完整而系统的论著，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杨开渠还是四川省栽培双季稻最早的研究者和倡导者。早在1935年，他根据四川的气候条件，认为部分地区可以种植双季稻，当时主持四川省稻麦改良场的杨允奎采纳了他的建议，在泸县设试验分场进行双季稻的研究，并成功地作了示范栽培，逐步在农村推广。建国后，为了增产稻谷，四川省于1956年开始大面积推广双季稻，从1955年的8万亩猛增到500万亩。杨开渠经过调查，预计产量不理想，其原因是物质准备（品种、种子、肥料、水利、药械等）和技术准备都不够，步子跨得太大了。当获悉四川省计划在1957年种植双季稻1000万亩时，他在四川省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作了"四川省栽培双季稻问题"的发言，认为四川不宜大面积种植双季稻。农业部将他的发言稿在《中国农报》上全文刊出。实践证明，四川省1957年种植的近900万亩双季稻，晚稻平均亩产不到100斤，早晚两季相加仅比一季中稻增产13斤。通过几年试验研究，结合他在1959年主持长江流域双季稻考察，1960年在川西、川南深入农村调查时所获得的资料与经验，杨开渠明确而肯定的提出长江流域应选用早、中熟水稻品种作为双季晚稻栽培品种的论点，同时还指出了各类品种适宜的播种期及秧龄期，并撰文在《中国农业科学》上发表。

他对水稻种子发芽、育秧、分蘖习性及其和栽培密度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为解决水稻生产中的关键技术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还选育出适合四川省栽培的一季稻和双季早、晚稻品种20

余个，其中《川大粳稻》被列为全国优良品种之一。杨开渠还对小麦、薯类、野生油料、花卉等进行过研究。尤其是花卉更是占据了他大多数业余时间，曾培育出300个菊花新品种，在四川大学校园和成都市人民公园等地展出，轰动一时。

杨开渠治学严谨，总是力求从大量材料所表现的多样性中去探索其共同点，找出其规律性，使得出的结论更准确和符合客观实际；他强调实事求是，从不人云亦云，即使在1958年农业到处放"高产卫星"那样的情况下，也没有放弃根据科学理论和实践所形成的观点，无原则的赞同；他注重身体力行，重视生产实际，注意总结群众的生产经验，并加以研究提高；他自奉简朴，以身作则教育干部和子女，省吃俭用捐资办学，对经济有困难的助手也常解囊资助。

杨开渠曾被评为四川大学教学模范。他还历任四川省政协常委、四川省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川西区科普协会副主任委员、四川省科协副主席，1957年被聘为中国农业科学院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1961年被选为中国作物学会第一副理事长。

杨开渠的译述和著作甚丰，据不完全的统计有近百种。反映他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的代表作已辑成《稻作论文选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他协助丁颖主编，最后由他主持定稿的《中国水稻栽培学》，也于1961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

戴伯行

戴伯行，谱名修孝，号伯行（百行），取"百行孝为先"之意。清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日（1905年5月23日）出身于河南省光山县新集镇东乡彭家村（1959年划属河南省新县）一个小地主家庭。

1920年入汝南益制中学学习。1926年入开封中州大学理预科班，毕业后考入中州大学数理系本科。旋因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三镇，学校停办失学。1927年1月，辗转至武汉报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被录取入学，编为入伍生。在政治思想上受到恽代英等中共教员的深刻影响，逐渐接受共产主义思想。

1927年3月，戴伯行奉学校派遣，与同期入学的河南光山同乡，返乡搞农运工作，配合北伐战争。以中国国民党河南省光山县党部的合法身份开展活动，组织农协会、妇女及青年组织，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6月，再赴武汉，拟回中央军政学校继续学习。步行至武汉后，才知军校学员已全部编入中央独立师，参加平定夏斗寅叛乱。因一时无法

找到恽代英，拟先加入中央独立师。还未办好手续，突发恶性疟疾，不能行动，此时中央独立师已调往江西九江，遂失去组织联系。10月初，经同乡介绍，先后到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第三科、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1928年冬，赴北平就任河北省训政学院训练部训练员，后又任河北省区长训练所教员，在课余兼任中学教员、家庭教师。在北平工作期间，读社会科学著述甚多，尤以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著述为多。

1930年11月至1937年10月，先后在山东安邱中学、莱阳乡村师范校、临沂乡村师范校任教。在莱阳乡师时，适逢"一二·九"运动发生，常为学生策划爱国活动，并曾起草爱国宣言。并与该校教师王襄一（建国初任山东省副省长）、王野（冶）秋（建国初任文化部文物局长）、何其芳（建国后任中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过从甚密，向往参加革命工作。

1937年10月，戴伯行从刊物上得知陕北公学招生消息，决心赴延安报考。11月，率一批莱阳乡师、临沂乡师学生集体步行赴延安。途经开封，经友人林孟平推荐，加入十五军刘茂恩部开办的干部训练班任教。该训练班的教员多数是中共党员，范文澜、嵇文甫等都曾在此任教。训练班中的中共党组织活动引起国民党高层警觉，开办3个月后突然改组，并迁往陕西宝鸡。随至西安后，脱离训练班。1938年4月8日，步行至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0月，经陈云过问，中央组织部调查核实，恢复党籍。学习未完，奉调抗大总校训练部政教科任助理员，分工主管教材编写。

1939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抗大总校移设敌后办学。7月10日，戴伯行随抗大总校从延安出发赴敌后。于当年10月到达晋察冀边区灵寿县陈庄驻地，奉调参加总校政治教育研究室工作。1942年2月，日伪频频"扫荡"，根据地环境恶化，总校开始向晋冀鲁豫边区转移，奉派至二分校训练部政教科任助理员。8月，升任驻校政治教员，年底提升为文化主任教员，始终负责文化教育工作，单独负责分校文化教学所用的全部算术、国语、自然科学教材的编写。其间，抗大二分校成立了附属中学，出任该校教务科副科长。旋与冀中的抗大中学合并，1942年任该校教务科长兼教导主任。1943年2月，奉命随附中向陕甘宁边区转移，4月初抵达延安，与抗大七分校合并，编为七分校二大队，留七分校校部工作。初任抗大七分校校部代理政教科长，兼授干部课，后参加干训队整风学习，兼任组长。

1946年8月，二大队奉中共西北局命令，改为西北联防军步兵学校，任校政治部主任。1947年2月，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发起进攻。3月19日夜，奉命随学校撤出延安，并担负警卫后方首脑机关的战斗任务，转入流动环境和保卫延安战斗，在陕北转战约5个月。1947年8月，保卫延安的战斗已取得决定性

胜利，奉上级命令，随校东渡黄河至山西洪洞完成培训任务，年底再返陕北。1948年1～2月，再迁河东晋绥九分区。1948年10月，步校奉命与晋绥分区的贺龙中学合并成立西北军政大学，驻山西临汾，任副教育长兼组织部部长。1949年7月，迁驻陕西王曲，大量招收新区青年知识分子入学，学校扩编为军政、财经、艺术等学校，学员达8000余人，任该校训练部长。在长期从事党的教育事业的历程中，总结出丰富的思想工作和教学工作的方法经验，为培养革命干部倾力工作，成绩卓然。

1950年1月5日，随校参加南下进军入川。1950年3～8月，就任四川大学军代表组首席军代表，组织和领导了对川大的接管工作、党组织创建工作。当年8月，调任成都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兼党委副书记。1953年4月起任川大副校长，1954～1960年11月兼任川大党委书记；1960年11月代理川大校长，后又兼任党委副书记、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其间，组织和参与了成都工学院、四川农学院的创建工作。

在四川大学工作期间，特别是在主持工作的1953～1955年、1960～1962年，学校起色大，人心齐，大局稳，在系科设置、教学、师资、科研等方面形成了特色。运用老区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工作的优秀经验，对办学目标、教学工作进行根本改革，强调在教与学中贯穿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在知识分子工作上有远见卓识，对知识分子关爱引导，有口皆碑。川大许多老教职工认为："对党的认识，是从戴校长那里开始的"。工作之余，常出入于教职工家中，亲密显于嘘寒问暖之际，平易见于谈笑风生之间。又常深入课堂调研，曾先后听过柯召、徐中舒、缪钺、胡鹏、张鼎铭、郑衍芬等老教授的课，并与他们谈诗论文，切磋教艺，交流思想。化学系教授蒋克贤去世后，他主动关心、周济其遗孀和子女。其他细微之事，不胜枚举，皆存于口碑。在"肃反"、"反右"等政治运动中，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顶住压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一批知识分子。为此，曾被错误地指斥为"右倾"，受到委屈，但毫不计较。在工作、生活上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勤恳踏实，处处以"工作第一、他人第一"为座右铭。生活俭朴，在住房、用车、家属安置上从不提特殊要求。因此深孚众望，为人敬重。

因长期艰苦工作，积劳成疾，医治无效，于1962年12月10日在成都病逝。

李亚农

李亚农，又名李旦丘。生于1906年6月26日（清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五日），江津县人。1916年，年仅10岁的李亚农随其兄李初梨东渡日本留学。他先学完小学课程后，相继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特设预科和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学习。1927年在三高卒业后转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攻读哲学。他十分喜爱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同时对文学、史学和美学也有浓厚的兴趣。

求学期间，李亚农和留日同学中的进步分子秘密阅读马列主义书报，收集传阅日本共产党的传单，成立了一个叫“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读书会组织，团结了一批进步学生。1927年，李亚农在京都帝大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日本支部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1929年，日本政府发动全国性的大检举，李亚农和沈起予等30多位中国留学生被逮捕，他被监禁达3年之久。由于监狱生活的长期折磨，使李亚农体质极度虚弱，终至不能进食，被保释出狱。不久，经好友的帮助，化装潜离日本回到国内。

1933年，李亚农来到上海，因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已被敌人破坏，他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经人介绍和通过沈尹默的关系，到北平中法大学、北平大学等校执教。1937年重返上海，任职于由沈尹默任馆长的孔德图书馆。这时，他决心从事学术研究，特别是用马列主义作指导来研究中国历史。李亚农在日本时曾对甲骨文、金文和中国古代史进行过研究，又受到郭沫若的影响，因此，他试图通过对古文字的研究进而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规律。从1937年至1941年，他利用孔德图书馆的资料，先后写了《铁云藏龟零拾》、《殷契摭佚》、《金文研究》和《殷契摭佚续编》4本古文字学专著及一些学术论文，从而奠定了他在20世纪50年代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基础。

1941年冬，李亚农中断学术研究工作，投笔从戎，奔赴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受到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的热情接待，并同他作了竟日长谈。因李亚农精通日语，熟悉日本国情，被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部长，负责对日本战俘的工作。不久，李亚农被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对日俘的教育、争取工作中，李亚农以感人的热忱和对日本历史、风俗人情及日本人民心理状态的了解，深入细致地进行感化和教育，从而受到日俘的敬重。

1946年春，李亚农调任华中建设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正当他为培养干部和各种专门人才，竭尽全力办好这所大

学之际，国民党发动了大规模内战。李亚农带领以教授为主的教职员队伍，随部队向北转移，他们突破敌人陆上的包围和海上设置的封锁线，到达当时由苏联红军占领的大连。李亚农在大连除继续进行团结、教育、救济日俘和日侨的工作外，为防止文物流散，又开设了“博古堂”文物商店，收购保存了一批包括罗振玉所藏甲骨在内的珍贵文物。

1948年9月，李亚农奉命离开大连，重新回到陈毅身边工作。他被任命为华东研究院院长，积极为日后接管上海的科学文化事业作好准备。翌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李亚农以军管会代表的身份，负责接管并主持上海科学文化机关的工作。他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华东办事处主任、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为发展上海科学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特别是为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李亚农还先后领导筹建了由他分别任会长和所长的上海史学会和上海历史研究所。

建国后，李亚农根据党的方针，在整顿和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同时，重新开始历史研究工作。他制定了宏大的计划，即通过对中国史的研究，探索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发展阶段，并根据丰富可靠的资料来具体分析中国历史发展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状况和特点。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李亚农在繁忙的领导工作和严重的病痛中，争分夺秒，坚持不懈地进行写作和钻研。从1952年开始直到病逝，10年中先后完成了5本系列的学术著作：《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周族的氏族制度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殷代社会生活》、《西周与东周》、《中国的封建领主制和地主制》，后又合编为《欣然斋史论集》（再版时改为《李亚农史论集》）。该书对中国古代的农村公社、宗法制度、土地制度、奴隶制度转变为封建制度的具体过程，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分期等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进行了探讨和论述，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受到国内外史学界注目。

1962年9月2日，李亚农因患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和肺癌病逝。

冉雪峰

冉雪峰，原名敬典，字剑虹，别号恨生。1879年11月18日（清光绪五年十月初五）生于巫山县大溪乡。少年丧父，家境贫寒，勤奋好学。15岁中廪生，19岁到成都参加乡试，因考场弊端而落第。后考取留日官费生，因故未能成行。

1907年，冉雪峰出游京沪，卜居武昌，担任上海民主报驻鄂新闻记者，创办湖北通讯社，受当时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不时撰写政论文章，抨击时弊，并参加振团尊心会任学界代表。1911年武昌起义，为军务部秘书。南北议和后，曾被黎元洪逮捕入狱，定以死罪，成为共和后因言论系狱的第一人，致国内舆论哗然。武昌首义周年纪念日，在各省代表们的强烈要求下，黎元洪迫于舆论，不得不将其释放。此后，冉雪峰因在报上披露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再次被捕入狱，押囚北京军机执法处，至1916年袁世凯死，方出狱。自此，遂抱不做官、不发财主义，弃政从医。同志中有劝其复出者，冉雪峰说："余无政治学识，破坏及建设异致，民国自我辈创之，不必自我辈安之，何能再为冯妇？况卫生即以强国，发扬至道，倡明绝学，以与欧美争衡，未始非挽回国权，拯救同胞之一助也。"

1917年，冉雪峰开始悬壶武昌中和里，医名日噪。每值疾病流行，他竭力搜罗古今医籍，深夜批阅，拟定治疗方案，写出文章，刊登医报，以供同行参考。1918年，鼠疫流行至武汉，死亡甚众。冉雪峰著《瘟病鼠疫问题解决》，制太素清燥救肺汤、急救通窍活血汤，功效显著，服此二方得救者，不在少数。霍乱流行时，著《霍乱症与痧症鉴别及治疗法》，麻疹流行时，著《麻疹商榷正续篇》。名中医张锡纯赞誉说："冉君诚近世医界之翘楚也。楚国有才，其信然乎。"

1919年，冉雪峰鉴于西医东渐，中医衰落，以复兴祖国医学为己任，遂联合同道，组织湖北省中医公会与中医学会，被选为湖北省中西医会第一届会长，并创办湖北省《中医杂志》，兼任编辑。

1920年于武昌三佛阁创办武昌中医学校，由冉雪峰私人付酬请武昌名医任教。1923年，冉雪峰复独资创办"湖北武昌私立中医专门学校"于武昌黄土坡，借陆军学堂为校址，并任校长。学生近200人，分甲、乙两班，冀以"发扬国粹，造就真才"。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编讲义、改作业、上堂讲课，学生有疑难执书请问，耐心解释，以懂为止。并设临时医院送诊施药，不独方便了贫苦群众，更使学生有了实习基地。该校培养了一大批中医人才，其中熊济川、宦世安等名医，均为冉之高足，并形成有独特学术风格的冉派医学。

1925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不许中医学校加入教育系统，冉雪峰联合山西中医学校教育长杨百城、赵意空，据理力争，使中医学校加入教育系统获得通过。1929年国民政府公开颁布中医为非法，激起了广大中医界的愤怒，冉雪峰与张锡纯结成南北同盟，反对当局扼杀中医事业的反动行径。

从1929年起，冉雪峰历任汉口卫生局考试中医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检定中医委员会委员、中央国医馆湖北分馆第四届馆长、中央国医馆医务处处长。

抗日战争期间，冉雪峰放弃了丰厚

的门诊收入，组织“湖北国医药界战地后方服务团”，任团长及中医救护医院总院副院长，并捐出多年积蓄，为抗日将士和难民看病。武汉沦陷前夕离汉，避难四川万县董家岩（今董家乡），在这期间，著有《国防中药学》、《大同药物学》、《大同生理学》、《大同方剂学》、《中风临证效方选注》等医学专著。他历来主张不同学科之间相互交流和渗透，“大同”二字即包含中西结合之意。他曾亲手制备人体骨骼标本，并绘制了数百幅人体解剖学彩图。

抗战胜利后，冉雪峰于1946年迁回汉口继续行医。1949年举家搬迁重庆。1955年任重庆市政协委员、重庆中医进修学校首届校长，从事青年中医培训提高工作，负责组织编写了第一套中医进修教材，并著《内经讲义》、《伤寒论讲义》。

1955年11月，冉雪峰奉调到北京中医研究院工作。出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高干、外宾治疗室主任，中华医学总会常务理事，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享受一等一级专家待遇。

1958年，陈嘉庚因“头风痼疾”，自服《验方新编》中的“治诸般头风”的乌头验方，因病者家属之误，遂至中毒，后经冉雪峰以扶正解毒法治之，神志渐清，病情好转。冉雪峰诊治的验案中，尚有以化裁藏蕤汤（滋阴解表法）治疗陈毅的外感病；以补充而不壅中，理气而不伤正之四磨饮治疗陈毅父亲之食滞，均获显效；中共“八大”召开期间，冉雪峰会诊过许多领导同志的疾病，傅连暲当时负责保健工作，对冉雪峰极为赞扬。这一时期，他还诊治了数以百计的外国友人，疗效显著。

冉雪峰治病，善用经方。认为经方为群方之祖。对张仲景医书尤为重视，毕一生精力，认真钻研，写成《冉注伤寒论》。此书集中反映了冉雪峰50多年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是其代表作。

1959年元旦，冉雪峰以80岁高龄，尽一月之力，写成《八法效方举隅》一书。建国十周年大庆时，又著《冉雪峰医案》。1963年1月29日因脑动脉栓塞在北京病逝。

卓雨农

卓雨农，成都人，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生于中医世家。16岁即随父卓翰屏学习中医，长进很快，内、妇、儿科皆通，尤以妇科见长。1930年其父病故，自此开始独立行医。而立之后，医名即显于蓉城，有“卓半城”之称。

建国初期，卓雨农先后任成都市第一区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医师学会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出席了川西区首届卫生工作者代表会议。1951年，就职于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1956年任该院副院长。同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1957年调成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任副院长兼妇科教研室主任。1954年，当选为四川省第一届人大代表、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60年被评为全国文教、卫生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

卓雨农治疗经验丰富，学术造诣深。他对妇科疾病论治，重在调气血，养肝肾，和脾胃，三者有机联系，相互化生。具体施治，重在调理，要在补而不滞，滋而不腻，温而不燥，清而不凝，行而不破，涩不留瘀。如养血之中，时佑丹参、益母草；滋补肝肾诸方配山药、砂仁、台乌等品，疏肝解郁。理气行滞，习选香附、木香、香橼、柴胡、郁金、金铃炭；活血化瘀常用当归、川芎、丹参、赤芍、桃仁、牛膝、蒲黄、五灵脂、红泽兰、益母草之属；温经散寒，则以桂心、台乌、吴萸、小茴、鹿角霜为首选药。他注意照顾妇女经孕产乳的生理特点而辨证用药。应用古方，则师而不泥。卓雨农继承家传并经自己长期诊疗实践的磨砺，形成了药味少、用量轻、价低廉的特点。曾受到陈毅的当面称赞。

卓雨农主持编写的《中医妇科临床手册》，为建国后第一本中医妇科专著，于1958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证治方药，大多是他的临床心得。所著的《中医妇科治疗学》（陶涵清补充修改），从病种到证型，自制方，习用方，都是他毕生经验的凝结。书中所载他常用自制方剂155首，其间多有匠心独运之处。如据清代名医傅青主“清经散”化裁，用以治疗妇女月经先期或月经过多的“加减清经散”，即以生地易熟地，取其滋阴清热凉血之功；用知母代青蒿，是因其发散而不宜；加玄参，乃深明傅氏原方“使热去而阴不伤，血安则经自调”之旨，妙在少佑丹参凉血化瘀，疏解血分热滞。又如他所拟的通脉大生片，至今仍是成都中医药大学的协定处方，广泛用于妇科各种疾病的适应证。

1958年，温江县发生流行疾病，卓雨农义不容辞参加灭病工作，在治疗上获得显著成绩。为了攻克疑重疾，他承担了组建肿瘤治疗研究组的任务，在子宫癌和卵巢囊肿的研究治疗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卓雨农对中医教育事业满怀热忱，为培养学生不惜心血，经常熬更守夜，精编教材，认真备课。常常为学生介绍学习读物，修订学习计划，审阅作业医案，指导临床疑难，并对学生的生活、健康关怀备至。学生们无不称赞他是传道授业的好老师。他主编的全国高等中医院校试用教材《中医妇科学》（一、二版），为中国高等中医妇科学教材建设奠定了基础。因辛劳成疾，卓雨农于1963年4月17日病逝于成都。

覃子豪

覃子豪，谱名天下，学名覃基。1912年1月12日生于广汉县连山乡。在广汉上中学时就喜爱诗歌，崇奉李白。1932年，他从成都成城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中法大学孔德学院，主要研究浪漫派诗人雨果及象征派诗人波莱尔等人的作品。1934年，他的诗“竹林之歌”、“我的梦”列入他与朱颜、贾芝等人合出的诗集《剪影集》卷首，当时，正值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他的诗充满了“哭泣”、“哀怨”、“忧郁”的苦闷情调。

覃子豪在北平上大学期间，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员夏奇峰、蒋代燕所组织的“读书会”，该会主要读物有《大众哲学》、《自修大学》、《世界知识》以及普列汉诺夫、卢那卡尔斯基的论著，他还阅读高尔基、普希金等人的作品。

1935年春，覃子豪赴日本，先在东亚日语预备学校进修，后进入日本中央大学。当时，中国留学生以任白戈为首、郭沫若为指导，成立了“左联”东京支部，以及各种进步团体，创办了30多种刊物，覃子豪 参加了《诗歌》社，他在《诗歌》上发表了《大地在动》、《少年军进行曲》。这时他目睹深重的国难和敌人的侵略罪行，心灵受到震撼，诗的风格也自然发生变化，为他后来的创作奠定了爱国主义与倾向革命的思想基础。他还参加了“中国诗歌作者协会”，并在《诗歌》杂志上联合签名发表抗日救亡宣言。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他从倾向新月派和象征派，开始成为时代的歌手。

抗日战争爆发后，覃子豪从日本回国。在武汉，他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活动，在《抗战文艺》和《大公报》副刊上发表了不少抗战诗歌，他在寄给重庆救国会办的《诗报》的一首名为“伟大的响应”一诗中，呼吁台湾这“美丽的岛屿”在“祖国的旗帜下”“参加这神圣的抗战”。

1939年9月，覃子豪被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派赴浙江金华前线，任政治部扫荡简报班第十四班少校主任。1942年，他担任了第三战区司令部政治部设计委员兼陆军第八十六军《八六》简报社社长。并在江西上饶发行的《前线日报》上主编《新时代》周刊，但因该刊积极抗日，为当局所不容，不久即被迫停刊。

1943年覃子豪辞去国民党军职经商，他在福建经商盈利，便在漳州创办了《太平洋日报》，以此作为其文化事业活动的立足点。1944年，他任漳州《闽南新报》主笔，1945年1月，他创办《南风文

艺社》,还主编过福建龙溪《警报》的副刊《钟声》。

抗战期间,覃子豪出版的作品有诗集《自由的旗》、译诗集《匈牙利裴多菲诗抄》、散文集《东京回忆散记》、诗集《永安劫后》。

抗战胜利后,覃子豪在上海结识章伯钧,并经章的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7年底他到台湾省担任了省物资调节委员会专员,后又任省政府粮食督导员。他赴台后不久写了诗《虹》,反映出心头的矛盾与忧愁。

覃子豪在台湾期间,编创诗歌刊物,成立诗社,培养后学。1951年,他主编《新诗周刊》,1953年10月他担任了"中华文艺函授学校"诗歌班主任,次年春加入台湾文艺协会,并与其他人一块创立了"兰星诗社",出版了《兰星新诗周刊》,还参与设立"兰星诗奖"。他的诗论:《诗的解剖》、《论现代派诗》、《新诗向何处去?》,都曾发生很大影响。他在台湾16年中,一直踏在"长桥"之上,左脚踏"起点"(大陆),右脚踏"尽头"(台湾),欲退不行,欲前不能。出版了诗集《海洋诗抄》、《向日葵》、《画廊》,在思想上较低沉,但在艺术上却渐趋精细成熟,是台湾的"诗坛三老之一",被誉为"跨海诗人"。

覃子豪在台湾孑然一身,直到1963年10月10日因癌症病逝,因无钱安葬,骨灰寄放于善导寺。1978年,诗友们集资出版了《覃子豪全集》,并将覃子豪安葬。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相继出版覃子豪的诗集,其中有《覃子豪诗选》(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覃子豪诗粹》(重庆出版社1986年出版),《没有消逝的号声》(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香港文艺出版社1987年也出版了《覃子豪诗选》。

谢无量

谢无量,名大澄,字仲清,号希范,别号啬菴。1884年6月28日(清光绪十年闰五月初六日)生于乐至县北乡金马沟农家。父亲谢维喈,号凤岗,在安徽做过三任知县。谢无量4岁时随父母至安徽,他少年聪慧好学,父母朝夕教诲,6岁作诗,8岁作小文,9岁读完了五经而学八股文,12岁时完篇。1898年浙江学者汤寿潜携女婿马一浮到芜湖,谢无量拜汤寿潜为师,受益甚大。他与马一浮志趣相投,结为知交。

1900年,谢无量为开阔眼界,由安徽赴上海,前往北京,后转太原。数月游踪所至,目睹北方人民受封建统治的种

种摧残，革命意识得到启发。1901年回到上海，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特班。学校以蔡元培为中文教授，与谢无量同班要好的同学有李叔同、邵力子、黄炎培。同时，他与马一浮、马君武在上海共同创办“翻译社会”，出月刊《翻译世界》，内容以翻译世界名著为主，同时还翻译有社会主义书籍。谢无量受新潮流的影响，投身于反清革命活动，结识章太炎、邹容、章士钊等，参加《苏报》、《国民日报》的编辑工作。1902年11月16日，上海南洋公学发生学潮，谢无量与全体学生退学。1903年7月1日因“苏报案”发生，谢无量逃往日本，补习日、英、德文。这年秋，马一浮自美国来日本，赠谢无量英文版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1904年谢无量由日本回国，应芜湖安徽公学之聘任教授。次年同马一浮游镇江焦山和杭州，在文澜阁静心翻阅四库全书及大量社会科学名著。

1906年1月，谢无量重上北京，任北京《京报》主笔，每日写社论，评论时事。适逢天津发生段芝贵以名歌妓杨翠喜赠农工商部尚书贝子载振，而获任黑龙江巡抚的巨大受贿案件。谢无量了解此事内幕，在《京报》上发表文章，揭露这一丑闻。在社会舆论压力下，载振、段芝贵被迫辞职。北京内城巡警总厅厅丞朱启钤勒令《京报》停刊，谢无量离京来到上海，与周紫廷等人创立蜀学会。

清廷废科举后，在全国办“存古学堂”七所，成都亦居其一。经学部左丞乔树枏和四川高等学堂总理周紫廷推荐，谢无量于1909年来成都，任四川存古学堂监督兼教授词章一科，同时担任高等学堂及通省师范讲席。教学之外，他还专心致力于古典文学及书法。他潜心研习历代名家碑帖，其书法兼取各家之长，既有汉魏之刚健，又含晋唐帖之秀媚，严谨处似真楷，流走处若行草，熔各家之长于一炉，独创一格，世称“孩儿体”。20世纪50年代全国名书法家聚北京献书艺，谢无量居第一流，其书法艺术愈名震中外。此外，他的诗词古雅含蓄，寓意深远，独具风范。

1912年夏，谢无量离川到南方各省游历，翌年初回芜湖，转上海。此时，谢无量为中华书局编书10余种，有《中国大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妇女文学史》等文学、哲学书籍，均陆续出版。

1917年7月孙中山在上海，慕名谢无量，特写信约见，两人谈论欢洽。孙中山正著《建国方略》，以稿征求他的意见，谢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想法，供孙中山参考。

“五四”运动前，谢无量著书大都用文言文。“五四”运动后，他经常用白话文为《新青年》写诗，同时用白话文为商务印书馆编写《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颇受鲁迅重视。在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中，各篇均以谢无量所著的《中国大文学史》、《诗经研究》、《楚辞新论》等，作为参考书多次援引作例证。谢无量著

的《马致远与罗贯中》、《楚辞新论》、《古代政治思想》等为孙中山所赞赏。

1923年3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成立陆海军大元师大本营。这时，谢无量游历来到广州，孙中山留他在广州大学任教。当时孙中山与段祺瑞、张作霖"三角联盟"以对抗曹锟、吴佩孚。这年秋，孙中山派孙科、谢无量和陈剑如为代表，持函赴沈阳会见张作霖，商量讨伐曹、吴。后赴天津，会见段祺瑞、冯玉祥、胡景翼等人，转告孙中山的旨意。

1924年5月19日，孙中山任命谢无量为大本营特务秘书，后又任参议。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25日电请孙中山北上。孙中山于11月17日由广州抵上海，邀谢无量同行。后孙中山肝病复发，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谢无量作诗凭吊。

1926年，谢无量应南京东南大学（后改中央大学）聘请，任历史系主任并教历史研究法。一学期后，他又回到上海，在中国公学任教，讲世界革命思潮课程。后来，应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邀请，于1930年任监察委员。"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谢无量在上海创办《国难月刊》，他主张改组政府，彻底抗日。1932年，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一·二八"战争爆发。谢无量非常愤慨，次日即将月刊改为《国难晚刊》，每天著文痛斥蒋介石、汪精卫的不抵抗政策，引起蒋介石集团的不满，派特务持枪到报馆寻找谢无量数次，不得逞，刊物被迫停办。他在抗日救亡的高潮声中，从全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实际情况出发，写成《四川政治经济改革方案五要点》：（一）改组四川省政府，以军民分治为原则；（二）制订以四川为中心之西陲（川、康、青、宁）经济建设方案；（三）改进四川教育，提倡固有道德，普及平民教育；（四）严密四川社会组织，利用民间固有社会组织而扩充改进之；（五）实行民兵制，由改良国防制度人手以达全民皆兵之目的。计划显示了孙中山《建国方略》对他的强烈影响。谢无量的计划并未被当局采用。

"八一三"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危及南京，谢无量于1937年12月避至汉口。次年，他应邀赴港澳讲学。原拟游历南洋，逃出蒋介石的控制，徐图救国之策。在港期间，特务又持蒋介石的手令，迫使他取道广西经衡阳，于1940年春返回重庆，旋到成都。1946年在四川大学（城内部）先修班任教，讲授汉朝以后的学术思想变迁史。

1947年，谢无量为乐至县"国大"代表，去南京参加大会，会议未结束即以病假到沪。1949年2月他由沪返渝。这时，熊克武、但懋辛等所组织的"中国公学"聘请谢无量任文学院院长。中秋后，他回到成都，直至解放。

建国后，谢无量历任川西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川西博物馆馆长、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四川省政协委员等职务。1956年1月，谢无量作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特邀代表，受到毛泽东接见、宴

请,并合影留念。同年8月,应吴玉章邀请赴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谢无量晚年倍加努力于史学、文学、经学等诸方面的研究,发表不少论文,如《再论李义山》、《纪念关汉卿—革命的戏剧家》、《诗经研究与注释》等。

1960年8月6日,国务院聘任谢无量为中央文史馆副馆长。1964年12月10日,谢无量因患心脏病在北京逝世。

吕子方

吕子方,生于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巴县人。幼入私塾,12岁就读江津县立中学堂,后转学重庆府中学堂。1913年考入上海大同学院,次年东渡日本,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攻读数学、物理、天文诸科。其间曾回国参加讨伐袁世凯出卖国家主权的宣传运动,此后即留国内,再次就读于上海大同学院。

1918年,吕子方考入英国伦敦里茨大学,仍习原学学科。留英期间,曾与彭用仪一道赴德国进行社会考察,并同往哥廷根大学,拜谒朱德及孙炳文。1923年毕业回国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厦门大学、广东大学、河南中州大学、暨南大学、成都大学等校执教。在暨南大学任教期间,曾兼任上海自然科学研究室主任、苏州工业学校三角天体测星训练班教授,制《中西对照恒星图》供学员参考。1928年与沈懋德、彭用仪等共商创办重庆大学。次年参与重庆大学建校工作,担任过该校董事会委员、教务长、训导长、理科主任等职。抗战期间,曾任重庆三十二兵工厂实验室主任,对改进枪械发蓝工艺作出贡献。1943年8月,任四川省立重庆联中校长。他亲自选择沙坪坝高家花园为校址、主持新建校舍,把该校办得有声有色。后长期任四川大学物理系教授。1951年曾应聘任北京工业学院物理系教授,翌年仍回川大。在数十年的教学工作中,培育了大批人才。因积劳成疾,1964年4月13日病逝于成都。

吕子方在教学之余,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他治学严谨,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中,精勤搜集大量科技史料,穷极专门著述,旁及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以至散见在稗官野史、私人杂记、佚文夹注等中的零星资料亦不轻易放过。在占有大量系统而又丰富的资料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并同社会科学研究紧密结合,一批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相继脱稿,取得重大科研成果。如在《〈三统历〉历意及其数源》一文中,以代

数连分数法对《三统历》的主要数据列式运算之后，证明中国早在汉代即已知求连分法，比欧洲早1683年，并确认《三统历》为中国古代优良历法之一。他用逻辑分析和化学分析的方法，研究了有关文献资料后，考证出中国在战国时期即能制造玻璃，有力驳斥了“玻璃外来说”。对《山海经》，则以科技史的角度进行系统研究，所著《读山海经杂记》中考证出黄河流域和巴楚长江流域，均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这已为近年考古发现所证实。在《天数在蜀》一文中，收录了大批古代占星术家的材料，肯定他们在早期天文发展史上的贡献。《落下闳并非黄门老工考》是对四川古代天文学家落下闳之考证，纠正了过去某些学者将其混同于黄门老工匠之讹误。数学家何鲁、史学家蒙文通等知名学者，对吕子方的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何鲁认为，《〈三统历〉历意及其数源》一文“析以新法，洞中窾要，尤能明古人之用心，使二千年之成绩焕然一新，厥功甚伟。”

1981年8月，在成都召开了“吕子方教授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遗著学术讨论会”。与会专家学者一致希望能尽快整理出版吕著，以繁荣祖国的科学文化事业。此后，《自然辩证法通讯》、《大自然探索》、《社会科学研究》等刊物，均刊载了介绍“吕著”的专文及整理研究动态。香港《大公报》发表了《李约瑟之外》的署名文章，把吕子方与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研究上的成就加以比较，为看到中国学者写出具有极高科学价值的同类著作而感到欣慰。消息传到国外，也引起很大反响。

1983年，凝聚着吕子方毕业心血的遗著中的主要部分，经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自然辩证法研究室整理，汇编成一部约50万字20篇论文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分上、下册，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气象、数学、物理、化学、航运等学科史、科学思想史和科学家传记，以及《山海经》研究等，填补了大量中国科技史研究的空白，提出不少精辟、独创的见解、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瞩目，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庞石帚

庞石帚，名俊，生于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成都人，祖籍綦江县。父务农，因贫流徙到成都作厨工，遂定居于此。庞石帚幼时勤奋好学，初读私塾，后入小学，又升商业学堂。17岁时，因家贫辍学，在姊家授外甥读，以此遂为塾师。

年二十，丧父，家愈贫困，昼夜勤学，遂患失眠之症。求医识名医沈绍九，与语相投，沈绍九便聘他在沈家设专馆，教他的义子丁沈。庞石帚刻意自学，读《书目答问》、《郘轩语》，得治学门经，博览经史诸子，旁及杂书小说，无论新旧，莫不综贯。喜做文章诗词，下笔不苟。文章不主一派，骈散皆佳。作诗于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为近。词则崇尚南宋，最喜姜白石（夔）。

24岁时，以诗向《学衡》投稿，甚得主编吴宓的赏识。赵熙看到他的诗，嘱门下人致意。庞石帚遂以诗投献赵熙，赵熙极为赞美，次韵酬答。庞石帚因对赵熙称弟子。赵熙向华阳林思进（山腴）推荐，林思进访庞石帚于新街后巷子，借荀淑的话自谦说："郭有颜子而不知"。因聘请庞石帚到他任校长的华阳中学任教。接着张重民聘庞石帚教成都联立中学，赵熙弟子向楚又推荐庞石帚为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此后，庞石帚历任成都师范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成都大学教授、四川大学教授、华西协合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光华（后改成华）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同时还兼教成都县中、树德中学。

庞石帚虽然以诗见赏于赵熙，与林思进、向楚等齐名。但他的志向却是要作一个朴学家。他治学仿朱彝尊，厉鹗、汪中、孔广森诸人，博闻广识，下笔汪洋肆恣。他很推崇《癸巳类稿》和《越缦堂日记》，可以看到他的学术趣向。

庞石帚长期担任中国文学史、文选、词选等课程的教学，而教中国文学批评为最久。他教这个课程，以《文心雕龙》及章太炎的《国故论衡》中、下卷为教材。他曾写《国故论衡疏证》20余万字，川大和华西协合大学先后都有排印本，这部书不仅对章氏原著所涉及的经史诸子以至佛典、域外之书一一为之寻根讨源，辨别是非。而且发微解惑，触类旁通，畅论自己的精辟看法。讲《文心雕龙》也上下古今，虚实并务。川大第五班学生杨明照的关于《文心雕龙》的毕业论文，便是他悉心指导的。

建国后，庞石帚讲授专家诗，以杜甫、苏轼两家诗集为教材，有些遗著，已在《草堂》等刊物上发表。

庞石帚中年以后，讲课余暇，留心宋明典籍，曾在川大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这方面的论文。晚年患严重的支气管炎，寒暖不适，即哮喘肺气肿。在知交的敦促下，1963年动手撰写《养晴室笔记》，到1964年秋冬之际，写完三卷。这时病情加重，12月，以肺原性心脏病逝世。这三卷书遂成了他的绝笔。

《养晴室笔记》总共约3万字，"纸墨丛残，无多类例"，很像范声山（锴）的《花笑廎杂笔》。内含广博，特别是有关宋明诸条，充分表现他晚年的兴会所趋，精力所萃，观点正确，要言不烦，是一本罕见的好书。经弟子屈守元整理并作序，1985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庞石帚的文章诗词优美，遗箧中遗稿累积，由屈守元编录为《养晴室诗录》及《词录》，凡诗300余首，词60余首。此外的诗文遗稿，正由其家属及门人继续搜辑中。

庞石帚非常热爱新社会。1951～1952年，他曾有将近一年时间，在重庆西南革大办的高校教师研究班学习。当时他已年近六旬，但是听课、读文件、作笔记都很认真。返川大后，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带研究生。教学科研，十分努力，还写了一些歌颂新中国建设的诗作，发表在文学刊物上。尽管屡遭极左思潮冲击，但他对于共产党的领导，新中国学术文化的前途，仍然充满信念，鞠躬尽瘁，直到逝世。

王恩洋

王恩洋，字化中，南充县集凤场水龟山人。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生于一农家。1913年考入南充中学。课余喜读宋、明理学诸儒著作，崇尚儒家思想。1915年春，日本迫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王恩洋在学校抗议会上发表知耻、自觉、自任三义演说勉励同学，并作《亡国惨》告县人。

1919年，王恩洋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继入法文专修学校做留法准备。同年底，天津学生以外交事故发起爱国群众运动，北京学生游行声援，王恩洋参加讲演，被反动军警指为肇事的首要分子之一，逮捕入狱。他在狱中读了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深感改造社会之必要。1920年4月他出狱后，抱着社会主义的思想，参加了王光祈创办的工读互助团，并任组长。不久，工读互助团解体。经此一番波折，王恩洋对接受外来思想进行社会改革产生了怀疑，决心转向佛学的探讨，经寻求解决人生及社会问题的适当途径。

时值梁漱溟在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唯识哲学和东方文化等课程，王恩洋受梁的熏陶。课余，他专攻《成唯识论》，又因他负责管理印度哲学图书室，有条件泛读有关佛教瑜珈法相的著述。

1921年4月，王恩洋经梁漱溟介绍，前往南京支那内学院谒见佛学大师欧阳竟无，提出对唯识哲学的积疑多条，欧阳竟无逐条解答，使王恩洋积疑得释，他决心继续留在内学院学习。在欧阳氏的指导下，王恩洋相继研究了大小乘各家戒本、《唯识述记》、《掌珍论》、《思益梵天秘问经》等，整理并续成欧阳竟无《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讲稿，写了《佛法真义》论文。校刊了《唯识述记》、《唯识枢要》、《唯识学记》、《唯识了义灯》、《能显慧日

中边论》、《仁王般若测疏》、《顺正理论》等诸要籍。

1925年，支那内学院得梁启超、陈铭枢诸人的赞助，创办"法相大学"，王恩洋任大学部主任，编写了《佛学概论》，精简扼要地提示了"法相"纲领和"缘生"要义，体制内容别具风格，经内学院刊行后，在佛学界有一定影响。在南洋西伯里岛经商的华侨黄联科来函云："本人感到人生的空虚，出入于东西学校而无所得，时萌自杀之念。因读此书而获解救……"此后，王恩洋多种著作的刊行和兴学活动经费，多得黄联科的资助。

1927年，法相大学因驻入部队而被迫停办。王恩洋抱痛返南充原籍，在贫病交困中研学不辍，通读了《瑜珈师地论》。1929年，他在家乡设"龟山书房"授徒讲学。次年，他应成都佛学社邀请讲学，结识了倾慕佛学的黄肃方。此后黄肃方成为王恩洋事业上的有力支持者。至1942年龟山书房结束期间，王氏的著述计有：《摄大成论疏》、《论语疏义》、《世间论》、《孟子新疏》、《二十唯识论疏》、《佛说无垢经释》、《人生学》、《老子学案》、《王国维先生之思想》、《新理学评论》、《杂集论疏》等。其中《人生学》(28万字)，糅合儒佛，以佛法为体，以儒学为用，以佛法为究竟，以儒学为过渡，形成该书的思想体系，也是他的代表作。

1942年，龟山书房结束，王恩洋应廖泽舟、陈戒予诸人之邀，赴内江主办东方佛学院。同年9月，黄肃方由成都到内江，与廖泽舟共议，改院名为东方文教研究院。1943年，王应邀到武汉大学(内迁乐山)讲授《佛学概论》、《儒学概论》，历时3月。1946年，王恩洋一面主持东方文教研究院的院务，一面在蓉、渝、自流井和泸州等地讲学。这期间，他的重要著作有：《心经通释》、《清福和尚传》、《实有真空中通了义论》、《孔子学案》、《孟子学案》、《荀子学案》、《新人生哲学》、《人生哲学与佛学》、《金刚经释论》、《因明人正理论释》、《儒学中兴论》等。其中，《孔子学案》、《儒学中兴论》中儒学倾向比过去置重，《实有真空中通了义论》对汉藏佛教教理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王恩洋以上著作同前述龟山诸作，由文教院汇集编号总辑为《文教丛书》，在内江出版发行。文教院应中央图书馆之请，将《文教丛书》分赠英国远东非洲学院、大英博物馆东方图书馆本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各5部。此外，还将全书赠给来访的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

1951年秋，文教院交川西行署接收。王恩洋先后任川北行署政协顾问、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及四川省政协委员。1957年～1960年，他应北京中国佛学院邀请讲授《佛学概论》。在京期间，他托上海佛学书局将1942年完成的巨著《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疏》复印了200部作资料保存。1961年因病返成都，1964年2月5日病逝。

伍非百

伍非百，初名伍程骥，蓬安人，生于1890年1月23日（清光绪十六年一月三日）。13岁中秀才。旋科举停，乃走读于合川实业学堂。他见闻日广，接触新思想渐多，遂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为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国而奔走。

1913年伍非百被选为第一届四川省议会议员。会上，他与国民党议员一起，为选举议长，与胡景伊所把持的共和党展开激烈斗争。胡投靠袁世凯，力图消灭川中的国民党势力。8月4日，熊克武，杨庶堪等人在重庆宣布独立，举兵讨袁伐胡。伍非百积极参加讨袁之役。旋熊、杨失败，胡景伊大肆逮捕国民党人。伍非百潜赴上海，但因与党人失掉联系，难以在沪久留，仍回蜀中。

不久，川中军阀混战，伍非百报国无门。他考虑欲以文化救国，为社会作出贡献。于是在家埋头读书，刻苦钻研先秦诸子之学，尤其潜心攻读名学名篇。但以经济拮据，生活日绌，乃以在实业学堂所学育蚕种、植桑苗等技艺的所得而维持生计。无钱买书，则往返数十里就借于藏书家，或借阅，或抄录，勤奋学习，坚持不懈。他全面整理《墨子经上下、经说上下》，数易其稿，阅七年而成《墨辩解故》（初名《墨子辩经解》），1922年在北京中国大学晨光社出版。在墨学研究中，他富有创见，受到当时学术界的赞赏。梁启超在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评价说："伍非百著《墨辩解故》，从哲学科学上树一新观察点，将全部墨经为有系统的组织。"而伍非百并不以此为满足，1924年收回版权，重加修订。并研究撰写《墨辩校勘记》1卷，附于《墨辩解故》之后，以备阅读者检寻核查。同时，伍非百对《公孙龙子六篇》进行校释，从而写成《公孙龙子发微》初稿。初稿一大半为陈柱的《公孙龙子集解》所采录而与读者见面。伍非百又进一步钻研墨子、尹文子、庄子、荀子等有关名学的篇章，研究范围日益扩展。

1926年，张澜任国立成都大学校长，聘请伍非百担任教授，主讲墨子、公孙龙子等课程。1931年，伍非百赴南充，任嘉陵高中校长。适逢学校经费来源日益减少、影响师生情绪。伍非百毅然到当地驻军会见军长杨森，详为申述后，学校经费困难得以缓解。

1933年，伍非百受聘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同时，他又以同盟会员兼学者身份，应国民党考试院之聘，任该院参事与考选委员等职务。但他平生志趣却在于学术研究。他多次至苏州谒见章太

炎，研讨墨经与先秦诸子之学。他又与海内学者如四川廖平、山东栾调甫、南京张纯一等人，或书函往返，或时相过从，互相探讨。他陆续撰著：《墨子大小取章句》、《尹文子略注》、《庄子齐物论新议》、《荀子正名解》、《形名杂篇》、《邓析子辨伪》，合前著《墨经解故》与《公孙龙子发微》，全稿8种，总称《中国古名家言》，约40万言。伍非百因此成为著名的名学学者和墨学专家。

抗日战争发生后，国民政府西迁，伍非百举家返蜀。1938年冬，他弃职寓居于南充西山。1941年，他在南充创办西山书院，聘请名流，相与研讨讲习于其间。他在讲学之余，对其著作再次校勘修订。1948年，他将书稿在南充自费刊印100部，分送国内大专院校及著名学者，此书得以全面问世。

抗战胜利后，伍非百与南充有识之士，以西山书院为基础，创办川北文学院。当时正处于解放战争高潮，中共地下党员与进步师生，在院内进行革命活动，伍非百竭力保护，深得师生们的赞佩。

建国后，伍非百被委为川北行署委员。1950年，川北文学院与川北农工学院（原在三台）合并，改称为川北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伍非百任副主任委员。1952年冬，行署撤销，成立四川省人民政府，伍非百由南充调至成都，任省政府委员，并担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同时，他还兼任四川省政协委员、省人大代表及民革四川省委常务委员。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改聘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1965年3月，伍非百患脑溢血逝世。

伍非百为名学研究，整整经历了50年，直至死后，还留下《中国古名家言》3种修改中的稿本。凡涉及名学的篇章，他都全面地加以整理、编次、校勘、诠释、辨伪，进行通盘研究，熔多种治学手段于一炉。在名学研究上，他将名家放在先秦诸子争鸣的大 论战中作全面考察、紧紧抓住他们之间正、反、合的杂复关系，从中探索古名家言的精义要旨。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拨乱反正，落实政策，伍非百得到平反。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名家言》。

伍非百性情豁达，平易近人。无论与师友相叙，或与学生言谈，和蔼可亲。他平时亦爱好诗文，晚年曾著有《东维子文集校注》、《铁崖乐府校注》及诗文等，尚未付梓。

赵少咸

赵少咸，名世忠，成都人，祖籍安徽休宁，其先辈游宦四川，遂家于此。1884年10月9日（清光绪十年八月二十一日）生于成都。少时就学于成都名儒祝彦和（祝为中国著名文献学家，贵州独山莫友芝高足），奠定了良好的语言文字学基础。

1904年，赵少咸入四川高等学堂学习，在校期间，与张培爵、李培甫等缔结反清组织（后来该组织称为“乙辛学社”）。当时会府东街的赵宅是志士仁人集会的地点。袁世凯窃国后，大肆搜捕革命党人，他牵连入狱，被关押了两个多月。在狱中时，仅有《说文解字》一书相伴，他朝夕默诵，开始走上了研究语言文字学的道路。

1918年，赵少咸出任四川省立第一中学校长。从此先后执教于成都联合中学、成都高等师范、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主讲音韵、文字、训诂等课程。

抗日战争爆发后，赵少咸受黄侃生前推荐应聘于内迁重庆的中央大学，在沙坪坝红槽房赁屋而居，继黄侃后在中央大学主讲语言文字学，前后达5年之久。

20世纪40年代初，赵少咸应四川大学之聘回到成都，任中文系主任，同时又是研究生的指导教授。

建国后，因年近七十，赵少咸在四川大学主要担负培养中青年教师的任务和进行科研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赵少咸家中70余箱藏书及大量手稿，连同他女婿殷孟伦（山东大学教授）的80余箱书籍全被红卫兵劫去。当时赵少咸年逾80，正卧病在床，目睹此景，十分伤心，在同年12月21日含恨去世。

赵少咸生活极有规律，每天天未明即入书房，天一黑就寝，从不熬夜工作。治学勤而有恒与博闻强记是其特点。他常常以抄书来帮助记忆，不少的人曾见过他将整部书誊抄，仅《广韵》他就誊抄过两部。对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他能够成段背诵。蜀中知名学者林思进赠他的诗有“《玉篇》过目洞厥疵，《广韵》口诵如流水”之句。

赵少咸执教近50年，受业者众。当代学者如李一氓、徐仁甫、郭君恕、刘君惠、周法高、殷焕先、李孝定、钟树梁、余行达、李运益等，皆出其门下，连同他的女婿以及儿孙辈，多执教上庠，有不少的人还是海内外知名学者。赵少咸注重教书育人，对学生既严格又宽松。严是督导学生不松懈，他指导的研究生连寒假中的作业也安排得满满的；宽是指他的为人厚道坦荡，不摆师尊架子，不以专家

长者自居，弟子受业在融和的气氛中进行，就是外地学子来川，登门造访他时也一视同仁，热情接待。他不拘陈规，为了让弟子们随时请教受益，在家中特设过一间教室，备有黑板、桌椅等，星期日照常开讲。

赵少咸治学承传乾嘉学派，服膺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讲究根柢之学，推崇“以声音通训诂”的研究语言文字学方法。他的教学与科研是以《广韵》为核心，上考古音，下及等韵。在近代学者中，他和章太炎、黄侃均有交往，学术观点较为接近，属中国传统的研究语言文字学学派体系。据传黄侃有“50岁以前不言著述”的自律条例，赵少咸也是如此。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他开始发表很有分量的文章。《斠段》载于《学林》月刊，对段玉裁《说文注》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批评；《史籀篇疏证辨》载于《四川大学文学集刊》第二期，对王国维关于《史籀篇》的看法多有驳正。除此之外，他的著作少有印行出版者。然而就其一生来说又是著作等身。有待整理付印的约有800万字，其代表作为遐迩闻名的300余万字的巨著《广韵疏证》。

《广韵疏证》是针对中国现存完备而又较早的一部著名韵书《大宋重修广韵》（简称《广韵》）完成的研究成果。全稿引用了大量的文献，对《广韵》的纵横关系和内部规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起，赵少咸已开始搜集有关《广韵》及研究语言文字学的资料。1934年9月，他路过南京晤见黄侃，黄侃建议他以《广韵疏证》为题著书立说，还说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的各家音义就是证明《广韵》音系的好材料，又提供刘履芬过录的《释文》14家校本为参考。直到1960年，《广韵疏证》始告完成，分订为30册（其中2册为“索引”），校正了《广韵》的讹误近4000条。书前“叙例”对《广韵》和版本、命名、分部、同用、反切、四等、引书、段校《广韵》八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可惜浩劫之后残存仅8册计60韵（全书206韵）。20世纪80年代后期，赵少咸的家属及学生开始整理出版《赵少咸集》。《广韵疏证》一书由他的学生余行达等整理，补已亡146韵，南京大学程千帆教授已将序文写成。另外，赵少咸还有巨著《经典释文集说附笺》（亦约300万字，原订30册，今残存8册），以及《广韵谐声表》、《毛诗韵例》、《毛诗韵谱》、《赵少咸先生小学论文集》、《古今切语表》、《唐写本切韵残卷校记》、《唐写本切韵残卷校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校记》、《韵目表补》、《读书札记》、《说文解字集注》、《故宫博物院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校记》等。

等韵学是音韵学中极为深奥的部分。赵少咸晚年著有《等韵浅说》，深入浅出地解释了等韵学上的各种术语和概念。他一生中还指导学生校勘、研究了许多等韵学著作，如《韵镜》、《通志七音略》、《切韵指掌图》、《四声等子》等。

蓝 田

蓝田，字子玉，生于1888年10月27日（清光绪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郫县人。1906年入四川铁道学堂学习，1909年转赴唐山路矿学堂深造，专攻土木工程。1916年夏毕业后，即以毕生精力投入铁道交通建设工作，一直到去世，长达50年之久，是中国从事国内铁路建设较早的一员。在旧中国的33年中，相继在四郑铁路（后改称四洮铁路）、奉海铁路、杭江铁路、成渝铁路筹备处、浙赣铁路、粤赣铁路、湘桂铁路、叙昆铁路、川康公路改善工程处、交通部铁路测量总处和成渝铁路工程局等处工作。历任公务员、工程师、工区主任、总段长、线路勘测总队长、处总工程师、工务处长等职。建国前夕，任成渝铁路工程局副总工程师。

蓝田早年即在国内铁道工程界享有声誉，特别是在铁路选线方面卓有成绩，被称为老资格的选线专家。1932年和抗战胜利后，他怀着为桑梓服务的满腔热情，两度勘测修筑成渝铁路。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路局官僚的营私舞弊，虽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时断时续开工达十余年，但直到解放前夕，仍然寸轨未见，使他既愤慨又失望。在苦闷之中。他以作诗画、篆刻自娱，并从佛学中寻求精神寄托。

新中国成立后，蓝田先后被任命为西南铁路工程局巡视组主任、西南铁路设计分局线路勘测队队长、宝成线广略段总体设计负责人、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设计总工程师、院副总工程师等职。共产党的尊重和信任，使他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他后来回忆说："直到1949年解放，我的整个工作和生命，才从许多破灭的幻想中获得希望，那时刚好度过了我62岁生日，从那以后，我才能开始做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工作。"

在铁路勘测设计工作中，蓝田最擅长选线，有不少独到之处，在确定一段新线时，他总是反复实测、研究和比较，从各种方案中选择最佳方案，既要保证工程质量，又要争取为国家节约投资、简化工程量、节省材料。1950年初，新中国还处于百废待兴的时候，国家就把修筑成渝铁路列为重点建设项目，立即上马。年过花甲的蓝田带领勘测队，在沿线各地作了一次精确的勘测。成渝铁路成都至乱石滩段，原定路线是从成都北门外起，经过金堂赵家渡、淮州至乱石滩，全长72公里，这段线路必须经过淮州凉水井一带（沿沱江一段），那里地质不良，又是一个大塌方地段，对以后安全行车有很大影响。蓝田反复实测，多方收集资

料，把各种方案进行比较，力排众议，果断提出从成都经洪安乡越柏树坳，沿石板河下至沱江边接乱石滩的改线方案。新线不仅使铁路避开了原定路线的不良地质地段，保证了行车安全，还缩短线路23.8公里，从长远看，每年又可为国家节省大量的运营费。这个方案经铁道部审查后，被采纳实施。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正式通车，这是新中国所建成的第一条铁路干线，在国内外引起重大反响。根据蓝田建议所改的那段新线，在当时曾被誉称为“蓝田线”。

成渝铁路勘测任务完成后，蓝田又立即投入了天成铁路（后改为宝成铁路）和成昆铁路的勘测工作。1951年，在领导勘测天成线南段一高线工程时，蓝田和另一工程师郭彝发现1950年测定的线路是沿山谷蟠延，高出地平线达90米，还要修建50米以上的高架桥和几处大隧道，工程十分艰险。他们带领勘测队多次实测之后，根据实际情况向上级作了报告，又召集技术人员共同讨论，认为应将线路的坡度提高，用双机牵引，这样就可以避免修建1500米长的隧道及50米高的填土工程，高架桥普遍降到20米以下。时任铁道部副部长的吕正操和铁路工程局的负责同志也亲自参加研究，解决遇到的各种困难。最后测定的现宝成线南段新线，与1950年的线路相比，降低了离地面高达90米的悬岩路线90余公里，避免和降低了60米高的桥梁7座，共长1471米，减少了山谷高架桥3600米，减少土石方580万立方米和御土墙92.5万立方米，避免了1公里以上隧道2座，缩短线路31公里，并达到了铁路干线的标准要求。综计可为国家节约1.2亿元（折合新人民币）的巨额工程建筑费。

1952年在踏勘并草测成昆线时，蓝田呕心沥血，在长1000余公里，宽200多公里的范围内，进行实地勘测，踏遍了沿线所有山沟，寻找最薄垭口，终于选出沙木拉达隧道的越岭方案，奠定了成昆铁路线路方向和技术标准。

蓝田不善辞令，但作风平易近人，长于集思广益，从不摆老资格。为了在有生之年为国家作贡献，不顾年迈、不畏艰险，忘我地工作。他带领勘测队，冒着寒冬酷暑，爬高山、涉急流，长年出没在深山野岭之中，深入到人迹罕至之地，为了勘测到理想的路线，有时一天要徒步往返七八十里。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蓝田处处以身作则，辞谢上级对他的照顾，同年轻人一道，攀山越险，风餐露宿，坚守在工作的第一线。一次他在作比较线时，不慎跌伤肋骨，医生要他休养一月，但他带伤不离现场，直到任务完成。

由于蓝田在铁路勘测设计中作出重大的贡献，早在1951年，他就被评为全国铁路劳动模范。从1954年起，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2月18日病逝于成都。

彭家元

彭家元，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生，金堂县人。父彭任勋，系清秀才，以塾师为业，长于诗文。胞兄彭家珍炸毙清宗社党首领良弼，当场壮烈牺牲，被孙中山大总统追授为陆军大将军。

彭家元自幼从父读书，1912年入成都高等学校预科。1913年，北京政府以"总统府顾问"酬报烈士之父，彭家元随父入京，第二年考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1920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立大学、伊里诺斯州立大学、爱荷华州立大学以及阿利瓦大学学习、研究，专攻土壤、肥料学，获农学硕士学位。学习期间，半工半读，在农村、工厂、餐馆、家庭都做过工，备尝艰辛。

1924年回国后，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1926年南下，先在厦门集美农林学校任教，1928年应聘任广东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兼农业化学系主任，主讲土壤学、肥料学、土壤微生物学及土壤改良学等课程。他讲课循循善诱，引人入胜。所编《肥料学》一书（193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当时全国大学丛书之一。他与邓植仪合编的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材《土壤学》，也是全国大学最早编写和出版的土壤学教科书之一。1929年与邓植仪创办"广东土壤调查所"，彭家元兼任技正，这是国内较早开展土壤调查研究的单位，在广东中山、南海、三水等20多个县进行分县土壤调查，出版土壤调查报告10余册。1934年，又与邓植仪、陈方济等倡议成立了"中华土壤肥料学会"，并与邓共同主编《土壤肥料学报》。这一时期，彭家元发表了20多篇颇有影响的科研论文，其中《广东土壤中氮系固氮菌之分离及研究》，是中国研究固氮微生物最早的一批论文之一。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培养了土壤学家多人，如茹皆耀、陈祥、张守敬等。

1937年，彭家元因批评中山大学校长邹鲁而被解职，旋受聘任武汉大学教授。1938年回川任四川省稻麦研究所（其后为四川农业改进所）技正兼农化系主任、农事总场场长。任职期间，对四川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做了大量的工作。该所在内江城郊建立了全国最早的水土保持实验区，同时，为增加四川土壤的磷肥，第一次在成都建立了骨粉厂。从1946年起，彭家元任四川大学农学院院长，直到解放。

彭家元返川后为四川土肥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后来的四川省农科院副院长陈禹平便是他科研方面的助手，由他俩名字命名的"元平菌"是当时著名的成

果之一。在教学方面，土壤学家侯光炯、蓝梦九先后是他的助教，农业化学家孙羲曾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科研工作，都受益匪浅。

建国后，彭家元继任四川大学农学院教授兼土壤农化教研组主任，同时兼任全国土壤学会理事、四川省农业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第三届四川省政协委员。在教学工作中，他诲人不倦，奖掖后进。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新调来三位助教担任土壤学、肥料学实验工作。由于实验资料缺乏，彭家元把自己保存的国外资料供参考用，并耐心辅导，使他们不仅完成了教学任务，有的还成了专家。1956年，学校独立建院，从成都迁雅安。为了联系实际，彭家元不顾年老，带领土壤农化教研组部分教师去二郎山考察。对不同类型的垂直带，亲自指导鉴别土壤。一路上看土壤剖面、打土钻、访问农民、分析化验，饥食干粮，夜宿道班。彭家元编有《土壤学附地质学基础》、《土壤管理与改革》讲义；与孙羲共同编写的《农业化学》教科书，1963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

“文化大革命”初期，彭家元被诬陷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长时间的批斗，精神和肉体备受折磨和摧残，于1966年9月3日去世。1978年3月14日，中共四川农学院委员会为彭家元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举行骨灰安放仪式。

刘世楷

刘世楷，号仲则，生于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万县人。早年就读于成都府中学堂、华阳县立中学和公立四川农业专门学校。后赴北京，于1917～1922年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部，并在北京中央观象台气象测候练习班任练习生，后任观测员，同时在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研究科学习。毕业后曾在安徽、山东、四川、吉林等地任中学教员。1929年～1931年任吉林大学讲师。1932年后，历任四川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华西协合大学、川康农工学院、东北工学院、华北大学工学院、辅仁大学等校教授。建国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其间，于1940年到1942年曾任成都石室中学校长；1945年至1950兼任四川省气象所所长。1922年加入中国天文学会，是该会发起人之一，后被选为中国天文学会北京分会理事。

刘世楷十分重视实践和科学普及工作，并取得重要成就。他提出天球坐标概算法原理，并据此设计出“天球坐标概算仪”，经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张钰哲台长等审查，受到好评，认为可简捷地

换算地平、赤道、黄道各系坐标及解决球面三角问题，在天文教学和天文测量上都有一定作用。他还研制出“太阳概算仪”和“新式活动星图”，前者可概算各地各时所见太阳出没的时刻、方位、中天高度、昼长、晨昏蒙影以及各日各时太阳高度、方位角等；后者除可供认识星座参考外，还可概测各日各时恒星及太阳的方向高度、各日的两种晨昏蒙影、太阳和恒星出没时刻方位。他还创办了吉林大学测候所、实验室，四川大学测候所，为教学和科研取得第一手资料，创造了有利条件。

刘世楷一生著述丰富，发表了《天球坐标概算法及其应用》、《七曜历的起源—中国天文学史上的一个问题》、《从天象与降水的相关概推二十五年间中国水旱的趋势》等多篇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论文。专著有《四川气候》（为四川省第一部气象学专著）、《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略》、《现代天文学年表》等。译作有《普通实用天文学》、《航空天文学》、《趣味的化学实验法》等。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世楷受到残酷迫害，于1966年去世。

能　海

能海，俗名龚学光，字缉熙，绵竹县汉旺场人，生于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幼年读私塾。1900年到成都东大街恒升通匹头业商号当学徒。《辛丑条约》签订后，外侮日亟，他矢志报国，1905年考入四川陆军学堂速成班。毕业后任康定张蓬山镇守使部管带。1909年任云南讲武堂教官。次年返川任团长兼川北清乡司令，1914年袁世凯设置将军府，他应调入府。1915年前后赴日本考察政治和实业，半年返京，在北京大学听张克诚讲授佛教哲学，萌出家之念。1916年6月，将军府废，他应刘湘之请，任驻京代表。1917～1925年，他在成都创办佛经流通处，深得刘成勋支持，并提供场地、经费。龚学光佛理益精，出家之念益炽。1924年在儿子出生40天后，毅然同程昌祺一道去涪陵县天宝寺出家为僧，法名能海，字阔初。1925年春，能海赴新都宝光寺从贯一老和尚受具足戒，由佛源法师任羯磨师。

能海出家后，曾阅北京雍和宫藏经目录，遂决意赴藏学密。1926年赴康定、理塘学习藏文、菩萨、比丘、密乘诸戒及《菩提道次第》、《具舍论》等，并经灌顶，受度母等密法。后返成都大慈寺、文殊院讲经。1928年初在昭觉寺举办法会，继赴重庆讲经，筹集数千元，下半年

赴西藏为康萨入室弟子，学《现观庄严伦》兼及显密诸法。1932年经印度回国。1933年先后在成都文殊院佛学院、佛学社、大慈寺讲《心经》、《具舍论》、《华严经十地品》，听众每座达一千四五百人。

1934～1936年能海先后在上海佛教净业社、觉园班禅纪念堂、山西太原、五台山、重庆等地讲经。同时译出《大威德十三尊仪轨》，集成《比丘戒集颂》、《定道资粮颂》及《菩萨道次第科颂》，并集出《皈依发心摄要颂》。由弟子集他讲录为《三皈依观初修略法》，经他校阅后出版。

1937年春，能海应山西太原海子边佛教会会长力空和尚、山西省主席赵戴文等邀请去太原讲经说法。“七七”事变后，他回成都入近慈寺，先后修法堂、住房、宗大师殿、藏经楼、护摩坛、沙弥堂、译经院，成为内地首创黄密根本道场。

1938～1939年，能海先后在绵竹祥符寺、德阳崇果寺、成都佛学社、文殊院、昭觉寺、重庆、巴县、自流井、彭县龙兴寺举办法会和说法、传戒。并发愿重修龙兴寺舍利塔。

1940年，西藏康萨格西愿来内地弘法，能海亲往拉萨迎请。并随康萨仁波卿学密乘诸法，得传承衣钵。康萨格西因病未能来川，能海携《宗喀巴三父子集》等数十函以及法器等于1941年10月回成都近慈寺。

1942年，能海在近慈寺举行大威德金刚大灌顶20余日，四众云集。他还主译《大时轮上师相应法》。1943年赴绵竹开办西山云悟寺，作为专修之所。是年译《大威德生园次第秘密伽陀》、《三尊胜赞供养饮食观行仪轨》、《清净法身天香供养法》、《水陆供施仪》等。

1949年12月，能海住云悟寺，热忱接待解放军入藏代表，他亲自督促近慈寺交公粮、退押。1951年10月，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1952年10月出席中国佛教协会筹备会议。同年12月出席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1953年春，他在五台山选清凉桥三昧律师道场故址，重建律宗道场，定名吉祥律院，任住持。秋，赴京参加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大会，当选为副会长。1955年4月，出席在新德里举行的亚洲和平会议。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他坚决拥护政府的政策措施。他曾当选为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一、二、三届山西省政协委员，一、二、三届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一、二届山西省佛教协会会长，五台山佛教协会会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罹其厄，仍坚持撰写《阿含经学记》。1967年元旦圆寂。一生译著及弟子集录笔记近70种。

张德成

张德成，1886年12月11日（清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生于巴县走马岗。1岁时不幸丧父，随母流徙自流井投亲靠友。

张德成7岁就拜在宗吉山（艺名白甘蔗）门下学川剧，工小生和正生。10岁开始到成都至万县的各县市搭班演出，艺名“小偏褡”。尽管他饱受流离贫困之苦，换嗓时，因败嗓连跑龙套也遭人嫌弃，但他并未动摇对川剧艺术的执着追求。他刻苦勤奋的钻研，从前辈艺人宗吉山、黄炳南、曹俊臣、叶炳臣等人那里学到许多宝贵的艺术经验，在表演艺术和唱腔方面得到不断提高和发展，他常以“学无止境，艺无尽头”自勉。

他二十六七岁后嗓音逐渐恢复，步入中年时，他的表演、唱腔已近炉火纯青，驰名于宜宾、泸州一带。在泸州演出时，当地举人温筱泉对张德成极为赏识，在艺术修养上给张以指点，成了张德成在艺术上的良师益友。

1934～1945年，张德成辗转于重庆“萃芳荣园”、“章华”、“又新”等舞台演出，名声日益响亮，被誉为川剧艺术的生角泰斗。这期间他主演的戏有《龙凤剑》、《扬州恨》、《辕门斩子》、《杀家告庙》、《双金丹》等，他在川剧舞台上塑造了一系列刚直不阿，凛然正气，爱国为民的忠臣义士形象。他演唱的《双金丹》、《盗白旄》、《困夹墙》等，经唱片公司灌制成唱片。他还从理论上将自己从艺数十年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写出《川剧内影》、《川龙蜀虎》等著作，阐述了“戏曲的特点主要是在于唱上”，研究戏曲，“首先就应该从它在唱或音乐方面的特点来研究起”的理论。他在写作《川剧内影》一书时曾受到一些人的讥诮，说他是自不量力。他为了传统的文化艺术遗产能发扬光大，以坚忍不拔的毅力，一个人收集资料，八方奔波，埋头钻研终于完成了《川剧内影》的写作。

抗日战争期间，张德成还担任了中国戏剧协会的理事和陪都分会（重庆）理事长。他还与艺术界同仁组织了陪都演员协会，协会成立时，郭沫若、田汉、阳翰笙等应邀到会并讲了话，郭沫若还应张德成之求为《川剧内影》作序，序曰：“中国戏剧保存曲调之丰富者，闻以川剧为最。近年时代巨变，伶工零散，已存者复有坠失之虞，识者忧之。张君德成，斯道名宿，就平生实地经验，撰成《川剧内影》一书，于舞台布置、唱工、做工等叙之甚详，此固为伶界友人之宝典，即我辈说民间艺术形式之艺术者，亦应有所引村，故乐为之序，以传于世。”郭沫若还观看了张德成演出的《孝儒草诏》，对他塑造的

方孝儒舞台形象给予很高的评价，并赋诗一首相赠：

凌威一代明成祖，骨鲠千秋方孝儒，
纵使舌根能断绝，依然有口在吾徒。

抗战末期，川剧艺术濒于绝境。1945年张德成一气之下离开戏剧舞台，闲居在家。

抗战胜利后，张德成因思想进步，接触中共在文艺界的领导人和民主人士而家室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搜查。他还盖章保释过中共地下党员屈楚等人。1946年内战爆发后，文艺界革命人士撤离重庆时，他亲自前往送行。

重庆解放后，张德成受文艺界领导邵子南邀请，重新登上川剧舞台。1950年他担任重庆市戏曲改进会主任，并被邀请为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

1951年张德成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并赠送他一件黑呢大衣。他参加了1952年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会演，并获文化部颁发的二等奖。他还先后担任过重庆市实验川剧院院长、西南川剧院副院长、四川省川剧院院长、四川省川剧学校校长、重庆市川剧院院长、四川省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政协常委等职。

1958年冬，张德成到北京演出《孝儒草诏》、《文公走雪》、《单刀会》等戏剧，并被拍为舞台戏曲纪录片。他还亲自挖掘整理出传统剧目《元宵错》，参加过现代戏《不准四害过元宵》的编写。

张德成在生活上一贯简朴，每月除留30元生活费外，全部存起来买公债，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将1000多元积蓄全都捐给重庆市川剧院党组织。

张德成步入晚年，他决定研究总结川剧中的高腔并撰写《川剧高腔乐府》一书，他的想法和打算得到四川省文化局和重庆市文化局的赞许和支持。1962年4月，他开始着手《川剧高腔乐府》的著述，省市专门派了四位对川剧音乐有研究的同志为他记录整理。张德成以古稀之年不辞辛劳的查找资料，考证核实，走访演员。将数以千计的高腔曲牌从名称、性能规格、用法上一一从理论上进行阐述。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终于完成了70余万字的初稿，1964年12月《川剧高腔乐府》问世。这是张德成一生舞台实践经验结合向川剧界内外的师友们的请益中而得出的成果。

《川剧高腔乐府》完成后，79岁高龄的张德成还计划将《论川剧表演艺术》和《回忆师傅》这两部记录稿整理编写出来，后因体弱多病，未能如愿。

“文化大革命”中，张德成横遭迫害，1967年12月16日含恨逝世。“四人帮”垮台后，他的冤案得以昭雪。

苗勃然

苗勃然，成都人，1910年（清宣统二年）出身于一书香门第。幼年丧父，由祖父抚养成人。他先读私塾，后考入成都青年会附设英文学校，又转入大成中学。

1925年，苗勃然考入四川美专普师科，次年转学西画。1928年秋，他只身赴上海，考入刘海粟主持创办的上海美专。1931年毕业后，他参加了“木刻讲习会”，这是鲁迅提倡新兴的木刻运动而在上海“一八艺社”内成立的，由日本美术家内山嘉吉讲授木刻技法。1931年冬，苗勃然回四川途经贺龙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湖北洪湖时，参加了红军的工作，在湘鄂西苏维埃文化部担任《工农画报》、《红旗画报》的美术编辑，后来由于敌人“围剿”，处境艰险，苗勃然服从安排，告假返家。

1933～1935年，苗勃然在重庆艺术专科学校担任西洋画科主任和教务主任。1935年秋，他返回成都，先后在南虹艺专、东方美专、西南实用艺术职业技校、协进中学等校任教。1946年他在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任副教授。

苗勃然一生追求进步，富有民族正义感。“九一八事变”后，苗勃然和上海美专的进步同学一块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抗日。他回川后又与进步版画家张漾兮等人组织“四川漫画社”，以漫画为武器抨击日寇，宣传抗日，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1938年，他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敌人的追迫下脱党。1943年，苗勃然经张漾兮、吴汉家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建国后，苗勃然担任了四川美术学院绘画系主任。他擅长水彩画，博采众家之长，自成一家，充分发挥水彩薄和透明的特点，突出整体效果和笔触的奔放，水分的饱和酣畅，别具风格。抗战时期，他曾在成都举办个人水彩画展，作品大都是农村风景和城市面貌，表现手法细腻，追求真实，博得同行赞誉。建国后，在教学、行政工作之余，他还深入农村、工厂、工地，创作了不少反映祖国新貌和建设成就的新作品，其中《缙云山》选入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的《水彩画选》（1961年）；《码头》被选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的《水彩画选》（二集，1962年）；《长江大桥工地》、《静物》亦发表在《美术》杂志上。

1964年，四川美协在重庆鹅岭公园为他举办了个人画展，其作品还在当年参加了“四川、湖北水彩画联展”。20世纪60年代以前，全国高等美术院校使用的透视学教材大都是三四十年代的旧著，不太适应现代美术教学的需要。苗勃然根据绘画实践的需要，理论联系实际，编著了5册《绘画透视学》教材，经过

试讲，效果良好，受到师生的好评。苗勃然从教几十年，为四川省美术界培养了不少的人才，其中很多人已成为美术界的骨干。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苗勃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遭囚禁，1967年9月含冤去世。

罗广斌

罗广斌，忠县人，1924年11月出身于成都一个官僚家庭，其父为前清秀才，其母作过中学校长。他的异母长兄罗广文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成都解放前夕，在郫县两路口起义。罗广斌在成都建国中学读书时，与罗家关系较深的共产党员马识途成为罗广斌政治上的启蒙教师，帮助他认识到应该怎样走自己的路。为了抗拒包办婚姻，摆脱封建家庭的羁绊，罗广斌毅然出走，到昆明求学。

1944年初，罗广斌进入西南联大附中，性格开朗的他很快就和许多进步青年交上朋友。名教授闻一多、华罗庚的子女是他的同班同学，他成为闻、华两家的常客。他天资聪明博学强记，对自然科学、航模、篆刻、演讲、球类运动有着广泛的兴趣，群众关系也很好。1945年，他在昆明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青社”，在“一二·一”学生运动中，担任了西南联大附中壁报联主席。因在学运中引起了敌人的注意，组织上安排他去了滇西建水县健民中学。1947年6月，他在重庆又参加了中共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并在重庆学生“反内战”学运高潮中担任西南学院系联会主席，而后他又服从组织安排，去盘溪民建中学任教，并负责地下刊物《反攻》的印刷工作。

1948年初，党组织派他去秀山，以教中学为掩护，准备开辟武装斗争据点。临行前，中共重庆地下学运领导人江竹筠、刘国志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8月底，罗广斌奉命回成都和家庭恢复关系，以便对任国民党兵团司令的长兄罗广文进行统战工作。9月10日，由于叛徒的出卖，罗广斌在家中被捕。他被捕后，军统驻蓉站站长周迅予亲自审讯他，并动员其父出面劝降，要他为他母亲着想，罗广斌要他父亲转告母亲：“就当没生我这个儿子好了。”敌特将他用飞机押送重庆后，1949年7月，特务头子又安排他父亲和他晤面，声称只要他不再参加政治活动，即可释放，罗广斌当即大义凛然地回答：“办不到！”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罗广斌先囚于渣滓洞一号牢房。在狱中，他因与别的

同志传递信息而被戴上镣铐。1949年春节，他积极参加狱中战友为庆祝解放战争胜利而秘密筹办的春节联欢活动。春节那天早上，他最先在牢房中唱起了《乌云遮不住太阳》。不久，他又被转囚于白公馆，在那里，他参与了发行《挺进报》的工作，及一系列秘密对敌斗争，由于得到许多老同志的信任，他了解到很多重要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入狱中后，罗广斌和陈然等人秘密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期待着解放那天打着这面红旗冲出去。敌人加紧了屠杀，他崇敬的老同志谭沈明、文策慷慨赴义的演讲，许晓轩烈士临刑前向党留下的遗言，以及刘国志烈士作的《就义诗》，一次次地使他热血沸腾，准备献身。他牢记陈然牺牲前的嘱咐一定要沉着、冷静，坚持最后的斗争。

1949年11月27日，集中营的特务们对革命志士的屠杀进行到深夜。这时，人民解放军正向重庆胜利挺进，敌人为了集中力量尽快将渣滓洞的被囚者杀掉，将白公馆的特务大部调往渣滓洞，罗广斌趁机说服了看守杨钦典交出牢门钥匙，放出尚存的19人，组织大家越狱，从白公馆侧门冲出去，钻进紧靠监狱的松林，在黑夜的掩护下他们当夜全部安全脱险。

建国后，罗广斌参加了“杨虎城将军暨一一·二七被难烈士追悼会”的筹备工作，并参加了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后来，他担任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重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重庆市青联副主席。他以革命先烈在重庆集中营中进行英勇斗争的事迹为题材与刘德彬、杨益言合作写出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该书一出版，发行量即达328万册之巨，在全国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此后，他又与刘德彬、杨益言合作，开始了小说《禁锢的世界》的写作，并于1957年写出初稿。

1958年11月，共青团中央负责同志向罗广斌传达了广大青少年强烈要求他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反映狱中革命斗争的愿望。罗广斌怀着渴望表彰先烈，揭露敌人的强烈情感，承担了这一光荣任务。

小说《红岩》的创作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半脱产情况下进行的，他不仅一再努力消化自己熟悉的大量生活积累，还访问了数以百计的老同志、知情人，查阅了上千万字的文字档案材料，他为了确切把握小说描写的特定环境，曾站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展厅里，面对那些“不许照相，不许抄录”的展柜，把毛泽东、党中央指挥全国解放战场的一些重要电报手稿，一字一句的研究比较，在心头默记下来。他还从烈士牺牲前留下的话语中，去寻取最准确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他经常每天写作十六七个小时，经过几次大改、重写，废弃了原稿二三百万字之多，最后他与杨益言合作完成了一部40万字的长篇小说《红岩》。该书以“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敌我斗争为主线，对

当时国民党统治区阶级斗争作了全貌的描写，以狱中斗争、重庆城内的学生运动和地下工作、农村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三条线联系为广阔背景，形成纵横交错的斗争场面。小说塑造了一个在极艰险的环境中坚持斗争，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战斗集体，成功地塑造出一批深入人心的英雄人物形象。这部小说于1961年底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第一次出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被称为“震撼人心的共产主义教科书”。在国内先后发行了720万册，在国外被译成日、德、朝、越、英、蒙等多种文字。还先后被改编成电影、话剧、歌剧、舞剧等多种形式的文艺作品。

正当罗广斌积极参与《红岩》续集的准备工作，并搜寻了上千万字的文字资料，将执笔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7年2月，受尽残酷折磨的罗广斌被迫害致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罗广斌得以平反昭雪，《红岩》又再版问世。

王兆荣

王兆荣，字宏实，秀山县人，祖籍江西。生于1887年7月29日（清光绪十三年六月九日）。1905年考入成都东文学堂，1907年毕业后，获公费赴日本留学。次年抵日，先后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和熊本第五高等学校学习。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曾短期归国。1912年夏，再赴熊本五高复学，于1915年毕业。经选拔，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政治系攻读。1916年冬，与同学陈启修、吴君毅、周昌寿等发起组织“丙辰学社”，并于次年刊行《学艺》杂志，发表各种思潮的争鸣文章，以期学术强国。

1918年，为反对段祺瑞政府出卖国家主权与日本签订《中日陆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王兆荣被推为“留日学生救国团”干事长，他领导救国团发出抗议宣言及救国主张，寄上海各报发表，并电告欧美留学生一致声援。救国团的行动，受到日本当局镇压，王兆荣等数千留日学生愤而辍学归国。王兆荣回到北京后，领导救国团积极宣传“抗日拒约”，并联络各大专院校学生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赴天安门请愿。后又南下上海，建立救国团机构，创办《救国日报》，积极宣传反对中日军事协定。

1920年秋《救国日报》被迫停刊后，王兆荣投身教育事业，受聘任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教务长。次年8月，代表学校参加“国立北京八校教职员联谊会”，得识李大钊，不久加入李组织的“民权运动大同盟”。1923年出任安徽法政

专门学校校长。1924年辞职赴上海，与郭沫若、何公敢、周昌寿等筹建学艺大学。1925年秋，学艺大学成立，先设文学院。校董事会聘王兆荣为校长，郭沫若为文学院院长。次年学艺大学停办后，王兆荣全力投入学艺社工作。该社以学术报国为宗旨，影响日增，不少教授、学者纷纷加入、国内部分大城市及欧美等地均有分社成立。先后出版发行了《学艺杂志》、《学艺丛书》、《学艺汇刊》、《学艺论文集》等。1931年春，王兆荣应中国公学校长马君武之聘，任该校总务长。

1931年11月，原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国立成都大学和公立四川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成为当时全国13所国立大学之一。经张澜推荐，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32年2月任命王兆荣为国立川大第一任校长。5月2日王兆荣到校就职后，立即着手整顿川大校务，努力推进学校各个方面的发展。他首先为筹措经费、改善办学条件而多方奔走。到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省政府切实保障川大的办学经费，在盐税款项下拨足。但在军阀混战下，学校经费不可能照数兑现，王兆荣每年都要派出多人赴重庆、自贡等地接洽提款事项，一催再催。1934年2月，他亲赴重庆与盐业公会谈判提款，后又多次到重庆接洽经费划拨手续。他还两度赴京，向教育部和财政部请求增加学校经费。经艰苦努力，川大的办学经费终于列入国家预算中，取得和其他国立大学一样平等的地位。

1932年刘湘、刘文辉为争夺四川霸权的"二刘大战"爆发。11月16日，刘文辉、田颂尧两军在成都展开激烈巷战，川大校本部所在的皇城一带成为主战场。经王兆荣与向楚等冒枪林弹雨同交战双方交涉，达成次日上午停火半小时，使被困师生300余人得以安全转移南较场理学院。1933年9月，刘湘决定变卖川大皇城地产以筹集军费，引起川大师生强烈反对。王兆荣领导全校师生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与刘湘进行了激烈而艰苦的斗争，在社会各界和舆论的支持下取得胜利，维护了学校的生存。

王兆荣在任校长4年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川大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他对学校进行了初步整顿，建立各种规章制度，严明纪律，使刻苦求学的校风得到发扬；又大力充实教师队伍，续聘了周太玄、林思进、刘绍禹、张鼎铭等一批知名教授执教；支持组织各种学术团体，鼓励出版学术刊物；完成了川大院系及附中、附小的调整统建工作；学校的实验设备及图书馆的规模和水平都有较大的提高。以上措施为合并后的川大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发展基础。《国立四川大学一览》(1935年)在评价王兆荣的办学业绩时说："他筚路蓝缕，奠定基础之功，均啧啧尚在人口。"

后因学校面临各种困难和军阀的压迫，王兆荣心力交瘁，于1935年8月辞职。此后曾任四川省临时参议会参议

员，乐山乐昌实业公司总经理，私立成华大学校长，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川北大学文学院院长、代理校长。

建国后，王兆荣历任川北大学教授，川北行署参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参事室副主任，四川省中苏友好协会副总干事，第一、二、三届四川省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四川省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团结委员、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副主任委员。1968年3月10日病逝于成都。

蒙文通

蒙文通，名尔达，生于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10月，盐亭县人。5岁入私塾，所读四书五经、诸子之文，不两年，多能背诵。其伯父蒙裁成，热心地方教育事业，倡办新学。1906年，蒙裁成受聘任成都府学教授，蒙文通亦随之来成都。旋进入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同学中有郭开贞（沫若）、王光祈、李劼人、周太玄等人。在校期间，蒙文通阅读了《辖轩语》、《书目答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文解字》等书，读书渐入门径。

1911年，蒙文通被选拔进入四川存古学堂（后改名为四川国学学校），先后担任校长的有谢无量、刘师培、廖平、宋育仁。蒙文通在校，得经、史诸大师之教，学业精进，所写论文《孔氏古文说》，曾刊于《国学荟编》。此文辨旧史与六经之别，从而探今、古文之源流，是为后来《经学导言》、《经学抉源》专书问世之先声。

1918年以后，蒙文通由成都返回家乡盐亭，在金顶场老家办学，招收邻里亲友子弟，教读经史，为家乡培育出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

1921年，蒙文通受时任重庆联中校长的伯父蒙裁成之邀，先后执教于重庆联中和省立重庆女二师。此间，得见钱穆所发表的《先秦诸家论礼与法》一文，惊其宏旨，遂寄书钱穆共论学术。

1923年，国内学术界于今、古文之争，展开激烈论战。有鉴于此，蒙文通离开重庆，东走江浙，访求时贤，欲以探讨同、光以来经学之流变。至南京后，曾拜谒章太炎。后得识佛学大师欧阳竟无，探问唯识法相之学，深感用治经之法以研佛典之重要，遂入欧阳在南京所办“支那内学院”，潜心研习佛家哲学。在院内，与同窗好友汤用彤、熊十力、吕澂、王恩洋等朝夕相处，谈古论今，相得益彰。蒙文通所写论文《支那禅学考》、《唯识新罗学》，皆深得欧阳竟无之赞赏，并将《支那禅学考》刊于院刊《内学》创刊号。

1927年，蒙文通写成《古史甄微》，并于1929年初次刊布。此书是他的成

名之作。他在书中虽力破三皇五帝体系，但却未把女娲、燧人、伏羲、神农、共工、祝融等传说一概摒弃，并进而据之以探索上古历史真相。同年，蒙文通一度回川，执教于成都大学及成都师范大学等校。1929年重赴南京，留教于中央大学。次年再度返川，仍受聘于成都大学。1931年因反对当局强行将三大校（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愤然离开成都，去河南开封，执教于河南大学。此间，常为文阐述周秦两汉学术思想之变迁。又曾撰写《天问本事》，探讨邹鲁、三晋、荆楚文化之本源。

1933年，应汤用彤之邀，蒙文通赴北京，与钱穆同执教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先后写成《犬戎东侵考》、《秦为戎族考》、《赤狄东侵考》、《古代民族迁徙考》诸文（后整理合编为《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于1958年出版）。1935年，蒙文通移居天津，教授于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时有学界败类，大肆鼓吹"中日提携"者，多次找蒙文通，许以重金，意图诱请蒙为撰此类文章。其时，蒙文通携家小7口，经济拮据非常，但对此类人之邀请，早察其意，遂严词相拒。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京津陷落，为避日伪纠缠迫害，挈家由塘沽乘外轮南还。

蒙文通返川后，除任教于四川大学外，还曾先后执教于成都华西协合大学，三台东北大学，直至全国解放。其间，于1940年应四川省教育厅长郭有守之邀，出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这一时期，蒙文通先后完成《周秦民族史》、《中国史学史》、《古地甄微》、《儒学五论》、《周代之商业》、《秦之社会》、《汉代经济政策》等专著和论文。《儒学五论》是他研究儒家思想之结晶，其中以《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尤为重要。他以史学家的角度对儒家思想进行历史的考察，跳出了前此学者就经学以论经学的窠臼。蒙文通对道家思想也有较深研究，深通道藏，曾与省图书馆同仁辑校《老子》注，前后计成：严君平《道德指归》、王弼《老子注》、成玄英《老子义疏》、李荣《老子注》等10余种数十万言。

建国后，蒙文通任教于成都华西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后，改教于四川大学，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曾先后担任成都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民盟成都市委、四川省委委员。此间著述甚丰，陆续完成了《中国封建地租》、《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论熙丰变法》、《宋代的商税》等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他尤致力于论述和撰写西南地区古代民族史和地方史，《巴蜀古史论述》等相继脱稿。从1964年起，全力投入撰写《越史丛考》。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备受迫害，写作极为艰苦，此书初稿草成，还未及修改定稿，便于1968年6月病逝。《越史丛考》成为他绝笔之作。

《越史丛考》经其子蒙默整理，于

198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获四川省第一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该书备受学术界的关注，评论认为，“这是解放后第一部专门考证了越史的著作，对越族的族源、分布、种类、变迁、征战和社会发展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缜密的考证和深入的探讨”；“既全面系统地探讨论述了百越民族史，又于泛论中重点突出，始终针对着陶维英越族古居扬子江以南整个地区之臆说”；“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学术专著，它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古代史研究的一个方面达到了新的水平”。

周太玄

周太玄，原名周焯，号朗宣，后改名周无，号太玄，赴法国留学时即以号行。1895年1月20日(清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于新都县。祖籍河南祥符县。先祖周亮工，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学者，大量著作因文字狱被毁，现在流传下来的仅有《赖古堂诗钞》、《书影》等。其父周棫曾任四川新都、峨眉等县典史。他很重视子女的教育，周太玄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造诣与其家学渊源有着密切关系。

1909年周太玄考入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郭沫若在《反正前后》中曾这样写道：“王光祈、魏嗣銮、李劼人、周太玄诸人都是我当时的同学，前三位是丙班的同班。在当时都要算是佼佼者。太玄在诸人之中最年青，……他是翩翩出世的一位佳公子……他多才多艺。据我所知，他会做诗，会填词，会弹七弦琴，会画画，笔下也很能写一手的好字。”据周太玄称，他曾深受该校校长刘士志的进步影响，“在他的庇护之下，……颇能读到许多海外寄来的革命刊物”。当时的《国粹学报》中所刊载的文天祥的《集社》、岳飞、郑所南、张苍水、翟式耜等人的豪气磅礴的诗歌都曾激励他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

1911年，周太玄毕业于分设中学堂，他于艰难竭蹶之中，毅然奔赴上海、考入中国公学政治经济专门部。毕业后即在上海《民信报》任翻译、编辑等职。后至北京，任《京华日报》、《中华新报》编辑和中华通讯社通讯员。他和同在《京华日报》做编辑工作的好友王光祈都深切感到，军阀统治黑暗腐败，列强觊觎宰割，风雨如晦，民族灾难深重，社会改革势在必行。这时他结识了在北京大学任教并主编《晨钟报》副刊的李大钊，彼此过往甚密，感情契投，一致认为，必须“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

变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于是,“少年中国学会”这一组织,在他们中间逐渐酝酿成熟。

1918年6月30日,在北京顺治门(即宣武门)外的岳云别墅召开了由李大钊、王光祈、周无(即周太玄)、陈淯、张尚龄、曾琦、雷宝菁7人参加的发起人会议,决定王光祈任书记、李大钊任编辑,年纪最轻的周无任文牍。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在“五四”时期会员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极大的进步社团正式成立了。该学会在国外的会员以旅居法国者为最多。1921年3月27日成立了巴黎分会,周太玄当选为书记。南洋、东京、纽约等地会员均由巴黎分会联系。

1917年,经吴玉章介绍,周太玄加入了华法教育会,积极学习法文以备赴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于1919年1月18日召开,为了尽快地向国人报道巴黎和会的真实消息,周太玄于这年旧历正月初一即前往法国。他在征得吴玉章的同意,并在华法教育会倡导者之一的李石曾支持下迅即办起了巴黎通信社。

由于中国代表团所提出的取消“二十一条”和列强在华特权的要求被帝国主义国家否决,中国国内形势一触即发。“巴黎和约”又肯定日本侵夺中国山东的权益,北京政府代表团准备签字。“巴黎通信社”最先将这一消息传回国内,由各报披露出来,不久,便爆发了“五四”运动,北京政府被迫拒绝签字。

1919年底,周太玄又开始创办《旅欧周刊》,并筹办《华工周刊》,次年,《华工周刊》改为《华工旬刊》开始出版。《旅欧周刊》为周太玄主编,其中大部分文章是他所写。该刊大量刊载了宣传讨论勤工俭学、工读主义、华工状况以及社会改革等反映新思潮的文章。《华工旬刊》由周太玄、李立三、赵世炎一起创办,是主要反映华工生活的刊物。这期间周太玄结识了周恩来、陈毅等。

1920年,周太玄结束了刊物的工作,进入法国南部的蒙彼利埃大学学习博物学。1924年毕业,获教育硕士学位,迅又进入巴黎大学研究院。这期间曾在法国科学院、法国动物学会、生物学会的刊物上发表过许多研究报告、论文和所绘详图,并解决了细胞器—高尔基体的染色问题,从而确切地证实了它的存在。加以他对腔肠动物尤其是对水母研究的成就,1930年被授予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直到1949年苏联出版的《下等动物胚胎学》中还引用了周太玄的图和叙述,足见其当时达到的水平。

1930年他应成都大学校长张澜之聘回国,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动物学讲座的名义同时在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任教。1931年三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他又被聘为教授、理学院院长兼生物系系主任。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四川军阀又在成都展开激烈的巷战。周太玄对

现实社会深感失望。1936 年再度旅欧进行科学考察，曾为《大公报》、《国闻周报》撰写过多篇文章，对积弊日深的社会进行了抨击。归国后开始暗暗研究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学习俄语，为救国救民进行新的求索。

1948 年至 1949 年期间，是旧《大公报》新生的时期，周太玄曾致函王芸生，指出："未来一二年是整个国家重大转变之年，……希望《大公报》能以新的姿态出现……"继之，周太玄担任了香港《大公报》顾问并主持社评委员会工作，对该报言论开始站在人民一边作出了贡献，在统战工作方面，也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1950 年他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和文教委员会委员，并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此后继任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委员会委员直至去世。1951 年 9 月任四川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 年 9 月任重庆大学校长、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1953 年调北京，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常务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副局长、局长，中国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自 1955 年开始又兼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一级研究员。此间，他曾组织人员从鸭绿江口到北海市对中国沿海地区水母分布进行了普遍的调查，此外还参加了国际合作的调查，为中国此项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填补了国内水母研究的空白，被称为中国腔肠动物研究的鼻祖。

周太玄作为中国科学出版社第一任社长，为建立新中国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综合性自然科学出版社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主持编辑出版了《世界科学译丛》、《中国动物图谱》、《动物志》、《建国十年科学成就》等许多具有较高水平和较大影响的科技书籍。为中国科技出版事业和科学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周太玄一生勤于著述，并十分重视科学普及工作。留下来的有七部关于生物学的著作，重要的有《Chrysaora 生活史之研究》、《动物心理学》等。译著有 11 部，重要的有《达尔文以后生物学上诸大问题》、《人的研究》、《人的科学》、《物种》等。此外他还撰写了大量的科学论文，科普书籍，教育、文学、哲学、宗教等方面的评论和大量的政论文章。他的长篇科学论文《瞻望人类的未来》，引起科学界的瞩目。他还翻译过法国著名诗人爱米尔·德巴克斯和保罗·凡尔勒仑的诗作，是将保罗·凡尔勒仑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他的《诗的将来》对诗歌理论也作了重要的探索。他的诗歌《过印度洋》曾广为流传，脍炙人口。他有一些诗歌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中，为他赢得了很高的诗名。

周太玄曾于 1953 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历任该党北京市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委员。

1968 年 7 月 23 日周太玄在北京病逝。1978 年 12 月 22 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骨灰安葬仪式。

夏云瑚

夏云瑚，原名桢莲，号云瑚，重庆人。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生。1922年毕业于广益书院商科，为谋生计进美孚洋行当职员。因他自幼家贫曾被迫辍学当童工，身受厂主工头的欺凌，不愿为洋人当奴才，1926年被提升为美孚洋行驻万县总管时，毅然辞去厚禄之职，用积蓄办了一个自产自销的家庭手工业社。以后先在重庆开办渝孚冰厂，又在成都与人合资开办青羊冰厂，获利不少。

1929年，上海美商环球影片公司通过重庆环球电影院经理吴铁生向西南发行影片。吴很赏识夏流利的英语和干练之才，委派他驻沪办事，专门挑选外国和国产影片，对重庆、成都、昆明统一租片排片，统一经营。

1936年，夏云瑚在重庆经营国泰大戏院，他看到电影业有发展前途，即通过商业关系联络蓉、渝电影院，组成了上江影片公司，任副经理。夏云瑚在经常往返渝沪各地的同时，结识了在上海的左翼电影工作者蔡楚生、柯灵等，受到他们的影响，在排片、宣传和经济上，特别照顾国产进步影片。抗日战争时期，他与人合作成立了重庆亚洲影片公司，专向西南发行苏联影片。1938年十月革命节期间，重庆放映《列宁》、《夏伯阳》等电影时，他不顾特务之威胁，请人画了一幅夏伯阳巨幅油画像，挂在其经营的国泰大戏院门口，以扩大宣传。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上海最后一批撤退的进步影人组成上海影人剧团，夏云瑚受蔡楚生等的委托，护送该团赴川作抗日宣传。该团取道南京、芜湖到武汉，历尽艰难险阻，乘民生公司民贵轮于10月5日抵重庆。这时，夏云瑚无资金，只得靠借债来维持全团开销。他安排好全团人员的食宿和排练场所，又腾出国泰大戏院晚上的黄金时间专供剧团演出。自10月27日起在渝公演月余，演出了《芦沟桥之战》、《沈阳之夜》、《流民三千万》、《放下你的鞭子》、《醉生梦死》和《汉奸》等话剧50余场，盛况空前。该团旋改为职业剧团，由夏云瑚主持内外事务。

影人剧团于12月3日抵成都演出，上演《芦沟桥之战》、《沈阳之夜》等抗日爱国戏，观众踊跃。这期间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三请名演员白杨赴宴被婉言谢绝，在上演《流民三千万》时，严借故封闭剧场，限三天驱逐影人剧团。此时，夏云瑚一面将著名女演员疏散掩护起来，另方面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指责严啸虎破坏抗日救亡宣传。后经中人调解，以

影人剧团更名，白杨更名，不上场为条件，才使这场风波平息下来。影人剧团更名为成都剧社后，于1938年元月16日起相继演出了社会讽刺喜剧《醉生梦死》、抗敌话剧《汉奸》，不久，白杨即登台主演《日出》，轰动全城。此时，严啸虎以高价挖走演员来整垮剧团，但绝大多数演员不为金钱所诱，他们团结在夏云瑚周围，坚持演出，使严的阴谋未能得逞。同年4月，当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到蓉巡回演出时，夏云瑚等即加入该会，人才荟萃一堂，演出了一大批高水平的进步话剧。

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建立的联华影艺社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电影阵地，拍摄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上集《八年离乱》，在全国获誉甚高，但缺乏资金，影响扩大阵地。昆仑影业公司是夏云瑚和任宗德在战后合资经营的，但缺乏创作人员和剧本。这时夏云瑚促使了两家电影公司的合并。在合并筹建期间资金奇缺，夏投资占筹建初期投资总数的51%。1947年6月，联华与昆仑合并，仍名昆仑影业公司，夏任总经理兼厂长，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下集《天亮前后》，夏任制片人。至1949年冬，昆仑共拍摄了《万家灯火》、《关不住春光》、《丽人行》、《希望在人间》、《三毛流浪记》、《乌鸦与麻雀》等10部影片。在国统区的文化斗争中，这些优秀影片以质量胜数量，战胜了反动派的黄色影片，昆仑影业公司成为战后进步电影的核心和阵地，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48年，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夏云瑚以同乡身份掩护阳翰笙，在危急关头机智地与特务周旋，终使阳脱险安抵香港。不久，夏也携家小转移，在香港筹建南国影业公司，拍摄粤语片《珠江泪》，受到香港及内地粤语观众的欢迎。

新中国建立初期，夏云瑚在香港、印尼、美国等地经营电影事业，在印尼时与华侨黄兴创办飞鹰影业公司，拍摄了《三个女性》等15部故事片。

1957年，夏云瑚回到北京，次年起任中国电影发行总公司顾问。他在任期间谦虚谨慎，努力工作，到华南、西南、中南等地的城市和农村调查研究，对影院经营管理、服务质量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夏云瑚遭到诬陷迫害，于1968年12月6日含冤病逝。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8月25日得到平反昭雪。

孙维世

孙维世，女，又名光英，南溪县人。1921年出身于革命家庭。父亲孙炳文，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27年被国民党杀害，母亲任锐早年投身革命，是中共老党员。孙维世在兄妹五人中行三，自幼深受革命熏陶和教育。

孙维世刚满14岁时，任锐就把她托付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化名李琳，先后加入东方剧社、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学习，不久开始登台表演。孙维世在进步话剧《醉生梦死》（后改编拍成影片《摇钱树》）中饰女主角，初露才华。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上海沦为“孤岛”。孙维世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队，随队来到武汉。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去延安，因她年纪小被劝阻。孙维世伤心地哭着走出办事处，巧遇周恩来办事回来，经周恩来询问，才知道她就是老战友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周恩来、邓颖超将孙维世收为义女，在这一年里就把她送至延安。不久，中共党组织又找到任锐，送到延安与儿女们团聚。初，孙维世与任锐同入抗日军政大学，大家称任锐为妈妈同志，当时在延安传为佳话。后来孙维世又转入党校、马列学院学习。1938年孙维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秋，为了配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宣部主持演出了多幕话剧《团圆》，孙维世积极参加演出，获得成功，成为她走上革命戏剧艺术道路的新起点。

1939年夏，周恩来胳膊负伤，中共中央决定送他到苏联治疗，孙维世随周恩来、邓颖超到莫斯科。周恩来的病稍好后，便开始工作，孙维世根据周恩来的口授整理函电、起草有关文件，并参加摘抄资料等工作。她白天忙工作，晚上则抓紧时间刻苦自学俄语。周恩来病愈回国，孙维世留俄，于1940年初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不久，考入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敌机经常侵扰莫斯科，孙维世在极不安定和粮食供不应求的艰苦条件下坚持学习。1941年10月，战火逼近莫斯科近郊，学校被迫停课，中国留学生也被安排回国。孙维世不愿放弃刚开始不久的学习，要求留下，随几位同学向东撤至乌法市，暂时进入党校学习。

1942年初，莫斯科会战胜利，她回到莫斯科，继续在戏剧学院表演专业和导演专业学习。她坚持5年学习，于194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然后，回到延安。她先参加土改工作，然后调华北联

合大学文艺学院工作，不久又编入联大文工团随军在陕西、山西、河北等地做文艺宣传工作。这时，她成功地导演了具有民族形式的秧歌剧《一场虚惊》。后来随军参加了解放太原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她随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联，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孙维世担任翻译组组长。1950 年春，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组建，她担任第一任总导演，直到 1956 年。1950 年文化部委托她筹建中央实验话剧院，相继担任副院长、总导演，当选为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孙维世是中国第一位在苏联学习、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的专家，她在学习民族文化艺术遗产、借鉴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发展中国话剧表演艺术方面作出了贡献。她先后导演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钦差大臣》、《万尼亚舅舅》、《大雷雨》、《求婚》、《同甘共苦》、《汾水长流》和童话剧《小白兔》等十多台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中外名剧。

1954 年，孙维世兼任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干部训练班的班主任，这是一个高层次的训练班，参加学习的都是全国知名的导演和演员。这个训练班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导演骨干。

1964 年，她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深入东北大庆油田，创作了六幕话剧《初升的太阳》，并亲自导演，在北京公演后，获得好评。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许多来历不明的人要孙维世交代有关陈毅、朱德、萧华以及王进喜等人的“问题”。孙维世坚持革命立场，顶住巨大压力，始终一言不发。1968 年 3 月 1 日，江青利用她已窃取的权力，逮捕了孙维世。在狱中她坚强不屈，受尽精神和肉体上的种种折磨，于 10 月 14 日被迫害致死，并被消尸灭迹。打倒“四人帮”后，文化部艺术局于 1977 年举行“声讨四人帮迫害孙维世同志罪行大会”，为孙维世彻底平反昭雪。

孙维世的翻译作品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导演课程》、《一仆二主》、《第二次爱情等》。

袁丽华

袁丽华，女，1930 年出身于成都市一个小商家庭。两岁丧父，由舅父家抚养。她在初中毕业后，考入成都女子师范学校。1948 年，成都市小学教师上街游行请愿，反饥饿，反迫害，要求当局改善小学教师生活、工作条件。女师出动声援，袁丽华是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女师毕业后，袁丽华走上了小学教师的岗

位。

成都解放后，袁丽华在党的培育下进步很快，1951年1月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年底，袁丽华调到龙江路小学、担任班主任并教语文课。由于她刻苦钻研业务，虚心请教，大胆创新，不断进取，所以教学效果很好，在多次公开教学中都取得成功，受到学生的欢迎和省、市、区教育部门领导的好评。

1952年8月，袁丽华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在教学中她十分重视语文基础训练，注意结合语文课的特点，运用富于形象化、启发式的数学方法，通过课文分析讲解和阅读，培养儿童的想像力和语言思维能力，以加深儿童对课文的理解和记忆。

在十几年的语文教学工作中，袁丽华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教学经验，有很高的教学艺术水平。她上语文课，情景交融，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使听课者产生强烈的共鸣。许多年过去后，她当时的学生仍能绘声绘色地再现袁老师讲课的情景。《人民日报》、《四川日报》、《成都日报》、《人民教育》、《四川教育》等报刊曾多次刊登袁丽华的教学经验和先进事迹。《人民中国》杂志还向国外介绍了她的优秀事迹；196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袁丽华著的《怎样培养儿童读写能力》一书，总结了她语文教学中的一些经验；省、市广播电台多次播送了她的那些脍炙人口的语文课教学录音。她讲授公开课时，几乎每天都有校内外的教师、领导来旁听，教室坐不下，就搬到附近单位的大礼堂去。

袁丽华注重教书，更注重育人。她十分注意在语文课中贯穿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注意培养儿童从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在课外，她也十分重视对儿童的品德培养，使儿童从小养成热爱劳动、遵守纪律、艰苦朴素、爱护公物的良好习惯和品德。袁丽华关心、爱护学生无微不至。班上每个学生的生日她都记得，每个孩子10岁生日的时候，她都要向他们祝贺，送上一本书或一个笔记本，并在上面写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谁的父母出差了，她常三天两头去照看；谁的家庭经济困难，她就给买铅笔、文具盒，还发动全班同学互助；有一个学生脚受伤了，家里又没大人，她就早晚亲自用自行车推他上学；有时还晚上去学生们家里看是否按时睡觉。她以师德、母爱润育着孩子们成长。她刻苦坚持自学，白天没时间，常常是晚上家访之后自学至深夜，当她已是很有名气的语文老师时，都没放松过学习。假期，她从不虚度，总是通读教材，读文学作品，钻研儿童心理学。她订购了多种政治、业务刊物，认真阅读，写了许多读书笔记；苏联专家在成都讲学，她从不缺席；遇上经验丰富的教师，她总是虚心请教，从而使自己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对于备课，她更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无论工作多忙，她总是挤时间在一星期前备好课。

每天清晨、傍晚或节假日，她常在房间里反复地朗读课文，有时还对着镜子审视自己的教态。为了获得最佳教学效果，她从不倦怠地去观察了解学生的习惯、爱好、进步与接受能力，并作好教学笔记。还满腔热情地帮助学校新来的年轻教师，无私地奉献自己的经验。凡和她有过接触的教师，都强烈的感受到她热情、朴实、“艺精而不骄，名高而不矜”，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袁丽华也有家庭、孩子。她白天上课、工作，晚上家访、学习。只有星期天才生上一个炉子，给丈夫和女儿做上些可口的饭菜。她太忙，能给丈夫、女儿的时间实在太少。

由于袁丽华在教育工作上的卓越成绩，党和国家给了她很高的荣誉。她先后被选为成都市第一、三届党代会代表，市第一、二、三、四、六届人代会代表；她出席了1953年全国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出席了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工作会议和1960年全国文教群英会；1952年以后，她曾多次被评为省、市、区的优秀教师；1960年被命名为全国“三八”红旗手；1963年被四川省教育厅批准为小教特级教师。

袁丽华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中受到残酷的迫害与非人的折磨，1968年她38岁时，带着满腔悲愤与世长辞。1978年，袁丽华的沉冤得到昭雪，恢复了名誉。

张 颐

张颐，字真如，又名唯识，谱名润金。1887年8月11日（清光绪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生于叙永马岭乡一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自幼即参加田间劳动，并由父兄教读。1906年，张颐得亲友资助，考入永宁中学堂读书。当时，叙永为革命党人活动的重要基地，同盟会四川支部成员杨沧白、朱之洪、向楚等皆受聘来校任教，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张颐“入校不久，思想突变”，逐步倾向革命。1907年，经杨沧白介绍入同盟会。张颐在校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尚未卒业，即考上四川高等学堂理科。

1908年张颐抵成都。革命党人正云集于此，开展活动。张颐入高等学堂不久，就参加了由杨沧白、张培爵、熊克武、黄复生、向楚等组织的乙辛学社。同时他还联络陆军小学及其他各校同志组织勉学会，密议国是。以是，凡革命党人有所策划，张颐皆得参与。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张颐奉命奔走仁寿、青神、自贡、井研各地，宣传鼓动，策动起义，于中

秋后及时赶到重庆。当时，重庆革命党人正在紧急筹划起义大计。杨沧白、张培爵听取了张颐汇报下川南的情况，又派他往川东一带活动，并与随端方入川的鄂军中革命党人取得联系。张颐完成任务回渝，又参加重庆独立的活动。1911年11月22日，蜀军政府成立，张颐任都督府机要秘书兼代炸弹队队长。1912年，成、渝两军政府合并，他又任民政长公署机要秘书。他深感自己的性格与才能不长于政治工作，决心从事教育及学术研究。当时，各省皆有派遣革命青年出国深造之举，张颐也在1913年考上四川省公费生出国留学。

1913年10月初，张颐抵美国，入密执安大学。他考虑到："西方各国何以富强，除科学发达外，其社会思想必有同中国相异之处，欲探究其思想之奥妙，于是选学哲学"。西方哲学派别甚多，张颐初无定见。头两年从塞勒斯教授、罗维德教授学《实在论》、《实用论》。第三年听温莱教授讲授《康德与黑格尔哲学及其对欧美哲学之影响》，提纲挈领，颇能引人入胜，遂醉心于黑格尔哲学之研究，并以此为终生奋斗的目标。他在密执安大学六年，由本科到研究院，成绩优良，先后取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张颐学习既有心得，悟出当时美国的学术水平尚逊于欧洲，乃于1919年夏入英国牛津大学研究院继续深造。为了探索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原委，1921年他又赴德国，在埃尔朗埂大学和柏林大学进行多方面的研究。1923年，他用英文写成毕业论文《黑格尔伦理学说的发展、意义及其局限》，送交牛津大学研究院审查。经过公开答辩，张颐以成绩优异获哲学博士学位。这篇论文，于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文本，书名为《黑格尔氏伦理探究》，颇受欧美哲学界的重视。英国史密斯教授为之作序，指出："特别有趣的是张教授讨论了黑格尔关于家庭和国家的观点。在这里，他以他的批评超过了黑格尔，消除了一般西方思想和制度所根据的偏见。"德国拉松博士在《康德研究》中也评介了此书，认为张颐对黑格尔的评价"较许多德国作者尤为公允。"

1924年，张颐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两年后，到厦门大学任教，兼任文科主任、副校长。1929年，北方政局稍有好转，复回北京大学任教授兼哲学系主任。所教课程，除西方哲学史外，还讲授从莱布尼兹到赫尔巴特的各派哲学。他讲授康德、黑格尔哲学，力求扬其精华揭其糟粕，并直抒自己的独立见解，颇受学生欢迎。贺麟曾在祝贺张颐60寿辰《献辞》中说："张真如先生是中国哲学界专门研究西洋古典哲学的先驱，是北大哲学系多年来注重客观研究哲学史及哲学名著的朴实学风的范成者，也是中国大学里最早专门地、正规地讲授康德及黑格尔哲学的第一人"。在此期间，他还在报刊上发表不少哲学论文，如《读克洛那、张君劢、瞿菊农、贺麟

诸先生黑格尔逝世百年论文》、《关于黑格尔哲学回答张君劢先生》、《余与张君劢先生讨论黑格尔哲学之经过》、《黑格尔与宗教》、《从哲学周刊征文联想到圣路易哲学运动》等，在国内外均有很大影响。

1935年，张颐出国休假，以考察欧美哲学研究的倾向和发展。1936年回国，应任鸿隽之邀，任四川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长，一年后又代理校长。在此期间，他竭力争取教育经费，积极增添设备，扩大院系，提倡自动学习和自由研究，坚持学术和应用结合，采取措施提高学生文化水准，因此全校学术空气日益浓厚，学生成绩显著提高，教学、科研均有所发展。同时他还广纳名师，一时名流学者荟萃，蔚为大观。1938年底，他离川大，又执教武汉大学。抗战胜利后，一度返北大，因病于1948年回川。

建国后，张颐先后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四川省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并重回北大指导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学习。1969年6月，张颐在北京病逝。

刘孟伉

刘孟伉，名贞健，号呓叟，云阳县人，1894年（光绪二十年）4月生。幼年丧母，其堂兄刘贞安乃一饱学之士，长期辅导刘孟伉学习书法、诗文，对他影响很大。

1921年起，刘孟伉曾先后任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国文教师、川军第二混成旅书记、川军郭汝栋部秘书。他结识刘伯承后，受其影响，追求革命真理，于1926年12月参加了刘伯承领导的泸州起义。次年初，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泸州起义失败后，刘孟伉失掉党组织关系，曾去川军向成杰部任秘书，后相继在开县、云阳、万县等地中学、师范校任教。1933年后，他定居万县，开办裱书店，以刻章鬻字为生；曾被聘为《万县县志》编纂。1938年，刘孟伉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中共万县中心县委委员，从事宣传、组织和统战工作。他的裱书店和家成为党的地下工作接头、开会的地点。同年，他送胞弟刘闲达和长子刘祥纶去延安。次年春他出任国华中学董事长，这是党领导下的一所进步学校。当年6月，国华中学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刘孟伉遭到通缉，被迫转入云阳乡下隐蔽了8年。此间，他主要致力于文史的研究，整理刘贞安遗著，并创作了大量诗歌、书法和篆刻作品，完成了《说文解字笺》、《六书评议》两部著作。1947年秋，彭咏梧赴下川东发动武装斗争，成

立"中共下川东游击纵队",刘孟伉被任命为七南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同时担任中共云奉南岸区区委书记。此后,他在川鄂边区打游击,直到解放。

建国后,刘孟伉历任万县市咨询委员会主任,万县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会主席,川东行署委员兼副秘书长,四川省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委员,第一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第一、二届四川省人大代表,第一、二、三届四川省政协常委。在主持省文史馆工作期间,潜心于文史、艺术的研究和写作,组织领导馆内研究员创作了大量诗词、书法、篆刻、绘画等艺术作品,收集整理了大量文史资料。他主编的《杜甫年谱》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刘孟伉对诗经、楚辞、唐诗、宋词有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陆游其人其诗颇下功夫。他对自己的诗作要求很严,经反复筛选,现留下的诗词稿有《冉溪诗稿》、《砀隐集》、《庚辛坠稿》、《壬寅汇稿》、《冻桐花馆词钞》等。他的诗词深受四川老一辈善写古体诗词者的好评和推崇。

刘孟伉的书法在四川享有盛誉,篆、隶、行、楷皆工,对秦、汉、魏晋、唐各名家碑帖无不心慕手追,深得汉隶颜书之精髓。他法古而不泥古、力主创新。他的书法具有风骨雄健,气格宏博,奇野朴茂,浑然天成的艺术特点。他总结自己的书法经验,把传统的"永字八法"提炼为"十字两法",认为汉字的千笔万画,皆由一笔的起、行、止变化而来。"博操约守","一收一放",是他的为书之道,并以此教授门人。他的书法作品被人们珍爱、流传广泛。《刘贞安传》(刻石)是他的楷书代表作,存万县文化馆;《游峨眉诗稿》是他晚年的行草力作。存于杜甫草堂的《画鹰》(木刻)是他的隶书精品,成都武侯祠有他的楷书巨幅《前后出师表》,文殊院藏有由他书写的"波罗密多心经"。除此之外,四川的名胜之区,如峨眉山报国寺、眉山三苏祠、江油太白祠和新都桂湖公园等地均有刘孟伉留下的墨迹。刘孟伉亦精于篆刻,其风格"既刚健而遒劲,又跌宕而隽永;既从容而雅致,又含蓄而空灵。"他的边款微刻"能于方寸牙面,刻字数千"。既具金石之味,又是精妙的书法。他一生治印不下千方。现存《呓叟印余》、《呓叟刻印》各1册,均收1962年以后作品,以往作品皆尽佚去。

刘孟伉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1969年2月6日不幸逝世。1978年9月得以昭雪。

邓均吾

邓均吾，原名邓成均，笔名均吾、默声、微中，古蔺县人。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11月5日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祖父邓湘在家乡设馆教学，以教学有方闻名乡里，父邓晴皋为光绪举人。邓均吾自幼受到严格的旧学教育，1912年入教会中学重庆广益书院，并得到吴芳吉的指点，阅读了不少欧美的诗作。毕业后因家境日艰而失学，他刻苦自学，并开始学习创作。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得吴芳吉举荐，1921年邓均吾到上海，在泰东书局编译所谋得非正式工作。

邓均吾在泰东书局认识了刚从日本到沪的郭沫若、成仿吾，于1921年冬加入创造社，是国内首批会员之一，他在郭沫若等帮助启迪下活跃于文坛。他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4人负责编辑《创造季刊》。他还是《中华新报·创造日》副刊的主要编辑之一（该副刊计出101期，深受读者的欢迎）。1922年又与林如稷、陈翔鹤等发起成立文学团体浅草社，创办《浅草》文艺季刊。邓均吾勤奋写作，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他在刊物上发表了许多诗，如组诗《心潮篇》、《白鸥》和《遗失的星》等，以“诗品的清醇”受到郭沫若的称赞，成仿吾和郑伯奇很喜爱他的《澹溜》和《虹》等小诗，后来的文学青年沙汀也很推崇他。从1921年至1924年是邓均吾早期文学活动的黄金时代。除诗歌外，他的译作也多是中国最早的译本，其中《希腊神话》和《歌德传》被誉为“空前壮举”。

1924年，创造社前期活动趋于停止，这时邓均吾老母病重，他于该年下半年返川，为生计奔波于重庆和川南。1932年经友人介绍再次赴沪，在杨伯凯、任白戈和沙汀等集资创办的辛垦书店译书，他翻译了英国科学家汤姆生的《科学概论》、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的《人类悟性论》，均由辛垦书店出版。

1933年底，邓均吾再度返川，至1936年，他倡导兴办古蔺县立中学，出任教务主任、校长。1937年秋，他到成都在《大声周刊》社工作，常与车耀先及党员作家周文、沙汀、赵其文等来往，并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初，参加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被选为分会理事，任研究部负责人和《笔阵》编委。他在中共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团结进步文艺工作者，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在刊物报纸上发表了不少诗歌和文章。

1939年秋，邓均吾因老母病故，返回故里。按照党组织的委派，从1939年秋至1941年春，任中共古蔺县委书记，以教育职业为掩护，在该县开展党组织

的建设及抗日救亡、统一战线工作。

1941年春"皖南事变"后,邓均吾按照上级指示,转移至彭水县,他利用关系转移隐蔽党员,并协助在彭水建立中共特别支部。1942年春他再返古蔺,以中学校长及县参议员的公开身份开展合法斗争,掩护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后因有"戴红帽子"之嫌,被当局撤去校长职务,旋到北碚、金堂等地中学任教。1947年冬,又托关系到营山县晋德中学任教,兼任县府秘书。他利用县府秘书工作搞情报活动,在危急关头保护了组织和同志。1949年3月,他到重庆任市参议会秘书,虽失掉了党的组织关系,仍积极参加党领导下的革命活动,迎接解放。

重庆解放后,邓均吾全力投入人民政权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历任西南文联常务委员,重庆市文联秘书长、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副主席,四川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重庆市文史馆馆长及《红岩》、《奔腾》文艺月刊主编等职,被选为重庆市第一至五届人大代表、重庆市政协第一至六届常务委员。在报上发表了新旧体诗200余首,评论和杂文50多篇。

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邓均吾虽遭迫害,仍坚信"环宇同温会有时"。1969年6月3日,邓均吾含冤病逝。1979年2月26日,中共重庆市委为邓均吾举行追悼会,平反昭雪。《邓均吾诗词选》于1981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精选了邓氏1922年至1968年间的新诗和旧体诗词246首、译诗5首,由著名作家沙汀作序。

陈翔鹤

陈翔鹤,重庆人,生于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3月9日,1919年毕业于四川省立第一中学。次年入复旦大学外语系攻读英语。因爱文学而成为《浅草社》的主要成员。1923年,他赴北京自修,曾在北京大学听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略》,受影响较深。后来他又和在北大教书的郁达夫结成忘年之交,并曾一道拜访过鲁迅。在他初期的小说作品中明显的反映出鲁迅和郁达夫对他的影响。他还如饥似渴地阅读外国文学名著。

1925年,他和冯至、杨晦、陈炜谟组织了文学团体"沉钟社",鲁迅称为这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鲁迅很喜欢他们对文学切实认真的态度,不过也觉得他们被悒郁沉闷的气氛所笼罩。

1927~1936年,陈翔鹤先后在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山东省立一中、吉林大学、青岛市

立一中、河北邢台女子师范等校任教。在教学中他向学生传播五四新文化和民主思想。1936年他应周太玄之聘，在四川大学理学院任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成都市六中任教，积极从事救亡活动。1938年，他担任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常务理事，并于当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他到罗江第六中学任教，鼓励从山东流亡来四川的学生以文学形式反映流亡生活，并编成10万字的文集《在沙风中挺进》，他因批评国民党当局的复古倒退和奴化教育而被当局解除了职务。后到一家私人银行作文书主任，以糊口养家。

1945年，陈翔鹤出任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支部执行委员，他积极协助名教授李相符、陶大镛、彭迪先、谢文炳、罗念生、文幼章等人，组织了"成都各大学教授联谊会"，声援川大进步师生的民主运动。同时，他利用在华西协合中学、建国中学教书的讲坛，向青年学生揭露旧社会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宣传民主和革命的思想。他还与加拿大籍教授文幼章合作，翻译刊物《群众》上揭露反动派罪恶的文章，寄给美国、加拿大的进步报刊发表。

1947年春，国民党统治区"反饥饿，反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6月3日，当局在全国实行大逮捕，中共党组织得知敌人将对陈下毒手，指示他立即转移，在李劼人的安排下，他化名陈定波，在乐山嘉乐纸厂隐蔽下来，直到解放。

建国后，陈翔鹤曾担任川西行署文教厅副厅长、川西文联和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四川大学教授等职。1953年他调北京后，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及古典文学部部长、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文学遗产》主编、《文学评论》常务编委、《文学研究季刊》主编等职。

"文化大革命"中，陈翔鹤受尽摧残和折磨，于1969年4月22日含冤而死。1976年得以平反昭雪。

陈翔鹤一生著述颇丰，建国前发表的有：短篇小说集《不安定的灵魂》、《在阪道上》(1927年北新书局出版)、《独身者》(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鹰爪李三及其他》(1942年桂林丝文社出版)。他还在《沉钟》半月刊上发表过中篇小说《写在冬空》、剧本《沾泥飞絮》、《郁达夫琐记》、《狂飙之夜》、《落花》、《雪霄》、《圣诞节之夜》。他翻译过外国文学作品《生日茶会及其他》、《春情曲》、《在公寓里》等。他的《关于沉钟社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建国后，他的作品有《喜筵》、《方教授的新居》、《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等，刊载于《人民文学》、《文艺月报》等刊物上，他还整理了四川民间故事《张黑七上西天》。

陈　铨

陈铨，字大铨，号选卿，富顺县人。1903年9月25日（清光绪二十九年八月五日）生，其父为晚清秀才，对陈铨的教诲和影响较深。陈铨自幼聪颖好学，在富顺县立高等小学堂上学期间，课余进私塾学古文、诗词，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小学毕业，他考入省立成都中学，后来又考入北京清华学校。从少年时代起，陈铨就开始写作旧体诗词，在清华学校读书时，他写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革命前的一幕》，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他在清华学校期间，学习了英、德、希腊等国语言。1927年，他从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国阿伯林大学留学，以优秀成绩取得硕士学位。之后，又留学德国克尔大学，并获该校博士学位。

1933年底，陈铨学成归国。次年，由清华大学教授吴宓推荐，任教于武汉大学，讲授文学课程。1935年任教于清华大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陈铨随清华大学南迁昆明。西南联大成立后，他执教于西南联大，1940年，调重庆国立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在此期间，陈铨与林同济等创办《战国策》半月刊，并在重庆《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形成所谓的"战国策派"。陈铨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在中国近代文坛上引起过极强烈的反响。文学界和思想界曾对陈铨的作品进行过严厉的批驳，认为其作品的创作思想倾向和主题是混乱的，是鼓吹尼采的"超人"哲学观点，甚至是吹捧法西斯。因此，在过去较长时期中，陈铨一直是作为一个反面作家而被否定的。

陈铨创作的鼎盛时期是在三、四十年代，长篇小说有《彷徨中的冷静》、《天问》、《冲突》、《狂飚》、《死灰》等。他的短篇小说成集的有《再见冷荇》、《归鸿》、《蓝蝴蝶》。他在剧本创作方面也颇具才能，其主要作品有《婚后》、《野玫瑰》、《蓝蝴蝶》、《金指环》、《无情女》、《衣橱》、《冷战》等剧本，还有电影剧本《断臂女郎》（收入《归鸿》集中）。陈铨还有为数不少的文学理论文章发表于《战国策》和《大公报·战国》上，另有专著《文学批评的新动向》、《中德文学研究》、《戏剧与人生》、《从尼采到叔本华》。

由于陈铨的创作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所以，他的小说和剧本大多数都是以抗战为题材，例如《狂飚》写立群等几个青年，被"七七"事变的炮声粉碎生活的美梦，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有的被俘后自杀，有的参加了抗战，有的在抗战中战死。又如五幕剧《黄鹤楼》，描写中国空军中的飞行员在抗战中对日作战的故事。电影文学剧本《断臂女郎》，则是描写一位中国妇女在抗日游击队中

对日寇作战的故事。《闹钟》里描写了日机轰炸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陈铨还在以中国留学德国的学生为题材的作品《政变》、《免职》中，直接记述了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理的丑剧，以及法西斯党徒迫害犹太人和有色人种的事实。

对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描写也是陈铨作品的一个特点，他在一些作品中追求"史诗"风格和"编年史"效果，《彷徨中的冷静》以其家乡富顺县为背景，基本勾画出四川腹地本世纪初的形象历史。他的作品中与家乡有关的部分都注重展示四川地方特色，如四川方言，富顺的自然环境等。

1946年秋，陈铨任同济大学外文系主任兼任上海《新闻报》资料室主任。

建国后，陈铨任同济大学文学院外文系主任兼复旦大学教授。1952年他调南京大学外文系，任教研室主任，教授德语和德国戏剧。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再度受到打击摧残，于1969年去世。1979年1月，陈铨的政治问题得到公正的解决，恢复了名誉。198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翻译著作《语言的艺术作品》(原著凯塞尔)。

杨允奎

杨允奎，字星曙，安岳县人。生于1902年11月16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七日)。家境贫寒。9岁时就读于本乡小学，课余仍参加劳动。1916年考入安岳县立中学，学习刻苦，每期名列前茅。毕业后于1921年考上北京清华学校留美预备部。1928年，得庚子赔款资助，留学美国，经过1年预科学习，入俄亥俄州立大学农学系学习，潜心玉米遗传育种研究，1932年获博士学位。他放弃美国教授推荐他留美国或去德国任教的机会，于1933年回国，就任河北省立农学院教授。

1935年杨允奎应任鸿隽之邀回四川，任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农学系教授。1937年受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卢作孚之请，创办四川稻麦试验场，任场长(后改称稻麦改进所，任所长)。1938年，稻麦改进所改组为四川省农业改进所、任副所长。由于经费设备严重不足，再加上内部人事纠纷，使杨允奎的工作无法进行，1941年辞去任职。其时他已积劳成疾，病稍好后，又回到四川大学农学院农艺系任教授兼主任，直到解放。

1950年，杨允奎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农业部四川农业实验所所长。以后还历任四川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四川省农业厅厅长兼四川农业科学院院长等

职。1956年,周恩来总理主持第一次十二年科学规划,由杨允奎负责农业部分。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62年起,又兼任四川农学院院长和数量遗传研究室主任,评为一级教授。他还先后被选为第一、二届四川省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并担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农学会和作物学会理事长、四川省科委委员兼农业组组长、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等职。

杨允奎从20世纪30年代初即从事农业科研工作,除从事小麦、豌豆育种外,对玉米的遗传育种研究造诣尤深。不仅探索了遗传的基质,丰富了遗传学的理论,而且利用遗传学原理培育出不少作物良种。在玉米杂交优势的科学应用上,为中国最早的开拓者之一。编著有《遗传学》。40年代在美国《农艺学杂志》上发表多篇有影响的论文。

建国后,杨允奎首先介绍了国外数量遗传在玉米育种上的应用,并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研究工作,从实践中先后培育出自交系"可—36"、"金—2"、"D—0039"、"门—5—2"、"金—57",玉米杂交种"门可"、"双奇"、"矮双巨"、"矮三交"等玉米良种,在四川全省大面积推广,对促进农业增产起了重要作用。发表了《论四川省粮食作物传统栽培经验对自然条件的适应》、《论四川作物地方品种与自然条件的关系》、《利用玉米雄性不育特性制杂交种的研究》及续篇《玉米遗传原理》等论著。晚年,在实践中改进了格里芬氏关于特殊配合力小估算理论和方法,在所著《玉米自交系数量性状遗传研究和初步报告》一文中,对计算特殊配合力效应的简便方法,作了系统论述。这一估算方法被认为是"不仅具有正确的遗传理论基础,而且简便,较为切合育种实践,在配合力育种中是一种值得广泛使用的较好方法。"

杨允奎很重视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和科技成果。他认为科学无国界,凡能为中国所用都要学习。他主张从中国实际出发,用他人之长,外为中用,走出自己的路子来。建国后,他曾访问日本、苏联、匈牙利、罗马尼亚、缅甸等国。每次都带回新的信息和工作方法,直接推动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发展。访问缅甸时,曾被邀请给缅甸科技界知名人士500余人作农业科研报告,受到与会者好评,促进了中缅两国科技文化的交流。

杨允奎治学严谨,非常重视科研的实践性。他主持玉米选种工作期间,从拟定计划、室内选种、田间规划、试验播种,一直到以后的观察、鉴定、选株、套袋、授粉,都坚持亲自参加,并注重推广。他说:"科研搞出来的成果,应该致力于推广,首先拿到生产实践中去检验,不断的总结和提高。"数十年中,他培育出的豌豆、小麦、玉米良种,在农村很受欢迎;对四川农业发展所作的宏观规划,也是切合实际,行之有效。他指导学生时,一丝不苟,首先要求将一些重要著作细细研读,充分体会,然后再旁征博引,扩大

知识面。他反对浮皮潦草，一览而过，强调具体实践，经他培养出来的数以千计的专业人才，分布在全国各地。

“文化大革命”期间，杨允奎被诬陷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残酷迫害，身心备受摧残，1970 年 9 月 14 日病逝于成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昭雪。

沈起予

沈起予，1903 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生于巴县一品场一中产家庭。先在县中就读，1920 年赴日本入东京高等预备学校学习。后考进京都帝国大学专攻文学，直至 1927 年毕业。归国后在上海参加了郭沫若主持的创造社，开始发表以一个中国留日学生生活为题材的中篇小说《飞露》。相继在《创造月刊》推出了《诺托的左页》、《演剧运动之意义》、《艺术运动底根本概念》、《巴比塞（H、Bartusse）之思想及其文艺》等 4 篇富有学术性的文章，还执教上海艺术大学。25 岁的沈起予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

1929 年 2 月 7 日，国民党当局查封了创造社，并公布《宣传品审查条例》。革命文艺处境严峻，革命文艺内部也对“新写实主义”展开了争论。沈起予直面这样复杂的形势，认为必需加强学习，深入研究，遂于 1929 年夏再东渡日本，收集资料，充实自己。可是，他已引起密探注意，不能见容于东京警视厅，被迫在是年冬回到上海。

1930 年 3 月 2 日，沈起予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的成立大会。此一阶段，沈起予陆续发表了《法国的新兴文坛》、《我的文艺生活》、《演剧的技术论》、《抗日声中的文学》、《文学大众化问题》、《新英雄》、《高尔基与托尔斯泰》、《五四文学运动之历史意义》、《文学上的真实》等近 20 篇作品；他以战斗的姿态，走在革命文艺的前列。

除散篇文章之外，沈起予还以学识渊博、外语稔熟的优势，翻译了纪德的《我喜欢的十种法国小说》，科佩的《面包块子》，以及专著《欧洲文学发展史》，左拉的小说《酒场》。并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沈起予的中篇小说《残碑》，短篇小说集《火线内》。

1936 年春，“左联”决定解散，另组扩大的抗日文艺团体——“中国文艺家协会”，由茅盾、叶圣陶、郑振铎、王统照、沈起予 、赵景琛、沙汀、艾芜等 40 余人发起，1936 年 6 月 7 日在上海成立；出版《光明》半月刊，由洪深、沈起予任主编。

《光明》继续担当起“左联”的组织和创作任务，以唤醒全国人民一致奋发抗

日救国的姿态出现于文坛。创刊号发表了一组“国防文学”专辑：小说有茅盾的《儿子开会去了》、沙汀的《兽道》、舒群的《蒙古之夜》、戴平万的《满洲琐记》；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洪深执笔的独幕剧《走私》；徐懋庸与周立波“关于国防文学”的论文；周扬翻译苏联作家潘菲洛夫的小说《田野的姑娘》。刊物备受读者欢迎。从第二期起郭沫若、艾思奇、杨骚、王统照、沙汀、艾芜、姚雪垠、刘白羽等著名作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基本上都为《光明》写稿。据沈起予的夫人、作家李兰回忆：“今天已颇负盛名的作家中，有好几位最初的作品是在《光明》上第一次与读者见面的。”

正当《光明》欣欣向荣之际，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光明》在炮火中停刊了。沈起予带着全家，随京沪撤出的文艺界人士陆续集中武汉。1938年3月27日在汉口市总商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会”，选举郭沫若、老舍、茅盾、冯玉祥、张道藩、夏衍、阳翰笙、沈起予、张恨水等45人为理事。在极度困难下，沈起予坚持出版不定期32开活页本《光明》，发表多篇描写抗战前线的速写。是年秋，武汉沦陷，沈起予与总会同志迁重庆，他受《新蜀报》周钦岳之聘，编该报副刊《新光》，连载了他写的《抗战回忆录》。同时，还去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以及“日俘救容所”工作。

日俘救容所重庆分所，对外名“博爱村”。它主要收纳华中一带的战俘，设在南岸13公里的土桥杨家林地主庄园里。日俘成员复杂，有部分属朝鲜人；而且又有官兵之分，这给沈起予的“宣教”、“管理”带来极大困难，时刻担心可能发生意外。恰好日本左翼作家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到“博爱村”，组织成立日俘“反战同盟”，郭沫若、冯乃超、刘仁、绿川英子（对日播音员）等也到“博爱村”看望战俘，一时间战俘激情高涨，都表示盼望早日回到家园。沈起予抓紧机会，进行教育，特别是一个名叫三船的日俘，不仅能认识错误，改变了顽固态度，公开检讨，恢复了人性的本来面目，还积极参加日语剧本《新亚之光》的编写。

中国电影制片厂导演何非光（朝鲜人、日本留学生）根据“博爱村”日俘演出的话剧脚本改写成电影《东亚之光》，他与沈起予研究商定拍摄，并请鹿地亘校阅。战俘们得此消息，兴奋不已。1939年春，恰逢重庆展开“献金运动日”，由沈起予率领几十号穿“皇军”制服的队伍，举起旗子，吹着日本礼号，参加山城的大游行，观众如潮，掌声如雷。他们毫不悭吝的将每月30元生活金节省下的钱，亲自送上献金台，捐献给英雄的中国人民，之后，才去拍摄电影。是年秋，鹿地亘带走了“博爱村”第一批“反战同盟”盟员，以“正义军”的英姿奔赴战场。

基于此，沈起予以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手法，写成改敌为友的报告文学《人性的恢复》，发表在茅盾主编、1941年2月第六卷214期《文艺阵地》上，受到普遍

好评。

抗战胜利后，沈起予任上海群益出版社编辑主任，继续翻译了许多文艺理论名著。建国后，沈起予担任第一届上海市人大代表、四届市政协委员。1970年1月病逝。

范长江

范长江，原名范晔，号希天，1909年（清宣统元年）10月出生于内江县。自幼从祖父（清末秀才）读书习字，且攻诗文，文学功底颇为扎实。

1922年范长江进入中学，一些宣传革命的进步书刊源源不断地从外地传入内江，学生中建立了“读书会”、“警觉会”等进步组织，范长江是其中的活跃分子。

1927年初，范长江到重庆，准备投考黄埔军校，因错过时间，未能如愿。经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人杨闇公介绍，考入中法大学重庆分校（吴玉章任校长）。在校期间他学习了《唯物主义史论》、《社会发展史》，并阅读了瞿秋白写的《共产主义ABC》等书籍，受到启发，因而积极参加革命活动。

1927年3月31日，重庆各界群众为抗议英美炮轰南京，在打枪坝举行集会声讨英美罪行。范长江参加了这次集会。刘湘组织军警特务屠杀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血案。范长江沉着地组织群众转移，结果自己身负重伤。后在亲友的帮助下离开四川前往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在那里他被邀列席了正在武汉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随后又被送到高级劳动党校学习。瞿秋白、蔡和森等在该校授课。1927年7月，范长江参加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军长贺龙）学生营，随军到黄石港后被编入第三师教导团。部队到达南昌后，范长江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随军转战瑞金、长汀、汕头，后因病掉队。

1928年下半年，范长江抱着探索一条改革乡村、富国救民道路的愿望，报考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乡村行政系。入学读了一两年，使他非常失望，觉得这样的教育绝不可能解决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问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学校当局对日军侵略罪行无动于衷。范长江在一次军训点名时，面对广大学员发表慷慨激昂的抗日讲演，他指出国土沦丧，责任全在国民党当局。他的讲演使在场的同学痛哭失声。次日全校学生集会，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主义，要求抗日救亡，范长江担任了学生宣传队的领导工作，进行宣传抗日的活动。后来学生

运动被镇压，范长江逃出学校。

1932年秋，范长江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次年1月，日寇出兵侵占山海关，范长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辽、吉、黑抗日义勇后援会”的工作，带领同学赴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在北大期间，他开始向《晨报》、《世界日报》投稿，以后又给天津《益世报》写稿，多是报道学校文化教育。《大公报》还聘他担任北大通讯员，撰写有关抗日救亡运动的长篇通讯。

1935年7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名义前往大西北采访。他从成都出发，经川西、陇东，越祁连山，绕贺兰山行程4000余里，历时10个月，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他在《大公报》上连续发表游记、通讯，第一次向全国公开介绍红军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真实情况，揭露国民党的腐朽和日寇入侵造成的严重危机，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由这些报道汇集成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成为畅销书，被誉为“一部震撼全国的杰作”。

大西北采访结束后，范长江被聘为《大公报》正式记者。绥远抗战期间，范长江曾深入战地采访，写了不少通讯。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他从绥远直赴西安，先采访周恩来，后又在博古、罗瑞卿的陪同下到延安采访了毛泽东。随后他写出《陕北之行》，从此他思想也发生重大转变，更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范长江亲赴芦沟桥、宛平县、保定车站，冒着枪林弹雨进行战地采访。徐州战役时，他在徐州街头宣传抗日。1938年3月他与恽逸群、陈同生等人创办“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在团结进步青年记者加强前线报道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周恩来曾写信赞扬范长江：“听到你饱载着前线上英勇的战息，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

1938年10月，范长江脱离《大公报》，次年初与胡愈之、孟秋江等人在桂林创办“国际新闻社总社”，在共产党领导下，他们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封锁，如实地报道抗日战争的真相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

1939年5月，范长江在重庆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与沈钧儒之女沈谱在重庆结婚。

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令逮捕范长江。1941年2月，他到香港，任共产党在海外的机关报《华商报》副总经理。1941年底香港沦陷，范长江到苏北解放区，先后担任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并亲自讲授《论人民的报纸》、《新闻学概论》等课程。

1946年5月，范长江参加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南京与国民党谈判。解放战争时期，范长江在延安任中央负责宣传工作的四大队队长，并兼负责《解放日报》的工作。

建国后，范长江先后担任新华社总

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等职。1956年起调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继后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还连续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范长江横遭打击，于1970年10月23日在河南确山农场被迫害致死。1978年范长江得到昭雪，12月27日胡耀邦、邓颖超参加了为范长江举行的追悼会。为纪念范长江对新闻工作的杰出贡献，国家设立了范长江新闻奖，这是中国中青年记者优秀成果最高荣誉奖。

范长江的著作汇集出版的，除《中国的西北角》外，还有《塞上行》、《长江战地通讯专集》、《通讯与论文》，与人合集的《西北战云》、《西线风云》等。所写旧体诗，汇为诗集《耕耘集》出版。

罗静予

罗静予，成都人，1911年（清宣统三年）生于一基督教徒的家庭。由于家贫，罗静予早年辍学，1925年，他由张子玉介绍，加入了在成都的CY（早期共青团）组织，先后在川军第二十八军和二十四军中当过兵，也曾在重庆《新社会日报》、成都《锦江日报》、《成都新闻》当过校对和助理编辑，暗中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进步活动。他还在李铁夫办的永宁书店当店员，该书店暗地传送进步书刊和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报纸。永宁书店被迫停办后，他前往上海，就读于中国无线电工程学校和南洋无线电传习所。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罗静予参加了《第五军淞沪抗日画史》的编辑工作。1933年，他进入中华职业学校英文补习班，打下了电讯工程知识和英文方面的基础。1935年，他受郑用之邀请，到上海制成了配音机，并首次应用于《孙中山逝世记》电影配音。

1937年，罗静予参加了中国电影制片厂的筹建工作被任命为技术副厂长。他参与了一系列抗战新闻片的制作，反映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在中国的侵略罪行，报导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等内容的5集纪录片《抗战特辑》就是由罗静予编辑的。此外，他还编辑了《电影新闻》共7集，内容也是以反映抗日战争为题材的。此外，他还根据新闻素材编辑了《抗战号外》、《武汉大会战》，纪录南京失陷前后的《南京专号》，纪念爱国军人郝梦麟的纪录片《郝军长荣哀录》等。1937年9月下旬，八路军在晋北发动了痛歼日寇的平型关战役，罗静予参与了拍摄这次战

役的纪录片的工作。影片中有八路军整装待发、挺进平型关、朱德总司令和一一五师领导人的镜头，以及被俘的日军俘虏、缴获的战利品的镜头。这部影片在国内外放映引起极大轰动，收到良好的宣传抗战的效果，也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罗静予编辑的影片《抗战特辑》还在新加坡、越南、缅甸、菲律宾、苏联、美国等国上映。

1938年底，武汉失守后，中国电影制片厂内迁重庆。由罗静予负责，在香港筹建了大地影业公司，并担任经理和制片人。“大地”公司很快就拍出了抗战故事片《孤岛天堂》，罗静予亲自装配“静音机”录音，该片上映后轰动一时。夏衍编剧、司徒慧敏导演的《白云故乡》也是“大地”公司出品的。1939年底，“大地”公司被国民党当局下令停办。

1941年底，罗静予应美国电影工程学会邀请赴美国出席该学会年会并进行交流访问。临行前，周恩来给他的亲笔信中说：“……唯祝早达太平洋彼岸，宣扬国光，艺术猛进……”他还带去了中国文艺界赠送给卓别林、华人摄影家黄宗霑的礼品。他在美国滞留了4年，在美国电影工程师年会上，他作了《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电影》的学术报告，考察美国电影行业，学习化工专业，为国内采购电影器材。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静予回到祖国，担任了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由于他反对内战，抵制拍摄反动影片，以人力和物力支持上海昆仑影业公司，帮助延安派来的干部，1946年10月，他被当局逮捕，送入南京国防部军法处监禁。周恩来立即写信给郭沫若设法多渠道营救，在党内外知名人士呼吁奔走下，国民党当局于1947年3月释放了罗静予。1948年5月，他辞去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职务，赴西欧考察电影业。

1949年1月，北平解放，罗静予抱着献身新中国电影业的愿望，取道香港回国。他相继担任中央电影局制片处长兼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影器材公司经理、北京电影制片厂总工程师等职。他参与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洗印厂的筹建，南京电影机械厂的改建，以及保定胶片厂和哈尔滨照相器材厂的创建工作。他还翻译了不少的外国电影技术资料。为提高新中国电影技术水平作出了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罗静予遭到残酷无情的打击，于1970年1月26日被迫害致死。1978年4月，文化部党组予以平反昭雪。

羊路由

羊路由，原名黄怀清，成都人，1917年7月30日生。八岁上私塾，1934年考入成都县立中学。因为受“五四”以来进步文学作品的影响，他对现实感到不满。在一次校庆活动中，他编了一个讽刺学校腐败的独幕话剧《醉翁操》，挖苦学校教育误人子弟，这是他第一次音乐创作活动。因此受到校方的处分，于1936年夏被迫离开学校。同年秋，他考入成都敬业中学高中部。不久，结识了《建设日报》职员、中共地下党员侯泰阶，在侯的影响下，他逐步走上革命的道路。

抗日战争爆发后，羊路由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天明歌咏团》，在街头茶馆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搬夫曲》等抗日歌曲。之后又曾参加“明天剧社”，与陈戈等演出街头剧，还参加了大型话剧《芦沟桥》的演出活动。

1937年冬，他向侯泰阶提出去延安的愿望，他改名羊路由，由组织安排经西安到了延安，进入陕北公学第一期第九队学习。1938年2月，他和田家英等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习期满后，他到八路军留守兵团“烽火剧团”工作，他创作了该团团歌的歌词，后剧团改编为宣传大队，羊路由被提升为副分队长。1939年3月，他进入“鲁艺”学习。1941年，他担任了八路军三五八旅政治部“战线剧社”的社长，其间曾回“鲁艺”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晋绥军区先后任宣传干事、副科长，参加了解放战争中的绥包战役、大同战役、保卫张家口战役、忻州战役等。建国前，他创作了不少的音乐作品。他写了《帮助抗日军》、《加紧学习》、《江南草》、《方向歌》等歌词。他为毛泽东诗词《六盘山》、《七律·长征》谱了曲。还为萧三写的《八路军万岁》谱了曲，选入了当时的《战线歌集》。创作了《反扫荡进行曲》、《反对内战》等歌曲，为《梁红玉》一剧中的插曲《长剑舞》谱曲。1943年2月，由他执笔(剧本、歌词)，与王大化、李波编写了中国第一部广场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多次演出，深受欢迎。他的音乐创作还有《纪念七一歌》、《打太原》、《到西京》、《在敌后纪念七七》，还为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谱了曲。

1949年5月，羊路由赴北京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随即调任西北大学绥蒙分校教育科任职。11月随军南下，12月成都解放。在入城式大会上，他指挥群众唱《国际歌》。不久，他担任了成都音乐协会分会秘书长。

全国解放后，他创作热情高涨，写下了数十首歌曲。1956年4月，他担任中国音乐代表团副团长，赴捷克斯洛伐克参加了“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1957

年秋，他调任西南音乐专科学校副校长。1959年初，音专改为四川音乐学院，他担任副院长、党委副书记。还担任了四川省文联常委、四川省政协委员、四川省青联委员。建国后他创作的作品计有：《太阳出山》、《八一纪念歌》、《战马呀，我的好伙伴》。歌剧《激浪丹心》（集体创作）、《春天大合唱》（作词）。还为毛泽东诗词《蝶恋花》、《如梦令·元旦》、《清平乐·会昌》谱了曲；为交响乐《浣溪沙》写了解说词。

“文化大革命”中，羊路由横遭迫害，不幸于1970年1月25日逝世于成都。

杨佑之

杨佑之，原名德宽，祖籍湖南长沙，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生于江苏南京。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商科，师从于中国经济学泰斗马寅初，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1919年经马寅初推荐，先后任教于北京尚志商业学校和北京师范学校。1928年至1935年相继在北京中国大学、保定河北大学、北京朝阳学院、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北平大学商学院担任会计学、统计学教授。

1936年，杨佑之应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之聘，从北平来到成都讲学。抗战前夕，西南地区现代会计统计人员极为稀缺，他成了第一个在四川讲授高等会计学的教授。此后，又相继担任了四川大学、铭贤学院教授，成华大学、华西协合大学教授、系主任，四川省会计专科学校校长，成为四川文科的著名教授之一。1943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向他颁发了教授证书，成为部颁教授。同年7月，领到了会计师证书。1945年，他在成都创办了“杨佑之会计事务所”，受理民间会计事务。

新中国成立后，杨佑之被任命为华西协合大学接管委员会副主任、总务长兼经济系主任，代表新中国政府从美国人手中接管了华西协合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长期担任四川财经学院（一度更名为成都大学）教授和会计系、核算经济系、计划经济系、会计统计系主任。他还历任四川省政协常委、民建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人大代表等职务。1962年，应邀出席了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

作为一名教育家，在杨佑之执教的50余年中，直接听过他讲课的学生多达数千人。他讲授的课程较为广泛，开设过“初等会计”、“会计学”、“高等会计”、“成本会计”、“统计会计学”、“差额分析”、“经济学原理”、“国际公法”、“国际

商法”等许多课程。他具有扎实的经济理论基础，渊博的专业知识，尤其对会计学和统计学研究较深。在教学中，他讲授的内容丰富、层次清楚、语言生动、分析透辟、注重知识性和趣味性有机结合。使课堂讲授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他还特别注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发表自己的见解。课后，无论是批改作业还是指导毕业论文，他总是字斟句酌，用工整的楷书详批详改，或者提出问答、建议、意见，供学生思考和研讨。这一切给许多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杨佑之在抗战时期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于1938年出版了《会计学》，1939年出版了《会计学纲要》。这两部专著不仅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至今仍然是会计学界公认的有影响的著作。1943年，他又在成都出版了《高等统计学》、《审计学》。建国后，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撰写了《高等会计》、《成本会计》、《会计报告分析》、《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等多部教材和《加强会计核算，正确运用价值规律的作用》等10多篇学术论文。1964年，他年逾古稀，仍孜孜不倦地写作，出版了《现代资产阶级会计学说批判》一书。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认为：统计与会计应该结合在一起，成为帮助和指导生产管理的决定性环节。中国要成为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就必须在统计与会计学上下工夫，使管理科学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为了探讨这一理论，他已整理了几千张卡片，准备写一部会计——统计专著，后因“文化大革命”动乱而中断。1971年9月10日，杨佑之因病逝世。

金满成

金满成，笔名东林、秋羊、许由、冬林等，峨眉县青龙场人，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生于一穷秀才家，出生仅8个月，父亲即逝世，14岁时母又病亡。他只好靠兄嫂过活。

金满成16岁时，以优良成绩考入嘉定府教会办的华西中学，后因反对读《圣经》被学校开除。回家后，潜心苦读古典文学，打下了文学基础。

1918年，金满成与陈毅等人考入留法预备学校成都分校，次年与陈毅等人同赴法勤工俭学。9月中旬抵巴黎，后入圣日耳曼公学，半工半读，阅读了法国许多文学名著。他和陈毅、李立三、李富春、蔡和森、聂荣臻、赵世炎等人因反对李石曾、吴稚晖等人用庚子赔款在里昂所办的“中法大学”，必须交费才能就读的规定，进驻该校，被法国政府逮捕入

狱。1921年冬被押送回国。

后来,李石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为这批回国的留法学生筹办了"陆汉克学院"(即后来的中法大学),金满成继续入该校学习,专研法国文学及叔本华、尼采、孔德、卢梭等人的学说。1923年,陈毅在他的鼓励下也从重庆到了北京,与金满成再次同窗,还与王昆仑结成相知。他们开始在晨报上发表小品和散文。1925年他们从中法大学毕业。金满成毕业后曾赴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北伐。1927年他到上海,翻译出了法郎士的长篇名著《红白合》,还担任了《民众日报》副刊编辑。

1929年,金满成到南京与张友鸾、吴竹似等人创办了《新民报》,他主编副刊《葫芦》,发表了不少讽刺社会黑暗的杂文与诗歌,并和聂钳弩合创"什么诗社",出版定期的《什么诗刊》。后因《新民报》坚持抗日,反对妥协求和的言论而遭到当局刁难。金满成处境艰难,于1932年秋回到重庆,在《新蜀报》主编副刊。由于他开辟的栏目《金刚钻》、《新副闲话》等针对当局言词激烈,而险遭逮捕。经社长鲜英掩护,以考察灾区记者赴川北,待矛盾缓和,才返回报社。

1936年4月,金满成与肖林、尹树满等人创建"人力社",出版了《人力周刊》。1937年5月16日,《人力周刊》和《新蜀报》、《商务日报》、《大江日报》、《春云社》等联合发起成立了"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金满成被推为主席。这时期,他发表了长篇小说《静静的嘉陵江》,短篇小说《中日关系的另一角》,杂文集《鬼的谈话》。

1941年后,金满成离开报社,迁居江北,在刘家台创立"工人合作社",直到抗战胜利才结束。1947年冬,金满成赴越南探望病危的岳母,并参加了当地华侨《远东日报》的工作。他的文章"反殖民主义者"刊出后,为法国殖民当局所不容,被驱逐出境,至香港卖文为生。1949年初,随柳亚子等前往济南,陈毅特从前线赶来相见。

建国后,金满成先在全国总工会搞翻译工作。后调人民文学出版社作法国文学编译。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0年国庆前摘去帽子。晚年,他准备译完左拉的名著,准备写一部《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史》。由于十年浩劫,他的愿望未能实现。"文革"中,他多次被逼迫交待揭发"陈毅反毛泽东的罪行"。他拒绝做那种亏心事,被视为态度顽固而强制劳动烧砖,后因患肺癌不幸于1971年12月26日逝世。

金满成生前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还有:法朗士的《女性的风格》、巴尔扎克的《剥削者》、左拉的《金钱》、狄英普的《锤击集》等;与人合译的有:莫泊桑的《巴黎———市民的星期天》、阿拉贡的《共产党人》、亚马多的《黄金果的土地》等。

许可经

许可经，原名许存孝，三台县人，生于1904年10月16日（清光绪三十年九月初八日）。许可经自幼好学，特别喜好音乐诗赋。

1921年，许可经考入四川省立一中，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师从肖友梅、杨仲子学习和声、作曲及钢琴，并跟刘天华学习民族乐器。他结识了陈毅，并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梓光社”，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

1928～1932年，许可经在法国里昂音乐学院及巴黎师范音乐学院深造，专攻理论作曲和音乐教育专业。归国后，相继在四川大学艺术科、成都天府中学、东方美专、协进中学、重庆第二女师、重庆大学体育科等任音乐教师。1941年3月，他担任了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四川音乐学院前身）音乐科教授兼科主任。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他创作出版了《叱咤风云集》、《中华男儿血》、《湖边女》、《招魂合唱曲集》、《怒潮曲集》、《救亡歌曲集》。他创作的《抗战到底》、《打走日本人》、《妇女抗敌歌》在成渝各地广为传唱。他亲自到重庆大学、重庆国立女师院和一些中学校去教唱抗战歌曲。

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可经任重庆国立女师学院音乐系教授兼主任。1950年8月任西南师范学院音乐系教授兼主任。他亲自指导了音乐系教学楼、演奏厅及琴房的设计和修建。他在40年的教学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了一套高师音乐系的教学方法，针对“师范性”的特点，他拟定了抓好“三条主线”的教学计划，注重钢琴、声乐、理论三大基础课程，让学生达到能弹、能唱、能讲的要求，同时重视开设二胡、三弦、琵琶、扬琴等民族乐器普修或选修课程，还开设了艺术实践课和自修乐器课等，以提高学生指导中等学校课外活动的能力。由他领衔执教的西师音乐系（科）毕业的学生许多都成为音乐教育的中坚力量。对于普及中小学音乐教育起了重要作用。

许可经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曾当选为第二、三、四、五届重庆市人大代表。1960年出席了全国第三次文代会。“文化大革命”中，许可经遭到无理的批判和审查，1972年12月19日，因心脏病逝世。

许可经一生创作丰富，仅抗战歌曲就有60多首。影响较大的艺术歌曲有《湖边女》、《黄河难童船夫曲》、《綦江神女》、《阳关三叠》。其他创作还有钢琴曲《鹊桥》、《天安门进行曲》、《田间》等17首，小提琴独奏曲《和平之夜》、《祖国的春天》、《青春舞曲》等10余首，《小品管弦乐曲集》4首。他将西洋和声作曲技

法同中国民间音乐素材相结合进行创作，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旋律深沉而抒情、节奏鲜明紧凑，音调朴实而优美，和声丰富多彩。

何　鲁

何鲁，字奎垣，生于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广安县人。家境贫寒，有弟兄三人，何鲁行三。他从小聪颖过人，勤奋好学，对数学尤感兴趣。1903年，何鲁不满10岁，赴成都报考机器学堂，以第一名成绩被破格录取。毕业后，得官费保送入上海南洋公学，不久转入北京清华学堂就读。后因反对美籍教师无理辱骂愤而离校，改入北京留法预备学校补习法语。

1912年，何鲁与川籍同学罗世嶷等人，作为中国最早一批留法俭学生赴法国留学，考入里昂大学数学系，以精辟阐述《纯粹数矩阵论》一文，于1919年获数学硕士学位。同年，他辞谢了一些法国大学的聘请回国。面对当时旧中国贫穷落后、军阀混战，备受帝国主义列强欺侮的现状，何鲁认为，应当从教育着手，培育人才，唤醒民众，才能拯救中华，决心毕生从事教育工作。从回国后担任南京东南大学教授起，先后执教于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校、大同大学、广州学术院、中国公学、第四中山大学、安徽大学、重庆大学、云南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等校，担任过这些学校的教授、教务长、院长和校长。1931年受聘任重庆大学理学院院长后，曾长期在该校执教。1936年和1939年，分别在广安和重庆创办了载英中学，自任校长，收容贫苦学生或因参加进步活动被开除的学生。建国后，历任重庆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革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数学会理事等职。

何鲁在数学上造诣很深，是把现代数学最早引进中国的著名学者之一。他十分重视应用数学的研究，其论著多着眼于普及数学和对基础数学方面的介绍、传播，尤其对中等数学的介绍，起了较大的作用。一生著述甚丰，除多篇论文外，他所撰写的《商务算术丛书》，行世至今的，计有《二次方程式详论》、《代数》、《初等代数奇数变迹》、《微分学》、《积分学》、《变分法》、《行列式详论》（与段调元合著）、《虚数详论》（与段调元合著）等八种。他在《纯粹数矩阵论》中，阐明了由一种变数发展到多种变数的理

论,并在推进运用"矩阵"这一重要数学工具,判断线性方程组有解无解和如何解方面,取得一定成就,获"一代数学泰斗"声誉。直到晚年,他还计划撰写一本从初等数学到高等数学的《数学自学丛书》,可惜未能终篇,即遽尔逝世。

何鲁在数学教学中重视对学生的基础训练,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讲授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引人入胜。他以"为国储才为一大乐事",十分注意发现和奖掖后学,鼓励攀登,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培育了大批人才。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就是他在东南大学任教时精心指导的学生,并在经济上给以帮助,后又鼓励资助去法国留学。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成名作《堆叠素数论》写成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无人评审,乃请何鲁审稿。他在重庆的一幢小楼上冒着盛夏酷暑,挥汗审阅,不时拍案叫绝,对华罗庚的天才一再称赞。审完后,不仅作长序介绍,还以他"部聘教授"的名望,坚持给华罗庚数学奖,这是国民政府颁发的惟一数学奖。他还用工整小楷抄录了全稿共 12 大本,送给华罗庚。华罗庚十分尊重何鲁,后来他对人说:"熊庆来先生是我的业师,何鲁先生是我的又一业师。"中国不少著名专家、学者,如吴有训、钱三强、赵宗尧、柳大纲、吴文俊、吴新谋等都是何鲁的学生。

何鲁又是一位爱国进步的社会活动家。1911 年即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他一生追求民主,正气浩然,风骨坚贞,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深恶痛绝。他曾当面指责刘湘"把一个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搞得民穷财尽,啼饥号寒。"他公开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统治,反对国民党迫害进步人士,耻与贪官污吏为伍。抗日战争期间,何鲁在重庆慷慨陈词,痛斥国民党摧残教育、祸国殃民,使在场的政府官员狼狈不堪,轰动山城。当时延安的《解放日报》登载了这一消息。建国后,毛泽东接见何鲁时,还忆及此事,他与何鲁握手时称赞何鲁"你的胆子不小!"

何鲁所创办的载英中学,汇集了许多优秀教师和进步人士,还有当时失业的重庆大学和重庆中央大学的毕业生也被何鲁安置到该校任教,以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他不顾当局的种种阻挠,大力疏通《新华日报》在该校的销售渠道,传播进步思想,并掩护了一些共产党员和受迫害的进步人士。1946 年,何鲁加入九三学社,被选为监事。1948 年,加入民革,被推为民革西南执行部负责人之一,次年任民革川东区分会主任委员。他与周均时、税西恒等共同召开重庆文教界应变问题座谈会,组成"文教界应变联谊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与推动西南四省民革成员的地下斗争。建国后,邓小平、刘伯承曾于 1950 年专门宴请何鲁、税西恒等人,感谢他们对共产党地下工作的支持,并鼓励他们为建设新中国作贡献。

何鲁博学多才,通晓法、英、德、俄等

多种外语，擅长诗文，精于书法。他在为吕子方所著《〈三统历〉历意及其数源》一文所撰序文中，引古论今，立意新颖，论断确凿、精辟。他对古典诗词也有相当造诣，无论游踪行迹所至辄记之以诗，或睹物兴怀，或抚今追昔，一生留下的诗词有数千首。新中国成立后，他受新人新事激励，激情涌向笔端，诗词间充满了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由何郝炬选稿、广安县政协和岷峨丛书编辑部合编的《何鲁诗词选》，已由巴蜀书社出版发行。何鲁的书法先学颜、柳，后习欧、王，博采众长，自成一家。他的楷书，既有欧字的锐利俊秀，又融二王笔意，兼有汉碑的特色。其书法作品曾东传日本，受到日本书法界的赞赏。存世之手迹有《千字文》、《景福殿赋》、《孙过庭书谱》、《宋姜尧章续书谱》、《史游急就篇》、《狮子赋》等。

1973年9月13日，何鲁病逝于北京，葬八宝山革命公墓。当时正是"四人帮"横行年代，姚文元主宰宣传大权。经周恩来批示，《光明日报》冲破阻力，刊登了何鲁逝世的消息，开"文革"后《光明日报》以自稿形式登载高级知识分子逝世消息的先例。

贺昌群

贺昌群，字藏云，马边县人。生于1903年10月5日（清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五日）。1921年毕业于成都联中。1922年初，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得以结识了在该馆工作的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等文化界名人，并参加了文学研究会。

从1926年起，贺昌群开始在《文学周报》、《语丝》、《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刊物上发表文章。他兴趣广泛，涉猎于广阔的学术领域，特别嗜好文学、哲学和心理学。后来，他决定在学术研究上找到一个重点，作为自己终身从事的方向。经再三忖度，加之又受到日本和西欧汉学的影响，便转而治西北史地、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

为了阅读被日本财阀从中国收购去的"东洋文库"的丰富藏书，贺昌群于1930年4月间，请假东渡日本，着重查阅了大量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著作和记载，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1931年，贺昌群辞商务印书馆职，任教于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1933年转任北京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并同时担任北京图书馆《图书季刊》和《大公报》图书副刊的编辑工作。此间，他利用北京图书馆丰富的馆藏，特别是其中由国外出版的有关汉唐的罕见考古书

籍,对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同时又根据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考察成果和新近发现和出土的考古材料,参照历史记载,相互印证,追本溯源,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先后发表的重要学术论文有:《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唐代女子服饰考》、《流沙坠简校补》、《汉代以后中国人对于世界地理知识之演进》、《大唐西域记之译与撰》、《汉初之南北军》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贺昌群举家南迁,到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授。1939年夏,应马一浮之邀,到四川乐山任复性书院教务长之职。不久,因与马办学意见不一致,辞去任职,移居乐山白云庵,撰写魏晋南北朝史。

1940年,贺昌群应故乡马边人民之邀,回县创办了马边中学,并担任第一任校长。1940年冬,应蒙文通约请,至四川三台东北大学代课1年。此后即受聘赴重庆任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

20世纪40年代,贺昌群致力于研究汉唐及魏晋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他认为,自秦汉以来,古代西域是中国、印度、波斯等几种文化的交汇点,研究西域,可以探寻出这几种文化的线索。他又认为,汉、唐文化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因此,他特别重视对古代西域和汉、唐文化的研究。完成了《烽遂考》、《论两汉政治制度之得失》、《唐代文化之东渐与日本文明的开发》、《汉末大乱中原人民之流徙与文化之传播》、《汉唐精神》、《魏晋清谈思想初论》等多篇功力深厚的论著。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全国民主运动迅速高涨。12月,重庆学生为制止内战,声援昆明"一二·一"运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贺昌群积极支持学生的斗争,并参加了游行。

1946年,中央大学从重庆迁回南京后,贺昌群担任了历史系主任。他延聘罗尔纲、向达等具有真才实学的名教授在系里授课,使中国史的教授阵容极一时之盛。1947年四五月间,南京学生不畏强暴,展开了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斗争。贺昌群与其他进步教授一道,坚决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并挺身而出,起草教授会宣言,激励了学生的斗志。随后又参加了"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他还经常在学生集会上发表演说,并掩护一些中共地下党员的活动,因此受到国民党特务监视和迫害。南京解放前夕,贺昌群被当局列入黑名单,为了防备敌人下毒手,他应邀至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直到上海解放才回到南京。

建国后,贺昌群任南京图书馆馆长,发动工作人员编印了《国立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8厚册。他又亲赴东北、华北各地,通过接管、收购、合并等方式,使馆藏图书由原110万册猛增到200多万册,成为当时国内藏书最多的图书馆之一。在纪念太平天国起义百周年时,贺昌群积极参加了组织工作,并将罗尔纲

主持的太平天国资料编纂委员会设在馆内，大规模地查阅馆藏书籍，抄录了上千万字的太平天国史料。

1954年，贺昌群调至北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兼科学院图书馆副馆长。他亲手购进了藏书家徐行可的藏书和邓之诚所藏大批清代诗文集。1958年，因心脏病的频繁发作，辞去兼任的图书馆领导职务，专力于学术研究工作。1964年，他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贺昌群治学谨严求实，十分重视新史料和新观点，未经反复斟酌成的著述，从不轻易发表。建国后，他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努力把唯物主义理论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中西交通文化史方面，他写了《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的印度巡礼》、《伟大的旅行家伟大的文化使者——论玄奘的西行在古代中国与西域诸国文化交流上的影响》等论著。同时，他又在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和农民战争的研究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发表了多篇有关的论文，出版了《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的专著。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在宋代之前，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的见解，引起了史学界广泛的注意。

1973年10月1日，贺昌群因病逝世于北京。生前他将自己多年苦心搜攒的有关研究汉唐的全部典籍捐赠成都杜甫纪念馆。

陈文贵

陈文贵，又名愠愧，生于1902年8月23日（清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永川县人。6岁入私塾，12岁读江津县聚奎小学，1917年进江津县中，次年转入重庆私立求精中学。1923年入长沙湘雅医学院。

1926年秋，陈文贵受大革命风暴熏陶，在学院中共地下党组织支持下，出任学生会会长，组织和支持学院学生、职工举行罢课、罢工，被校方视为“赤化”分子，列入黑名单，通报其他医科学校。陈文贵离校前往武汉，加入国民革命军十一军二十四师，任师部卫生队队长。1927年7月，随队去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部队向广州进军途中，遭到敌人围追堵截，陈文贵在枪林弹雨中，十分勇敢地抢救伤员。后奉命去汕头购运救护药品，在返队途中，不幸于揭阳县汤坑被俘。他乘敌不备，逃离虎口，经武汉回到家乡。

1928年春，陈文贵转入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医科，1929年毕业，获博士学位。同年赴北平协和医学院病理科任助教，研究细菌血清病理学。这一时期，著有《嗜菌体对霍乱细菌的分解》、《恢复期病人霍乱细菌的粗型》、《从疫苗病毒提取特异性溶解物质的程序》等多篇论文，分别发表在美国的《实验生物》和《医学会刊》上。

1934年夏，陈文贵去国民政府西北防疫处、蒙绥防疫处任职，以技正代行处务。1936年春，被国际联盟卫生组织聘为公共卫生视察员，到印度孟买哈佛金研究所进行鼠疫防治研究，并赴印度南部及南洋一带考察鼠疫防治措施，撰写了《参观访问印度防治鼠疫的报告》。

1937年“七七”事变后，陈文贵去南京国民政府军医署任第一防疫大队队长职务。曾秘密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会见廖承志，获介绍信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洽。他率防疫大队去西安途中，视察了陇海铁路沿线的伤病员防疫工作，并为延安送去大批医药器械和药品。12月到延安，在此设立防疫第四分队。后被特务告密，国民党当局以他去延安事前不请示报告为由，撤销其第一防疫大队队长职务。陈文贵愤然离开军医署，去贵州筹建疫苗血清制造室，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检验学组主任，兼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检验学指导员，同时兼任贵阳医学院细菌学系教授。他专心致力于细菌学研究，半年时间就研究出单纯霍乱疫苗、破伤风类毒素和伤寒菌混合疫苗、伤寒副伤寒霍乱四联菌苗及狂犬病疫苗，为中国生物制品的制造打开了禁区，受到军医署传令嘉奖。

1940年底，国民政府卫生署在重庆召开全国卫生技术会议，秘密讨论浙江宁波鼠疫流行案。陈文贵根据汇报的情况，尖锐而肯定地指出：日本在中国进行了细菌战，应立即训练侦察敌人生物战和防止生物战的专业队伍。1941年11月，日军又一次在湖南常德进行细菌战，造成该地区人工鼠疫流行。陈文贵立即率队前去调查，以日军空投带有感染了鼠疫杆菌的跳蚤制造鼠疫的事实，撰写了《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成为日军进行细菌战的最早见证人和控诉人。该报告书被国民党当局修改扣押，未能发表。

1944年冬，日军攻占独山，贵阳告急。陈文贵组织力量，将疫苗血清制造室的全部药物器械运抵重庆。1945年春，陈文贵任重庆市宽仁医院副院长兼医务主任。他在张孝骞院长的帮助下，聘请了各医学院校毕业的医师，随即培修病房，改善病房条件，扩大门诊，提高职工待遇。

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陈文贵主动向有关领导部门表示：“我年虽半百，愿为人民的卫生事业贡献绵薄。”1950年2月，陈文贵任西南军政委员会

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的临时卫生顾问。这时传染病四处流行，迅猛蔓延。陈文贵和西南卫生部的同志，发动医务人员给小孩普种牛痘，开展各种防疫工作，使一些传染病很快被控制下来。他还深入滇西鼠疫流行的弥渡、祥云等县，发动群众捕鼠，进行预防注射，抢救重危病人，控制了鼠疫流行，并筹建了滇西鼠疫防治所。

1950年7月，陈文贵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华医学会西南分会理事长。1951年12月底，率领中华医学代表团，出席匈牙利召开的微生物学会第一届代表大会，为揭露帝国主义施行细菌战的罪行，交流反细菌战经验，研究防治措施而奔走。

1952年初，美国悍然践踏国际公约，在朝鲜进行大规模细菌战，中央卫生部派陈文贵率领中国专家组赴朝，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卫生部顾问兼检验队队长。他冒着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前往受细菌袭击的现场作实地调查，搜集美国空投下来的昆虫、细菌容器等实物标本，了解因感染病菌而致病、致死的人和牲畜的情况。他根据在湖南常德反对日军细菌战中积累的经验，用严格的科学方法，从搜集的昆虫体中，分离出了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炭疽杆菌、伤寒杆菌、副伤寒杆菌、赤痢杆菌等毒性很强的病原体，以确凿的证据，揭露美国侵略者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罪行。国际科学委员会派人作了两个月的实地调查，对中国提出的事实证据，表示信服，一致签字承认美国在侵朝战争中使用了细菌武器。国际科委对陈文贵的工作予以高度的评价。

1952年10月，陈文贵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同年12月，又出席了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他以中国代表团成员、细菌学专家身份，就亲临现场目睹的事实，出示美军进行细菌战的实物，愤怒揭发和控诉美军使用细菌武器的弥天大罪，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对中朝两国人民反对美军细菌战的正义斗争的同情和支持。为表彰陈文贵为祖国人民和世界和作出的贡献，中国政府发给了荣誉奖状和奖章，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授予陈文贵二级国旗自由勋章。他回国后，还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设宴招待。

1952年后，陈文贵任卫生部防疫司司长。他不辞辛劳，多次深入各地调查研究，开展防疫工作，并积极筹建微生物学流行病学研究所，还举办流行病学医师进修班，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既懂理论，又有实际工作经验的流行病学干部。他被评为一级教授和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61年，陈文贵出任四川医学院副院长，主管科研工作。他进一步筹建和完善了四川医学院的科研组织，审定各项科研选题，还多次率领医疗队去专

县巡回医疗。

“文化大革命”中，陈文贵被列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残酷批斗。1970年被送去大凉山劳动改造，于1974年6月15日与世长辞。

蔡绍序

蔡绍序，安岳县人，1909年（清宣统元年）生。自幼热爱音乐，喜好川剧。

1928年，蔡绍序中学毕业后考入成都艺术专科学校。1930年秋赴上海，以第二名成绩，考入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上海音乐学院前身）声乐系，师从应尚能，学习声乐。同时他还求教于俄罗斯女中音歌唱家、声乐教师克利罗娃。两位名师的指点，使他在技艺上获得相当显著的进展。“八一三”事变后，克利罗娃病逝，他才结束学习生涯。经香港、越南、昆明抵达重庆，在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从事教学工作，并经常参加演出活动。1942年他因与新任校长意见不合愤而离职到成都，在南虹艺专任音乐系主任。后来川大校长黄季陆又聘请他兼任四川大学教授，负责川大合唱团。

蔡绍序在成都时，为养家活口，每年都要举办独唱音乐会，以票房收入补贴家用。他主要演唱地点是暑袜街礼拜堂，他当时演唱的歌曲主要有《打柴歌》、《满江红》、《茶花女》中的《饮酒歌》。他的音域宽广，音量足，音色纯正，起伏跌宕，悦耳动听。每次演唱，听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他与花腔女高音歌唱家郎毓秀合作演唱的《满园春色》录制成唱片，堪称珠联璧合。

建国后，他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二军文工团工作。1950年秋，他举家赴上海，受聘于上海戏剧学院歌剧系，任教授。1951年3月，他随中国青年艺术代表团赴德国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随后又去苏联及东欧各国巡回演出。翌年载誉归国后，调任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教授，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1954年他又参加了中国文化代表团赴印度访问演出。

蔡绍序是中国歌唱家中卓有成就的一位。他演唱特点是：把建立在科学发音法基础上的欧洲唱法用之于唱好中国歌，他从学生时代起就一直进行着这方面的探索。他唱的《车水歌》、《打柴歌》、《太阳出来喜洋洋》、《槐花几时开》，充满了四川乡土风味，《李有松》、《罗嗬嗬》这两首歌则有鲜明的江浙地方特色。他演唱的《黄河颂》、《黄河之

恋》、《热血》及古曲《满江红》等慷慨、激越、悲壮、高昂。

“文化大革命”中，蔡绍序遭到无情的迫害，于1974年2月26日含恨辞世。1981年11月得以昭雪。蔡绍序生前著有《发声学》。

蒲辅周

蒲辅周，少名启字，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生于梓潼县西溪沟。祖父蒲国桢，父亲蒲显皆以医为业，名闻乡里。

蒲辅周自幼勤奋好学，15岁时开始随祖父和父亲学习医学。家庭对他要求十分严格，常教育说：“医乃仁术，如不下一番功夫，不足以为医”。其时，祖父在梓潼东街开了“杏林堂”。蒲辅周铭记家训，白天在“杏林堂”侍诊，晚上刻苦攻读中医书籍，每感购买医书十分不易，多方向人借阅。他曾借得日本著名学者丹波氏所著的巨型医学丛书《皇汉医学》一部，该书内容丰富，论述颇精，蒲辅周爱不释手，每晚读至深夜。边读边摘抄，先后历时数月，方将全书学完。蒲辅周对此十分感慨：外国人尚对中医有如此精深研究，中国人岂甘自卑？他献身医学的志向，更加坚定。

三年之后，蒲辅周独立应诊于乡，辅周之名乃此时所取，意在以医术辅助贫弱，周济病人。

蒲辅周既得家传之秘，又勤奋努力，在医疗技术上长进很快，逐渐得到家乡人的信赖。但他感到，自己虽然有了一点名气，但毕竟是初出茅庐，刚刚踏进医学的深宅大院，在临床上有功亦有失，许多医疗问题还须探索和研究，尤其是中医经典著作，更有进行一番系统学习的必要。于是，他断然闭户停诊，用三年的时间，集中精力研读了《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典籍，从中领悟了中医学的许多真谛奥旨，为其一生的医学事业，打下了牢实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蒲辅周又善于吸取民间经验，广泛搜集秘方验方。如他在临床上屡见奇效的眼科秘方“九子地黄丸”和伤科良方“百损丸”，都是从民间医生那里得来的。

蒲辅周从早期行医开始就对中医各家学说，能取其所长，不存偏见。不仅潜心于伤寒的研究，而且重视温病的研讨。他特别崇尚温病学家杨栗山的《寒温条辨》。从中获得许多宝贵的教益。后来蒲辅周在治疗“乙脑”中总结出的“八法”（即辛凉透邪、逐秽通里、清热

解毒、开窍豁痰、镇肝熄风、通阳利湿、生津益胃、清燥养阴）就是根据杨氏等温病学家的理论经验，结合自己的实践体会而得的。在蒲辅周的倡导下，梓潼中医界伤寒、温病两派，打破隔阂，互磋医术，兴了会诊共商之风。

在此期的临床实践中，蒲辅周还注意总结失败的教训，精益求精。曾治范姓友人，蒲辅周以为是一般感冒，未加重视，开了一付辛热解表的麻黄汤予服。未久，患者病势加剧。速往复诊，方知是温病误作伤寒，用辛热药所致。经极力调治，方才化险为夷。此事对蒲辅周震动甚大，深感作为医生，首在认真负责，每遇一症，必加详察细究，辨证施治，否则贻误病人，造成医疗事故。

1934 年，蒲辅周到成都行医。此间数年，他以医技活人，内、妇、儿科俱精，尤善治外感热病，以诊断精细、辨证准确、用药审慎、疗效显著闻名，他还特别讲究药物炮制，用要方药，多在“泰三堂”等成都名药店配制，所以疗效特佳，治愈了许多危重病人。他平易近人，诊病不论贫富，皆尽心尽力，贫困无钱者，还施以药物，以故医名大振，成为成都孺幼皆知，人所喜爱的名医之一。

1945 年夏末，成都连绵大雨，街巷庭院，积满了水。许多人家的小孩患麻疹，发烧不止，疹毒去皮下隐伏，发不出来，医生们用辛凉宣透的常用办法医治，不见疗效，患儿丧生者与日俱增。蒲辅周心急如焚，默思苦索几个夜晚，突然从中医运气学说中得到启悟，断定此次成都小儿麻疹，与多雨湿热的季节气候有密切关系。于是改用“温化”之法，在方药中加进麻黄一味，使患儿疹毒豁然而出，热退神清而愈。此法推广，均获奇效，为制服此次成都麻疹病疫肆行建一首功，传为佳话。

建国初期，蒲辅周受聘于西南铁路医院。1956 年 1 月，蒲辅周奉调北京中医研究院，从事中医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此前，石家庄地区总结了治疗乙脑的经验。1956 年 8 月，北京地区乙型脑炎流行。医院按照石家庄的经验（清热、解毒、养阴），用中药白虎汤和输氧、注射青霉素等西法治疗，均不奏效。有的患者不仅高热不退，而且病势加重。患者急剧增加，疫情大有蔓延之势，严重危及首都人民，特别是儿童的生命安全。中央卫生部采取紧急措施，组织中西医专家组成乙脑医疗工作组，在北京市传染病院和儿童医院进行观察治疗。在此紧要关头，蒲辅周作为专家组成员，提出了独特的见解：用温病治疗原则治乙脑是正确的，石家庄的经验也是很宝贵的，但关键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辨证施治。中医历来讲究“必先岁气，毋伐天和”，外感热病必须掌握季节气候特点。石家庄与北京的乙脑虽同在暑季，但石家庄久晴无雨，乙脑患者偏热，属“暑温”，用白虎汤清热

润燥，故见奏捷；而北京今年雨水较多，天气湿热，患者偏湿，属“湿温”。倘不加辨别，而沿用清凉苦寒药物，就会出现湿遏热伏，不仅高烧未退，反会加重病情。正确的办法，是采用宣解湿热和芳香透窍的药物，湿去而热自退。蒲辅周之见，群医称是，即改投通阳利湿法，效果立竿见影，不少危重病人转危为安，一场可怕病 疫得以迅速遏止。9月4日，《健康报》在头版消息中用大标题报道了这场战果，一时在全国传为佳话。中医界尤其为之鼓舞。

蒲辅周又对腺病毒性肺炎、冠心病和肿瘤等疾病进行观察研究，总结治疗规律，取得较大成绩。在担任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国际友人的保健工作中做出突出的贡献，并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医学骨干人才。

1962年，蒲辅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先后任中共中医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国家科委中医专题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和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蒲辅周晚年视力极差，但勤学精神不减当年，他常告诫家人和学生，人的智力虽各有差异，但贵在勤。医生如果分为三等，他只能算中等。几十年来，他就是靠一个“勤”字，在医学的道路上不断学习实践和前进的。

1975年4月29日，蒲辅周病逝于首都医院。他一生忙于诊务，其宝贵经验，由其学生进行整理，出版了《中医几种急性传染病的辨证论治》、《蒲辅周医案》、《蒲辅周医疗经验》等论著。蒲辅周之子蒲志孝，整理汇集了《蒲辅周医话》。

章　泯

章泯，原名谢兴，又名谢韵心，笔名杜山、陆擎等。峨眉县燕岗乡人。1907年2月11日（清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生。其父为清末秀才。章泯1岁丧母，幼年从父读书，1918年考入成都第一中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席卷到成都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成都的“春柳剧社”演出时事剧《徐锡麟刺恩铭》、《安重根刺伊藤博文》、《威尼斯商人》（演出时改名为《一磅肉》），受到市民的喜爱。章泯深受这种环境的影响，对新文学和新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3年，章泯考入了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他在北京结识了萧三，1926年由萧三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此后，他致力于研究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新戏剧艺术。

章泯毕业后，因时局动乱，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0年，他从北平来到上海。1931年，“左翼戏剧家联盟”一成立，章泯就立即参加，并当选为执委。次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章泯创作了《东北之家》、《黄浦江边》、《我们的故乡》、《妇女进行曲》、《家破人亡》、《生路》等独幕剧、多幕剧，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义愤。他在上海先后导演了抗日名剧《放下你的鞭子》，世界名剧易卜生的《娜拉》、果戈理的《钦差大臣》、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大雷雨》，在上海剧坛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撰写了《戏剧的现在和将来》、《悲剧论》、《喜剧论》等专著和论文。还系统地翻译介绍了国外特别是苏联的戏剧理论著作，如阿·杜克斯的《近代戏剧家》、波斯瓦的《哈姆雷特对演员的忠告——莎士比亚的表演论》，契莱的《戏剧的本质》，特别是翻译介绍了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著作，对中国戏剧艺术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是中国最早介绍并实践斯氏表演体系的人。1937年5月，章泯在上海与葛一虹等一起创办了《新演剧》月刊，宣传革命现实主义的戏剧理论，特别是斯氏表演体系，为建立中国自己的表演艺术体系培养了不少人才。

抗日战争爆发后，章泯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戏剧活动。在武汉参加了话剧《保卫芦沟桥》的导演工作；在桂林导演了他创作的《我们的故乡》和于伶的话剧《夜光杯》。同时，他又创作了《血》、《战斗》、《钢表》等抗战剧本。发表了论文《论战时工农演剧》、《新悲剧论》。1938年入川，在成都四川省立戏剧学校任教。1939年到重庆，在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任戏剧组主任，同时被聘为中国电影制片厂特约编导委员，撰写出版了《表演艺术论》。1940年底他被安排在郭沫若主持的重庆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从事剧本创作和戏剧理论研究。皖南事变后，章泯辗转流徙，先后在香港、东江游击区、四川江安等地从事戏剧教学和创作工作。他导演过《希特勒的杰作》、《北京人》、《家》、《孔雀胆》、《天国春秋》等戏剧。与郑君里合作翻译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单独翻译了斯氏的《演员的筋肉松弛》、《交流》，史莱格尔的《论闹剧与趣剧》，创作了多幕剧《苦恋》。

抗战胜利后，章泯到了香港。1946年，他导演由中原剧社演出的话剧《阿Q正传》，创作了话剧《虎》、《村中之夜》。后来，他又撰写了总结自己多年舞台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成果的重要著作《演员与导演》一书，创作了电影剧本《红尘白璧》（即《怨偶情深》），导演了电影《结亲》，编导了故事片《静

静的嘉陵江》、《冬去春来》。

建国后，章泯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电影工作者协会，并当选为理事，还担任了中央电影局艺委会主任。20世纪50年代初他在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团导演大型苏联话剧《俄罗斯问题》，与吴雪合作导演了《在新事物面前》，他还翻译了美国海夫纳著的《戏剧导演手册》、和苏联罗沙里著的《苏联电影的实验》。

1955年，他参加中国第一个电影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的创建工作，先后担任北京电影学院的副院长、院长、党委书记的职务。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章泯因为对江青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戏剧界的行为有所了解，而深受江青的打击陷害，在江青亲自干预下，章泯遭到无情的摧残、凌辱，1975年2月4日逝世于北京。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章泯才得以平反昭雪。

傅润华

傅润华，原名德荣，字天正，长寿县人，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生。父亲傅志清早年赴日本留学，在日期间，曾参加过春柳剧社，热心新剧（话剧）。幼年的傅润华在六七岁时就参加了新剧演出，并接触到杂技艺术。

傅润华自幼受过良好的正规教育，会英、日语。他就读于成都大学期间，深得其师吴芳吉器重，他助吴整理出版《白屋吴生诗稿》。成都大学停办后，傅润华转学于北京大学文学系。毕业后，他在成都、重庆的几所中学教书，后又在重庆《国民公报》作编辑工作，编著出版过《女诗人薛涛》。

傅润华虽曾参加过中国青年党，但他对政治兴趣不浓，他最感兴趣的是魔术。他进入魔术界并非为了生计，而是由于强烈的兴趣爱好，从业余而专业。魔术这门“保密性艺术”对他富有强烈的吸引力。他对中国传统的幻术“九连环”兴趣极浓，早从9岁起便钻研魔术，到大学毕业前他已遍访四川、浙江和上海的魔术师张敬福、莫悟奇、张慧冲等名家，并与他们结下了友谊。后来，他在重庆《国民公报》工作之余，常研究大量的外国魔术书籍。他的大学学历使他能对中外魔术进行比较研究。他认为源于生活的魔术，是人们对幻想的特殊反映，而这种反映在现代必须凭借科学原理才能突破创新。中国传统的魔术只有与声、光、电、化（学）紧相连，才能发扬光大。他在研究书本的同

时，不断实践，常常利用家庭宴会和学校晚会作业余表演。

1943年，傅润华组织了中国环球幻术学社，将妻子曾庆薄的妆奁——幢房产卖去，全部作为建立中国环球幻术学社的资金，该社社址在重庆四德村，演出在扬子江舞厅。一面对外公演，一面招收学生培养新人。后迁至成都，社址在守经街，演出在新又新大戏院（今四川电影院址）。

傅润华的魔术长于“手采”，他演出的“手采”节目稳、准、快，心手相应，出神入化，引人入胜。仅扑克一样，能在掌上变100多种戏法。他演出的节目大都紧扣时代脉搏，在抗日战争时期演出多与抗战紧密关联，如《枪毙汉奸》、《腰斩土肥原》，把幻术的变化与“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以及万众一心抗日斗争紧密联系起来。其胞弟傅天奇（即傅德雍）受其影响，终身从事魔术事业。抗战胜利后，兄弟二人合编《中国八年抗战大画史》，1946年在香港出版。为编此画册，他们俩人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收集了平型关战役等资料，该画册全面地反映了八年抗战。

建国后，傅润华任新中国幻术歌舞团、天正幻术创研实验社主任，在重庆大众艺园演出。他还被选为重庆市人民代表。1953年，傅润华受上海魔术团聘请任该团总导演。他把积累的10多箱宝贵服装、道具全转让给上海魔术团。他在该团工作10多年，为丰富上演节目，提高艺术质量，培养新生力量作了大量的工作。

傅润华还从事魔术研究，建国前编撰出版有《群众魔术》、《中国民间戏法》等专著。建国后他自学俄文，精通了四国语言。晚年立志要完成两部专著：《中国魔术史》、《中国杂技史》，他已在上海收集了不少资料，写出部分初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中断了写作。1975年病逝于上海。粉碎“四人帮”后，由其女傅起凤将《中国魔术史》整理完稿交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邬宗岳

邬宗岳，云阳县城关镇人。生于1933年1月12日。其父邬泽鑫从商。邬宗岳从小品学兼优。1946年考入重庆南开中学，课余特别爱好体育运动，被推为校“环球队”（包括篮、排、足球）总队长。

1951年元月，邬宗岳报名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被编入西南军区空军第四航空预科总队。1951年12月10日，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预科总队

学习期间，他被选为业余篮球队队员。

1952年下半年，邬宗岳被分配到西南军区空军政治部体训班。由他任队长的西南空政男子篮球队在四川省首届运动会上获冠军，又在全国空军运动会上获冠军。全队因此荣立三等功，邬宗岳因表现突出荣立个人三等功。1954年他因领导全队训练突出又获三等功。

1955年3月，邬宗岳转业到成都铁道部第二工程局火车头体协，他又获“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和“优秀职工”称号。

1956年，邬宗岳考入成都地质学院找矿系56115（后改56103）班。他先后担任学院体育部长、学生会副主席，又是院篮球队队长和院手球队主力队员。繁重的社会工作和比赛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学习。在生活上他严于律己，乐于助人。

1960年初，他大学尚未毕业，就被选派去参加首次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任务。从北坡攀登珠峰，当时尚无成功的先例。因此北坡被称为“不可攀援的”和“死亡的”路线。中国登山队装备极差，任务艰巨。邬宗岳担任后勤工作，他以坚忍的毅力，克服强烈的高山反应，把物质、食品运到海拔8500米高的营地。为中国登山队首次从北坡登顶成功，当了一块铺路石。国家体委授予他“运动健将”称号。

此后，邬宗岳还在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学习摄影技术。很快便成为一名优秀的登山队员和出色的教练。1961年6月，他带领中国女子登山队，登上海拔7595的公格尔久别峰，打破了女子登山高度的世界纪录。在这次攀登中，他不顾个人安危，两次从十几米深的冰缝中，抢救出遇险的战友，荣立一等功。1964年5月2日，邬宗岳和其他九名男运动员登上海拔8102米的希夏邦马峰峰顶，在气候极端恶劣的情况下，他冒着生命危险，成功地拍摄了中国登山运动员首次攀登这座高峰的电影，荣立特等功，并获国家体委“五好运动员”称号。在国庆十五周年时，他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17天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文化大革命”中，登山队瘫痪。1974年初，邬宗岳回到中国登山队。当时，中国准备组织男女队员一起攀登珠峰，进行综合科学考察，拍摄电影及登顶照片。邬宗岳任登山队党委委员、副政委，并兼任登顶第一突击队队长，负责拍摄电影，承担心电遥测任务。

邬宗岳当时年已42岁，即将开赴西藏时，长期分居两地的妻子才由成都调来北京，他顾不得安排好家务就匆忙地奔赴西藏。1975年3月13日，登山队在珠峰山麓的绒布寺扎下了大本营。

队党委决定派邬宗岳带领第一突击队首先突击珠峰。他向党表示：“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带领大家登上顶峰！”登山队中，他年龄最长，任务最重，他除了要背装备、食品外，还比别

人多背电影摄影机、电影胶片、报话机和信号枪，身穿“电极衣”承担心电遥测任务。为了抢拍登山镜头，他时而要在队伍前头，时而要走在队伍后面。攀登到7600米营地时，邬宗岳冒着零下30℃的严寒，解开衣服，将穿着的“电极衣”上的插销固定在心电发射机上，裸露着手、脚在雪地上躺了约20分钟，向大本营发射心电讯号，经过两次试验，终于测试成功。5月4日，他在8200米高度前进途中又拍了不少镜头。下午7时到达目的地。他向大本营汇报后，在外国人从未进行过心电遥测的高度——海拔8200米处，他又躺下，向大本营发出了心电讯号，成功地取得了心电图，为研究人类对特高海拔的适应提供了宝贵资料。

5月5日，邬宗岳抢拍了攀登8300米附近冰坡时的惊险镜头。连日的操劳使他精疲力竭。在生死关头上，他想到的是把氧气留给别的同志，想到的是人民的事业。

两小时后，当队伍到达8600米营地时，同志们才发现邬宗岳未到。5月27日，邬宗岳的遗体在8300米的悬崖上被发现。邬宗岳为中国登山事业战斗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1975年7月18日，国家体委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邬宗岳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在他读书的中学、大学里，为他竖立了纪念碑和身着登山服的雕像。

严雁峰　严谷声（合传）

严雁峰，原名祖馨，字德舆，后以岳莲名，更字雁峰，别号贲园居士。陕西渭南人，生于1855年（清咸丰五年），卒于1918年。

严氏三世行商于蜀，以盐业起家，号称巨室。严雁峰幼时随母入川，定居成都。1876年回陕西参加科考，中秀才，补廪生。当年秋返蜀奉母，入成都尊经书院。严雁峰和书院的杨锐、廖平、宋育仁、吴之英、张森楷等知名之士，相互切磋学问，学业大进，以诗文著称，深受山长王闿运的器重。王在离蜀回湘时，将手书《湘军志》稿及《圆明园词卷》赠严雁峰以作永久纪念。

严雁峰曾归秦3次参加乡试，皆不第，因此厌弃八股，敝屣功名，遂绝意进取，决心以搜求典籍，校刻古人著述为志。不惜重资，购得不少珍本书籍。他所收藏的胡林翼、严树森、曾国藩来往信札手稿，以及用兵的山川舆地图，顾炎武的《肇域志》手抄本，刘永福幕僚的《使越日记》等等，都是极为珍贵

的历史文献。严雁峰将搜集来的海内精本图书，在成都骆公祠街（今和平街）筑“贲园书库”藏之，并陆续收购，增添库藏。根据张森楷核计四部之书：“一万四千一百四十五科，为卷十一万五千二百三十有二，为册四万五千九百八十有二，侈侈隆富，甲蜀中收藏家”。

严雁峰虽有藏书甲蜀中之誉，却不视藏书为古玩摆设，所收善本，殆皆遍读，以博览强记闻名。他把经营多年的盐业变卖，除继续收购书籍外，还修建书坊，亲自斠镌善本书籍。曾校勘刻印了《关中金石记》、《毛河西四种》、《明四子诗集》、《戴东原文集》等多种。晚年更以著书教子为终身大事。他著有《辟耳集》、《既冠集》、《太华归来集》。其子严谷声将上述各集合刻为《贲园诗钞》（其中有著名叙事长诗《东乡行》，笔录东乡冤狱于诗前）。他还有《读晋书笔记》、《随笔四卷》等稿本。严雁峰曾拟回原籍兴学建祠，辑《渭南严氏孝义家塾丛书》，仿汲古阁毛氏刻书，以饷后学，粗有眉目，未竟而殁。

严雁峰无子，以陕西老家族人之子严谷声为嗣。严谷声，本名式诲，严雁峰根据《诗经》：“教诲尔子，式谷似之”之意，赐名谷声。生于1890年，入川时已过学龄。严雁峰深感后学艰苦难成，除亲授以诗文外，为勉之以学，特为其书斋取名为“时过学斋”，以示警励。嘱其读书，整理古籍，并引用黄宗羲《书天一阁藏书记》中：“读书难，藏书更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又难矣”来告诫严谷声。

严谷声遵循教诲，勤奋好学，广交天下著名学者，耗费重金继续修建贲园书库，整理古籍。1924年，贲园书库全部建成，严谷声遵父遗嘱，敦请张森楷来家课读，并“乞编贲园书目”。张森楷整理书目时，严谷声随侍在侧，耳闻心记，承教不倦，积累了丰富的整理典籍的实践经验。他对古籍版本、纸色、册数、品种、刊地之鉴别，凭肉眼观察，手触感摹，而无谬误。对各种典籍版本校勘，有较深的造诣。他学识渊博，深谙古代典章制度，风土人情，名人掌故轶事。又因贲园多金石地理书籍及历代名人字画，所以严谷声旁及金石书画文物的鉴赏。

严谷声一生致力于收藏各种版本图书。贲园所藏经、史、子、集四部皆备，所收地方志2000余种，并以奇书、精刻善本、孤本驰名海内外，藏书总数达30余万卷，较其父原藏多3倍。他还大量搜集秦、汉、魏、唐、宋、元、明各代碑文拓片，以及历代名人法贴。

严谷声继承乃父遗志，着手续编《渭南严氏孝义家塾丛书》。首先编辑《音韵学丛书》凡32种，123卷，集唐宋以来音韵大成。他延请川中学者龚道耕、向楚等到贲园进行校雠工作，达数年之久，并专程去苏州就教于章太炎，章欣然为之作序。又重校稽古楼本“四书”，补校抱经堂本《颜氏家训》7卷，

附补校注1卷，辑有阮元等注《曾子四种》，缩刊明世德堂本《老子道德经》等。1924年，严谷声又校补刊印其父在清光绪宣统间校勘验方的中医丛书《医学初阶》4种，次年还勘印了《伤寒论条辨》8卷。严氏父子所辑各种丛书，是研究经传小学、音韵训诂、中医学等的重要文献。它以内容精、版本好、刻工精细、纸质绵密，装帧美观大方著称，在近代成都私家刻本中有重要地位。

贲园成了海内文人学者荟萃之所，同时也是研究学术的场地。宋育仁修省志、县志，廖平考订伤寒古本，研究公羊谷梁，都赖贲园藏书以引证考订；张森楷前后数十年出入贲园，撰述《通史人表》、《二十四史校勘记》、《四川省历代地理沿革表》等。20世纪20年代，向楚、龚道耕、林思进长期在贲园，为丛书校勘了大批精刻善本、如《音韵学丛书》、《梦溪笔谈》、《颜氏家训》等书。以后卢冀野、顾颉刚、蒙文通、庞石帚，任二北、刘庐隐、陶亮生等都经常来往其间，当代书法家谢无量、于右任、沈尹默，国画家张大千、叶浅予、张寒杉、谢稚柳等，都是贲园长期的座上客。其中于右任和张大千与严谷声交谊最深，往还尤密。于右任为严谷声所书的文天祥《正气歌》和诸葛亮《出师表》等落笔挥毫，出神入化。张大千在严谷声资助下，在成都展出敦煌临摹壁画，轰动文化界。张的许多巨幅名画，如用丈二宣纸为严谷声画成八张屏幅合成的《西园雅集图》和《荷花通景》屏幅等皆作于贲园。

为保护祖国珍贵文化遗产，严谷声多次拒绝外国和古董商的重金收购。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东京文禄堂以高价收购他所藏地方志和四川各城镇户口簿籍。严谷声十分愤怒，对家人说："这不是要我当汉奸吗！"4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曾以50万美元代价，收购部分藏书，他断然拒绝。但是他在文化交流上又并不保守，大量向国内学术单位和著名学者赠送自刻丛书，如国史馆、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四川省立图书馆等。又通过西南基督教会会督宋诚之，华大校长张凌高、方叔轩等，把丛书捐赠国外学术界，如苏联的列宁格勒图书馆、莫斯科大学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图书馆等。各处都回赠有图书及专函致谢，并签发奖状，苏联还有以斯大林名义签署的感谢信。

解放前夕，国民党要人如张群、关麟征、黄季陆、朱家骅、杭立武等，分别前来劝严谷声携带名贵书籍出走，赴港赴台都给予方便，他以贲园书库为两代人毕生精力所创事业，表示决不离开成都，一一加以谢绝。当时中国共产党通过邵力子致函严谷声，转达周恩来对古籍的关注和对他的敬重之意。

成都解放后，严谷声毅然将书库及全部藏书30万卷（包括善本书5万余

卷），自刻书籍木版3万余片，各朝代名人珍贵书画、碑帖、文物多件，捐献国家，由时任川西行署文教厅长的张秀熟代表人民政府清点接收，现藏于四川省图书馆。

建国后，严谷声先后被聘为川西行署特邀人民代表、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1976年病逝。

彭椿仙　易心莹（合传）

彭椿仙，名至周，1883年8月9日（清光绪九年七月七日）生，贵州毕节人。早年曾入云南讲武堂学习军事。因见清朝政治腐败，不愿从事军务，只身到四川灌县（今都江堰市）青城山常道观出家，拜程明星道士为师。彭因勤学、诚实能干，数年后被推为住持。

清末，四川省劝业道周孝怀提倡栽桑养蚕，创办蚕桑学校，特设方外班，并规定凡就学僧道，其寺庙、宫观土地得保留作栽桑基地。彭遂与灌县普照寺、雪山寺僧人到蚕桑学校学习。毕业后，回到青城山带领道众栽桑养蚕、种茶、种树。1919年8月，受到四川省省长杨庶堪表扬，颁给“道在养生”匾额。今青城山牌坊岗及常道观山门路旁，挺拔秀丽的杉树，多为当年种植。

民国初年，彭因故触怒地方军阀。为避祸出省游历，遍览名山大川，观摩寺庙宫观建设、布局、建筑结构，学习宫观管理办法等。从湖北武当返青城山后，彭椿仙着手重建扩建常道观，他亲自规划，扩大基地，又亲率道众、工匠采运石条，征集能工巧匠，精工制作。从1919年开始修建斋堂至1941年，重建了三清殿、灵祖殿、玉皇楼（即今黄帝殿）、祖堂、东客堂、山门侧廊及青龙、白虎等殿；新建长啸楼、迎曦楼；维修饮霞山舍及银杏阁等。常道观的建设，历时22年，耗银近5万元。彭椿仙因积劳成疾，卧床不起，1941年工程遂由易心莹接替完成。

彭椿仙善于理财，常道观建设缺乏资金，道众提议向外募集，彭则说：“我们出家人若依靠外人出资修建宫观，他日人来观中，则不敢怠慢，使吾徒皆为彼子孙奴役。不如出我道友私蓄，集腋成裘，也是我们以观为家的宗旨。”道友都争先恐后拿出过去卖田产分得之款和观中集体经营积累的资金，建成了常道观。青城山每到夏秋季节，游客云集。彭采取在常道观奉祀三清、黄帝、天师为主祀外，废除其他神祀，增添接待游客设施，增加收入，积累建设资金，彭还利用树皮、边料修建桥梁、亭榭形式多样，供来往游客憩歇、观赏。

这独特的建筑风格，成为青城山风景特点之一。

彭一生广交游，热情接待游客。观中设留言簿征求意见，以改进管理、接待工作。后来留言发展为4尺宣纸4开大卷册页，往来名人学士多在簿上题诗作画或题名留念，留下珍贵墨宝。至彭椿仙辞世，共存7大册。当三清殿、灵祖殿、东客堂还在修建中，就得到于右任、张大千、程芝轩、宋育仁、颜雍耆、易鼎臣、谢无量、林山腴等题署的楹联、诗文及绘画等。

1925年灌县二王庙被焚，彭椿仙立即决定分出修建常道观的材料及人工支援重建二王庙。他对常道观佃户采取无息贷款，对无法偿还贷款的，就适当照顾。并不收道观佃户礼品，只要求每户于青城山向阳空地栽好几株树苗，管理施肥。山区儿童无钱上学，彭积极筹资办学校，今日青城一小、二小皆为当年创办。彭还支持农民开荒谋生，赈灾济贫。

1941年前后，为了抵抗日本侵略，彭椿仙在道观生产项下提取一定财物，补助当地应征壮丁的家属。青城山周围土匪经常出没，他尽力保护游客的安全，因此数十年间，很少发生抢劫游客事件。他严格执行道教清规戒律，对违犯者耐心教育，妥善处理。1942年3月18日，彭椿仙病逝。

易心莹，原名良德，字综乾，法名易理轮，1896年9月26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日）出身于遂宁县老池乡双河口一个农民家庭。他幼年读私塾8年，常听先生讲“人皆要有道，有道与圣贤同”，“道家之身，强神、强国之术”，又因自幼体弱多病，遂决心学道。

1913年，易心莹只身到灌县青城山天师洞（常观道）要求出家，庙上因见其呆闷，只留下干杂活，故未能正式皈依道教。不久，易到成都青羊宫二仙庵专收出家道之蚕桑传习所帮工，历时一年多，后由天师洞道士魏至龄将其带回天师洞，遂为全真龙门派碧洞宗第二十二代传承道徒。当时住持彭椿仙见易有一定文化，便委为游客向导，并介绍到朝阳庵吴君可处重念诗书，历8年之久，易由是茅塞大开，开始钻研道学。1926年，原清朝翰林颜楷游青城山，易作向导，颜见其好学可造，经住持彭椿仙同意后，于当年夏带易到成都颜楷所办“崇德书屋”读经。易拜颜为师，钻研国家及道家经论。一年多后颜楷病故，易返天师洞自修。1928年，易心莹被推为天师洞知客兼文书，并着意研究道学，读五经、习《道藏》、知方术。不久辞去知客职务。从1931年至1942年，他潜心穷研道教学理，广收道书及诸子百家、稗官野史，罕见书籍数千册，并先后到潼川（三台）、大足等地考察道教历史遗迹。自此，他学业精进，著作日丰，计有《道教三字经》、《读老心解》、《老子通义》、《青城指南》、《道家养身》、《道学课本》、《道教

系统表》等，采用《春秋繁露》和《阴符经》解黄老之学，并辑有《女子道教丛书》、《老子八十一化图》等。

易心莹求学虚心，同一些研究道学的专家学者联系较多，如上海道教刊物《扬善半月刊》主编、著名道教学者陈撄宁（建国后任中国道教协会会长）、西南联大教授陈国符、四川大学教授蒙文通、陈践石等均与易心莹常有书信往来，切磋学术，并对他的研究表示尊重。

1942年彭椿仙病逝后，易心莹一度担任天师洞当家，但不久因庙内矛盾而被挤走，到朝阳庵去专心研究道学渊源、调神内功和搜集整理道学史料。1954年后被选为灌县人大代表及县政协委员，1955年任天师洞住持，1956年被安排为四川省政协委员、中国道教协会常务理事，1957年当选为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四川省道教协会会长。1962年到北京白云观中国道协道教徒进修班讲学，任道教史教研组长。

1955年，周恩来到青城山时，易心莹参加接待工作。以后他主要致力于《四川省宗教志·道教篇》的编纂工作。他广征博采，请教专家学者，反复核对史实，数易其稿。惜“文化大革命”浩劫，使其一生心血多付东流。易心莹对宫观文物十分爱惜，“文化大革命”中曾率道士将观内外的楹联、匾额、题词，用书有“文化大革命”口号的标语或“最高指示”覆盖，使这些珍贵文物得以保存下来。1976年春，易心莹病殁于青城山天师洞。

邓胥功

邓胥功，字只淳，巴县人。生于1888年1月（清光绪十三年十二月）。1902年入巴县正蒙公塾，1904年入重庆府中学堂。1906年在上海加入同盟会。1907年赴日本，入预备学校，同时任同盟会四川支部长，进行反清革命活动。1910年，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邓胥功归国，任总统府秘书，不久再赴东京高师学习。

1915年毕业归国，受聘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主讲教育学，同时主编《四川教育杂志》。1918年，高师校长杨若堃出国考察，邓胥功代理校长。在此期间，他以两大建树见称。一为改变教学环境，将校址由盐道街迁入皇城；一为开辟教学实验园地，增设附属小学，亲兼校长。附小办学原则：注重德育，发展智育，开展体育，培养爱国

思想和民族自尊心，男女同班。校训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认为品德须从小培养，做到不偷不盗，不淫不乱。重要的是有大志，能为人类做贡献。要求扩大学生知识面，适当发展儿童兴趣爱好和特点。教师应循循善诱，使儿童感到读书的快乐。他把学生自习室命名为台湾、琉球、旅顺、大连、香港、澳门，教育学生反对帝国主义，收复失地，勿忘国耻。由于贯彻上述原则，高师附小成绩显著，全国教育会评选，名列第一。代理高师校长期间，他很重视体育活动。1920 年举行全川运动会，高师及附中、附小，分别获团体第一名，附小跳高、跳远及球类运动，更为全川小学之冠。

1923 年至 1924 年邓胥功赴日本，继取道莫斯科到德国考察教育，1925 年返国。同年暨南大学聘邓胥功任教授兼师范科主任。综合历年讲授与考察心得，撰成《教育学大纲》（上卷）及《教育通论》，由上海文通书局、世界书局出版。《教育学大纲》兼采中外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学说，而以在欧、美、日本及中国影响较大的近代德国著名教育家赫尔巴特学说为主要依据，涉及人生哲学及社会、经济、生物、心理、生理学等领域，"取材最新"，注重学校教育，"于苏俄状况介绍尤力"。暨大学生主要来源是东南亚侨民子弟。在暨大任教 6 年间，经他尽心培育的侨生毕业后咸成了侨民教育骨干力量。有的到外国深造，成为海外知名学者。

1931 年邓胥功返川，历任成都大学教授、四川大学教授兼教育学院院长及教育系主任。1936 年，系办《教育半月刊》，曾撰短文多篇，抨击教育界弊端。1938 年 12 月，国民党指派程天放出长川大，消息传出，邓胥功与 60 余位教授联名反对，又联合发表罢教宣言。1939 年，成都中苏文化协会成立，邓胥功选任理事长。川大疏散峨眉后，他积极支持学生文化救亡团体工作，还掩护进步学生的活动。

抗日战争中，四川省内文物迭遭破坏，四川大学受托与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进行联合调查。1938 年 11 月，川大成立博物馆筹委会，推邓胥功负责筹备工作，他陆续收进一些文物藏品。1941 年，四川省博物馆成立后，川大博物馆搜集文物全部移交省博物馆，直至 1943 年开始王建墓发掘工程，他仍不断给予帮助。

1946 年，邓胥功任四川大学师范学院院长。为了适应师范教育新需要，师院扩大招生范围，于文理科外，增招工农院系师范生，重新规划课程，分必修、辅修两类，体现一专多能特点，使师范生毕业后对工作有更大适应性。四川是多民族省区，为了适应边远地区小学教学需要，他请拨专款作为师院附小复式教学实验经费，聘请专人负责。对师院成绩优异毕业生，更极力推荐。

邓胥功不仅把大半生奉献给高教事业，还义不容辞地肩负起私人办学的责任。如成都民新中学能具有一定规模，

中国教师社创办的成都桂溪中学试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颇著成绩，即与他的努力、关注分不开。

邓胥功任川大教育学院院长时，院内曾设艺术和体育两专修科。抗战初，原艺术科主任赵治昌、体育科主任向志均等倡办南虹艺术专科学校，推邓胥功任董事长。截至1949年底，南虹艺专毕业生达1000余人，为四川省艺术教育培植了不少优秀人才。

成都解放后，邓胥功受聘为四川大学教育系教授。1951年，将历年收藏文物珍品捐赠川西博物馆，其中邹容刻印，文为“赤胆英雄今犹在”的遗笺，尤为难得。1952年，调任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教授，主讲《中国教育史》。他对先秦时期教育思想尤为重视，曾撰《〈吕氏春秋〉教育思想的研究》论文。

建国后，邓胥功还先后担任川西行署委员、川西区人民代表、四川省文教委员会委员，并连选为一至三届四川省人大代表。1961年参加四川省教育志编纂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因病医治无效，1976年6月，在成都逝世。

吴棹仙

吴棹仙，名浦。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生，巴县人。父吴俊生授私塾兼行医业。吴棹仙幼承庭训，练诗习文，诵读医书。1905年，考入朱叔痴等创办的巴县医学堂。学习期间，得名师教诲，奠定了坚实的医学基础。

1908年，吴棹仙在巴县医学堂卒业，以品学皆优升入“重庆官立医学校”师范班深造。1915年在“重庆存仁医学校”毕业考试中，又被评为精通医经典籍的高材生。1916年重庆警察厅对开业医师考试，在202名录取者中，名列第三，从此正式行医。

1918年，吴棹仙在龙王庙开设“双桂堂”药店，与王恭甫轮流义诊，活人甚多，遐迩闻名。

吴棹仙早年在唐德府、王恭甫诸名师指导下，对医经研究颇有心得，数十年中不曾有间断，自成一家。临证善用经方，方小而常奏奇效。如民国初，陈某之妻患温热病，已穿殓服，停榻家中。吴棹仙夜半至其家，执烛细察，面色未大变，诊脉微弱，忆及《伤寒论》苦酒汤或可救之，乃用半夏1枚，按古法煎制，汤成徐徐灌之，食顷，竟能语言，守候达旦竟起，后服安宫牛黄丸，迭进汤药，调理月余而安。

吴棹仙在1921年后，得针灸专家许直祁针法秘传，因其娴熟《灵枢》，故能极补泻迎随之妙。据患者病情轻

重、体质、寒热、脉象等分别采用时辰进针和不同的手法治疗，使不少危重病员得针而瘳，故有“神针”之誉。

1929年，国民政府发布“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激起全国中医药界强烈反对，重庆市中医药联合分会成立，吴棹仙被推举为负责人之一。此间他创办了《商务日报·医药周刊》，撰写《东方生风辨》、《阴阳学说》等文，驳斥余云岫等人消灭中医之谬论，为祖国医药学之生存而作有力抗争。

1932年，他与彭笃笙创办巴县国医学舍，后改名为重庆市国医传习所，吴棹仙任所长。1935年借国粹医药馆办了女生部。至抗日战争爆发，两部学生60余人毕业，其中不少人后来皆成为当地一代名医。

1935，吴棹仙与医药界同仁成立国医药馆，任馆长，搜集地道药材，改良炮制，以应社会需要，并设施诊、施药处，聘请内、外、妇、幼、针灸科医生，轮流值班，普惠贫困病人。同年又与石荣廷等办国医药馆分馆。

1939年，吴棹仙在重庆山洞镇创办重庆中医院、巴县国医学校，有30余人毕业。由于国民政府海军部等强行征购该院校，因而中辍。

抗日胜利后，吴棹仙乃招少量学生在中华路“永生堂”诊所讲学。1950年，他在和平路创办苏生国医院，又在归元寺街创办中华医药科学讲习所，次年春招收高、初级班各50人，自任董事长兼所长，自筹资金，自编教材。1954年被聘为重庆市中医进修学校教师，继被委以重庆市第一、二中医院院长。1955年底，吴棹仙以特邀代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向毛泽东献《子午流注环周图》并合影纪念，报纸杂志载文表彰。他以无比激情，作《献图碰杯礼》诗：“三世医怀卞和璞，今宵一碰入京门”，表达了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

1956年，成都中医学院开办，聘吴棹仙为医经教研组教师，继兼针灸教研组主任。编有讲义《医经生理学》、《医经病理学》，著有《灵枢经浅注》，在重庆编著《子午流注说难》，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1963年，全国中医教材会议在江西庐山召开，吴棹仙为全国四位特邀中医顾问之一。吴棹仙的医术和医德在群众中享有较高声誉，先后被选为第二届四川省政协委员、第三届四川省人大代表。

1976年9月8日，吴棹仙因避地震赴云南开远幼女家时，不幸辞世。

刘承钊

刘承钊，生于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山东泰安人。1922年中学毕业后，进入北京汇文大学预科。192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燕京大学，入学时先读历史，后改读心理学。由于他自幼对动植物有浓厚兴趣，1925年转入生物系，同时还兼做标本整理工作。1927年刘承钊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被留校任助教，并同时作研究生，从事两栖类动物的研究。在李汝祺教授的指导下，共同发表了《黑斑蛙和北京狭口蛙在蝌蚪变态期消化系统的变化》的研究论文。以后他又得到美籍教授博爱理（Boring）的指导，对北方两栖类动物的第二性征、性行为和生活史进行研究，取得不少研究成果。

1929年，刘承钊完成研究生学业，获得硕士学位和生物学研究“金钥匙”奖。同年，刘承钊受聘担任沈阳东北大学生物系讲师。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回到母校燕京大学任教，并与博爱理合作，继续从事两栖类动物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北京的蟾蜍类和蛙类的第二性征和性行为》、《华北的蛙类和蟾蜍的生活史时间表》等一系列论文和《华北两栖爬行动物册》的专著，引起了国际动物学界的关注。

1932年，刘承钊获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奖学金，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深造，专攻高等动物学。在其导师、著名动物学家赖特（Wright）的悉心指导和影响下，养成了严谨的治学作风。在对青蛙进行的解剖实验中，刘承钊发现了长期被人忽视的雄蛙的一种新的第二性征——雄性线，后来他把这一重要发现写成了《无尾目中一种新的第二性征：雄性线》的论文，于1935年发表。这一意外发现推动了这个新的第二性征与形态机能间关系的研究，受到国际动物学界的极大重视。

1934年春，刘承钊以优异的研究成果毕业，获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同时获科学和教育两项“金钥匙”奖。当年8月，刘承钊返回祖国，获当时教育部部聘教授的职称，在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担任教授。这一时期，他又发表了《无尾目的声囊类型》、《北方草蜥生活史初步记述》、《中国蛙类和蟾蜍类的第二性征》等多篇论文。刘承钊在国际动物学界的声望也与日俱增。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承钊于当年11月率领东吴大学生物系部分师生内迁四川成都。沿途历尽千辛万苦，于1938年3月到达成都华西协合大学。他带领师生们一面坚持学习，一面制作生物标本、模型出售，以解决经

费的不足。1939 年，这支生物系师生并入成都华西协合大学生物系，刘承钊就任该校生物系教授。此后，他还一度兼任过成都燕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和生物系主任、华西协合大学自然博物馆馆长、四川大学生物教授等职。

1938 年暑假，刘承钊带领十几名师生奔赴峨眉山，进行来西南后的第一次野外采集。峨眉山丰富多彩的动植物，使他兴奋和陶醉。在为时两月的采集中，他常常通宵达旦到溪边巡行、谛听、耐心等待，终于采集到因鸣声有似弹琴而遐迩闻名的峨眉山“仙姑弹琴蛙”(学名弹琴蛙)。他还采到一种具有非常奇特的眼睛和蜘蛛般的爬行姿势的髭蟾，俗名“胡子蛙”。后来刘承钊对这种髭蟾进行了深入研究，确定它是蛙的一个新属、新种，于 1945 年将它定名为 Vibrissaphoraboringiiliri，以纪念他的老师博爱理，还将美国学者坡普(Pope) 过去误定的角蟾更正为新种崇安髭蛙 (V.liui)。1938 年至 1948 年间，刘承钊先后 11 次带领师生深入到西南的崇山峻岭、偏远荒僻地区，采集到大量珍贵的标本，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科学资料。

1946 年至 1947 年刘承钊应美国国务院聘请赴美国讲学。他利用讲学之余深入进行研究，用英文撰写了他的第一部巨著《华西两栖类》，1950 年由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正式出版。书中所记述的动物，不仅从成体形态进行分类，还联系生态、生活习性、生活史进行物种分类研究，受到国际两栖动物学界的高度评价。刘承钊被聘为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名誉研究教授”。美国鱼类学、两栖爬行类学会还授予他“终生国外名誉会员”称号。

建国后，刘承钊把全部精力投入科研和教育事业，忘我地工作。1950 年，他回到北京担任了燕京大学生物系主任兼中国科学院动物标本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1 年 10 月，刘承钊被任命为华西大学校长。1953 年华西大学改为四川医学院，刘承钊任该院院长，直到 1976 年去世。他于 1951 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任民盟中央委员。195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选为中共四川医学院委员会常务委员。他还担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及《动物志》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四川省自然科学联合会主席，并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在旧中国，刘承钊从事科学研究，很多时候是孤军作战，有时依靠少数助手协助，工作十分艰辛。新中国成立后，两栖类动物分类区系研究列入国家自然科学发展规划，为进一步发展这门学科创造了良好条件。中国科学院拨款，在四川医学院生物教研室建立了两栖爬行动物研究组，由刘承钊领导，学校为他配备了得力助手，其中包括他的夫人胡淑琴 (研究员)。他和同事们先

后到云南、贵州、西藏、陕西、福建、广西、广东、海南岛、湖北、安徽、新疆等十几个省区进行野外采集调查。刘承钊从这些采集活动中，又获得大量珍贵标本资料，经过长期辛勤研究，他和胡淑琴合作撰写了第二部巨著《中国无尾两栖类》，1961年由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对两栖类动物的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和好评，被认为是中国无尾两栖类区系学的一本权威性著作。

1966年，刘承钊仍壮心不已，计划撰写他构思已久的第三部巨著《中国角蟾亚科分类讨论》，填补中国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几十年来他在这方面积累了大量科学资料，但是“文化大革命”浪潮袭来，他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迫停止了教学和科研工作，直到1973年，才重新获得工作机会。这时刘承钊虽年逾古稀，仍坚持科学研究工作。同年，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动物志、中国植物志和中国孢子植物志会议上，他宣读了《髭蟾属 Vibrissaphora 和种的初步探讨及其与分类学有关问题的讨论》论文稿。他还与助手们再度到大雪山麓的宝兴县进行了他一生最后一次野外采集。1976年4月9日，刘承钊因心脏病骤发，经抢救无效去世。他的第三部巨著未能如愿实现。

刘承钊一生先后在中外文刊物上发表论文60篇，出版专著三部，他亲自订名一新属，亲自或与合作者订名的新种及新亚种60余种；他对锄足蟾科动物的研究有独创见解，对过去分类上存在的若干问题作了较大的修订；对中国横断山脉两栖动物分类区系的研究尤为深入和细致，提出了横断山脉为中国角蟾亚种分布中心的见解，为进一步研究这类动物的起源与演化提供了科学依据。他创建了中国两栖类动物研究事业，对中国两栖爬行动物分类区系学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这门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刘承钊除致力于两栖类动物研究外，还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献给教育事业。他一贯主张医学教育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意学校教学秩序的稳定，提高教学质量，尤其注意以自己踏实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与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影响学生。在40余年的教学工作中，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动物学工作者，有的已成为知名科学家。

李先闻

李先闻，江津县人。1902 年 11 月 9 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日）出身于小康农家。早年入金山寺小学，13 岁考取四川省保送名额，入北京清华学校。在清华高等科阶段，立志学农。1923 年由清华学校毕业，赴美国留学，先入美国普渡大学，学习园艺，获硕士学位，继入康奈尔大学专攻遗传学，于 1928 年获博士学位。

自美国学成回国后，历任中央大学、东北大学、河南大学、武汉大学教授。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特别重视科学实验，在科研工作中取得重大成就，成为中国粟类作物研究的先驱。

李先闻受聘在河南大学农学院任教时，进行了植物遗传学研究，他作番南瓜与南爪的交配实验，做小麦育种工作。他亲自动手开行、播种、掩土，把育种的田间工作搞得井井有条。他的南瓜交配实验成果，在美国农学界获得好评。1933 年春，李先闻开始做小米（粟）开花的研究。他应用统计学及细胞遗传学的研究方法，亲自动手，白天、晚上定时观察记录，收集第一手资料，进行室内分析、试验。在美国农业杂志上发表了十几篇这项研究成果的论文，颇有影响。

1935 年，在武汉大学他开始实验水稻育种。次年，他又做小米种间杂交工作，在珍珠小米中找到了“四元体”。

抗战期间，他回到四川。1941 年，在四川农业改进所任稻麦改良场场长兼农业部华西区推广繁殖站主任，从事稻麦改进研究工作，担任水稻作业方面实施检定计划的负责人，并继续研究小米的进化。他还曾兼任四川大学、金陵大学、华西协合大学教授。为提高研究水平，他于 1944 年赴美国考察一年余回国。他用一种“美国谷”的种子，做水稻育种研究。他所检定的一种水稻优良品种，在绵阳试验成功，并推广栽种，很见成效；并在川北一带推广“金大二九〇八号小麦”种子，提高增产率。

抗战胜利后，李先闻于 1946 年调上海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他在这里开辟半亩地进行小麦栽培工作。1948 年，李先闻又继续进行小米交配研究。由于他多年进行试验研究成绩卓著，同年 4 月 1 日，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教理组农学院士。年底，他受聘到台湾糖业公司担任顾问，进入糖业试验所，开始致力于甘蔗品种的改良试验。当时，台糖公司所属有 35 个糖厂，自营的农场近 200 个，遍布台湾全省，生产经营很差。为扭转这种落后局面，李先闻不辞辛劳经过 14 年

坚持不懈的分析、试验、研究，终于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推出了“N:CO.310”甘蔗新品种。这种新品种出现后，在短期内栽培面积由1%推广到42%，促成了台湾糖业界的一项大“革命”，从而奠定了台糖生产的良好基础。李先闻作出的这项重大贡献，引起世界生物学界的关注。

1954年，李先闻应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聘请，担任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筹备处主任，1962年改任所长。他白手起家主持植物研究所并开展稻种试验工作。为了寻找水稻抗寒、抗变的能力，他将澳洲产的野生稻和台中“六五号稻种”杂交，使得只有12个染色体的野生稻，和有24个染色体的“六五号稻”交配，产生了拥有36个染色体的第二代。然后又将具有36个染色体的第二代，和澳洲稻一个一个交，从36种不同的杂交稻中，找出最能表现出澳洲野生稻优良特性的台中“六五号稻”。这项试验研究工作，历时八年，终于获得成功。新稻种防虫、抗病能力强，生长期短，产量高，因而促进台湾农业大丰收。同时，植物研究所也在他的主持下，从一个空架子，建设起一幢幢高楼，研究室内安装了最新式的第一流仪器设备。1968年，在第十一届国际遗传学会上，李先闻被选为亚洲区副主席。1976年7月4日，李先闻因心脏病突发病逝。

林如稷

林如稷，资中县人，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生。其父林冰骨，清末秀才，曾于1902年到日本留学，在日留学期间参加同盟会，回国后曾任同盟会四川分会负责人。林如稷少年时代深受其父的影响，接触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1917年秋，林如稷考入成都联合县立中学。1919年春，他随父母到北京，在北京正志中学读书，后转入北京高师附中。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示下，林如稷开始文学创作，著有小说《伊的母亲》、《死后的忏悔》，先后发表于1920年12月17日和1921年1月19日《晨报》副刊。其早期作品一开始就注意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大胆地揭露社会矛盾。他还积极参加进步学潮，经夏康农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1921年4月，林如稷考入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院工预科，仍热心文学创作。1922年，林如稷作为发起人，同陈翔鹤、邓均吾、陈炜谟、冯至等在上

海成立“浅草社”，编辑出版《浅草》季刊，此刊共出4期，其中第1、3期由林如稷主编。在这期间，还撰写小说、诗歌、散文，大都发表于《浅草》季刊。其中小说《将过去》刻画了一个消极、颓唐但又不甘堕落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后被鲁迅编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1923年，林如稷参加中法通惠工商学院学潮，并被推选为到北京请愿的三位代表之一，因此被校方开除。旋即筹备赴法国留学。

1923年底到1930年6月，林如稷先后在法国里昂大学、巴黎大学法科和文科听课，并自修经济史和近代法国文学等课程。在法期间，他支持同学敬隐渔把鲁迅的作品翻译成法文，介绍给罗曼·罗兰主编的《欧罗巴》杂志。其中《阿Q正传》第一次被介绍到西方，并且得到罗曼·罗兰的高度评价。

1930年7月，林如稷归国。次年7月，由刘为涛、杨晦介绍，任北平中法大学经济系教授，讲授经济史。

“浅草社”在1925年时改为“沉钟社”，出版《沉钟》周刊，后至第12期停刊。1933年，林如稷与杨晦等复刊《沉钟》，改为半月刊，从第13期（复刊号）一直出到第34期，1934年因战事而终止。复刊后的《沉钟》仍然每期都寄给鲁迅。“浅草社”、“沉钟社”先后存在11年，鲁迅盛赞：“沉钟社确是中国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在这期间，林如稷除写小说、散文外，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翻译。他翻译有左拉的长篇小说《卢贡家族的家运》（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重印）及匈牙利、苏联作家的小说多篇，刊载于《沉钟》。

1937年7月底，北平为日军侵占，林如稷于8月回成都。1938年秋，由周太玄介绍到四川大学经济系教经济史。不久，参加反对国民党官僚程天放任川大校长的风潮，愤然离职。后挂名为大康公司昆明分公司、成都分公司经理，实际从事左拉作品的翻译和评介工作。

1945年，林如稷在友人陈翔鹤、沙汀、李劼人的影响和鼓励下，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活动。1945年至1949年帮助华西协合大学几位进步青年编辑综合月刊《民讯》，该刊出至第5期被迫停刊。他还为进步刊物撰写短论、诗歌、杂文，曾将其旧体诗编选成册，名为《待旦室诗草》，以示对光明的向往。

1949年底成都解放，林如稷重回四川大学任中文系教授，教现代文学、世界文学史和写作实习等课程，并在1952年至1955年间任系主任。1950年至1960年间，他还兼任成都市文教局、文化局副局长。又曾任第一届成都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四川省人大代表，第三届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文联常委，四川省志编委等职。著有电影文学剧本《西山义

旗》、鲁迅研究论集《仰止集》及文艺评论和散文数篇。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如稷身心遭受摧残，仍对未来充满希望，写下了“莫言垂老贪微命，留待春来听杜鹃”诗句。1976年12月10日林如稷逝世。198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唐正序编选的《林如稷选集》，由艾芜作序。

刘成基

刘成基，名三营，艺名当头棒，遂宁县横山场人。生于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家境贫寒，早年父母双亡，由姑母收养。

1915年，西充县戏班“三益科社”到遂宁横山场演出，10岁的刘成基被姑母送进该戏班学艺谋生，入社仅月余即登台演戏。他与别的学徒一起，住破庙、睡谷草、穿破衣、食不果腹，过的日子极为清苦。

1917年，“三益科社”到了重庆，在“重光茶园”与“阳春茶园”演出，不时也去合川、江津、涪陵等地跑滩。在重庆，川剧舞台名家辈出，刘成基因好学上进，艺术上收获不小，大大开阔了眼界，增长了技艺。

1919年，刘成基因连续演出多场《汜水关》而积劳成疾，倒床以后差点被戏班主当死人扔到城外的江水中。后因其师刘炳林向班主求情，并请医生为他治病，刘成基才侥幸死里逃生。1924年下半年，刘成基随戏班在江津演出。重庆家中的妻小患病，他思家心切，向班主请假不允，他夜里逃离，结果被班主派人追上，一顿毒打，险些将他打死。后因船工搭救才回到重庆。

刘成基在自己的艺术生涯中始终孜孜不倦的追求，他向赵瞎子学《东窗修本》，向邓小洲学《困荥阳》，向陈翠屏、曹俊臣等川剧名家学习，从这些名家的精彩表演中，他获得了戏剧表演方面的丰富知识，增进自己的艺术修养。1929年他正式拜傅三乾为师，以傅老师的表演路子为准，兼学他人之长。傅三乾在丑角表演中有独到的功夫，演技全面，教授方法出众，重视基本功训练。他教了刘成基很多昆曲散曲和整本戏如《拾黄金》、《夜误判奸》等。刘成基后来到成都，在川剧名家荟萃的“三庆会”既演戏又学戏，技艺更进一步。

1947年，成都因水灾，“米荒”空前严重，给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杨森和邓锡侯出面办米案，时逢刘成基在成都“锦屏”剧院演出《打判官》和《拾

黄金》，他当即将唱词增加两句“洋参（杨森）吊不到命，汤圆（邓锡侯）当不到顿”，借以表达人民的心声。为此刘成基被警察抓去关了三天。

1950年春节，贺龙在成都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茶话会上祝贺刘成基等人说：“当头棒，祝你们演员翻身了”。不久刘成基到德阳去组建了县川剧团，任团长。1952年刘成基任西南川剧院三团团长，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大会。由他改编、导演并参加演出的传统戏《柳荫记》荣获剧本奖，他主演的另一传统戏《议剑献剑》荣获二等奖。

1953年冬，刘成基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担任东海岸分团负责人，赴前线为中朝军民演出。1959年8月，刘成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成都市川剧院副院长。10月，他赴京参加了建国十周年的献礼演出，受到朱德、陈毅、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刘成基还担任过成都戏剧学校校长及四川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1956年、1957年、1962年他先后执教于四川省、西南地区及全国性的戏曲演员讲习班，1964年任成都市川剧院学员训练班主任，竭心尽力培养戏剧艺术人才。

刘成基毕生致力于川剧事业，功力深厚，善于运用传统表演手法刻画各类人物，特别是对川剧的丑角表演艺术有所创新。他饰演的丑角上自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尤擅长“袍带丑”，拿手戏有《问病逼宫》、《请长年》、《胡琏闹钗》、《赠绨袍》、《鸳鸯谱》等。建国后，他亲自整理剧本，或导演、演出的传统戏主要有《柳荫记》、《望娘滩》、《御河桥》、《鸳鸯谱》、《闹齐廷》等；现代戏有《丁佑君》、《红岩》、《红杜鹃》、《四川白毛女》等。他担任过电影戏曲片《鸳鸯谱》的艺术顾问，并饰剧中的乔太守。

刘成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残酷迫害，于1976年12月2日逝世。

1980年6月，由陈国铮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刘成基舞台艺术》问世。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张庚在这部25.6万字的著作“前言”中，对刘成基的艺术生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陈子庄

陈子庄，原名陈福贵，别号石壶、兰园、南原、下里巴人等。永川人。1913年10月15日生。其父为绘陶器、纸扇的工人，使他从小颇受民间美术的熏陶。他读过私塾，兼爱习武和绘画。16岁时，因逃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到了成都，从萧参学老、庄、楚辞。后来，在一次擂台比武中击败了一军阀的武术教官而受到王缵绪的器重，延为座上客。抗日战争前，他结识了来川的名画家齐白石、黄宾虹，得以向他们求教技艺，并由此上窥八大山人、石涛、吴昌硕诸大师精髓，是以艺术境界得到拓展。

1939年，陈子庄出于抗日救国之心，加入一抗日团体出川抗日，途经万县时被宪兵逮捕，关押于重庆土桥监狱达三年之久。由于看守的照顾，他得以坚持作画，出狱后，青帮头目石孝先邀他加入青帮，并结为金兰。石还曾推荐他任孔祥熙的秘书和保镖。仅几天因意气不投合而离去。后在荣昌城内东大街开设“金谷茶园”，组织“叙荣社”，任社长。他曾参与农工民主党及民主同盟的一些活动，与民主人士章伯钧等关系很好。这期间他仿石涛、八大山人、齐白石等人的字画几致神似，以致流世乱真。

1946年，王缵绪任重庆卫戍司令时，组织荣昌督导处，陈子庄任过督导处的股长。同年，余际唐组织地方建设协进会，陈子庄任常务理事。这时，他在中共荣昌县地下党组织的影响下，对时事政治逐渐有了清楚的认识。1949年，他协助郭署南策动王缵绪部队起义成功。

建国后，陈子庄入西南军政大学学习。后在重庆三山水泥厂和建新石化厂工作。不久赴成都。1955年受聘为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1963年任四川省政协委员。陈子庄在成都定居后，结束了动荡芜杂的生涯，开始了一个艺术家的历程。由于他秉性聪颖，勤于艺术的学习和实践，新中国建立后的十几年中，他的画艺以奇兀、峭拔、灵宕的特色而渐挺出时流。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中，他顶住精神及物质贫乏的重压，潜心于艺术上的开拓，在厄境中坚持作画、读书，把自己的艺术逐渐推向更高、更深的层次，在花鸟、山水、人物及书法上都开拓出具有自然、天真、鲜活的新境界。1976年7月3日，陈子庄因心脏病在成都逝世。

陈子庄的作品身后才得以大量发表于各种报刊，并在北京、美国、香港等地展出，获得很高评价，港澳、新加坡

等地的收藏家争相收藏。新闻界、美术界誉称陈子庄为“中国的凡高”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美术出版社、北京荣宝斋、北京外文出版社等相继出版了《陈子庄作品选》、《陈子庄写生稿》、《陈子庄画集》、《石壶论画语要》、还有中英文对照的大型《陈子庄画集》等。

叶 麟

叶麟，原名祥麟，字石荪，古宋（今属兴文县）人。生于1893年12月12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五日），逝世于1977年1月9日。

叶麟7岁入小学，12岁入县立高等小学堂（原经纬学堂）。毕业后考入永宁中学。1908年考入四川陆军小学。1911年加入同盟会，毕业时参加保路同志会起义，担任督队官。后又到重庆与熊克武、张培爵、黄复生和俞蕴澜等人协商组织学生军北伐。值武昌起义成功，遂感大局已定，民力稍苏，乃决定弃武就文。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19年在北大参加“五四”运动，并发表了《无强权主义及无强权主义学说》的白话文章，深得校长蔡元培的重视。毕业后，以特待生（获得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奖学金）的名义留学。1921年考入里昂大学，专攻心理学。1929年获得里昂大学博士学位后，于1930年返国。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医学院任教授、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长等职。1952年至1977年在西南师范学院任教授、心理学教研究室主任。

1937年至1939年，叶麟任四川大学教育系主任时，担任左派学生组织文艺研究会的导师，保护和资助进步学生蔡天心、邱觉新、袁丙生（即袁珂）等人。1946年3月12日，四川大学发生“三教授案件”，李相符（中共党员）、陶大镛（民盟盟员）、彭迪先（民盟盟员）遭迫害。叶麟以代校长身份前往查究，在图书馆门前大台阶上当众怒斥国民党中统特务的罪行。同时，又积极保护进步教授杨东蓴、罗髫渔、陶刍尧等人，赢得人们的赞誉。1948年，成都发生轰动一时的“四九血案”，叶麟不畏强暴，不避淫威，和全市学生请愿代表团一起进入省政府后，直接去找省主席王陵基辩理，说：“学生要求平价米，犯何法？有何罪？要抓，先抓我，要杀，先杀我！”当请愿代表团被扣押在省政府时，叶麟又挺身而出，亲自把川大代表刘光书、何骏生领回学校。“四·九血案”发生后，在维护人权的总罢课

中，叶麟又在《大公报》上发表了《维护人权声明》。

1950年，叶麟任四川大学校委员会委员、川西行署委员，曾参加“川西土改工作团”，为领导成员之一。1953年他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重庆市委委员，1954年担任重庆市政协常委、重庆市人大代表，1956年任四川省人大代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79年平反，恢复政治名誉。

叶麟曾于1935年至1936年曾赴欧美六国考察文化教育。建国前担任过中法、中比、中瑞诸国文化协会理事长。建国后，任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他在法国留学时，是法共中央委员、国际著名心理学家瓦龙的学生，博士论文撰的是《兴趣心理学》。主要著作有：《文艺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等书。翻译出版有：《阿朵耳夫》、《从心理学观点论述小说中景物的写法》、《导师与学生间的距离》、《列宁对苏联教育的贡献》等。发表过不少关于心理学研究的学术专论。例如《人底心理活动是人的高级神经活动》，载于中国科学院主办的《心理学报》1956年第1期第1卷。

叶麟一生勤勤恳恳，诲人不倦，学识渊博，教育经验丰富。在教学方法上深入浅出，善于启发，使莘莘学子听之入神。在教务工作中，根据《川大一览》（1947年版）记载：“自从1945年叶麟继柯召任教务长以来，竭力从事整顿，日新月异，成绩斐然。教务处不仅为本校最健全之部门，在国内各大学中亦有其特殊优越地位。叶先生为纯粹学者，风度严肃，诚笃不苟，认定欲整饬川大校风，应先由教务处作起，乃商同校长，严格审聘师资，迭函各教授从严督促学生作习，指导学生研究。……叶教务长对于提高川大教学质量，养成良好学风，贡献良多。”他的学生遍及全国，有的已成为著名的专家学者。

叶麟善于词章，早年在北京《晨报》上发表的诗词，颇得胡适赞赏。在抗日战争时期填写的《轻梦词》，载于杨公庶主编的《雍园词钞》内，共有66首之多。在四川大学任教时，常与中文系老教授在校刊上唱和，藉抒忧国忧民之情。

冯汉骥

冯汉骥，字伯良，生于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湖北宜昌县人。5岁入私塾，10岁入宜昌教会学校美华学院。1917年春入安庆圣保罗高等中学，1919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入教会办的武昌文华大学攻读文科，兼修图

书馆科。1923 年毕业后，被老师介绍到厦门大学任图书馆襄理，1924 年升任主任。

冯汉骥在厦大时，适逢鲁迅亦在此任教，两人过从甚密。冯在图书馆为鲁迅安置了一间寝室，鲁迅即在此考证中国典籍，引起冯对文物考古之兴趣。暇时他常协助生物学教授秉志采集标本，协助研究。后转攻人类学，即发端于此。

1931 年夏，冯赴美深造，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他受导师狄克逊（R.B.Dixon）的影响较大，以后他在研究人类学时所采用的文化进化论的观点，即受于狄氏。1933 年，他转入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系，从哈罗威尔（Hallowell）教授学习，亦受了哈氏宣传的文化心理学的熏陶。与此同时，又向布朗（N.Brown）及斯派塞尔（Speiser）两教授学习亚洲考古知识。1936 年夏，他获得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

在此期间，冯汉骥的著述主要集中在民族学和社会学方面，尤其是将这两种科学的内容和研究方法，运用于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解释某些历史上存在过的民族学和民俗学的现象，立论新颖，推理精确，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其中用英文发表的著作有《中国亲属制》、《作为中国亲属制构成部分的从子女称》、《玉皇的起源》、《傈僳之历史起源》、《以蛊著称之中国巫术》等。在《中国亲属制》一文中，他利用当代人类学中“叙述式亲属制”与“类分式亲属制”之原理，探索中国古代亲属名称之由来，旁及交表婚、姊妹同婚及收继婚三种婚姻制度在历史上之反映，使若干千古集讼的问题，得到科学而合理的解释，在当时国内外有较大的影响。

1937 年，冯汉骥由欧洲返国，受四川大学之聘，执教川大史学系，至是定居四川，终身再未离开。

1938 年暑假，冯汉骥获川大西南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资助，只身往岷江上游松、理、茂、汶等地考察羌族社会，历时 3 月，备历艰辛。此行除在民族学上获大量资料以外，又在汶川县雁门乡清理了一座石棺葬，其后发表《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一文，首次科学地报导了此类墓葬，探讨了西南古代民族与北方草原民族的联系，开创了川西高原考古发掘的先声。

1939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川康科学考察团，冯任社会组组长，对于西康地区民族的调查和分类，建树甚多。1941 年，四川省博物馆开始筹备，冯被推荐为筹备主任。从 1943 年开始，他应邀在成都华西协合大学社会系兼课，1944 年代理该系系主任。

他在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以 1942 年至 1943 年发掘前蜀王建墓最为有名。像这种规模较大的地下墓室的发掘，不但在西南是首次，就是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没有先例的。他在抗日战争

时期艰苦复杂的条件下主持其事，筹谋策划，显示了较高的组织能力和科学发掘技术。在工作进行中曾遭土匪抢劫，将他捆绑拷打半日之久，脱险后仍以献身精神坚持工作，终至发掘圆满结束。其后围绕对此墓的研究，他发表了《王建陵墓的发现和发掘》、《相如琴台与王建永陵》、《驾头考》、《前蜀王建墓内石刻伎乐考》等一组文章，考证了永陵的沿革，唐、宋驾头制度及坐卧风俗的改变，以及唐、五代时期的乐器及乐队组织。除此以外，他还在成都平原进行了一些考古调查，撰《成都平原的大石遗迹》一文，正确指出在四川古史上广为流传的有关大石的神话，实即考古学上之大石遗迹。在人类学方面，重要的著作有《由中国亲属名词上所见中国古代婚姻制》等。

建国后，冯汉骥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将自己的学识贡献给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1950 年，西南博物院在重庆成立，由徐中舒任院长，冯汉骥任副院长。两人通力合作，配合当时大规模开展的基本建设，数年之间，使四川考古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其最著者，如在成渝铁路修建期间发现的“资阳人”头骨化石，意义十分重大。他撰《关于资阳人的几个问题》一文，除了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对资阳人头骨的性别、年龄作了推测以外，还记载了这批化石与出土地层之间的关系，至今仍是研究“资阳人”的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又如宝成铁路修建过程中，在昭化宝轮院以及在巴县冬笋坝发现的船棺葬，为研究古代巴蜀的历史，提供了新的依据。配合成都市政建设，在羊子山发掘的土台遗址和大量墓葬，其时代从春秋延续到明清，科学价值很高。其后他主编的《四川古代的船棺葬》报告，初次系统地向学术界介绍了巴蜀文化的概貌，并对巴蜀史上若干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955 年，西南博物院撤销，冯汉骥又回到成都，任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兼川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这个时期，他除关心这两个单位的人才培养外，主要从事研究四川考古并整理解放以前即着手撰写的王建墓发掘报告，发表了《关于“楚公冢”戈的真伪并略论四川“巴蜀”时期的兵器》、《四川的画像砖墓与画像砖》等多篇论文，对于巴蜀兵器的分类断代、四川汉墓的特点和分期，唐至五代典章制度的考证，都提出了很有参考价值的意见。

从 1954 年开始，云南省博物馆对晋宁石寨山滇王族的墓葬进行发掘，遗物众多，内容丰富，为建国以来考古学上重大成就之一。1959 年冯汉骥应约去昆明对这批文物进行研究。他所写的《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研究——若干主要人物活动图像试释》、《云南晋宁出土铜鼓研究》等文，综合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的材料，对古代滇族的历史、族属、风俗及滇文化与中原文化的

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不仅学术价值很高，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兼收并蓄，有新的突破。

1962年，冯汉骥完成了《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的编写，于1964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是他近20年研究工作的总结。《报告》除了对墓室结构、雕刻和出土遗物等作了详细叙述外，还科学地复原了墓室的某些细部结构，同时又结合古代文献，对主要的雕刻和遗物作了考证和研究。此书的出版，不仅是考古学上的重要成绩，也对中国工艺美术史、建筑史和音乐史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他还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重译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冯汉骥基于对历史记载和地下发掘资料的综合研究，逐步形成了一种看法，即中国早期新石器文化可能要到长江流域去寻找，而不一定局限在黄河流域。为此，他进行了一定的准备工作，希望以此作为自己一生中最后一项主要的科研项目。但从1964年以后，由于政治运动的不断开展，使工作受到很大影响。1973年，浙江余姚县河姆渡终于发现了一种距今六七千年前的原始文化，证明了他的预见的科学性。1977年3月7日，冯汉骥在成都病逝。

张　铨

张铨，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10月生于浙江省仙居县一贫苦农家。幼年时就读于仙居教会小学。1913年小学毕业后，由教会保送入杭州之江大学附中。1917年升入之江大学文科，半工半读。1919年二年级时，因经济困难中途辍学，到金华省立七中任教。此间，他受“五四运动”及“工业救国”思想的影响，立志于开拓祖国的皮革工业。1921年，他考入国内惟一培养制革专业人才的北京燕京大学制革系。1925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27年升任讲师。不久，系主任美籍教授文森及另一美籍教授先后回国，由张铨代理系主任，他担当起原来两个教授的任务，全力维持教学。1年后，制革系与化学系合并，张铨仍然坚持开设制革课程，并充实皮革实验工场。

1937年，张铨在老师文森的帮助下，申请到两个奖学金，赴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制革研究系深造。他克服种种困难，仅用1年时间就获得硕士学位。两年后又攻下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得到皮革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此时，正值抗日战争进入艰苦阶段。皮革不仅是工业用品，也是军需

品。为了为抗战尽力，张铨放弃了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毅然离美回国。他接受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和四川乐山国立中央技专之聘，于1940年冬到达成都，先后任华西协合大学化学系教授、中央技专制革科教授、四川省立成都高级制革职业学校校长，并兼任燕京大学成都分校化学系教授、系主任，四川大学理科研究所教授等职。开设了制革化学、工业化学、制革工程等课程，培养了一批制革和化学工业人才。但由于国民政府对皮革工业不予重视，经费和设备奇缺，致使这门学科在中国长期得不到发展，中央技专制革科和制革职业学校先后停办，制革人才的培养濒临绝境。

建国后，制革工业获得新生。1952年，人民政府决定在高校设置皮革专业，并委派张铨负责筹建工作。从1953年起至“文化大革命”前的10多年时间里，他相继担任四川化工学院和成都工学院教授、皮革教研室主任，开设了丹宁鞣料，皮革准备工程、皮革整理、毛皮工艺学等课程，主编了中国第一部《皮革工艺学》教科书，编写了《毛皮工艺学讲义》、《丹宁鞣料讲义》、《皮革整理工程讲义》等大学教材，审校了苏联《皮革工艺学》教科书，并在1964年被轻工业部委任为高等工业院校皮革工业专业课程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培养的学生遍及全国，成为中国皮革工业的骨干力量。

在教学的同时，张铨为振兴中国的皮革工业作了不懈的努力。早在30年代，他就调查了北平、蚌埠等地区制革工业状况，并利用假期到张家口考察毛皮厂，又深入到绥远、宁夏、陕西等地山区考察皮革资源、植物鞣料资源。写出了《北平制革业之研究》、《安徽蚌埠皮革业之商讨》、《陕西各种物产之考察》等调查报告，提出了开办皮革厂，开发、利用植物鞣料制革等建议。还为天津春合制革厂的工人传授制革新工艺，使该厂的皮革质量名列前茅。建国后，张铨为发展皮革工业更是竭尽全力。20世纪50年代初，他即在成都开办猪皮制革训练班，传授腌制猪皮技术及猪皮革的鞣制工艺。在带领学生到上海、河南、重庆、成都等地制革厂实习期间，他不辞辛劳地推广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指导各地制革生产。

结合教学，张铨理论联系实际，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在北京燕京大学任教时，他就潜心研究皮革和毛皮的鞣制工艺，曾试验用萘醛、酚醛合成鞣剂。由于当时中国化学工业落后，萘和苯酚等化工材料无法供应，又转向植物鞣料的开发应用。在美国留学期间，致力于合成鞣剂、亚硫酸钠对植物鞣液发酵的影响等的研究，并进而探索植物鞣革的机理。他的博士论文《鞣酸和中国五棓子鞣质与皮粉结合的结合率》，就是研究中国五棓子鞣质与胶原结合的理论，证明五棓子鞣质与皮粉的结合系吸着作用。这篇博士论文成为辛辛那提学派创

立的植物鞣质吸着理论的开篇之作。张铨回国后，一直重视国产植物鞣料资源的调查和开发利用。他曾指导学生进行四川橡碗、姜头，陕西桦树皮、川南杉树皮的植物鞣料的鞣革性能研究工作。在华大任教期间，积极从事植物丹宁鞣革原理的研究；还研究制成制造皮革需用的油脂三种，以代替舶来品。1955年他兼任林业部成都植物鞣料研究室主任后，大力调查四川的植物鞣料资源，开发新的鞣料。在指导学生研究山羊皮保存法时，提出用硫酸钠、食盐来盐腌保存山羊皮的有效建议。他还对快速鞣革理论、铬植结合鞣法等进行了探索，提出了新见解。张铨先后发表了有关皮革质化学、植物鞣革理论、皮革毛皮加工及开发植物鞣料资源方面的科研论文20余篇，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1958年，他代表中国皮革界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第三届国际皮革专业会议上，作了“中国皮革涂饰剂生产、应用和研究的概况”的科学报告。

张铨历任第一届四川省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四川省政协常委，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化学化工学会理事，四川省化学化工学会副理事长，四川省科普协会及四川省科协副主席。“文化大革命”期间，张铨蒙受不白之冤，受到残酷迫害，但他仍不忘发展皮革工业。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酶法制革、皮革化工材料的发展方向、快速铬鞣工艺等翻译了大量资料，撰写了《快速铬鞣法简介》等论著和文章。1977年，张铨在成都病逝。

何其芳

何其芳，万县人，1912年2月5日生。幼年时在家乡读私塾，聪明好学，中国古典诗词和章回体绣像小说使他入迷，引导他走上热爱文学的道路。14岁到万县县城上新式小学和中学，开始接触白话文和新文学。他凭着自己的兴趣，读了冰心的《寄小读者》及其诗集《繁星》和《春水》，又读了印度泰戈尔的《飞鸟集》和《新月集》。他还喜爱闻一多早期的诗，受其影响很大，开始练习写诗。后赴重庆入治平中学，读至1928年。

在几年的城市中学生活中，何其芳接触到不少新思想，眼界为之开阔，抱负为之激发，理想为之升腾。他决心“欲成壮志往东下”，走出夔门，去寻求自己的前途。1929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预科；次年，又以优异成绩同时考上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1930年秋天，他自沪赴京，进入

清华大学外文系。由于没有正式的高中文凭，后被除名。1931 年，又入北大哲学系。他后来在散文《还乡杂记·代序》中说："我在大学读着哲学，又是一个偶然的错误。因为我当初只想到作为了解欧洲文化的基础，必须明了西方哲学思想的来源和演变，不曾顾及我自己的兴趣。"因而，他虽然读着哲学，心却向往着文学，并醉心于诗歌和散文的写作。1935 年，何其芳在北大哲学系毕业后，先后去天津的中学和山东莱阳乡村师范学校教书。

何其芳在大学读书和其后教书的岁月，作品计有散文集《画梦录》、《刻意集》、《还乡杂记》和诗集《预言》。此间，他还与卞之琳、李广田合集出版过《汉园集》，故有"汉园三诗人"之称。还办过小型文艺刊物《红沙碛》。1937 年他因散文集《画梦录》获天津《大公报》文艺奖，由此而在中国现代文坛享有声誉。

1937 年抗战爆发，何其芳从山东回四川，开始在万县师范教书。他和好友杨吉甫创办《川东文艺》，撰写和组织发表许多宣传进步思想、抨击腐败现实的作品。后《川东文艺》受当局查封，何其芳赴成都，任教石室中学。这期间，他又和卞之琳、方敬、朱光潜、谢文炳等同仁创办《工作》杂志。何其芳在上面发表《工作》等文。1938 年 6 月，写了为当时的热血青年广为传诵的《成都，让我把你摇醒》一诗。

1938 年 8 月，何其芳与沙汀、卞之琳等人一道，离开成都赴延安。到延安后，很快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被分配到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任教，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鲁艺，何其芳担任文学系主任，除了给学员们上创作和文艺理论两门课程之外，他还热情进行创作。就在他加入共产党的那个月里，写下散文《我歌唱延安》，歌唱延安"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

1939 年，何其芳和沙汀随贺龙一二〇师去晋西北、冀中抗日根据地工作。

1942 年，何其芳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此后，他的创作思想有了很大提高和发展。脍炙人口的《我为少男少女歌唱》及《生活是多么广阔》，就是这个时期的诗作。它们收集在诗集《夜歌》（再版时改为《夜歌和白天的歌》）中。

1944 年到 1947 年间，何其芳曾两次被中共中央派到重庆，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做重庆文艺界的统战工作和办《新华日报》。这期间，他写《论现实主义》等论文，以及不少犀利的杂文。这些论文，加上《我歌唱延安》、《川陕路上杂记》、《记贺龙将军》等散文，编成了《星火集》和《星火集续编》。另外，还有诗作《重庆街头所见》及《新中国的梦想》等，他还担任过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员，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宣传部

副部长，重庆《新华日报》副社长等职务。

1948年初，何其芳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中央工作委员会机关工作，一度任朱德的秘书。不久，到中央马列学院（党校）任教。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何其芳满怀激情写下了著名诗篇《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热情歌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他曾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历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书记处书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人民文学》编委等职。1953年负责筹建文学研究所，任该所副所长、所长，又任《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主编。

建国后，何其芳除担任行政领导职务外，主要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工作。他研究中国古典诗歌、民歌、新诗在形式上的特点，根据现代汉语的规律，提出了建立现代格律诗的主张，写出了《关于现代格律诗》的专文。同时，又撰写了大量的、有独特见解的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专文。还在《论〈红楼梦〉》、《论阿Q》中，提出了他著名的“共名说”。他在这个时期的理论著作计有《西苑集》、《关于写诗与读诗》、《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论〈红楼梦〉》、《诗歌欣赏》、《文学艺术的春天》等。又奉毛泽东之命编了《不怕鬼的故事》。

在“文化大革命”中，何其芳受到残酷的打击和迫害，身心受到摧残。1971年，他从干校回到文研所，不顾高压的政治气候，仍把精力放在中外遗产的整理、研究和翻译上。还着手撰写一部以他自己的经历为基础，反映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的长篇小说。

1977年7月24日，何其芳在北京逝世。其后，他的夫人牟决鸣将他1949年以来的诗作加以搜集，交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何其芳诗稿》。又有《何其芳选集》、《何其芳文集》出版。

郭沫若

郭沫若，原名开贞，号尚武，笔名石沱、鼎堂、麦克昂、杜徵、易坎人、高汝鸿、杜荃等。1892年11月16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生于乐山县（今乐山市）观峨乡沙湾镇。父亲郭朝沛是个兼营商业的中等地主。郭沫若在发蒙前由母亲杜邀贞教给许多唐宋诗人的绝句，5岁起入家塾“绥山馆”

读书8年，受到严格的中国传统文学的熏陶，这些成为他日后进行文艺创作的重要因素。

1905年冬，郭沫若考入嘉定高等小学堂，1907～1909年在嘉定府中学堂读书，课外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史著作及新学书报，受到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1910年2月，郭到成都插入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次年初，他被推为立宪派“早开国会”请愿的学界代表。不久，他放弃了对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幻想，接受了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的主张。

辛亥革命的果实被篡夺后，郭沫若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于1914年赴日留学，相继入东京一高医科预备班、冈山六高医科就读。1916年夏与圣路加医院护士安娜（原名左藤富子）结婚。在冈山六高的三年中，他广泛研读了泰戈尔、海涅、歌德的诗歌和斯宾诺莎及王阳明的哲学。1918年升入福冈九州帝国大学，仍习医。同年，与张资平、郁达夫、成仿吾筹商办“同人杂志”，决心用文学鼓动起热情来改革社会。次年11月发表第一篇小说《牧羊哀话》于北京的《新中国》月刊。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郭沫若即与几位留日学生组织了“夏社”，进行抗日宣传。1919～1920年，他不断在国内报刊上发表新诗和诗剧，这些诗震动了当时的中国文坛，后集为《女神》于1921年出版。1920年还出版他与宗白华、田汉的文艺通信集《三叶集》。

1921年7月，郭沫若与郁达夫、成仿吾等成立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很大的文学社团“创造社”，在他的努力下，《创造社丛书》、《创造季刊》相继问世。1923年3月，他从九州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全力推动创造社的工作。《创造周报》、《创造日》又相继发刊，使前期创造社（1921～1924年）达到了全盛时期。

1924年4月，郭沫若再度赴日，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这个时代的“唯一宝筏”。同年11月返回上海。他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中国社会问题，写出了揭露军阀战祸的调查报告《到宜兴去》。1925年他在沪投身于“五卅”反帝斗争。这时他创作了历史剧《聂嫈》，歌颂为国捐躯的献身精神。“五卅”之后，他配合中国共产党，与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展开论战，这些论文后集为《盲肠炎》出版。此间，他还出版了小说戏剧集《塔》、中篇小说《落叶》、小说散文集《橄榄》等。

1926年3月，郭沫若赴广东大学任教，并任文学院院长。他在广州期间应聘任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7月，他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秘书长、政治部副主任。次年，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逐渐暴露，他拒绝了蒋委以“总司令部行营政训部

主任”之职。在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前夕，于3月31日写出了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在人民群众中产生重大影响。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和宣传委员会主席。随军南下途中，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失败后，郭沫若受到蒋介石的通缉，在海丰农会干部的帮助下，取道香港秘密回到上海。

1928年至1937年10年间，郭沫若流亡在日本千叶县市川，在日本宪兵的监视下没有行动自由，全家6口生活艰难。但他一直关心国内情况，积极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支持并参加中国留日青年和国内文艺界的革命文化活动。1930年3月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艰苦的环境中，他第一个比较深入地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引入中国历史研究领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和古代社会历史，论证了中国奴隶社会的存在。他编著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卜辞通纂附考释索引》、《古代铭刻汇考》及续编、《殷契粹编附考释索引》、《石鼓文研究》、《周易的构成时代》等11种著作，尤以对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取得了震惊中外的突破性成就。他第一次提出西周是奴隶社会并从各方面加以论证；创造性地把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和古史研究结合起来；他的青铜器分期学说“实开我国青铜器断代研究之先河”，促进了古文字学、花纹学、形制学的研究，并用青铜器研究的成果，进行古文献的辨伪；初步清理了中国先秦思想发展的线索。

郭沫若在日本10年，译著甚富，先后翻译和出版的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艺术作品之真实性》（《神圣家族》后半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威尔斯《生命之科学》；歌德《浮士德》第一部（重译）、《赫曼与窦绿苔》；席勒《华伦斯坦》；辛克莱《屠场》、《煤油》；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一部分，抗战时期与高植合译完全书）；与李一氓合译《新俄诗选》；编译《日本短篇小说集》；米海里司《美术考古发现史》；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等。并开始了巨著《郭沫若自传》的写作，出版了自传《幼年时代》、《反正前后》、《创造十年》及历史小说《豕蹄》等。周恩来称这“海外的十年”是郭沫若“保持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准备了力量的十年”。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郭沫若于7月25日凌晨只身出走，秘密回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7月27日抵上海。次年1月，与于立群结婚。郭沫若相继在武汉、重庆，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郭任厅长）及其改组后的文化

工作委员会（郭任主任委员）为阵地，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和反法西斯、反分裂，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从而广泛地团结了大批爱国进步文化人士，为发展壮大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皖南事变”至抗战胜利的几年中，郭沫若按照斗争的需要，将主要精力转到学术研究和创作方面，创作了历史剧《屈原》、《棠棣之花》、《虎符》、《筑》（即《高渐离》）、《南冠草》、《孔雀胆》等6部大型历史剧。这些历史剧“借古讽今”，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内实行法西斯专制的黑暗统治，激励了革命人民的斗志，毛泽东赞扬他的历史剧“大有益于人民”。这一时期的史学著作有《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历史人物》等，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和评价先秦各派哲学人物颇多创见。1944年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影响深远，总结了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失败的历史经验，当时被定为中共整风文件。

1945年6月，郭沫若应邀出访苏联。日本投降后，他一直站在民主斗争的最前列。1946年2月，在重庆“较场口血案”中，他和李公朴等被国民党的特务打伤。5月，他离渝转赴南京、上海和香港，继续从事民主解放运动。其间写有自传《海涛集》、《洪波曲》和大量杂文等。

1949年2月，郭沫若由东北解放区到北平，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筹备工作，3月率团赴巴黎出席第一届世界拥护和平大会，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郭沫若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文联第一、二、三届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等职。在第一至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四届常务委员，二、三、五届副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1年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

郭沫若在繁忙的国务活动和社会活动之余，继续从事写作和学术研究。诗文方面创作了《新华颂》、《潮集》、《长春集》、《骆驼集》、《东风集》及《雄鸡集》等，历史剧创作了《蔡文姬》、《武则天》，还有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历史研究方面，郭沫若对中国古史分期方面的主张，引起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论争，大大推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1952年出版了《奴隶制时代》，确定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划界为春秋战国之交，这个见解在国内外的史学界具有很大的影响。1959年发表的《替曹操翻案》一文和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在

全国史学界引起广泛深入的讨论，兴起了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热潮。郭沫若还主编了《中国史稿》、《甲骨文合集》，校点了《盐铁论》、《崖州志》，集校了《管子》，此外还出版有《李白与杜甫》、《读〈随园诗话〉杂记》等著作。

1978 年 6 月 12 日，郭沫若在北京病逝。邓小平在悼词中说，郭沫若“不仅是革命的科学家和文学家，而且是革命的思想家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郭沫若逝世后，国家成立郭沫若著作编委会，出版了分为文学、历史、考古 3 编共 38 卷的《郭沫若全集》；将乐山沙湾和北京故居辟为纪念馆供人瞻仰。

吴锡瀛

吴锡瀛，生于 1903 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岳池县人。1929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任江苏无锡戚墅堰电厂工程师。1932 年回川任万县电厂主任工程师。同年，重庆华西实业公司为宽仁教会医院安装一台 50 马力的柴油发电机，闻吴锡瀛学识渊博，派员专程去万县聘请担任工程师，负责技术安装工作。1934 年，重庆电力公司成立，聘吴为工程师，负责筹建大溪沟电厂，历时年余，建成发电。

为适应电业发展需要，吴锡瀛于 1935 年去英国曼彻斯特工业大学进修，并在茂伟电机制造厂实习，半工半读。1937 年学成返国，购回 4500 千瓦的发电机两部，安装在重庆大溪沟电厂，该厂原有的三部发电机则分别拆安于南岸弹子石和铜元局。由于吴在安装、检修、运行、发电、供电等方面的知识广博，夜以继日地工作，既作工程总指挥，又亲自操作示范，还爬上数十米高的烟囱进行检修，因而激发了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工作热情，拆迁安装工程进度快、质量好，很快运行发电。

1938 年，吴锡瀛升任重庆电力公司总工程师兼大溪沟发电厂厂务主任。为防备日机轰炸，保证供电，他跋山涉水，制定规划，以快速高质于 1940 年将大溪沟电厂一部 4500 千瓦的发电机拆安于较为安全的鹅公岩石洞中。为缓和电力供应不足的矛盾，他帮助一些抗战期间内迁的工厂自备发电站解决技术上的难题。他还兼任内迁的金陵大学电机工程系教授，后又兼任重庆大学电机工程系主任至解放，培养了一批人才。1949 年 11 月底，重庆临近解放，几十名国民党特务去大溪沟电厂察看安放炸药的地点，策划破坏电厂。吴锡瀛配合

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护厂部署，冒着触犯重庆市长杨森“非常时期，不准停电，违者格杀勿论”的禁令，亲临关机停电，让工人护厂队堵死要道，使特务运送炸药的车子无法通行，保护了电厂。吴锡瀛因停电受到特务追捕，经工人保护才幸免于难。

重庆解放初期，急待修复被炸毁的鹅公岩电厂锅炉和其他电力设备，吴锡瀛担任总工程师兼鹅公岩电厂迁建工程主任，日夜加紧修复发电，并整顿了全市的供电线路，很快恢复了重庆市的工业与照明用电。三年经济恢复时期，重庆原有电力已不能满足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决定在大溪沟电厂扩建两台5000千瓦机组，在吴锡瀛的指导下，仅1年余就先后投产发电。他还指导建成35千伏电压的输电系统和跨越长江的输电线路，使重庆电力发展跨进了一大步。

1952年西南电管局在重庆成立。吴锡瀛被任命为总工程师，负责全局业务工作。贵阳电厂、云南开远电厂和普坪村电厂的踏勘、规划、设计、安装等，都是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的。同年，由苏联帮助修建的九龙坡电厂，一次出了技术故障，担任技术指导的苏联专家，一时找不出原因，无法解决。吴锡瀛组织部分技术骨干，利用晚上拆机检查，发现问题，作了技术处理，使发电恢复正常运转，受到赞誉。1953年，大溪沟电厂汽轮机上的水泵和调速器出现问题，影响发电正常进行。吴锡瀛召开技术会议，广泛听取大家意见，将水泵拆下，精心安装，并采用调整调速器角度等办法，使问题得到顺利解决。

由于新的工厂不断建成投产，用电量大增，重庆电力供应日趋紧张。1954年，狮子滩水电站建成后，吴锡瀛提议水、火电厂并网运行，变单发单供、供求不均为调节使用，使有限的电量得到合理的利用。

1958年，吴锡瀛任四川省水利电力厅总工程师，主管电厂和电力系统规划建设。在此期间，他主持了江油电厂、白马电厂的筹建和成都热电厂、重庆电厂的扩建工程，以及成都至德阳、绵阳至马角坝的输变电工程。20世纪60年代四川为国家工业建设的重点，年过花甲的吴锡瀛，仍徒步往返于大渡河两岸，为渡口市（今攀枝花市）的几处发电站选址。在勘定龚嘴电站时，天气骤变，冰雹风雨大作，吴被摔出五六米远，掉在两米多深的沟中，他不顾伤痛，仍坚持跋涉，直至选好站址为止。

吴锡瀛曾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先后任过四川省政协常委、九三学社成都分社主任委员、中国电气学会理事、四川电气学会理事长、水电部技术委员会委员等职。“文化大革命”中被扣上“特务嫌疑”、“反动技术权威”等帽子，受到批斗、长期关押，使大脑致残。1978年病逝。

曹葆华

曹葆华，乐山人，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生。他在家乡读完中学后，考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学习。在校期间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喜作诗歌，在著名诗人朱湘的鼓励下，曹葆华遂把写诗坚持了下来。1930年秋，他选了37首诗作，集为《寄诗魂》刊印，为表达对朱湘的敬意和感谢，他在扉页题上了“献给子沅”。这时曹葆华的诗已深受朱湘的影响，落句平实而少绚烂飞扬之感。

1931年，曹葆华考入清华研究院深造，继续钻研外国文学，并翻译了《现代诗论》、《科学与诗》等，出版了《灵焰》、《落日颂》、《无题草》等诗集，编入了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中，影响颇大。从研究院毕业后，曹葆华留居北平，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编译委员会翻译外国文学名著。

抗战爆发后，曹葆华辗转回到成都。他经常到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浓荫茶社喝茶，和新闻、文艺界的朋友交谈。1938年初，他与周文、沙汀等成立了成都文艺界联谊会。他写下了不少宣传抗日的诗歌，发表在进步文学期刊上。

1938年冬，曹葆华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他在《雪道上——去延安途中》一诗中写道：“心中如燃着夏天火热的太阳，忘记漫天飞雪，只知道，雪在飞，雪在跳，雪在笑，雪在歌唱，这西北的日子。”到延安后，曹葆华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任教员，他不顾条件艰苦，忘我地工作，要“向大众的头顶，竖起一面旗，一支号角”，写下了一首首炽热的诗歌，歌颂革命，歌颂延安。他赞誉道：“延安/西北的古城——/你是/阴霾天里/披着太阳的巨人/”“延安/西北的堡垒——/你是/暴风雨中/吹送光明的号手/”“延安/西北的屏障/你是/四万万人/命运唯一肩负者/”。

1940年，曹葆华参加中国共产党，1944年奉调中共中央宣传部，从事马恩列斯著作的翻译工作，他先后翻译了《马恩列论艺术》、《从猿到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等马恩列斯著作。

建国以后，曹葆华来到北京，继续从事翻译工作，他几乎每年都有译著问世，甚至有时一年几部。1962年，曹葆华调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他埋头书斋，专心译著，翻译了一系列文艺理论著作，如《论艺术》（普列汉诺夫著）、《文学书简》（高尔基

著）等。

十年浩劫中，曹葆华横遭迫害，但他仍坚持翻译工作，寄情诗歌。1976年4月5日清明节，因悼念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四五”运动。“四人帮”残酷镇压“四五”运动后，曹葆华再也无法平静，他激动地说：“我要是20几岁的青年，我也会走上街头这样做。”

粉碎“四人帮”后，曹葆华精神焕发，加倍工作，在他翻译《普列汉诺夫文集》第5卷列入出版计划后，他又抓紧时间整理校订，因过度兴奋疲劳，致使心力衰竭，不幸于1978年9月20日，病逝于书桌旁。

唐君毅

唐君毅，原名伯毅，1909年1月17日（清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生，宜宾县人。父唐迪风，清末民初学者，治音韵文字，先秦诸子及儒学，并兼及佛学。母陈大任，擅诗文。唐君毅幼承家学熏陶，敏而好学，“喜弄文墨”，善思考。1919年入学成都省立第一师范附小，后转读于重庆联合中学。15岁撰写《荀子的性论》发表。

1925年，唐君毅赴北京，先入中俄大学，旋入北京大学。在北大学者名流中，他独敬佩梁漱溟，并深受其影响。1927年，转学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时熊十力在该校短期讲学，唐君毅以其为师。1932年唐君毅由中央大学毕业返川，执教于成都敬业、蜀华、成公等中学。1934年回中央大学任哲学系助教。1937年抗战爆发后重返四川，在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及多所中学任教。曾与李澄源等人创办《重光月刊》和《理想与文化》。1940年任内迁重庆的中央大学哲学系讲师，1944年升任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47年任无锡江南大学教授、教务长，后又执教于中央大学和广州华侨大学。这一时期，他置身于现代新儒学旗帜之下，由探讨人生、道德入手，开始形成其唯心论的哲学思想体系，其主要代表作有《道德自我之建立》及《人生之体验》。

1949年6月，唐君毅移居香港。1950年春与钱穆、张丕介等人创办了新亚书院，唐任教授兼教务长。书院“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学府导师制度，以沟通中西文化，谋求人类福利和平为旨”。在唐、钱等人的努力下，新亚书院声誉鹊起，成为现代新儒学传道授业的大本营。是年，唐君毅还倡设新亚学术文化讲座，自任主讲，

并邀请文化界名宿主讲，前后达5年，计139次。

1957年，唐君毅应美国国务院之邀，赴美访问讲学，与旅居美国的张君劢作长谈，共感欧美学人对中国学术文化的观点多有不当，遂由唐起草，并与台湾现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徐复观“往复函商”。次年元旦，由唐、张、牟、徐四人联署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在香港、台湾同时刊出。《宣言》4万余言，全面论述了中国文化的诠释方法、精神生命、伦理价值、心理意义、长存依据，以及传统文化与民主政治、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互补、世界文化的未来趋向等。《宣言》轰动一时，被视为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思想纲领。

这一时期，唐君毅接续其20世纪40年代的学术研究，由道德自我的认识进达人文精神的探寻，全面探讨了中国文化价值、缺点及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应取的态度。先后有《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人文精神之重建》等出版。

唐君毅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从中国哲学入手，疏导儒、道、释哲学义理，深入展露儒家心性之学的丰富内涵，融会中西哲学。1961年，他推出了《哲学概况》（上、下），以中国哲学为主论述。后他又专注于中国哲学中基本概念、范畴的研究，疏导其义理及其历史发展相互关系，以求“对中国整个哲学传统予以系统的再解释”。在1966年至1975年间完成了《中国哲学原论》巨著，该书分导论篇、原性篇、原道篇、原教篇，200余万字。有学者认为该书将五四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964年，新亚书院与崇基书院等合组为香港中文大学，唐君毅任哲学系讲座教授、文学院院长等职。1974年，他由中文大学退休，专任新亚研究所所长。1977年，所著《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出版，此书除导论、后序外，计32章，80余万字。他在书中综合了中西印哲学，提出了心灵三界九境说，“建立了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将宇宙万物看做是求超越的过程，生命的存在不仅是为存在而存在，乃是为超越自己而存在；心灵的活动也是在这个基础上，从现实的生活逐渐向上求更高的价值，最后止于天德与人德一致的最高价值世界”。此书出版后，饮誉学林，唐君毅也被誉为“中国自朱熹、王阳明以来的杰出哲学家”。

1978年2月2日，唐君毅病逝于香港。他一生著有近20部专著，学术论文数百篇，近千万字，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有《唐君毅全集》。

李斯炽

李斯炽，名煐，祖籍河南阌乡，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生于成都。父熟先，清末游幕四川，定居成都，后以私塾授徒自给，与董稚庵交厚。董善书法诗辞，尤精医术，李斯炽以世谊关系，自幼从董受学。1915年李斯炽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留校作理化助手，并在成都市几所中学兼任教职。此间，在董稚庵的影响下，决意以主要精力从事中医事业，实现“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愿望。

1932年秋，成都霍乱流行，死亡惨重，棺木为之一空。李斯炽约集中医同道蔡品三、罗春航、谢子和、李懋勤、李用宾、雷敬之以及尚未成年的儿子李又斯等27人，组成“壬申（岁次壬申）防疫队”，由私人出资，采用民间验方，制成“防疫避瘟丹”，连同其他有效中成药，深入旧皇城坝、御河街等劳动人民聚居、发病率最高的地区免费治疗病人；同时散发有关卫生防疫常识材料，发动群众灭蝇灭鼠，对控制疫情，减少死亡，起了积极作用。

1934年，李斯炽正式开业行医。1936年，为反对国民党废止中医中药的政策，李斯炽在成都联合中医界同仁，呼吁请愿，并组成“四川医药改进会”，创办《医药改进月刊》，为维护中医事业而奋争。与此同时，又与赖华峰、杨白鹿、邓绍先、何伯壎等人，创办了“四川国医学院”。李斯炽先后任教务长、副院长、院长。此后，又与赵源章、王旭光、傅启初等，筹办了中医医院和新中医疗养院，作为国医学院学生的实习基地。由于国民政府对四川国医学院不予立案注册，学生毕业不发给行医执照，李斯炽为争取学院的合法地位而四处呼吁，不辞辛劳；并通过法律途径，请律师，上法庭，对有关当局提出控告，据理力争，不稍停止。又因办学经费困难，他只好与同道采取社会筹募。自身捐献，义务上课，借贷典当等办法，将四川国医学院惨淡经营到解放前夕。他为办学欠债如山，但毫无追悔之意。四川国医学院开办10余年，为四川地区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中医栋梁。

1950年8月，李斯炽赴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得到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接见。1951年，人民政府为李斯炽偿清了他解放前办学欠下的债务。他备感共产党和政府对中医事业和对他本人的关怀，工作更加不遗余力。1956年9月，成都中医学院成立。1958年2月，李斯炽被国务院正式任命为院长。1959年，李斯炽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同年获卫生部颁

发的金质奖章。此后，李斯炽先后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任中华医学会顾问，中华医学会四川分会副会长等职务。

李斯炽治学态度严谨，勇于进取。他常告诫后学：学中医要有四不怕，即不怕难治之病，不怕难答之题，不怕难讲之课，不怕难写之文。他对疑难病症，绝不轻易罢手。他认为：通过治疗疑难病，能探索复杂的医学规律，此一乐也；能救人于危难之中，此二乐也；能丰富自己的常识和经验，此三乐也。

李斯炽以善治内科杂病名噪全川。他对《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有精深的研究和独特的见解。他不泥于古方古论，学术思想上主张“诸家兼采，推陈致新”，临床上则主张“理宜精，法宜巧，方宜平，效宜稳”，常以“四两拨千斤之法”，取得简、便、廉、验的治疗效果。他对治疗心脏病、中风病有深刻研究；运用疏肝法治疗各种内科杂病，尤有丰富经验。如治咳嗽，常用疏肝理脉法；治胃痛，常用疏肝和胃法；治瘿病、瘰病，常用疏肝消痰法；治黄疸，常用清利湿热兼疏肝法；治水肿，常用运脾行水兼疏肝法；治症瘕积聚，常用疏肝软坚行血法；治气虚发热，常用补中益气兼疏肝法；治火郁胁痛，常用疏肝泄火法等。临床上辨证施治，化裁自如，有其独到创新处，疗效都很好。

晚年，李斯炽身患较严重的贫血和低血压症，仍坚持工作，对中医事业忠心耿耿，鞠躬尽瘁。1978 年，李斯炽被授予中国第一批中医教授职称。1979 年 2 月 28 日病逝于成都。

李斯炽的主要著述有《实用内科选》、《中医内科杂病讲义》、《医学三字经浅释》、《金匮要略新诠》、《医学歌诀三种》、《李斯炽医案》等 20 多种。

王文鼎

王文鼎，江津县人，生于 1894 年(清光绪二十年)。少时家境清贫，父母勉力供其读中学，但因他带头组织学生会反对袁世凯称帝，校方以“不悌不孝，而好犯上者，不堪教也”为由将他勒令退学。为谋生计，他先后拜郑先生、何秋涛，颜闻修为师，刻苦学习中医，步入医林。后欲赴日本求学深造未成，从上海折回武汉行医。时值大革命时期，经张曙时介绍，于 1925 年参加革命（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返川，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建国前在成都以善治小儿疾病被誉为“王小儿”，他以其声望和地位在经济和物资

上支持党的工作，为发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四川的解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建国后，他历任川西行署及四川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委员、成都市卫生工作者协会副主任等职。1956 年调北京中医研究院，担任中医科研领导和临床研究工作，并向中央推荐了一批四川名医调京工作。他曾任中医研究院学术处处长、北京西苑医院副院长、中央高级干部保健医师。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卫生部顾问、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79 年 3 月 20 日，王文鼎逝世于北京。

1962 年 7 月 10 日，王文鼎写了一份关于发展中医事业的意见书呈送中共中央研究参考，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并得到周恩来的接见。1977 年，他又对如何研究整理祖国医学发表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中医的研究发展和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都必须首先搞好继承，不仅要继承以往的治疗经验和有效方药，而且要全面掌握中医理论，加以整理和提高。进行中医研究，必须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成果，全面地研究中医的治疗规律，突出中医的特点，不能简单地以西医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指导中医研究。

王文鼎从事中医工作 50 余年，在医理上多有建树，尤其在辨证论治方面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他将防治疾病概括为 47 个字，预防疾病："时其起居，节其饮食，调其情志，适其劳逸"；诊断疾病："人、病、证（三结合，以人为主），整体观念，全面分析，辨证论治"；治疗疾病："治疗之要，贵在调整，自力更生，更为要紧"。

王文鼎善于对前人的经验兼收并蓄，吸取营养，在临床中加以运用发挥，取得显著成效。如对癫狂症的治疗，或用《千金方》温胆汤治其胆虚痰热；或用《丹溪心法附余》礞石滚痰丸治疗痰浊内壅或痰火挟风所致者；或用《医林改错》的癫狂梦醒汤，化瘀开窍，活血醒神。他还根据《难经》"重阳者狂"的论点，自拟"狂症方"，进一步摸索行之有效的治疗规律。他对一些验方、秘方也很重视。如治肢体奇痒症用"五黄汤"（黄连、黄芩、黄柏、火黄、栀子）加犀角、苍术、苦参、蜈蚣、全蝎、僵蚕，服汤药前服紫雪丹 2 克，一剂痒止，三剂结痂治愈。立方之意，遵"诸痛痒疮，皆属于心也。"此方是他从成都外科名医黄祖成那里学来的。又如治鹤膝风方，由生黄芪 240 克，远志、石斛、怀牛膝各 120 克，双花 30 克五味组成。用 10 碗水先将四味煎熬至两碗水时，加入双花，再煎成一大碗。临睡空腹一次服下。全身大汗，听其自止。用毛巾把汗擦干，揉搓全身。常可一剂见效，两三剂治愈。

王文鼎一生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高超的医术治愈了许多疑难病症，赢得人们的称赞。1975 年治一刘

姓患者，西医诊为肺脓肿，久治未愈，怀疑肺部有占位性病变，建议手术切除。王文鼎诊后谓肺部化脓性病变有肺痈、肺疽之别，“痈有火毒之滞，疽有寒痰之凝”。该患者发病开始为半阴半阳证，迁延日久，气血虚衰，阴寒凝结，毒邪深伏，瘀血内滞，是为肺疽。治疗先用益气活血化瘀，佐以止血解毒，服25剂。改补气养肺活血止血法，又服15剂。瘀散血止，肺虚阴寒之象毕露，投以通滞温补开腠的阳和汤加味50余剂，拍片，化验检查正常，患者自觉症状基本消失，以健脾益气之品调理月余而病痊愈。又如患者崔某右足背肿物7月，破溃翻花月余，被诊为右足滑膜肉瘤，建议小腿中下段截肢，并谓术后也只能多活一年半左右。患者家属不同意手术，于1973年9月29日请王文鼎诊治。他诊为石疽，乃阳虚阳毒内陷，气滞血瘀所致。治用温阳虚以扶正，拔毒消坚，行气化瘀以祛邪。常服阳和汤、犀黄丸，外用鲜商陆根30克，捣碎加食盐少许，涂敷翻花疽面，1日1换。经3年治疗，滑膜肉瘤基本痊愈，透视拍片及化验正常。

李紫翔

李紫翔，原名延瑞，曾用名董志诚。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生于安徽省泾县。早年就读于宣城第四师范学校。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历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委书记、全国铁路总工会秘书、中共河北省委秘书长等职务。1933年5月，上海共产党组织遭受重大破坏，李紫翔与共产党失去联系。

20世纪30年代初期，李紫翔与陈翰笙、王寅生、孙冶芳、钱俊瑞、吴觉农、薛暮桥、孙晓村、冯和法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他被推选为理事。1934年，李紫翔来到天津，参加吉鸿昌组织的“华北抗日行动委员会”。后经人介绍到泰山为隐居的冯玉祥及其部下讲授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历史。并担任了冯玉祥的秘书。他与冯玉祥从泰山到南京、汉口、重庆共相处了8年。

1942年，李紫翔在重庆经同乡介绍，到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处工作，后兼任第一科科长。1946年夏，国民政府迁回南京，李紫翔辞去经济部的职务，受聘为重庆《商务日报》主笔，主持经济问题的笔政，兼任西南实业协会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后又受

聘为重庆大学银行保险系经济政策教授，求精商学院政治经济学及商品学教授，并任该院院长。他还参与组织重庆民联（民革前身）临时工作组，负责重庆民联分会工作。

建国后，李紫翔任民革重庆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组织处长，并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财经委员会委员、研究室主任、计划局副局长，西南劳动部副部长，重庆市人民代表等多种职务。从1955年起调任民革四川省委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暨四川省水利厅厅长，全国政协委员与四川省政协常委等多种职务。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除保留省政协常委和民革省委委员外，被撤销了其他一切职务。1960年后任四川省志工矿志编辑组副组长。

李紫翔不仅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同时也是一位较有影响的学者、经济学家。他一生中著述很多，仅论文就达百余篇。1933年，他在上海期间，就帝国主义对纺织、交通、运输、贸易、金融等行业的入侵以及入侵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等问题，先后撰写论文10篇，刊载《申报》、《新中华》、《东方杂志》上。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论证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半殖民地的性质，驳斥了托派关于中国已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的谬论，坚持认为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

1934年，李紫翔转向了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他在《中国农村》月刊上发表有《中国农村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等论文数十篇。1935年，他与千家驹共同编著出版了《中国乡村建设批判》一书，揭示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对中国农村的残酷剥削以及中国农村的衰落，论述了中国农村变革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土地问题。指出改良主义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不能解决中国农村建设问题的，中国革命的任务不仅是反对帝国主义，而且要反对封建主义。

1944年，李紫翔在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处工作期间，主编了一套《中国后方各省工业统计》，编制了9期分季度的工业生产指数，这一套统计资料为研究大后方经济的专家学者门提供了全面、系统、翔实的参考资料。同时，他也利用这些统计资料，研究大后方的工业生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问题，撰写论文数十篇，分别刊载于《新经济》、《经济周报》、《中国工业》、《经济建设季刊》、《中央银行月报》、《西南实业通讯》、《四川经济季刊》上。这些文章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深刻地分析了抗战以来大后方工业，尤其是内迁工业的兴衰起伏，从社会性质上分析了大后方工业发展的种种局限性，阐述了他对中国工业化和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新经济体制的设想。他掌握有大量的统计资料，因而，他的文章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许多内容被解放后编选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书辑录。

李紫翔在任四川省志工矿志编辑组副组长期间，致力于省志工矿志经济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他组织人员，从报纸杂志中辑录出1840～1949年有关四川工矿经济的资料约2000万字，加以整理、分类、抄写，成为今天有关单位修志工作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文化大革命”中，李紫翔受到冲击，身心遭受严重摧残。1979年1月，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对他的错划右派问题作了纠正，恢复了他的政治名誉。同年10月，他当选为民革五届中央委员。由于心脏病复发，1979年10月29日在成都逝世。

常隆庆

常隆庆，字兆宁，江安县板桥镇人，生于1905年1月8日（清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三日）。1915年春，常隆庆得到岳父资助到成都入中城小学。1917年秋，考入江安省立第三中学，毕业后，于1922年夏，考入北京大学理预科。在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下，他决心献身于地质事业。1924年夏，他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后因家庭经济困难，于1926年休学，1928年夏重返北大复学。

1930年夏，常隆庆以优异成绩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他随即进入了实业部北京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任调查员。在此，常隆庆接触到中国地质学界老前辈丁文江、翁文灏等，耳濡目染，受益匪浅。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为了实地调查，他北至黑龙江的绥化、安达以及芦沟桥一带，冒着日军进犯的战火；西至陕南一带，不畏土匪抢劫，风餐露宿实地进行土壤调查。先后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发表多篇论文，为这些地区的土壤研究奠定了基础。1932年秋，应卢作孚之邀，常隆庆来到重庆北碚，担任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主任。他组织领导了北碚地区的地质调查，并为民生公司的川江航运进行了水文地质工作提供了丰富的水文地质资料。1933年6月，先后深入到华蓥山、渠县、天池等地进行地质调查。在调查期间，忽闻8月25日（农历）松潘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即叠溪地震），常隆庆被奉派深入地震灾区进行详细考察，并写成《四川叠溪地震调查记》。1934年冬，又到云阳、奉节、巴东等地，沿长江一线考察煤矿。途中，他所乘的木船在富里碛被外轮浪翻，在寒冷的激流中冲了四五里才被救起，他没有因此而中断工作，仍坚持野外调查。通过几年对川东地区的野外地质调查，积累了大量资料，在此基础上，常隆庆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编绘出四川

东部地区最早的地质图。1935年12月17日，因马边发生强烈地震，金沙江会理新堡子地段断流。四川省政府建设厅命常隆庆前往勘察，并要求调查宁属地区（现西昌地区）各县的地质矿产。他将刚开展工作10余天的綦江矿区地质勘探工作移交李贤诚主持，前往宁属。

1936年1月4日，常隆庆偕殷学忠由重庆出发，前往西康宁属彝族聚居区调查。当时民族关系紧张，川康境内战争也频繁。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随马帮徒步出没在荒野之中，坚持野外地质调查长达8个月之久。常隆庆对宁属七县的地质矿产情况均有令人振奋的重大发现。9月中旬回到重庆，编写了《宁属七县地质矿产》一书出版。书中对倒马坎（今攀枝花铁矿的倒马坎矿区）的地质情况及本区铁矿资源作了首次报道，并公诸于众。他在书中写道，这次调查“费时半载，周历七县，实勘矿区50余处”，“安宁河流域矿产之丰，为西南诸省之冠，而处川、滇、康三省之交，绾毂西南之势。诚能将由成都经西昌至昆明铁路筑成，则安宁河流域，当为国内极佳之工业区”。常隆庆这一卓识见解，今天已付诸实现。方毅在视察攀枝花时说：“攀枝花现在建成了，不要忘了发现攀枝花的有功前人常隆庆教授。”常隆庆首次调查宁属地区所取得的成果，为后人继续探明、扩大攀西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奠定了基础。

抗战期间，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提出“开发资源，整饬边备”，于1939年4月调常隆庆任行辕地质专员。12月他到会理、永仁一带调查地质矿产，并在永仁发现那拉箐煤矿（今宝鼎煤矿），在年终考绩时获“千城”奖章。1940年8月，常隆庆和刘之祥一道调查宁属南部康滇边区地质矿产，在西昌至盐边攀枝花找到了磁铁矿（现攀枝花铁矿的兰家火山矿区），并计算了储量，证实了他原来的推断。因此，年终考绩时，他又获“光华”奖章。

1946年2月16日，常隆庆担任四川地质调查所所长。抗战胜利后，地质调查工作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微薄的工资收入已不能维持职工的基本生活，调查所面临崩溃的境地。常隆庆在卢作孚的帮助下，创办了北碚旅游车以增加职工收入，想方设法维持调查所直到解放，使整个调查所的人员、设备得以保全。

建国初，常隆庆任西南地质调查所副所长。他参加四川工业基地考察团，到乐山、成都、灌县等地考察，为川省工业发展、布局提供了地质依据。1951年5月5日，他被调到昆明兼任西南地质调查所第二调查队主任，主持云南省的地质调查工作。

自1952年后，常隆庆就转入地质教学及科研工作。先在重庆地质学校任教导主任。在此他主编了中国第一部中等地质专业学校教材《中国地质学》，由地质出版社出版。1956年9月，常隆庆调成都地质学院任教。他参加学院教学实习基地的踏勘工作，担任《中国地

质学》的教学，编成《中国主要矿产及成矿规律》讲义2册，提供教学使用；他还参加西南红色地层研究工作，多次到云南鹤庆、永仁、昆明及西昌、昭觉等处，实地踏勘，测制剖面，采集化石、岩石样品，进行分析研究，为西南中生代红色地层及煤系的时代划分及对比工作奠定了基础。

常隆庆在从事地质工作和教学的40余年中，先后发表20余篇重要科学论文及专著，内容涉及地层、古生物、矿产、地质构造、土壤、地震、中国地质等。他把全部精力和心血倾注到中国地质事业中。1979年7月21日，正当常隆庆伏案编制《亚洲地质图》时，不幸因脑溢血夺去了他的生命。

陈达夫

陈达夫，原名大泗，西昌县马水河人，生于1906年12月30日（清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祖父陈介卿，父陈绂生，皆为西昌名医。

陈达夫青少年时代，很有一番抱负。当他读了东汉名医张仲景的《伤寒论序》后，深为张仲景忘躯徇物的献身精神所感动，决心为医，治病扶民。这一志向，正是他的祖父和父亲所期于的。在1922年至1925年的4年时间里，他在祖父和父亲的指导下，一面读书，一面临床。祖父和父亲的教诲使他懂得：为医性命攸关，绝非儿戏，重要的是精通医理。而精通医理，首在基础，即内科学问。眼科学理也是在内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理论到治疗上，都不能脱离内科。因此，他先后读完了《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神农本草经》、《医学心悟》、《东医宝鉴》、《目经大成》等大量医书，掌握了中医理论的基本功，为他一生的成就奠定了基础。

在许多医家中，陈达夫又十分钦佩清代医家王清任重视实践、敢于创新的精神。王清任为了解人体脏腑的构造，不避臭秽，多次到荒野废墓去观察暴露的尸体。陈达夫为了解人体眼球的结构，常常买回猪、牛眼睛解剖观察，反复琢磨；同时，一有机会，便阅读一些西医书籍，以补中医书之不足。陈达夫后回忆道，他这种“从来读书，总喜欢在书本以外去研究，不一定尽为书卷所束缚”的治学方法，是他获得成就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1933年，陈达夫正式在西昌开业行医，专攻眼科。他既受家传，又善博采众长，融会古今，临床效果很好，许多疑难眼疾，经他治疗，均妙手回春。

历时20余年，名噪西川。

1956年陈达夫被荐调至成都中医学院，1957年成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建立，陈达夫任眼科主任。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疑难眼病，同时也有机会学习更多的西医知识，为他系统地进行中医眼科学的治疗、科研和教学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62年，陈达夫写成学术论文《中西串通眼球内容观察论》。他用《内经》理论作指导，并经反复临床验证，第一次在眼科理论上提出的新的见解——即西医学的眼球组织结构与中医学六经分属，具有共通的相应和对照关系。这一创见，为眼科学的中西医结合作出了重大贡献。

1977年，陈达夫完成了祖传中医眼科诊断治疗理论和方法的总结整理，首创将《伤寒论》六经辨证用于眼科，著成《中医眼科六经法要》一书。

该书认为，六经证治是祖国医学中最早最完善的辨证论治方法，是东汉伟大医学家张仲景对公元二世纪以前人们与疾病作斗争的宝贵经验的总结。陈达夫将此法移于眼科，以《伤寒论》六经辨证为眼疾分类的纲领，体例亦遵循《伤寒论》。主证首列眼证，结合全身症象，从六经经络的表现，从仲景的六经方证，从伤寒的病理以及患者自视异常等各个方面，综合分析，辨证论治。该书突破了历代中医眼科以症名的框范，体现了中医学的两大基本观点：整体观与辨证施治，同时发展了中医眼科“五轮八廓”学说，在学术上是一大创新。对眼科的中西医结合，也是一大贡献。

1978年，《中医眼科六经法要》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次年获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

陈达夫多年运用六经辨证在临床中取得显著的成效，许多很难治的眼疾，如肝风失明（视神经萎缩）、炸伤失明、眼球外突、中心性视网膜脉络炎、视网膜剥离等，经他治疗，都不同程度的恢复了视力。他还同西医一起，合作完成了四川省第一例针拨白内障术，为针拨术的成功开展作出了贡献。他还通过教学、培训和学术观摩交流，为四川和全国各地培养了一大批眼科人才。陈达夫的医疗实践和学术思想，不仅为成都中医学院眼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在全国许多中医眼科同道中产生很大影响，从而形成中国中医眼科学术上的新流派。

1978年2月，陈达夫被授予中国第一批中医药教授职称，1979年，他相继出席了全国和四川省科学大会。他还先后担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四川分会常务理事、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等职。1979年3月30日，陈达夫因积劳成疾在成都病逝。

税西恒

税西恒，又名绍圣，1889年3月19日（清光绪十五年二月十八日）生于泸县白云场团山堡一书香人家。8岁入私塾。稍长，赴成都读嘉定中学。1906年去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读书，该校是同盟会的重要据点，税西恒深受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1911年，考入青岛高等学堂。1911年初经李石曾介绍加入京津同盟会，曾参与暗杀袁世凯的活动。

辛亥革命后，为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他考取了公费留学生，1912年入柏林工业大学学习，除修完机械系本科课程处，还选修了水利、建筑、采矿等学科。191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德国国家工程师称号，任西门子电力公司设计工程师。

1919年回国后，税西恒先后担任四川兵工厂总工程师、四川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四川工业专门学校等校教授。1921年应川南道尹杨森之聘，任道尹公署建设科科长。同年，税西恒通过对泸州龙溪河丰富水力资源的考察，提议利用洞窝瀑布办电厂，改变用油灯照明的落后状况。他四方游说，采取地方筹集私人入股办法，与德商签订购买机器设备合同，同时邀请留日学电机的彭玉富、留德同学骆敬瞻担任工程师。由于军阀混战加剧，泸州地处川滇要冲，几无宁日。致使认股的股东犹豫观望，多数不愿拿钱交纳股金，而德国公司又催款提货，否则按合同罚款或取消合同。在此事业成败的关键时刻，税西恒不顾家人的反对，说服了祖母，毅然将其部分祖业（田产和山林）变卖，交纳股金，以做表率，并当众表示：建站期间，不拿工资。此举极大的感动了县上的士绅，相继交纳股金，使电厂得以兴办。

在建厂期间，税西恒就地取材，亲自设计，开采洞窝丰富的沙石，用条石和石灰砂浆支礅筑厚连拱拦水坝，在龙溪河上建五级蓄水，水位基本上限制在河床内，避免淹没良田，农民也可常年利用水坝内蓄水灌溉田土。由于多级、坝低，就地取条石直立连拱成坝，工程简便，可分期投资，分期建设。1925年电厂建成，取名济和水力发电厂，正式向泸州城输电。济和水电厂是四川建成的第一座水电站，也是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建成的最早的水电站之一。在建电厂期间，税西恒还为电厂办了技工学校，培养了一批水电技术骨干。

1926年，重庆创办自来水公司，聘税西恒为总工程师。1929年开始建

厂。他选定了重庆临江的最高点打枪坝为地基，那里有大片三叠纪砂岩，可就地取材、采石修水池、水塔、厂房。当向德商订购的卧式、立式水泵和电机运抵重庆时，因当时重庆还没有起重机，起下困难，于是他雇了两条大木船并拢，搭上支板，权当“囤船”，卸下机器，然后用绞车绞上岸。不料在他检查“囤船”的支架时，跳板破裂，堕入船舱，同在一起的工程师也滑下，踩断他的胸部肋骨3根，使他人事不省，经德医诊治，苏醒过来，第一句话是：“水泵、电动机没有受损吧？安装时要仔细检查啊！”1932年，重庆市自来水厂建成供水。

1935年，税西恒任重庆大学工学院院长兼电机系主任，他延聘名师，亲自编写教材，又就地取材主持修建供教学用的金属实验工厂，千方百计提高教学质量。他还拿出工资，影印几百本德人特许所著《科技手册》，发给在校师生。抗战胜利后，税西恒又担任了重庆中国公学大学部代校长和重华学院院长，仍一如既往，为办好学校尽心竭力。

1936年寒假，税西恒约集教授刁泰乾、学生熊光义等六人去川黔边境乌江上游的龚滩勘察水力资源。历尽艰险，完成了龚滩历史上第一次勘测工作。他还先后勘测过龙溪河、大渡河、岷江、二郎滩、狮子滩等地。1941年，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聘税西恒担任调查设计主任，制定出川康地区5年和10年经济建设规划。次年他出任川康兴业公司技术室主任，在5年任期中，他一面积极兴办了四川农业公司、四川机械公司（由成都九眼桥的旧兵工厂改办）等；一面又尽力扶持帮助已有的一些民族工商企业。为解决燃料问题，他还特别重视煤矿的开发，到解放时，经他勘明的煤矿已有10余处。

1944年，税西恒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重庆“蜀都中学”筹建工作，并出任该校副董事长兼校长。当法币贬值，学校经费拮据时，他慷慨捐助了500多万元法币，支撑学校。同年，在成舍我创办的《世界日报》上，他约了两位有识之士，辟了《积极评论周刊》专栏，为文针砭时政，出了9期即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

抗战后期，税西恒和许德珩、褚辅成、潘菽等十多位文教科技界进步人士，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科学社”，团结知识界，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抗战胜利后，“民主科学社”改名“九三学社”，税西恒是九三学社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的主持者之一。

建国后，税西恒历任重庆自来水公司经理、总工程师，“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重庆分社主任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第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四川省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届四川省政协常委等职。

1954年税西恒担任赴朝慰问团副团长，奔赴朝鲜前线慰问志愿军将士。1956年，他曾在全国建筑学会专刊上发表有关木石结构的论文若干篇。1960年在重庆自来水厂的扩建工程中，他年逾古稀，仍亲自跋山涉水，现场勘测。1980年6月18日，税西恒在重庆病逝。

税西恒在文学艺术上也颇有造诣，诗词书画俱佳。他毕生喜好诗文，曾有《积极诗草》两册，存诗五、六百首。

刘建熙

刘建熙，生于1906年9月2日（清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六日），湖南省醴陵县人。1920年刘建熙考入长沙长郡中学，他2年学完了4年的全部课程，于1922年提前毕业，同年北京清华学校在湖南招收3名中学生，年仅16岁的刘建熙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1928年他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又以优异成绩被选送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系学习，专攻结构学和铁路学。1930年秋季毕业，获土木工程师资格。后升入该校研究院，翌年8月毕业，以《关于多层高屋架中风的应力分析》的论文获硕士学位，并由美国工程专家推荐，受聘于美国波阿铁路公司任学习工程师。他在参加一孔跨度426英尺的花钢梁大桥的设计中，显露其才华，受到了桥梁总工程师和公司经理的赞誉。

1933年春，刘建熙谢绝了波阿公司的挽留，毅然回国，先后参加了平汉、粤汉、京赣、湘桂、天成、黔桂等铁路及川中、川滇、粤桂等公路的踏勘修建工程。历任副工程师、设计室主任、总段长、测量队长、局总工程师、材料处长、工程处长、工程局副局长等职，并一度兼任过重庆中央大学、贵州大学教授和中国土木工程司学会贵阳分会会长，他因在桥涵、车站、隧道设计和审核工作中的劳绩，曾受到当时交通部的嘉奖。

贵州解放前夕，刘建熙任湘桂黔铁路工程局副局长兼都筑段（都匀至贵阳）工程处处长。他不受威胁引诱拒绝逃台，决心留下来迎接解放。当时都筑段数千职工生活无着，刘建熙不顾个人安危穿越反动军警戒备森严的川黔公路，从贵阳赶赴重庆，向国民政府交通部领回了最后一批银圆券，平均发放给每个职工，解决了职工燃眉之急，稳定了他们的情绪。他团结全处员工，积极作好迎接解放的准备，宣布全处人员冻结，不许流动，并组织将各种技术及人事档案、财产、物资、设备等清点造册，妥为保管。为不给国民党溃逃军队

提供交通工具，他还布置把全部汽车的主要部件拆卸封存。1949年11月14日贵阳解放，贵州省军管会接收工程处时非常满意，表彰了刘建熙的爱国行为。经他保留下来的筑路机械、器材，后来在乌江大桥和湘黔、贵昆、川黔公路的抢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保留下来的一批技术人员，在修建西南铁路干线中发挥了骨干作用，不少人后来成了各局、院、处、段的技术负责人。

建国后，刘建熙先后担任贵州支前抢修委员会工程组长，贵阳铁路局总工程师，第二铁路工程局技术处副处长、局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技术委员会第二主任等职。他把自己的精力和才智全部用在了西南铁路的建设中。从建国初期恢复交通，到西南几条铁路干线的修建，都凝聚着刘建熙的心血。

1949年底，刘建熙在负责抢修湘黔、贵昆公路的工作中，废寝忘食地组织力量，拟定修复计划，深入工地检查督促，并与工人一起抢装抢卸河沙，在他的带动下，经过工人日夜奋战，迅速恢复了公路交通，为解放整个大西南打通交通要道作出了贡献。紧接着刘建熙奉派到衡阳铁路局参加修复都丹段的铁路交通。当时国家经济十分困难，他想方设法将报废车辆拆下的槽铁拼成八座桥梁，解决了经费不足的大难题。在成渝铁路修建期间，刘建熙提出把资阳以西的几座厂制丁字梁改为就地依照厂制尺寸灌注，加快了工程进度。在宝成铁路（原称天成铁路）的桥梁施工中，为解决有的桥基在流沙上施工，白天挖空，晚上即被填满，挖不到底的技术难题，他提出采用钢板桩围堰、堰外压注水泥砂浆的办法，制服了流沙，立起了桥墩。在白水河架桥工程中，他建议把三孔钢桥梁提前架设，缩短了工期。在架设鸭子河桥时，曾出现部分混凝土预制梁因预制时捣固不实，拆模后呈蜂窝麻面。验收单位要求炸毁重浇，这样不仅造成浪费，而且影响工期，刘建熙同苏联专家反复研究，决定将露出的钢筋冲洗后，再用高强度水泥砂浆灌注抹平，先行架设通车，然后观察，发现问题再采取措施解决。经过30多年的运营考验，至今列车畅通无阻。

在修建川黔、贵昆、成昆铁路的西南铁路大会战中，已是年近花甲的刘建熙，仍以饱满的热情，深入施工第一线，哪里有通车的拦路虎，刘建熙就到哪里去解决。贵昆线上近10公里的大面积软土路基，号称“滥坝”，土填上就滑跑，车压上就下陷，其工程的困难，是西南铁路施工史上罕见的。刘建熙带领工作组在那里战斗了40多个昼夜，和技术人员、工人经过多次试验，采取了“深建桥，浅筑挡，两米换填石，平底打砂桩”的16字整治方法，终于治服了“滥坝”，确保了按时通车。刘建熙荣立三等功。成昆铁路金口河至韩都段约190多公里，工程艰巨，按原设计方案仅架桥就需650天，其施工架

桥方法，费时费力，还保证不了工期。经刘建熙察看研究后，决定在地质允许的条件下，尽量采用各式大小拱桥，在施工方法上运用钢梁预架、箱形钢筋混凝土梁预串，一般钢筋混凝土预灌等“三预”措施，大大缩短了施工架桥时间。

刘建熙十分重视技术管理和技术队伍的组织建设。他组织制定了《西南铁路技术工作条例》及《技术责任制》、《施工管理暂行规则》，并创办了《西南技术通讯》，以总结交流施工技术经验，推广新技术。20世纪60年代，他组织指导进行了西南六大铁路干线的技术资料总结和川黔线凉风垭隧道的经验总结。

刘建熙还勤于治学，所著《铁路定线概论》一书，以中国的铁路资料为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阐述，每个原理有实际例证，既可作教材，又可指导施工的实际。“文革”期间，刘建熙备受摧残，他不顾重病缠身，还翻译了《内功力学》和《岩石力学》等书，撰写了论文《机力剖面在铁路设计中的应用》。

刘建熙曾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四川省及成都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国铁道学会理事。1980年1月10日，刘建熙在成都病逝。

郑怀贤

郑怀贤，河北新安县人，生于1897年9月15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九日）。因家境贫寒，只读过4年私塾。11岁起开始拜师学艺。先后跟随李二庆、“铁臂”魏金山、“赛活猴”孙禄堂学习武术、骨伤医疗技术和制药方法。他刻苦钻研，终成名师高徒。

1928年，郑怀贤到上海开业行医，并相继在上海中华体育会、两江女子师范、上海交通大学任体育教师，教授武术。1936年，郑怀贤被选入中国武术代表队参加柏林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他表演的单练、对打十分精彩、特别是飞叉中的“怀中抱月”、“苏秦背剑”更使人叫绝，掌声雷动，谢幕达10多次。柏林市长在宴会上频频赞扬郑怀贤武艺精湛。一位丹麦博士在报刊上评价中国的武术是“艺术的精华”。

郑怀贤超群的技艺在奥运会上为中国争了光，为中国的民族体育赢得了声誉，却不为当局重视。为谋求职业，他四处奔波，后来到南京军事学校教武术。抗战爆发后，郑怀贤随军校迁往成都，除在该校任教外，先后兼任燕京大

学、成都体育专科学校、青年会武术教师。1948年，军校撤离成都，郑怀贤辞去军校职务，留成都继续行医和兼任成都体专、青年会武术教师。

建国后，郑怀贤继续任成都体专（后改为成都体育学院）武术教师。在任教中，他博采众家之长，吸取各派武术精华，潜心整理武术的散失套路，并大力推陈出新。成都体育学院著名“猴王”肖应鹏的猴拳、猴棍套路和多次获全国优秀奖的王树田的“八卦散手”，就是在郑怀贤的指导下改编的。他还编制和亲自教练了名扬海外的对练项目：空手夺枪、空手夺双枪、双擒拿、三节棍、进枪、双剑。1953年在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运动会期间，他作为西南代表队总教练，将自己擅长的形意、太极、八卦技艺传授给学生，培养了一批名冠全国的武术新秀。1957年，他发表《武术套路编制原则》，整理了一些散失套路。

郑怀贤还是著名的骨伤科专家。1950年在重庆举行的“五四”青年运动会上，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亲眼见他为一位卧地不起，疼痛难忍的运动员按摩后，伤员立即站起，跳跃几下，又若无其事地奔跑在运动场上。中午，贺龙对郑以上宾相待，称赞他医术高明，鼓励他为我国运动医学的发展多培养医务人才。

1958年，郑怀贤主持创建成都体育学院附属医院，并任院长。他创制的舒活酒、木瓜酒、活络药膏深受患者欢迎。他还为国家体委，各省、市、自治区的运动队培养了大批中医骨科医生。在教学中，他热情地传授正骨、按摩和伤科用药经验，从按摩手法到正骨手法，从常用药方到独创药方，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还将师传秘方奉献出来，供医疗工作者广泛采用。1960年，他主持创办了运动保健系。筹建了运动医学研究室，致力研究和传授骨伤科临床经验。

郑怀贤对中医骨伤科造诣很深，人称“神手”。在治疗中，对急性腰损伤病员，经他治疗，背进去可以自己走出来；对治疗肘关节脱臼，更有独特之处，用手指直接使脱臼的膺嘴复位，而不拉整个手臂，这样功能恢复快，又避免了后遗症；对上颌关节脱臼的整复，具有巧妙的复位手法，采用刺激物刺激患者鼻粘膜，使其引起爆破性反射，打一个喷嚏就可使其复位。他创制的“指针法”经穴按摩，既有局部之效，又有全身调节之功，再辅以其他疗法可治疗骨伤中的多种疾病。除沿用一部分传统经穴外，还在人体全身各部探索了55个新的指针点（经验穴位）。

郑怀贤在成都体院运动医学研究室和医务人员的帮助下，先后出版了《正骨学》、《伤科诊疗》、《伤科按摩》共130多万字的著作和几十篇医学论文。其中《正骨学》已译成外文，《伤科诊疗》（修订本）还发行到国外，并获

1978年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奖。

郑怀贤医德高尚，不分贫富、老幼、职务高低，都一视同仁、且不分上、下班，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对来信求医者也一一复信，同时随信寄去外敷中药和内服药方，以后还去信询问病情，及时处方、寄药，使许多患者迅速好转。他的医术医德多次受到有关方面的嘉奖和表扬。1964年他出席了全国文教战线群英大会。

郑怀贤除担任科研、教学和治疗工作外，还多次代表四川队参加全国武术表演或裁判工作。他于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常务委员、中国运动医学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四川省分会常务理事及外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国武术学会主席、中华体育科学会理事、四川省政协常委等职。为繁荣中国武术和促进运动医学的发展而努力工作。

1964年，郑怀贤为周恩来治手疾时，曾受到周恩来的鼓励。他常说："我的一切都是党培养的，我要像周总理说过的那样，甘当人民的牛，为人民拉犁耕田；像春蚕一样，为人民吐出最后一根丝。"他将自己近万元的稿酬和补发的工资，一部分赠给医院买书籍，其余的全部交纳党费。1981年10月31日，郑怀贤因患冠心病逝世。

刘绍禹

刘绍禹，新津县人，1900年5月23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生。1914年，刘绍禹在成都"成属联立中学"（今成都石室中学）读书时，考入当时被称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校"就读。1922年6月毕业，到美国留学，入俄亥俄州格锐乃尔学院教育学系。次年，转入芝加哥大学心理学系，1924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并继续在该校研究生院深造。在哈维·卡尔（Harvey Carr）教授的指导下，借助于芝加哥机能学派著名的动物心理实验室，从事比较心理的研究，通过大量的科学实验积累的数据和资料，于1927年写成论文《年龄与学习的关系》，获博士学位。并经卡尔推荐，由"全美自然科学家学会"接受为会员。

1927年11月，刘绍禹辞谢了卡尔的挽留回到了四川，任国立成都大学教授，积极传播现代心理学的知识和成就，倡导用客观的、科学的方法研究心理学。在他的推动下，将成都大学教哲系改为教育心理学系，先后开设了多种心理科学课程，如：普通心理学、教育

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变态心理学、比较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系统心理学以及心理测验与统计等，其中大多数课程都由他讲授。

1930年，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在成都大学设置教育心理讲座，刘绍禹受聘为该讲座教授。

1931年，成都大学与公立四川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刘绍禹继续在川大任教。在担任教育心理学系主任期间，他不遗余力，多方设法延聘在心理学和教育学方面有精湛研究的专家学者，如：高觉敷、常道直、沈有乾、薛鸿志、黄方刚、罗容梓、马师儒等来川大任教。同时，实行学生从三年级起分组（类似现在的专业）的制度，分为教育行政、教育心理、教材教法和中小学教学4个组。使学生学有所专，用有所长，造就了一批教育心理学方面的教学和科研人才。

1935年，刘绍禹任教育心理学讲座教授5年任期届满，按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规定，可休假1年，出国考察或进修，费用由董事会提供。于是，他再度赴美，考察了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的心理学教学情况、教学设备、科研活动等。同时，他还竭力为川大购置了一批心理学方面的图书期刊和实验仪器设备，为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加强科学实验，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1936年，刘绍禹回川，即在川大建立了心理学实验室，在他的不断努力下，使实验设备日臻完善，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也想方设法添置了不少仪器设备，使这所实验室成为设备较齐全、体系较完整的心理学实验室。

早在1929年，刘绍禹就在成大创办了《现代教育》期刊，到1935年，改为《教育半月刊》，使之成为教育学、心理学的学术交流园地，并先后为这些刊物撰写了多篇有独到见解的论著。

1947年，以川大师范学院部分进步师生为主，组织起“中国教师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办了私立桂溪中学（建国后并入川大附中），主张重视生产劳动，搞勤工俭学，多收贫困子弟，培养品德高尚、有理想的青年。刘绍禹十分赞赏，热情支持，主动出任董事，捐助经费，悉心指导办学。

建国后，刘绍禹出任四川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教务长，1952年改变体制后，继续任副校长兼教务长。他从教学工作、教学组织、教师队伍建设、教学设备等各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改造旧川大作出了贡献。1956年5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7年，国务院任命刘绍禹为四川师范学院院长。他以自己的言行，塑造了良师益友的典范。在他几十年的教学和科研活动中，一贯主张心理学研究必须从客观的、科学的实验着手，对任何理论的探索，都必须以实验结果为印

证。他常说："心理学的研究，不只要以实验为基础，而且要对实验结果提出合理的假设和理论，更重要的是发现心理活动规律"。20 世纪 50 年代初，国内心理学界在全盘苏化的影响下，他也认真学习了苏联心理学，但认为不应盲目否定西方在心理学研究中有价值的成果，并对苏联专家讲授心理学重哲学基础而忽视科学实验，持保留意见。认为学术上必须坚持百家争鸣，提倡客观的科学研究。

1963 年，四川省心理学会成立，刘绍禹被推选为理事长。同年，被推选为中国心理学会理事，后任副理事长。同时，他还担任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教育学会名誉会长。他还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四川省人大代表。

"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强加了若干"莫须有"的罪名而备受摧残屈辱，而他从不提及个人的不幸，惟一的系念是国家的前途。他对"四人帮"摧残教育、摧残教师深感痛心和愤慨。

1976 年后，刘绍禹重新被任命为四川师范学院副院长（1979 年后改任顾问）。他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衷心拥护，渴望在向科学和教育事业的进军中贡献自己的力量。1981 年 3 月 28 日，刘绍禹病逝于北京。

王俊贤

王俊贤，1904 年（清光绪三十年）生于四川仁寿县一个农民家庭。幼时即由成都一基教徒抚养。读小学时热心参加成都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谢道安（加拿大籍）在学校中组织的童子部和各种活动，经常去成都基督教青年会听演讲，颇得谢道安的赏识，并资助他进入教会办的华西协合中学读书。王在中学读书时积极参加青年会的教育工作。

1924 年，成都基督教青年会资助王俊贤 1 年的学费，入华西协合大学教育系预科学习。他还选读了"耶稣教训"课程，认为基督教可以救中国。第二年他得到浸礼会的资助，第三年提前升入正科。1925 年他被浸礼会派到雅安明德初中教书，并受到美籍传教士的重视。1925 年圣诞节，他受领洗礼正式加入基督教。

1927 年，王俊贤入华西协合大学教育系学习，1929 年毕业后即任该校学生宗教团"促进会"干事。他先后参加了"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牛津团契"、"唯爱社"等组织。1931 年暑期由浸礼会保送和资助随带家室入北平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深造。1934 年获神学学士学位，并返华西协合大学任"促进

社”干事兼讲师，讲授基督教伦理学。同年他参加了牯领艾德布道准备会议。1935年参加全国宗教教育会议。

1937年华西协合神学院正式成立，王俊贤任该院教授、教务长。1938年他代表全国基督协会出席印度马德拉斯的基督教世界宣教大会。1939年他在印度川文材省神学院参加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代表会。

1939年9月，由华西协合神学院资助王俊贤去美国纽约协合神学院研究院学习，获得神学硕士学位，还获神学院特设的“国际友谊奖金”。王在美国学习期间，加入“北美青年协会”，任中国留美基督徒学生会名誉主席。1941年3月在美国升任牧师。

1941年王俊贤回国，先后担任过华西协合神学院教务长、教授、代理院长、院长。任职期间，院中聘请教员、招收新生，一切大小事务他都亲自过问。包括教工的食米问题。1941～1946年间，王俊贤任“中美文化委员会”委员、“中国唯爱总社”委员、“成都规矩会”第二副主席，“中国基督教协进会华西临时委员会”委员、代主席。

1948年王俊贤由华西协合神学院和差会资助，再度去美国旧金山浸礼会贝克神学院攻读神学博士。1949年春，当他的论文完成大半时，国内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南京、上海相继解放，王俊贤于1949年6月经浸礼会差会推荐提前1年半在美国旧金山贝克神学院获得荣誉神学博士学位后回到成都，继任华西协合神学院教务长、教授和“希望月刊社”社长、四川基督教协进会主席等职。王在1941年～1951年期间同时担任基督教华西浸礼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从1950年起，他先后担任成都市基督教徒学委会主任委员、成都市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主席、第一届四川省人大代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常委、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第四届四川省政协委员、中国基督教协会常委、四川省基督教协会会长、四川省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副主席。

在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初期，王俊贤对中国基督教走独立自主的道路一时不理解，认为脱离了外国差会的资助，中国教会就没有办法。但随着三自爱国运动的深入，广大教徒和教牧传道人员积极响应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王的认识也有了提高，投入运动，出席政务院召开的“关于处理外资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1950年10月28日，由王俊贤组织的成都市基督教会座谈会一致拥护“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宣言，并通过了以成都市基督教徒名义发出的通电，拥护周恩来于1950年10月26日向联合国控诉美帝侵略罪行的电文。王积极投身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组织成都市广大基督教徒学习，提高认识，发动教徒写慰问信和做慰问袋。

1950年，王俊贤参与组织成都市

30余个教会团体和教会学校、医院的代表在暑袜街礼拜堂聚会，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和登记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决定。王在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中，团结了成都市广大基督教徒，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割断了同外国差会的关系，实现了自传、自养、自治。1956年王参加了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筹备活动，系发起人之一。

在1958年整风反右运动中，王俊贤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王俊贤被错划右派的问题得到了改正，他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支持改革开放，关心台湾回归祖国，致力于祖国的统一大业。1981年12月5日，王俊贤病逝于成都。

陈　戈

陈戈，谱名陈谦贻，后改名陈千一，艺名陈戈。1916年10月1日出身于自流井（今自贡市）三多寨的一户殷实人家。学生时代即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在读高洞初级小学时，老师肖奉阶（中共党员）对他影响很大。肖善讲能写，会英语，为学生所敬仰，课余着工人服秘密活动于采盐工区，后被当局杀害。14岁的陈戈深信肖老师是好人，多次到遇难地凭吊。

陈戈在读初中二年级时，因不满封建婚姻离家。1932年春考入成都美术专科学校习西洋画，后因家境变迁无学费，1934年投考供膳食的成都大同电影学校，不料半年后该校无经费停办而辍学。之后他返自流井组织光华剧团，旋应吴雪之邀到重庆参加西南话剧社，任演出股长，演出了《颤栗》、《苏州夜话》、《父归》、《讨鱼税》等戏，继入金星魔术团。此后，他到成都参加曙光剧社演出《回春之曲》，并经人介绍到商务印书馆作店员，工余饱览文学名著、表演导演艺术和戏剧理论书籍，为日后打下基础。

1936～1937年，陈戈相继参加成都剧人协社、国防剧社。“七七”事变后，他投入成都各界联合演出的《保卫芦沟桥》、《抗战》等戏。这期间，他因无路费失去了北上延安的机会。不久，吴雪、王肇湮等组织的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出队由武汉到渝，陈戈即赶去参加，并在《塞上风云》中担任主要演员，演出于渝蓉两地。旅外剧队经费每月由刘湘拨给600元，不久因刘病故，经费断绝，旅外剧队处于解体状态。这时，陈戈应邀参加了孙怒潮等组织的城镇街头

演出，还参加了星芒剧团的下乡演出。

1938年初，旅外剧队经改组后，下乡流动演出。这年3月，陈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决心像他在少年时代所见到的肖老师那样为党工作，在抗战中去“创造戏剧事业”。陈戈在刘湘系掩护的旅外剧队，在国民党中央势力与地方势力矛盾的环境中，迅速成长为骨干，任代理队长和队长，1938年5月至1939年秋，领导川西北和川东南的两期演出，历经37个县市，相继演出了《塞上风云》、《民族万岁》、《保卫芦沟桥》、《女战友》、《魔窟》、《飞将军》、《古城的怒吼》、《米》、《前夜》、《血溅九一八》、《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中华民族的子孙》和《抓壮丁》等剧。

《抓壮丁》是旅外剧队创作演出的一大收获，也是陈戈在艺术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他在剧中演王保长，把生活中观察到的乡镇上各类保长作为素材，经过提炼加工，变成剧中王保长的形体动作和神态，演得惟妙惟肖。在编剧中也显示出陈戈的才干。

1939年，由于国民党开始转入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治气候逆转。根据中共党组织的安排，旅外剧队以第二战区动员委员会政工第三大队的名义赴山西，12月8日出发，陈戈怀着激动的心情随队经宝鸡，北上洛川奔延安，1940年2月2日终抵日夜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他先入青年干部学校学习，继在青年救国总剧团任演出股长，1941年任延安青年剧院演出部主任。他在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演出了《塞上风云》、《渡黄河》、《铁甲列车》、《抓壮丁》、《雷雨》、《上海屋檐下》、《伪君子》等剧。他塑造的王保长、周朴园等人物受到周恩来的赞扬。他因在苏联名剧《铁甲列车》中扮演农民瓦西里，荣获延安青委授予的模范工作者奖；《渡黄河》中的酒店老板也演得有血有肉。他参加了《抓壮丁》剧本的加工修改，为丰富人物形象，增添戏剧纠葛、深化主题尽心尽力。他在20世纪40年代还创作了《大兵》、《上当》、《老师之家》等剧本，后皆出版。

在解放战争中，陈戈相继任延安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队务委员、东北联军政治部宣传队演出部主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队委及演出室主任、中南军区艺术学校戏剧主任等职。

1950年，陈戈调北京电影局任编剧，1957年调长春电影制片厂任导演，1964年夏到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广播文工团任艺术指导兼导演。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共和国的电影事业中，在编、导、演各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组织拍摄大型彩色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他在许多故事片中担任主要角色，如在《在前进的道路上》饰铁路局长、《遥远的山村》中饰省委书记，在著名的《南征北战》中扮演解放军师长，在国庆献礼片《党的女儿》中扮演将军，在《试航》中演工程师。他演正反面人物皆得

心应手，戏路宽，演正面人物生动自然，栩栩如生，演反面人物入木三分。他导演的故事片有《黎明的河边》、《抓壮丁》，戏曲舞台艺术片有《团圆之后》，他编写的电影剧本有《飞越天险》、《抓壮丁》等。

陈戈是中国20世纪60年代电视剧的耕耘者。1964年正当中国电视剧处于幼苗阶段，他就导演了《顶天岭上的风雪》和《焦裕禄》，在条件差的环境里尽心保证质量。直播《焦裕禄》时，为防止杂音，他赤足用双手抱住电缆，他一丝不苟的精神，带动了全剧组同仁。

在“文化大革命”中，陈戈作为《抓壮丁》的编、导、演，首遭冲击，他身处逆境，仍坚信有朝一日能重返舞台。陈戈瘫卧病床多年，不幸于1981年1月逝世。

席德进

席德进，南部县碑院乡人，1923年6月28日生于一殷实之家。他5岁学画，18岁考入四川技艺专科学校（即四川艺术专科学校）学西画，1943年转入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师从于名画家林风眠。抗战胜利后，席德进随学校迁返杭州。

1948年，席德进以优异成绩毕业，随即赴台湾，执教于嘉义中学，同时进行绘画创作。1951年，他的作品被选送巴西圣保罗国际双年展。次年，他辞去教职赴台北，专注于油画肖像画和现代西方抽象画，他爱用强烈的色彩来表现画面。1957年，席德进在台北举办了首次画展，作品《卖鹅者》被送到国外参加展出。后来，他出版了画集《席德进的世界》，在台湾画坛崭露头角。

1962年，席德进应美国国务院之邀，赴美访问考察。次年又转赴欧洲，考察西方艺术，在法国巴黎侨居3年。其间，曾与著名华人画家潘玉良、赵无极等人交流，切磋画艺。

1966年，席德进返回台北后，他的绘画技艺已趋成熟，当年，他出版了《席德进素描集》。1967年，他获得台湾“中国文艺协会”第八届文艺奖章。1968年，他出版了《席德进画集》（水彩、油画）。他还先后兼任台湾“国立师大”艺术系和淡江文理学院建筑系副教授。

席德进热心民间艺术研究和古建筑艺术。他编写过《台湾民间艺术》（1974年出版）、《台湾古建筑体验》（1978年出版）。欧美之行归来，他开

始在艺术上进行开拓性的探索。他着手尝试将水彩画与中国画的传统技法相结合，用以表现台湾亚热带风光特有的湿润气氛和宁静的诗意，力求使作品从中国的文化背景和深厚的民族感中孕育出来。他创作出了具有中国风格的现代特色的水彩画。席德进由于深受中国画革新派画家林风眠的影响，因此，力求在中国山水画上有所突破和创新。20世纪70年代初，他采用在裱好的宣纸上作画的方式创作，并注重线条与空间的关系，用点、线、块的对比来表现物体，讲究结构，重感觉，用色丰富，构图新颖，求神似也不忽视形体，富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乡土气息。这方面他的代表作是《瑞滨海岸》、《淡江夕阳》等。1974年，他又出版了一部《席德进画集》，1977年出版了《我画，我说——席德进水彩画集》。他还被选为台湾“中国美术协会”理事，并获得“中山文艺创作奖”，他的作品先后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法国、香港、韩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展出，被誉为“超群的艺术家”。席德进还著有《席德进的回声》、《席德进看欧美艺坛》等。他重视画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主张画家深入生活，面对现实，画现实中的山水，现实中的人物。他说：“我们的艺术不在外国人眼中，我有为所有中国人绘画的义务和责任”，他强调艺术要真实，认为“矫造浮夸的作品，只能让人看一眼，真实的东西则百看不厌”。

1980年，席德进不幸患胰腺癌，病中他仍然坚持外出写生创作。1981年6月，台北市的“阿波罗”、“龙门”等画廊同时举办“席德进画展”。7月，画展又在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展出，著名画家张大千前往参观，并托人将亲笔信和新台币20万元转送卧病的席德进，表示慰问。席德进怀土恋乡，在梦里“常回到孩提时光”，他病中常想念家乡的山水，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回到童年嬉戏的山间。1981年8月3日，席德进在台北去世。席德进献身艺术，终身不娶。留下的画集和著作有近20种。

吴鹿苹

吴鹿苹，乐山五通桥人，生于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其父吴子春经营盐业颇富裕。吴鹿苹7岁在家塾启蒙，1906年东渡日本就读，高中毕业考上东京帝国大学，专攻应用化学，通日、德、英、法外语。1919年毕业，获理学学士和工学博士学位。学习期中与日本女子松本野羽子结婚，毕业后相

偕回国。鉴于国弱民穷，他萌发了实业救国的思想。于1923年得父同意从盐业资金中拨出银币10万元，同其妻在重庆开设乐山肥皂厂，制造化妆用品，数年间具有规模。又创和济胶厂制造英胶，产品色泽透明，粘度强，无臭味，质量较高，抵制了英商卜内门洋行的侵销。1929年另设地下厂制造爆炸性黄磷，其时国内无产，全赖进口，因而获利甚厚，但风险很大。1935年蒋介石派“参谋团”入川后，在各部门布满了“别动队”，调查到吴鹿苹私造黄磷，遂将其逮捕，坐以“私造国防违禁品”罪，按《中华民国六法条例》应予枪毙。后经其弟兄亲友奔走营救，并有二十一军部秘书长杜少裳及郭开文从中斡旋，始得减判徒刑；再经贿赂上下，才因病假释。吴鹿苹遭此迫害敲诈后，愤离重庆，回乐山另起炉灶。1938年起先后创办兴蜀造纸厂、诚信火柴厂、和济胶厂及大和盐灶。其中纸厂因原料受掣，开业两年无进展，于1940年出顶给正中纸厂。其余火柴厂、胶厂和盐业则一直经营至建国后进入公私合营企业。

吴鹿苹在经营盐业中，对生产设备和技术有多项创新改进，为同行所折服。犍乐盐场的盐井，一般在白垩纪岩层见卤，地质疏松，井壁易垮塌，堵塞卤筒上下，必须用桐油拌石灰投入圈补，费时费事且不耐久。吴从物理推测大胆创新，在其经营的盐井用水泥灌浆筑补。同行认为用成吨水泥填满井腔，开灰时易成斜井，劝勿冒险轻试。其父素称经验丰富，亦谓无把握，力阻其议。他却认定有利无弊，坚持既定措施，经三昼夜下锉开灰，即告会通正眼。所费时日只相当油灰1/3，且极为牢固。这在办井有素的行家是不曾想，也不敢想的。经此见功，该井即跃列乐山盐场的丰产大井。为了节约能源，他设计利用锅炉废气烘制粉盐的设备，并拟进一步改成真空制盐，后因粉盐产品不合乐场固有的巴盐销岸，以致虽然试制成功，亦奉令停产。又所用汲卤蒸汽机因能源紧张和取水困难，他设计在山口装置风车，借风力牵动卷扬机，但限于器材无着未能实现。其他创新尚有：用机车直接捞取井内落物；以电力代替蒸汽；用抽水泵晒卤等，均取得增加产量，减轻劳力的效果，在盐场上普遍推广。

建国后，吴鹿苹奉调主持自贡盐场技术工作。当时中国所用硼砂、氯化钾都靠进口，花费外汇，还不易购入。1953年人民政府决定在自贡市张家坝建厂制造硼、钾、溴、碘，责成吴鹿苹筹建，于1955年建成投产，填补了中国化工空白。1954年，盐务局派吴去青岛调查盐业，适有解放军接管之日本侵占时未建成的真空设备，请吴设计改造，经半年时间改成一座年产3万吨的真空制盐，受到部队表彰。又日本投降时在辽宁省貔子窝遗下一家化工厂，用苦卤制

造氯化钾、氯化镁，因缺乏技术力量不能生产。1956年盐务局派吴去支援解决技术问题。由于设备破旧，吴主张重新设计，曾引起厂内争议，后经盐局支持，作了彻底改造，投产后运转正常，得到化工厂赞扬。

1957年吴鹿苹赴苏联考察盐业，他调查到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茨克，有5套年产4万吨的真空制盐装置，是二战后德国的赔偿物资。盐卤则是将白水灌入地层溶化盐岩，压喷出井的“水举”技术，由于机器埋藏地下无法窥测。回国后，吴潜心默揣，参考美国盐矿资料，结合具体情况，设计出自贡的“水举”装置，用于岩卤生产，荣获国家科技成果奖。

1960年自贡开始实验真空制盐，在郭家坳新建中间试验厂，由吴鹿苹负责设计安装，1967年投产，效果良好，获1978年四川省科技成果奖。

真空设备初投产时易结锅巴，盐色焦黄，腐蚀设备，产量不稳定。吴鹿苹观察到必须从除垢防腐着手，针对实际研究出“石膏晶种”工艺，解决了关键问题，使真空制盐顺利发展。

吴鹿苹因在科技上的诸多成就，晋升为高级工程师，历任自贡市化工局副局长、副总工程师，四川省盐务局设计研究所所长，自贡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四川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他在自贡30余年的工作中，还主持开办了化工学校、日语训练班，培养了不少技术人才。“文化大革命”中，他虽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受批挨斗，仍埋头撰写学术论文，翻译外文书籍，校勘外国学术资料，部分在《井矿盐技术》和《井盐史研究》刊物上发表。1982年9月9日，吴鹿苹因患头皮癌逝世。

陆　秀

陆秀，字佛侬，女，江苏无锡人，生于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其父曾任无锡商会会长。1915年陆秀就读于上海爱国女校，1917年考入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她读到意大利著名幼儿教育专家蒙台梭利的著作后，立志将来要当一名幼儿教育工作者。1920年毕业后，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保姆科。学习期间，进一步认识到儿童教育是一门深有至理的学问，写了一篇《我的理想蒙养园》（当时幼儿园称蒙养园），在校刊上发表。1923年毕业后留校，在附属蒙养园工作。后因人事关系先后在该校图书馆和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1926年入武昌文华大学攻读图书馆专业，于1928年毕业。1929年～1933年在浙江大学工学院等学校图书馆工作，虽取得一定成绩，但她内心始终不忘幼儿教育。

1933年陆秀申请官费留学并得到义父蔡兼三的资助，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攻读幼儿教育专业，1935年以优异成绩获教育硕士学位。同年又入英国剑桥大学研究院攻读幼儿教育研究生，同样以优异成绩取得研究员资格。

1937年，陆秀怀着献身幼儿教育的雄心壮志回到祖国，在成都四川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幼稚科任教。1938年去陕西城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家政系任教授。任职期间，为该院家政系学生开辟学习场地，创办了陕南第一个托儿所——乐城托儿所。

1940年陆秀返回成都。当时，四川的幼儿教育比较落后，全省仅有幼稚园162所，287班，受教育儿童10470人，仅占4～6岁儿童的0.66%。同时，一般幼稚园多以读书识字为主，与小学无异；一些幼稚园设施趋向贵族化，只收少数有钱人家的子女。陆秀急切地想改变这种状况，她四处奔走、呼吁，在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的主持下，1941年2月创建了四川省立成都实验幼稚园（建国后改为成都市第四幼儿园）。时值抗日战争期间，教育经费拮据，她到处募捐筹集经费，在成都西郊茶店子选定了园址，因陋就简，修建了2025平方米平房作校舍，陆秀亲自担任园主任。她带领全园教职员工，根据中国国情，对科学地教养儿童进行了探索和研究。她强调教养并重，提出“保教合一”的原则；对儿童既重视身心健康和智力的发展，同时亦重视儿童思想、品德、习惯的培养。她不仅在园内设立了幼稚班（3～6岁）、保育班（2～3岁），1944年还自费创办了婴儿部，收托初生至2岁的婴儿30多名。在四川创办婴儿班是陆秀的创举。陆秀还认为幼稚园一方面是“为儿童谋幸福，增进儿童身心健康及培养人生基本优良习惯”，另一方面是为“解放大多数父母，使能减轻育儿的牵累，而安心参加社会工作”。因此，成都实验幼稚园不仅有白托班，还办有全托班，全托的婴幼儿，大部分是公教人员的子女。为解决一些家长的困难，她还办了寒暑假托儿所。在四川创办全托班和寒暑假托儿所是陆秀的又一创举。

成都实验幼稚园负有研究实验幼稚教育、辅导全省幼稚教育的任务，为此，陆秀在园里设了教研室，成立了幼稚教育研究会。她还主编了《实验幼稚教育》期刊和《幼稚教育丛书》。1943年编译了麦特森和浮士德的《美国保育学校实施》。1945年又主编了《实验幼稚教育——五年来的实幼》一书，总结了成都实验幼稚园的经验。1941年开

始，成都实验幼稚园成为省幼师的实习场地。以上种种，对当时四川省的幼稚教育起到了指导和推动作用。

从1940年起，陆秀还担任了四川省立幼稚师范学校校长，直到1949年，培养了大批幼教师资，成为四川幼教事业的骨干力量。

建国后，陆秀历任川西民主妇联福利部部长，西南民主妇联福利部副部长，四川省立第一幼儿园园长，成都市民政局副局长、局长，成都市妇联副主任，第二、三、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1950年，陆秀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在成都筹建了军区保育院、育才保育院等。1958年，陆秀已年过花甲，还自费创办了“婴儿之家”，先后收托婴儿100多名，其中有一胎三生儿、一胎双生儿、早产儿、体弱儿等，后来都长得健康、活泼。1964年3月1日，邓颖超视察了“婴儿之家”，并捐款为孩子们买玩具。陆秀总结了“婴儿之家”的经验，写成文稿，希望能供保育工作者参考。“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婴儿之家”被迫停办。1982年12月，陆秀病逝于成都。

郑　寿

郑寿，又名郑景芳，1896年生（清光绪二十二年），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出身一华侨工人家庭。早年随父东渡日本，中学毕业后因家贫不能继续升学，遂回国。1915年毕业于天津军医学校药科，在陆军军医学校任助教、教授、药科主任多年。1935年后，主要从事药物合成及化学分析研究工作。曾任四川合川陆军卫生材料厂厂长、重庆北碚中国西部科学院特约研究员。1950年初，应西南军区卫生部之邀，参加了重庆西南制药厂的筹建工作，任该厂特约研究员兼研究室主任、总工程师。1964年后，任中国医药工业公司重庆分公司总工程师、重庆医药工业研究所所长。

郑寿从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的16年中，主持和参与了近40个主要科研项目，完成了痢特灵、活性炭、康得灵、长效青霉素、维生素V等近30多种药物的研制。在抗寄生虫药物的研制方面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先后研制出驱钩虫、驱蛔虫、驱肺吸虫、驱血吸虫、驱肝吸虫以及抗疟疾、治疗痢疾等药物，其中有20余种药物属国内首创，为治疗地方病和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他还为组建科研队伍、培养医学人才倾注了心血，

并将自己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1万元人民币捐献给国家，作为发展医药科研之用。在他的主持下，重庆医药工业研究所成为拥有近百科技人员的医药科研中心，使重庆发展成为全国医药工业的基地之一。他先后发表了《胶状活性炭的制法及吸附性能的研究》、《痢特灵的合成研究》、《新的有效蛔虫驱除药的探索》等学术论文。

郑寿曾六次被评为四川省和卫生部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是四川省特等劳模，重庆市百面红旗之一。1959年出席全国群英会并应邀参加国庆十周年观礼。他是第二、三届四川省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并曾任中国药物学会理事、重庆市药物学会理事长。1982年在重庆病逝。

罗家蕙

罗家蕙，女，富顺县人。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出身于职员家庭。早年就读于成都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20年升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1924年毕业，先后在成都、重庆、天津、西安任教。1938年返回成都，1940年任成都女子职业学校校长，1946年8月任成都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建国后，历任成都第一师范学校、成都第一幼稚师范学校、成都师范学校校长。1980年始任名誉校长至1982年3月。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成都市分部委员。1952年出任四川省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委员，1956年任成都市教育工会副主席。1957年加入民主促进会，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任第一、二、三届民进成都市委副主任委员，1982年，任民进四川省委委员。她还曾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四川省人大代表、四川省政协委员、成都市教育学会名誉会长。

罗家蕙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历尽艰辛，与师生同甘共苦，着力办好学校，发展教育，培养学生。抗日战争时期，她热情鼓励、支持学生开展宣传工作，发动学生起来“反对内战，一致抗日”，拯救民族危亡。她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强烈不满，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积极支持。1946年，她亲率师生购买大批干粮去慰问参加“反饥饿、争温饱”请愿斗争的小学教师，支持他们的斗争。同时，四处奔走帮助因参加请愿而遭到解聘的教师找工作，求职业。1948年冬，罗家蕙不顾个人安危，保释出被反动派关押的进步教师，并冒着极大的风险悄悄放走反动派要逮捕的进

步学生。

建国后，罗家蕙以饱满的热忱投身到人民的教育事业中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罗家蕙焕发了革命青春。在一次毕业典礼大会上，罗家蕙送给毕业学生五颗心："第一就是决心——决心朝着党所指引的方向不断前进；第二就是雄心——要有搞好人民教育事业的壮志雄心；第三就是热心——要热心关怀你所教育的学生；第四就是耐心——少年儿童的可塑性很大，要有耐心地循循善诱，启发引导；第五就是要虚心——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五颗心充分体现了罗家蕙对党的教育事业的赤胆忠心。她曾经这样说过："教育工作者永远年轻"，"使如我再有一个人生，我还是要搞教育。"

"文化大革命"中罗家蕙遭迫害，但她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毫不动摇。粉碎"四人帮"后，罗家蕙年过八旬，虽然身体健康不佳，她仍然拄着拐杖到小学听课，给邻近的中小学生补习英语，时时刻刻关心学校，指导工作。60年来罗家蕙始终以"学校就是我的家，学生就是我的乖娃娃"的敬业精神，为祖国培养了大批人才。勤俭办校是她的一贯作风，在她的影响下，学校全体师生员工爱护学校的一草一木，蔚然成风。

罗家蕙对教职工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在国家遭到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时期，社会经济极度困难，她不考虑自己年老体弱，把组织上分配给她的营养品，分送给教职工同志。她自己十分简朴，却又乐于助人。成都一师传达室有个老工人，死后留下一个孤女，罗家蕙按月资助小女孩生活费，直到她走上工作岗位。罗家蕙的工资收入除了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外，都用来支援有困难的师生与亲友，直到她1982年与世长辞，仍是身居陋室，家无长物。

郑用之

郑用之，学名绍嵩，曾用名峻生、戎子等。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9月出身于富顺县黄镇铺一农家。他早年在上海浦东中学就读，后进北京朝阳大学攻读文学。

1924年12月，郑用之进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学习，1926年1月毕业即随军北伐。到南昌后，在国民党清党时，被关押审查。后脱离军队到上海从事新闻工作。

20世纪20年代末，郑用之回到家乡，变卖了在自贡的一处产业，作为从事

新闻工作的基金。1931年，他作为重庆《新蜀报》和《新民报》的驻沪特派记者，由重庆到上海进行新闻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在上海创办了《新大陆报》。郑用之利用报纸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由于揭露了蒋介石的投降主义的活动，批评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报纸发行后在上海引起轰动，但随即便被当局查封。此后，郑用之又在上海创办中国新闻社，继续给《新蜀报》、《新民报》写稿。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抵抗，第五路军也进行了淞沪抗战。郑用之积极奔赴抗战前线，采访战地新闻，拍摄战地照片。与罗静予等利用这些照片编辑出版了有中英文对照说明的《淞沪抗战大画册》。

“一·二八”事变后，郑用之开始投身于电影业，与尹伯休合写了《如何抓着电影这武器》的小册子。此后，他应邀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组建电影股，电影股于1933年9月1日在南昌成立，郑用之为股长。

1935年，电影股逐步扩大，迁往武昌。购进了美国迪弗来35毫米有声电影摄影和录音设备，在武汉行营开始拍摄有声电影。此为中国有声电影之开端，此时电影股扩大为“汉口摄影场。”

抗日战争爆发后，汉口摄影场改名为中国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中制”），郑用之任厂长。中制以前由军事委员会政训处管辖。国共合作后，政训处改为政治部，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中制改由政治部三厅领导，郭沫若任厅长，郑用之任三厅第六处电影科科长。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阳翰笙等大批进步的电影工作者参加，中制拍出了一些较好的抗战影片。如《抗战特辑》一、二集，《电影新闻》41号、42号，以及标语卡通一、二集等。这些新闻片宣传了抗日运动，记录了日本侵略军的暴行和中国抗战的实况，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1938年1月，中制拍摄完成了配合抗日战争，发挥战斗作用的故事片《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八百壮士》和《最后一滴血》。

1938年1月29日，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宣告成立，郑用之是首届协会理事。为了达到宣传抗日救亡的目的，中制决定建立放映网，开办电影放映人员训练班。招收了60多名热心抗战的爱国青年参加训练。由郭沫若、郑用之分别兼正副班主任。1940年建立10个流动放映队，并成立电影放映总队，由郭沫若、郑用之分别兼任正副总队长。

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后，中制又组建了“中国万岁剧团”，郭沫若任团长，郑用之任副团长。剧团在重庆上演过《中国万岁》、《为自由和平而战》、《国贼汪精卫》等。为便于演剧和放电影，郑用之领导的中制还在重庆纯阳洞附近将该厂的第二摄影棚改建成剧场，取名“抗建堂”，大力宣传抗日运动，为大后方戏剧运动增加了新的演出阵地。

1939年，中制在重庆建厂期间，拍摄了故事片《保家乡》、《东亚之光》、《火的洗礼》等7部影片。并与美国合拍纪录片《中国之抗战》，在国际上影响很大。为防日本飞机轰炸破坏，郑用之派罗静予、吴蔚之等到香港，建立中制香港分厂——大地影业公司。拍摄了《孤岛天堂》与《白云故乡》两部故事片。

郑用之在中制注重人才培养。培养的人才不但在三四十年代的电影事业中发挥了作用，有的还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作出了贡献。

1943年，当局认为郑用之在中制容纳共产党员，撤销了他的厂长职务，他遂赴美国考察电影。

1949年，郑用之回到重庆，1951年春去香港，转纽约定居。1971年赴台湾，完成抗战纪录片《中国之怒吼》。1982年12月28日因车祸逝世于台北。著有《电影新法》。

李德才

李德才，艺名德娃子，成都人，1903年11月17日（清光绪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生。6岁开始随父李炳福学唱四川洋琴（解放后改称扬琴），先学男角。14岁换嗓时声音嘶哑，生活困难，去郫县教玩友清唱，在给玩友们打琴、配戏时，玩友中没有唱旦角仄音的，只好由他来代替。试唱小嗓，最初他感到很吃力，得到一个叫“廖吹吹”的玩友帮助，教他一些喊嗓发音的方法。他天不见亮就到河边去喊嗓，终于喊出一个旦角嗓子来。于是他辞别郫县，回到成都。

当时，扬琴名旦中有嗓音清润圆滑的邢国洪，老腔老调自成一格的曹霖，花腔开派人叶南章，他们都各自拥有听众。年轻的李德才学到他们的长处，并在不断的实践中摸索出适合于他自己嗓子条件的唱法与扬琴的打法，加之他的嗓音宽大响亮、年轻气盛，在20世纪20年代的成都一唱出名，红白喜事人家出堂会，多指名要点“德娃子”的戏。

20世纪20年代末期，李德才在成都鼓楼街芙蓉亭茶楼设馆卖唱，并得到著名数学教师王伯宜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墨士的帮助，为他解说唱词。王伯宜将他唱的《弃子拾子》逐字逐句用红笔勾出，向他解释清楚。此唱本全用《诗经》句子堆砌写成，近似于文字游戏，佶屈聱牙，唱起来很不“欢口”，但它的韵脚是一韵到底，又很“上口”，李

德才专心求教，终于将它“吃”下来，倒背如流，后来成为他的拿手好戏之一。

20世纪30年代初，在王伯宜为首的一批琴迷鼓动下，李德才突击出《木兰出塞》、《抽丁接帖》、《木兰荣归》三折“硬头戏”，同时，他在成都玉带桥陆羽茶楼开馆，座无虚席。“德派”艺术已成为格局，把成都扬琴艺术推向一个高潮。听众公认的代表曲目有《活捉三郎》、《碧莲教子》、《秋江船会》、《祭江》等。

李德才打扬琴的功夫是一流的，自打自唱，运用自如，而且具有深厚的韵味。他又解“翻五方”，把扬琴五个人坐唱的乐器弄奏得娴熟，成为“全手匠人”。他打奏的［将军令］、［月调］、《秋江》中的［背工］调等，或如千军万马，或如波潮起伏，自打自唱，随心所欲不逾矩。20世纪50年代初赴朝慰问团西南分团在东北地区慰问演出，他的四川扬琴使多少川籍伤病员感动得流下眼泪。成都“五老七贤”之一的刘豫波写诗送他：

乐意熙熙春满台，愁云都为管弦开。

胸中块垒消完后，不尽诗意笔底来。

1950年，李德才被选为川西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3年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曲艺队。1958年被选为中国曲艺家协会常务理事，参加第一届全国曲艺会演，获得荣誉奖。1979年，出席全国第四届文代会，当选为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同年7月，四川省文联、省曲协、省剧协举办“李德才同志舞台生活70周年”纪念演出，他登台演出，嗓音仍然细嫩圆润，极富韵味。1980年在四川省文联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国曲协四川分会名誉主席。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2年2月17日晨，李德才因冠心病逝世。四川省文化局在《悼词》中说：“李德才在艺术上造诣很深，形成一套完整的‘德派’扬琴唱腔艺术，是我国著名的扬琴大师。”

李有行

李有行，1905年（清光绪三十年十二月）1月生于梓潼县。1916年入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毕业后，随即考入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国画科，1926年毕业后去法国，就读于里昂美术专门学校，成绩优异，获毕业设计奖。旋即受聘巴黎维勒丝绸公司任图案设计师。由于他对色彩有过人的敏感和独特的表现

手法，被法国印染中心和艺术界同行誉为“东方色彩大师”。1931年李有行返回祖国。当海轮抵达上海时，他心潮澎湃，思绪万千，站在船头用绚丽的色彩、完美的构图，画了一幅题为《归来》的写生，以表赤子报效祖国之情。

李有行到上海不久，受聘为美亚绸厂美术设计师，他所设计的丝绸图案，既吸收了西方图案的构成原理，又博采民族图案的特色。开创了中国现代丝绸图案的新局面，在国内和东南亚赢得很高声誉。

1936年，李有行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和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李有行随校南迁四川。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无力恢复正常办学。但他对艺术教育的执着追求和艰苦创业的雄心并未动摇和减退。他四处奔走，约请当时在蓉的工艺美术家雷圭元、庞薰琴创办“中华工艺社”，自任总干事。由于大家齐心合力，工艺社在社会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原有的设备和条件显然不适应。1939年，李有行在省教育厅长郭有守的支持下，在成都新南门外择地筹办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并出任校长。

四川省立艺专是一所多科性的艺术学校，设有建筑、音乐、应用艺术等学科。先后聘请进步艺术教育家雷圭元、王颂咸（中共秘密党员）任教务主任。画家关良、吴作人，歌唱家郎毓秀，钢琴家蒋樵生，漆艺专家沈福文，翻译家罗玉君等人都曾在该校任教。他还聘请一批客座教授来校讲学。黄炎培、阳翰笙、徐悲鸿、俞平伯、司徒乔、孙伏园等也来校作学术、时事报告。李有行推崇蔡元培的办学方针，主张兼容并蓄，整个学校民主空气活跃，学术思想开明。

1947年春，李有行为支持学生反饥饿、反迫害的正义行动和掩护中共秘密党员进步学生，被省教育厅撤职。此事激起全校师生愤慨，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学校师生罢课、罢教，并签名上书要求撤销这一决定。其后，李有行仍在该校任教授，并应约任法国成都领事馆秘书。

建国后，李有行任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兼教务主任。195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重庆市委文教科技委员会委员。后被选为政协重庆市委员会委员、四川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理事等。

早在三四十年代，李有行即致力于水粉画的探索，其水粉风景、花卉独具一格，曾在成都、重庆、北平多次举办作品展览。建国后，他继续在水粉画创作上取得新成就，无论风景、花卉、静物，既强调色彩的对比，又强调色彩的统一。1963年，他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李有行水粉画展”。四川美术出版社、上海美术出版社分别出版有《李有行水粉画选》、《李有行画选》。巨幅

水粉画《重庆夜景》和《花卉》均为中国美术馆收藏。

李有行在教学方面，把染织专业的水粉画教学，大体分为黑影、黑白灰、复色、限色四个阶段。这既有它的科学性，又符合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认识规律，这种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已为全国工艺美术教育界所肯定和推广。

正当李有行精力充沛，画艺更精的时刻，“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使他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粉碎“四人帮”后，李有行还带病外出写生，足迹遍及川、陕、黔、甘、滇诸省。1982 年 4 月 3 日，李有行病逝。

徐近之

徐近之，原名念庄，字希朗。1908 年 1 月 18 日（清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生于江津县朱沱乡（今属永川县）。1927 年考入南京东南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地理学系。1931 年，中瑞（典）合作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对中国西北的地质、气象进行考察，团长由名噪一时的探险家、瑞典人斯文赫定担任。正在中央大学读书的徐近之被选派参加考察团，配合德国人赫德，进行内蒙气象观测。他们一行到达包头后，即开始了艰苦的历程，沿途骑行骆驼，露宿蒙古包，穿越茫茫戈壁和沙漠。每天早、中、晚观测天气变化，直到居延海边，行程 1500 公里。严冬来临后，徐近之在弱水河下游驻留 1 个多月，建立定位测候站，实测西伯利亚寒潮的盛衰演变，为中央气象研究所提供每次寒潮的资料，同时还为当时开辟欧亚航线提供基本气候数据。历时 14 个月的考察，使徐近之经受了一次很好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锻炼。他有 5 篇通讯分期发表在《地理杂志》和《方志》月刊上。

1932 年，徐近之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不久，中央研究院派他为国家资源委员会青康调查员，去西北调查，并入藏筹建拉萨气象长期观测站。

1933 年秋，徐近之出发去青藏高原。首先考察了中国第一大湖——青海湖的成因、湖岸地貌和变化、入湖河流及生物水产等。他当年写的《青海纪游》，是中国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最早记述。

正当徐近之准备深入青藏高原腹地进行探索时，忽闻川西北岷江河谷 8 月 25 日（农历）发生大地震，城镇陷落，江水断流而形成叠溪海子，惊动全国。他立即由青海经黄河上游峡谷地段南下，直趋松潘草原。途经岷江与黄河分

水高原一角时，他专门考察了黄河湾最东端的地形，在题为《西宁松潘间草地旅行》的论文中，提出黄河在某一时期曾流入岷江的见解，引起了地理学界的关注。到松潘后，徐近之又查访了岷江源头。此时余震未停，时有山崩岩断、巨石阻流。他知难而进，徒步跋涉，顺岷江峡谷而下，攀越叠溪，详细考察大地震后地质地形的变化，写成《岷江峡谷》，最先报道了岷江地震后峡谷考察纪实情况。

1934年5月22日，徐近之由四川绕道甘肃、青海入藏，沿途逐水草露宿，历尽艰辛，于9月20日抵拉萨，成为中国现代地理学者入藏第一人。他在拉萨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高原气象台站，为全国天气预报填图提供了重要资料。又逐月整理温度、湿度、气压的记载，编成月报、年表，寄当时南京中央气象研究所，供研究印度洋西南季风对西藏高原的影响之用。他将测得的各项数据，结合日常对云彩、风向、物候、旱涝和农事观测，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写成《1935年拉萨之雨季》一文，这是中国在西藏高原第一次取得海拔3760米的高山气象资料。此文一经发表，即受到国内外高原气候研究者的高度评价。

留藏期间，徐近之曾越喜马拉雅山，南下印度加尔各答，写成《西藏、西康交通路线在国防上的重要性》的论文。他还对世界上最高的大咸水湖——纳木湖，第一次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研究，为后来的科学工作者进一步研究该湖以及整个青藏高原湖泊的退缩过程和演化规律，打下了基础。他撰写发表的《西藏之大天湖》、《天湖小游23天日记》等文，是中国学者研究纳木湖的最早科学文献。

1938年秋，徐近之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地形学。两年后，获博士学位，转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深造。留美期间曾横贯美国南北，考察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和西南干燥高原峡谷，了解美国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实验情况，被选为美国气象学会和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会员。1946年回国，重返中央大学任教，培养出一批当代地理学家。

建国后，徐近之调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室主任。他组织了第一批综合科学考察队，去黄泛区考察，遍历黄、淮干支流淤积区，写成《淮北平原和淮河中游之地文》的论文。他还先后参加了新疆天山和阿尔泰山地形考察以及南水北调勘查、贵州乌江河道调查、江西南部红土丘陵和大庾岭一带沙砾岩地的水地流失研究。

徐近之在地理文献学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丰硕的成果。他所编写的《青藏高原自然地理资料》和《青藏高原及毗连地区西文文献目录》，是考察研究青藏高原的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他前后以20年时间，完成了《英、德、法、

汉地质学暨地表形态学词汇》的巨著，于1979年分3册出版。他还是中国较早关心南极洲的学者之一，1959年出版了《南极洲地理概要》一书。

徐近之在建国后最重要的贡献，是开创历史气候学的研究。从1955年起他在竺可桢研究历史气候的基础上，独自穷年累月，从中国浩瀚的地方志中，编辑分省历史气候资料共20多卷，约300万字。内容包括水涝、干旱、大风、大雪和严寒出现的频数概况，有的还兼及霜、雹、尘霾天气等记载。又以严重大旱、久雨成灾和特大洪水为重点，按地点与时序整理编辑，注明出处，以利作时空两方面的比较。这对探索中国气候变迁规律，为农业、水利等部门研讨防御灾害途径，具有重要科学价值。

1975年，淮河上游出现空前洪灾。徐近之根据所查知的康熙元年（1662年）夏秋间渭河流域特大洪水，引起黄、淮下游泛滥成灾的资料，通知黄河水利委员会，引起了该会规划部门的特别重视。这一重要发现为水利部门规划治理黄、淮，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为寻求古代气候有关遗证和传说，徐近之于1975～1977年，跑遍了黄河上、中、下游。这时他已近古稀之年，却不顾野外长途跋涉的劳累。中途在甘肃平凉心脏病突发，抢救后，又仍然坚持到宁夏青铜峡察看水迹。

1981年夏秋之交，黄河上、中游发生洪水，为探索黄河洪涝规律，他制成1731～1901年黄河上游丰枯水位变化图表。他还与助手陈家其合作写成《宁夏峡口（青铜峡）水志的科学价值》一文，警告近年高原天气形势在变，黄河秋涝仍然可能再现。文章脱稿于10月16日，3个月后，徐近之因心肌梗塞抢救无效，于1982年1月15日与世长辞。

甘祠森

甘祠森，原名永柏、字祠森。1914年8月17日生于万县新城堡一官宦之家，2岁丧父，5岁入私塾。后入万县第一高小时，与何其芳、方敬等为同窗，喜爱文学。1926年，英帝国主义在万县制造“九五”惨案，少年甘祠森愤然写下悼念惨案的叙事长诗《南津街之鬼》。是年，他考入四川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因受该校进步师生的影响，他常为校刊《誓矢》和《万州日报》撰稿，被称为万县的“新进诗人”。

1929年夏，甘祠森赴上海求学，于次年春越级考入复旦大学国文系，同年秋，考入中国公学大学部预科二年

级，后升入该校大学部英语系。1932年8月，他又考入国立中央大学上海商学院银行系。他不到18岁就在《小说月报》、《北斗》、《拓荒者》、《萌芽》上发表了诗歌《扬子江》、小说《劫场上的洗礼》、评论《关于梁秋实自称无产阶级的一点更正》，还与郭沫若、郁达夫、柔石、冯乃超等合作发表《我们希望于大众文艺的意见》，他还出版了小说《夜哨班》，他用的笔名有刈刺、甘辛、割爱、雨纹等等。他在上海商学院期间曾在《申报月刊》、《申报经济专刊》、《银行周报》等刊物上发表经济论文；文学方面他写了很多接近生活的抒情诗，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涵泳集》是他那几年中散文作品的集锦。毕业后，他曾留校任教。

1936年夏，甘祠森应民生公司之聘到重庆，担任该公司经济研究室研究员，航业部会计副主任和供应部副主任。1939年以后，他先后在重庆敬业商业学校，求精商学院、华侨工商学院、西南学院、正阳学院、重庆大学等校任教，1945年起在重大任教授直至1949年。他先后写出了《国际贸易的理论与实践》、《经济思想史》、《现代金融论》、《四川省输出贸易统计》等经济著作。同时，还写出了一部以战时经济动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暗流》，茅盾对这本书给予了高度评价。甘祠森还结合当时形势在《新华日报》、《唯民》等10家刊物的《联合增刊》上发表了《论经济民主的现实意义》、《论胜利声中的经济恐慌》等一系列论文。

抗日战争期间，甘祠森还积极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并参加了谭平山、陈铭枢等人发起的“民主同志座谈会”及《中国学生导报》的发行和创办工作。他还是“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联）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民盟”、“民建”的成员。1945年夏，他曾组织过“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

抗战胜利后，“民联”中央撤离重庆，甘祠森担负起了重庆“民联”的组织领导工作。“民联”积极参与了重庆的反内战、争民主的进步运动，如重庆各界举行的追悼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的大会，吊唁李公朴、闻一多的追悼大会，营救被捕爱国民主人士的活动。

1949年10月，由于白色恐怖加剧，甘祠森住宅遭到搜查，他被迫离开重庆去了香港，11月7日又从香港到了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甘祠森先后担任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厅长，国家监察部司长、部长助理，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第三、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第四届民革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第五届民革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等职。1962年，他在民革四川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民主党派已经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1981年，甘祠森到华东三省作实地调

查后，向民革中央写出的报告反映了他对民革组织的关心和对有关问题卓识远见。

甘祠森是建国后作家协会最早的成员之一。他在《诗刊》的创刊号上写出了《中国的大地普照着阳光》、《欢呼早起的太阳》、《山鹰》。1957年他的诗集《第一颗星》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他几次出国访问并写了不少的散文，晚年的创作多以知识分子为题材，例如小说《南飞的燕子》、《怅惘》。

1982年12月8日，甘祠森因心脏病发作，经抢救无效逝世于北京。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

石 鲁

石鲁，原名冯亚珩，后因崇拜清代画家石涛和文学家鲁迅，遂改名石鲁。1919年12月，石鲁出身于仁寿县文宫乡松林湾一书香门第。他自幼受家庭环境的熏陶，好学而喜书画。1934年，石鲁进入其兄冯建吾在成都创办的东方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他涉猎中西绘画艺术，着意临摹石涛，八大山人，吴昌硕诸家名作，打下了坚实的国画根底。从美专毕业后，他回乡任小学教员。1938年，他借读于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当时，他向往革命圣地延安。

1939年，石鲁放弃学业，赴陕北参加革命。他曾到山西第二战区民族革命大学“前锋剧社”，任宣传股长，进行战地戏剧宣传工作。1940年，石鲁在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后，担任了西北文工团美术组组长，主持舞台美术设计。1944年他又调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石鲁以画笔作武器，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因陋就简制作了一系列的新洋片(类似成都的西洋景)，被称为“土电影”，深受群众欢迎。他还走村串户，上门为群众演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动员作用。

石鲁还到群众日报社主编过《群众画报》，担任过延安大学文艺系美术班班主任。其间他主要进行版画创作，兼画年画、漫画、新洋片等，先后创作了《群英会》、《妯娌俩》、《民主评议会》、《说理》、《打倒封建》。

建国后，石鲁来到西安，担任西北画报社社长、西北美术工作者协会副主任。他开始全力以赴研究国画艺术，主张“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20世纪50年代初，他多次深入宝成铁路、兰新铁路工地以及青海少数民族地区体验生活，写生创作。他创作出了《变工队》、《移山》、《幸福婚姻》等生

活气息浓厚、形象亲切动人的作品。1954年，他担任了中国美协西安分会副主席、陕西省政协委员，同年他创作出了影响较大的作品《古长城外》。

1955年，石鲁到埃及、印度旅行写生，他尝试以国画艺术来表现异域风光，提出艺术愈有民族性，才会愈有世界性。他对中国画的技艺进行重新认识和探索，采中国文人画之长，吸取版画反差强烈的对比效果，不拘成法，注重精神气质的刻画，在技法上进行了一系列创新。为了表现中国绘画史上从未涉及过的黄土高原，他通过多年探索，创出了黄土“高原皴”等新技法，创作了一批以黄土高原为题材的作品，第一次向人们揭示了被称为“穷山恶水”的黄土高原浑厚朴实之美。1959年，他完成了以黄土高原为背景的革命历史画《转战陕北》，此画构思奇特，独具匠心，技法新颖，达到了画尽意未尽的效果，开创了以传统山水画形式表现重大革命历史主题的崭新道路，这是他艺术探索道路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并在国画艺术上开始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此后他又创作出了《东方欲晓》、《南泥湾途中》、《逆流过禹门》、《延河饮马》等表现陕北黄土高原风情的国画，他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术界曾引起广泛而热烈的争论，对他的评价有“野、怪、乱、黑”这样一种说法。石鲁还培养带动了一批陕西中青年画家，创作出一大批具有鲜明民族风格、时代精神和西北地方特色的新国画。1961年，这批画在北京展出，后又去南方各地巡回展览，轰动一时，以石鲁为首的这批艺术家被称之为“长安画派”。

“文化大革命”中，石鲁身心健康受到极度摧残，他因写诗痛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而被判处死刑。后由于医院证明他患精神分裂症，才幸免于难。他政治上始终不屈服于“四人帮”之流的淫威。艺术上持之以恒的耕耘不已，仅1971年他创作的画就有数百幅之多。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石鲁的冤案得以昭雪。他被选为陕西省人大常委委员、中国美协常务理事、美协陕西分会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陕西分会主席。1979年12月，中国美协、美协陕西分会联合在北京举办《石鲁书画展》，参观者规模盛况空前，随后画展又到西安、成都、南京等地巡回展出。

1981年，陕西发生严重洪灾，此时，石鲁已因身心健康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折磨而卧病不起。他抱病作画，以其画参加义卖展览救灾。

1982年8月25日，石鲁不幸去世。一生中出版的绘画作品有：《石鲁作品选》、《石鲁画辑》、《石鲁书画集》、《埃及写生集》。还发表有论文《新与美》、《谈十年美术总结》、《创作杂谈》等数十篇。未完稿《学画录》，另写有电影文学剧本《暴风雨中的雄鹰》。

张怡荪

张怡荪，原名张煦，蓬安县人，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出生，1983年9月1日病故于成都。逝世前为《藏汉大辞典》主编，四川省政协委员，四川省民族研究所顾问。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讲师、教授；山东大学教授、代校长兼该校中国文学系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西陲文化院院长和西康省通志馆总纂等职。建国后，受聘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兼文科研究所所长。

张怡荪一生著述甚富，如《公孙龙子注》、《老子校注》、《三国志集征原本》、《玉篇考订》、《玉篇原帙卷数部第叙说》、《藏汉大辞典》等，译有《西藏文法》、《宗轮晶鉴》。在这些著述中，《藏汉大辞典》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

张怡荪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门，毕业后留在北大任教，后又在北大作研究生。所作《公孙龙子注》一书，因成绩特别优异，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特向他颁发了500银圆奖金。

1922年3月4日，梁启超到北大作了一次关于《老子》成书年代的学术报告。梁在演说中认为《老子》有战国时期作品之嫌，并风趣地对听众说："我今将老子提起诉讼，请各位审判"。不久梁启超果真收到一份"判决书"，题目是《梁任公提诉老子时代一案判决书》，作者是当天在座听讲的张煦。那时张煦是一位年仅28岁的年轻人，居然敢于批评当时早已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梁启超："或则不明旧制，或则不察故书，或则不知训诂，或则不通史例，皆立言过勇，急切杂抄，以致纰缪横生，势同流产"。而且条分缕析逐一批驳，洋洋洒洒达数万言。梁读了这篇文章后，并不介意作者的尖刻用语，而是深自赞许作者的才华，尽管并不同意作者的观点，仍然亲自为之题识。识曰："张君寄示此稿，考证精核，极见学者态度。其标题及组织，采用文学的方式，尤有意趣。鄙人对于此案虽未撤回原诉，然深喜老子得此辩才无碍之律师也。"一个是少年豪气，敢于向权威挑战，一个是学者风范，热情奖掖后学。张煦的这篇文章连同梁启超的题识，在当时的北京《晨报》上发表以后，学术界一直传为佳话。

张怡荪早年研究《老子》，除《老子校注》、《梁任公提诉老子时代一案判决书》，还有《老子考异录》一书。这

些著述，颇有见地，成一家之言。他认为：《老子》一书是老聃遗说的发挥，无产于战国嫌疑。老聃其人比孔子年长，是在孔子之先。《论语》中的“窃比于我老彭”，老即老子。又“以德报怨”，此文见于《老子》。张煦的这些论点，与马叙伦、唐兰、郭沫若、吕振羽、高亨和苏联学者杨兴顺等人研究《老子》的论点相同，成为研究《老子》第一派的重要成员之一。张煦的成名之作《梁任公提诉老子时代一案判决书》已被收《古史辨》一书中。张煦的《老子考异录》一书，已被列入马叙伦编著的《老子核诂》所引用的书目中。旅美华人学者陈鼓应，在其所著《老子注译及评介》一书中，多处引用张煦的论点，来纠正梁启超关于研究《老子》的疏误。

1928年，张怡荪在清华大学执教，他目睹国外当时出版了不少有关西藏学问的著作，都为外国人所编，对此他内心深感不安。张怡荪认为，西藏是中国国土，西藏的学问应该由我们自己来研究，于是他矢志要改变这种状况，为国争光。他立志要首先编纂一部藏汉大辞典，用以沟通藏汉文化，奠定研究西藏学问的基础。是年冬，他在北京开始学藏文和佛学，并邀集同事，收集编纂藏汉大辞典的资料。他们先在北京圆恩寺，后又在雍和宫租用了部分房屋为工作地址。以后在成都创办了西陲文化院，作为研究西藏文化的专门机构。

建国后，张怡荪受命主编《藏汉大辞典》。1958年，65岁的张怡荪不顾年迈力衰，毅然率领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藏汉大辞典》编纂组前往拉萨搜集资料，进行实地调查采访和编纂工作。他在拉萨一住4年，成绩斐然。1964年，张怡荪将编好的书稿送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和北京同行的专家学者审查，获得较高的评价。由于“文化大革命”，这部大辞典出版的时间推迟了。粉碎“四人帮”后，张怡荪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提出恢复辞典编纂工作的要求。经邓小平、方毅和乌兰夫的亲自批示，《藏汉大辞典》才重新编纂，于1979年编出《藏汉大辞典》征求意见稿。

此后又经过5年努力，终于成书。它于1985年7月由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1万部，不到半年，就销售一空，1986年10月又重印1万部。《藏汉大辞典》是中国第一部供读者阅读藏文典籍、研究藏学课题以及解决实际问题使用的大型综合性工具。全书350万字，收词5.3万余条，以词语为主，兼收百科。《藏汉大辞典》3次被选参加书展，即参加香港中国书展、全国图书展览和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藏汉大辞典》两次获奖，即1986年10月17日获得四川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全省的第二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987年10月23日在北京获得“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学一等奖。现在这部大辞典已被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

字》卷。英国藏学家史蒂芬·巴齐勒（StephenBatchelor）1987年在伦敦智慧出版社出版的《西藏指南》（THE Tibet Cuide）一书的序言中说："这部三卷本的《藏汉大辞典》，远不只是藏汉两种语言的字典，它是有关藏族宗教文化的一部综合性的百科全书。资料珍贵，内容丰富，编纂精当，实属难得"。

方文培

方文培，字植夫，1899年12月10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生于忠县官坝乡杨家街老寨一农民家庭。8岁入私塾，17岁入忠县县立中学。1921年考入南京东南大学生物系。学习期间，他在图书馆里查到两部研究中国植物的专著：《中国植物学名录》、《华西植物志略》，均为外国人所著，这深深刺痛了方文培的心，他立志要实现"中国应当有自己的植物志"。

1926年大学毕业后，方文培在河南中州大学任教。次年考入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当研究生，在钱崇澍教授的指导下，从事植物分类学的研究。1928年，他被派赴四川作野外考察采集标本。从1928年～1931年，他带着两名助手，翻越崇山峻岭，风餐露宿，踏遍了金佛山、峨眉山、瓦屋山、大小凉山、大巴山等名山，历经南川、綦江、城口、开县、合川、峨眉、灌县、洪雅、荥经、汉源、泸定、康定、越西、马边等10余县。考察中，迷路、饥饿的事情时有发生，还曾被团防兵诬为"探子"捆绑关押，险遭杀害。考察收获巨大，采集珍贵植物标本12000多号，10多万份。这些标本至今仍被作为珍品，分陈南京、北京和华南植物研究所。通过考察，不仅掌握了四川植物资源生态区系及分布情况，还发现了20余种植物新种。他把在金佛山新发现的5种植物，分别命名为：金山杜鹃、弯尖杜鹃、川南杜鹃、长德鹅耳枥、金山安息香，并用世界统一的分类方法为这5种新植物取了拉丁文学名，成为世界植物宝库中出现的第一批方氏植物。

1932年，方文培用英文发表了第一篇论文：《中国槭树科初志》，不久发表《再志》，科学地提出了"槭树科的分类应根据它的全部营养器官和繁殖器官的特征来决定"，从而填补了国际槭树科分类原则的空白。1934年，方文培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奖学金，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师从于世界闻名的植物学家史密斯教授。留学期间，他不仅考察了爱丁堡、伦敦皇家植物园

和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中国植物标本，还先后赴德国、意大利、法国、奥地利等国，将各国从中国引种的植物和采集的标本进行考察，从中发现不少外国学者在研究工作的错误。1937 年 6 月，他以《中国槭树科植物的分类》的论文获植物学博士学位。不久，“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方文培婉谢英国朋友的劝留，毅然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

从 1937 年 10 月起，方文培长期在四川大学生物系任教，担任教授、系主任。1939 年川大迁往峨眉山，方文培开始了对峨眉山植物的第二次考察研究。从山脚到山顶，分段测出高度，逐段考察植物种类和分布，仔细观察植物在各个季节生长发育、开花结果的形态，并对所采集的标本进行鉴定、记录、整理、分析。经过四年努力，确定峨眉山植物至少有 3000 多种，并第一个对峨眉山的植物分布作科学描述。他选择出最有代表性的植物 200 多种，编写成 200 余万字的《峨眉植物图志》，用中英两种文字叙述，插图 200 多幅，这部科学巨著出版后，引起了中外学者的瞩目。英国皇家园艺学会赠送他一枚银质奖章，来华访问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特致祝贺。

1948 年，方文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下，应邀到美国讲学，访美期间，他自费把在美国的 4000 多种中国植物标本拍成底片。新中国成立后，他谢绝了美方的聘请，于 1949 年底回国，将所拍摄的植物底片交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这套底片，后来被大量翻印，广为应用。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编辑的《中国植物图片集》约 7000 张照片中，很多取自这套底片。

1950 年秋，方文培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植物分类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野生植物调查，并由方文培主持四川、西康两省的调查任务。1951 年，他组建、领导了一支由 20 余名中青年学者和数百名大学生组成的队伍、分作几路，进行大规模的野外考察。历时 7 年，调查了四川省 20 多个边远县、近 5 万平方公里的森林，采得植物标本九万多号，90 多万份，为编撰《中国植物志》和《四川植物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他鉴定，创建了四川大学植物标本室。1959 年，方文培被聘任为《中国植物志》编委，承担了第 46、52 卷（槭树科、杜鹃花科等五大科植物志）的编写任务。1978 年 1 月，四川省科委又任命他为《四川植物志》主编，他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

经过 20 余年的呕心沥血，1983 年 2 月，凝聚着方文培和同事们心血的《中国植物志》第 46 卷出版了。这本由方文培主编的植物志，总结了中国对槭树科等植物的研究，共 40 余万字，他亲自撰写的部分占全书 3/4。本书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中国是槭树科植物种类最多的国家，全世界有此种植物

200余种，中国就占有143种，其中新变种73种，而由方文培命名的达45种之多。他还对前人槭树科演化系统进行了修订，提出了新的演化系统。此后，方文培又主编出版了《中国植物志》第52卷和《四川植物志》第1卷。对杜鹃花科植物的研究也取得进展，发表了《中国落叶杜鹃》、《川康的杜鹃新种》、《峨眉山的杜鹃花》等多篇学术论文，并发现杜鹃花新种40多种。

方文培一生共撰写植物学专著8部，发表论文50余篇，发现植物新种100余种。主编的《中国植物志》第46卷、52卷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他编著的其他一些著作也分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三等奖。在5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还先后培养了几十届本科生、4届研究生、1届外国留学生，其中不少人已成为著名专家、学者和学术带头人。

建国后，方文培除担任四川大学生物系一级教授和理科学术委员会副主席外，还历任中国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四川省植物学会理事长、四川省政协委员。曾受聘为英国及荷兰皇家学会会员。1983年11月29日，方文培在成都病逝。

张大千

张大千，原名正权，单名爰，字季爰，别号大千，号大千居士。1899年5月10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一日）生于内江县安良里象鼻嘴堰塘湾的一户贫穷人家。其父张忠发，忠厚善良；其母曾友贞，善绘画绣花，人称“张画花”。张忠发夫妇共生九男二女，张大千排行第八，其二哥张正兰，即中外著名的“绘虎大师”张善子。

张大千9岁时，即随母、姊、兄等习画，12岁时已能画一些花卉、人物。15岁时，就读重庆求精中学，课余常画古装美人，功课惟数学较差，习字及国文则较优。

1917年春，张大千赴日本京都公平学校学习染织技术，闲时仍自绘画，时张善子也在日本，对他精心指导，尽力帮助。故后来张大千常说：“我之所以绘画艺术有此成就，是要感谢二家兄善子的教导！”

1919年，张大千由日本归国，留居上海，拜衡阳名士曾农髯为师，学习书法，旋因感情极笃的未婚妻谢舜华病逝等因，深受刺激，竟出走松江禅定寺削发为僧，由方丈逸琳法师为之取法号“大千”。3个月后，张又因不愿烧戎疤

而逃禅，被张善子寻回，送回内江老家结婚。

婚后不久，张大千重返上海，又拜江南名书家李瑞清为师。在曾、李二师的悉心指导下，张大千“学三代两汉金石文字，六朝三唐碑刻”，其书法尤得益《瘗鹤铭》，逐渐自成一家，其诗画等也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被艺坛称作“后起之秀”。1925 年，张大千在上海市宁波同乡会馆举办生平首次个人画展，展品 100 多幅全部卖光，由此开始其职业画家的生涯。

在此前后，张大千以石涛为中心，兼学八大山人、石谿、青藤、白阳等诸名家画，从中国古代的传统绘画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从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始，张大千又开始了“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广泛旅行、写生，由师古人转向并结合师造化。由于其不断地勤奋努力，张大千不但以“石涛专家”闻名于世，而且“于山水、花鸟、人物无所不工，笔路之广，见者莫不折服”。1929 年，张大千被推选为全国第一届美术展览会干事会员，负责审查送展作品。1931 年，张大千被推选为中国古代名画赴日展览的画展代表，负责对外宣传、解释名画等工作。

1932 年，张大千由上海迁居苏州网师园，更加勤奋作画。1933 年，其作品参加《中国近代绘画展览》在欧洲的巡回展出，代表作《金荷》和《江南山水》2 图，分别被巴黎博物馆与莫斯科博物馆购藏，“为吾国现代绘画生色”（徐悲鸿语）。于此，张大千渐有世界性的广泛影响。1936 年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正式聘请张大千担任该校艺术系的国画教授。

1937 年“七七”事变后，张大千赴北平接眷，恰逢中国守军撤退，张被困颐和园内。日本侵略军为笼络人心，迫张担任日伪北平艺专校长，又要张发起组织中日艺术协会，张大千坚持民族气节，坚辞不就。同时由于张揭露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时烧杀奸掠的罪行，曾被日本宪兵队关押 1 月。1938 年 5 月，张大千设计逃出北平，辗转经上海、香港、桂林，回到重庆，并旋上灌县青城山住居，潜心作画、写诗。

1941 年春，为探寻中国绘画的发展源流，张大千率领门人子侄，赴甘肃敦煌研究石窟画，在敦煌约两年半之久。他调查敦煌地区的石窟分布情况，为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水峡口等处石窟群编号，并从上述石窟中临摹十六国、两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历代壁画共约 300 幅，还完成了一部 20 万字的学术著作《敦煌石室记》，为敦煌石窟艺术的发掘、整理、研究、保护、传扬等，做了大量创造性的、极富意义的工作。

从 1943 年到 1944 年，张大千连续在兰州、成都、重庆等地举办声势浩大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轰动全国，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和高度

评价，并吸引大批有志青年前往敦煌，为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作出了贡献。

1944年3月，张大千被推选为中华全国美术协会理事。他在四川省美协召开的庆祝首届美术节的大会上表示："我愿追随同人一致努力，来促进新中国的文艺复兴。"

抗战胜利之后，张大千更是频频活跃于全国各地，或举办画展，或旅行写生，或搜罗古代书画文物。1946年，他又以佳作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伦敦、日内瓦、布拉格等地主办的《中国当代画展》，深得各国艺界好评。

1948年，张大千于上海展画后，又赴香港举办画展。1949年2月，张大千在香港闻悉北平解放，古都建筑、文物丝毫无损，十分高兴，特精心绘制一巨幅《荷花图》，托何香凝带北平赠毛泽东。

1949年冬，张大千接受印度美术学会邀请，欲赴印展画。同年12月上旬，张大千返成都接家小后，旋赴台湾，再往香港，紧接着即去印度。

1950年，张大千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画展后，随即赴印度阿旃陀石窟考察，比较研究印度壁画与敦煌壁画的异同，这是张当年在敦煌时就立下的心愿。经过比较，张得出结论：敦煌艺术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是中国传统绘画的表现。之后，张大千赴印度风景胜地大吉岭游览，"流连不忍离去"，在该地居住年余，并创作出大量的诗歌和画幅。

1952年，张大千为将中国画介绍给西方，并搜罗散失在海外的中国古代书画名迹，率家离香港赴南美阿根廷侨居。1953年，张大千见巴西圣保罗附近一地极似故乡成都平原，遂又举家迁往此处，并将之命名为"八德园"，从此在巴西侨居达17年之久。

1956年，张大千首次赴欧洲，同时在巴黎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览》和《张大千近作展览》两大画展，轰动西欧。同年7月29日，张大千与西画大师毕加索在法国尼斯港会晤，互相交流画艺，互赠画幅。西方人士誉此为"中西艺术界的高峰会议"，是"中西画坛巨子的历史性的会见"。

1958年，在美国纽约举办的世界现代美术博览会上，张大千以国画《秋海棠》，荣膺国际艺术协会颁发的金牌奖，并获该协会公选的"当代世界第一大画家"的荣誉称号。这是中国人在美术方面第一次所获得的崇高荣誉。

1969年，因八德园附近拟建水库，张大千又迁往美国加州卡麦尔城侨居，建中式庭园环荜庵。1976年，由于健康等方面的原因，张大千又率家迁回台湾省台北市居住，在市郊外双溪畔建摩耶精舍，从此再未迁离。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张大千的作品就不断地在亚、欧、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展出，皆获成功；他本人的足迹也几遍全球，为介绍与弘扬中国的传

统文化艺术，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因此，中外多所大学，颁赠他荣誉博士学位。1976年，台湾当局授张以“艺坛宗师”匾额，1982年又颁授“中正勋章”，以奖励他在艺术上的卓越成就。

张大千自离乡以来，在外漂泊达30余年，其对家乡故国，无时不在眷恋，他曾创作大量的诗词与画幅，来倾吐自己的乡国之思。就在这种“万里归迟总恋乡”的心情中，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因病逝于台北。

蔡复初

蔡复初，字奠基，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生于南江县一贫困教师家庭。

蔡复初少时信仰基督教，1920年考入圣公会阆中天道学校（即圣经学院）。1923年学成后，在巴中县教会作布道员，兼任华英学校教员。1926年考入成都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后转入华西高级神学院，1928年毕业，任牧师。他常徒步到教区各县巡回布道，足迹遍及川东北各城乡教堂。

1934年秋，蔡复初应邀到重庆青年会任德育部主任干事，他还被各教会推选为重庆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1935年出席了在上海、南京召开的青年会全国协会会议。他参观了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办的“平民教育实验县”，回川后广为宣传，希望四川将来也能出几个“实验县”。

1937年抗战爆发后，蔡复初兼任成都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他经常乘教会的服务车往返于成、渝两地，宣传抗日救国。服务车还义务为劳苦大众治病，深得好评。《大公报》和《东方杂志》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发表了《访蔡复初先生》一文。黄炎培也作诗赞美他。由于他在这段时间广泛接触各界爱国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爱国主义思想的提高，起了积极的作用。

1940年，蔡复初担任东川教区会吏总，先后驻阆中、达县。他以圣经上古圣先贤的爱国榜样向信徒们宣传抗日战争必胜的道理。号召信徒们为抗战胜利而祈祷，他还积极参加为“伤兵之友”的募捐活动。

1949年，他应重庆神学院院长陈崇桂的聘请，担任了重庆神学院的董事长。1950年初，东川教区会督办事处常委会发出通函，要求各牧区以信函方式提名投票选举一位中国会督，蔡复初以他的能力和在各地信徒、教牧中的威信而当选。11月底中华圣公会主教院

在上海为他举行主教祝圣典礼，他正式就任东川教区第六任会督，也是该教区的第一个中国人会督（即主教）。1951年，他以主教名义号召教牧人员和广大信徒积极参加革新宣言签名运动和支持抗美援朝。

1954年起，蔡复初担任四川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主任，东川、西川两教区联合办事处会督，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委会委员、四川省基督教三自爱委会副主席。先后当选为巴中县人民代表，川北行政区人民代表，第二、三届四川省政协委员，还担任过四川省政协宗教文史资料组负责人。他积极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四川省基督教徒三自爱国运动的展开作了很多工作。

1959年11月，英国友好人士坎特伯雷约翰逊教长访问四川，他陪同约翰逊受到陈毅的亲切接见。他还陪同过澳大利亚悉尼大主教莫尔立访问川北地区，并向国际友人介绍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1983年1月25日，蔡复初病逝于重庆。

蔡复初好读书，喜诗文，曾写过不少文章和诗歌，重译和改编了教区礼拜时用的《都来颂》、《赞美颂》等圣歌。

汤乃武

汤乃武，生于1925年，湖南湘潭人。年轻时先后就读于长沙大麓中学、岳云中学、清华中学。194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冶金系，回母校清华中学任化学教师。1949年11月调鞍钢炼铁厂，任高炉工长，参加了中国第一座机械化大型高炉的生产准备和开炉工作。曾被评为鞍山市工业劳动模范。1954年任鞍钢中央试验室炼铁研究室副主任。他在参加高氧化镁渣冶炼试验和高炉结瘤问题研究之后，又参加了冶金部包钢工作组，主持包头含氟赤铁矿的焙烧、磁选和烧结矿的工艺性试验，解决了包钢高炉冶炼含氟矿长期未能解决的技术问题。1958年，汤乃武被调到武汉钢铁公司，任中央实验室主任。他参加了武钢大高炉技术攻关，撰写了《高炉炉料中粉末在炉喉分布的研究》的论文，从理论上解释了煤气流对布料的影响，建立了力学方程。接着他根据对布料和风口的测试研究写下论文《高炉上下部调节的关系》，提出了计算风口氧化区长度的经验公式，对指导武钢高炉生产起了重要的作用。

1964年10月，汤乃武作为支援四川攀枝花第一批建设者被调到攀钢西昌

中试基地，担任了攻克用普通高炉冶炼高钛型钒钛磁铁矿这一世界性技术难题的任务。冶金部专门组织了108人的攻关试验组，汤乃武为该组的技术负责人之一。他和攻关组同志一道先后在承德、西昌、首钢进行了多次冶炼试验，白天亲自到炉前操作、观察、取样、化验，晚上在灯下整理数据，研究冶炼方案，有时冒着烟熏火烤连续工作达40多小时。历尽千辛万苦，试验终于成功，填补了世界冶金史上一大空白。

汤乃武在攀钢工作期间，还解决了攀钢高炉布料反常等问题；组织并领导了攀枝花选矿尾矿的选钛试验；开展了重、电流程选钛工业试验和强浮流程选钛半工业性试验；参加了攀枝花铁精矿氧化球团高炉冶炼试验和钢渣返回烧结高炉冶炼试验；参加编写《攀枝花钒钛磁铁矿选矿、烧结、高炉冶炼试验资料汇编》，负责烧结部分的主编工作。

1979年，汤乃武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攀枝花钢铁研究院副院长。身患癌症后，仍忍着剧痛，参加科研试验。1983年1月12日病逝。

汤乃武一生发表的主要论文还有：《高炉炼铁的辩证法》、《试论牛顿力学的哲学思想》、《关于烧结矿的布料问题》、《怎样掌握高炉冶炼规律》、《高氧化镁的高炉冶炼》、《攀枝花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的特点》等。编写了《工人炼铁学》，与人合译了《高炉生产的技术检查》等书，分别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

阳友鹤

阳友鹤，原名永清，1913年出生在彭县濛阳镇的一个贫苦裁缝人家。8岁入金兰科社习旦，取艺名小金翠登台演出。1年后金兰科社倒闭，阳友鹤返家，幸遇姓马的打鼓师收为徒，并带他到成都锦新舞台，以《若兰寺》为第一个登台演出的踩跷戏。后相继拜杨凤仙、张少华、张小云、陈翠屏为师，改艺名春鸣、筱桐凤和筱菊芬，到重庆、泸州演出。在泸州遇成都著名班社三庆会演出，得亲睹周慕莲等名家演出，技艺日进。

阳友鹤在泸州三年中，在名艺人老旦王本清指教下，受益匪浅。后他到成都、重庆、川南一带演出，广泛地吸取艺术营养，先后观看了不同艺人演出的十多出《金山寺》，与配演青蛇的艺人谢鹏飞切磋技艺，围绕着白蛇神话的艺术处理、舞蹈动作和人物塑造，创新武功身段绝招：白娘子寻夫时的“托举”

(当时称为“马马肩”)，蛇形的优美动作“倒彪”，白娘子斗金钵时“钻火圈”、“滚禅仗”以及“溜台口”等。这时他被名旦潘云成邀到资阳河演出，又得潘传授拿手戏《打饼》、《反延安》。他在资阳河广为演出《金山寺》，名声大振。

1931年，阳友鹤应邀到重庆登上第一流的章华大舞台，以扮演《北邙山》、《金山寺》、《八宝公主》、《太岁庄》和《万宝瓶》戏中的武旦、刀马旦的角色征服了山城观众。他在重庆的“章华”、“又新”两个大舞台演出年余，常与生角泰斗张德成、名小生曹俊臣合作，技艺更精。1938年，阳友鹤与张德成合演的《别宫出征》、《访友》，阳单独演唱的《刁窗》、《欢娱楼》等戏，被上海百代公司录制成川剧唱片。1937年“又新”分班到成都，取名“新又新”，阳友鹤往返成渝两地演出。

阳友鹤在演《凤仪亭》时，请川剧作家刘怀绪写唱词，他再按唱词设计唱腔，并在服装、化装上改革，使《凤仪亭》成为其拿手好戏。1940年，郭沫若、田汉、阳翰笙等在渝观看该剧，称赞其在剧本和服装、化装上的改革。

20世纪40年代后期，川剧舞台上出现了演员以色相来迎合观众的混乱现象，他即取下牌子，进行了抵制。

1952年，阳友鹤参加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与周企何排演《秋江》，根据该剧的人物性格，重新设计了舞台动作，荣获演出一等奖。

1956年，阳友鹤赴京参加文化部第二届戏曲演员讲习会，总结自己的艺术经验，写成了《川剧旦角的基本功训练与表演要求》一文。讲习会结束后，即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参加川剧《杜十娘》的拍摄，担任艺术顾问。1957年6月出席在北京召开的戏曲音乐座谈会，作了《川剧音乐工作者的两个问题》的发言。1959年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国庆，他导演了整理本的《白蛇传》，到北京参加献礼演出，获得好评。同年，阳友鹤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党的推陈出新方针的指引下，阳友鹤积极对传统戏进行改革。他与梅兰芳研究过《贵妃醉酒》，多次改进，删除旧本中庸俗的唱词和表演，增加抒情的唱段，加强了音乐伴奏。对他在解放前的成名之作《刁窗》，先后修改6次。他擅演的泼辣旦戏有《别宫出征》、《杀狗》、《铁笼山》等。

建国以来随着川剧事业的发展，阳友鹤十分重视不同剧种间的艺术交流，他进京登门拜访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张君秋等名家，取经探宝。他先后为越剧、晋剧、粤剧、评剧、京剧、秦腔和豫剧等剧种的著名演员排练折子戏，传授旦角表演程式或讲课，增进了兄弟剧种之间的相互了解。

1956年在全国第二届戏曲讲习会上，由中国戏曲研究院派专家为阳友鹤记录艺术经验，拍摄造形艺术，整理成

《川剧旦角表演艺术》出版，梅兰芳在所作的序中说：阳友鹤“对川剧旦角表演有着准确的传授和深厚的功夫”，“所以他能出一本比较系统而有丰富内容的旦角演技教材”。该书再版3次，在全国戏曲界颇有影响。阳友鹤在剧院（团）导演、教授技艺的岗位上培养了许多中青年演员；在戏校的教学工作中，培养了大批学员；名演员陈书舫、许倩云、廖静秋、刘芸等直接得其教益，而间接得其教益的遍及全川。

建国后，阳友鹤历任西南川剧院实验学校教务主任和川剧院导演、四川省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和四川分会名誉主席、四川省川剧领导小组成员、成都市文联副主席、成都市戏剧学校校长、成都市川剧院副院长等职。他将各流派，各地名家在艺术上的特色和技巧吸收，为我所用，形成独特的风格。他能戏甚多，文武兼备，闺门旦、青衣旦、鬼狐旦、刀马旦、花旦、奴旦皆能，唱做吟打无一不精，他演出小家碧玉、大家闺秀、帝王后妃皆生动传神，塑造了不少能文能武，古代和近代的妇女形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戏剧家协会及省、市文化部门，曾于1980年11月20日在成都联合举办“阳友鹤舞台生活六十周年纪念”的活动，为时一月，张爱萍、任白戈、艾芜等领导和文化界知名人士曾赋诗作贺。

正当阳友鹤为川剧改革作出新的贡献之时不幸身患胰腺癌，经医治无效，于1984年2月20日逝世。

任应秋

任应秋，字鸿宾，1914年6月5日生于江津县油溪镇一“书香门第”之家。4岁启蒙读经，13岁时十三经皆能成诵。稍长，问难于经学大师廖平，凡治经、训诂、考据之学，均打下坚实的基础。又好古典文学和医史。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精读、勤写、深思、善记。1929年，任应秋受医学于当地老中医、经方家刘有余，尽得其传。3年满师后，即在家乡设立“清世诊脉所”，免费给乡里治病。

1936年，任应秋到上海中国医学院学习深造。此间，得到沪上名医丁仲英、曹颖甫、陆渊雷等人的指导。1937年，因日寇侵华，未及卒业。回川后，一面行医、研究中医经典，一面执教于几所中学校。彼时，抗日烽火燃烧中华大地。上海、南京、苏杭、武汉等地名

医，纷至大后方重庆，一时蜀中名医汇集，精英荟萃，任应秋有机会同他们广相结识，请教交往，情谊甚深，为他以后的事业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1944年2月，任应秋在家乡江津创办了《中医周报》，同年著成他的第一部中医著作《仲景脉学法案》，1945年著成《任氏传染病学》。

抗战胜利后，年方“而立”的任应秋已成为四川中医界公认的后起之秀。此期，他在学术上力主中医科学化，在政治上为中医争生存，争地位，积极参加医界社会活动。1946年4月15日，任应秋和同仁们在重庆中山路94号创刊了《华西医药杂志》。任应秋任主编，社长周复生，特约撰述有各省名医84人。该刊阵营强大，声名煊赫于海内。《华西医药杂志》在任应秋的精心主编和全国医界同道的支持下，不仅在继承、发扬中医学术，普及中医药知识，倡导科学卫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成为团结四川和全国中医人士，争取中医合法地位，反对国民政府歧视、废止中医的舆论阵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始了任应秋事业上的黄金时期。1952年，任应秋应邀任重庆中医学校教务主任。1953年著《脉学研究十讲》，1954年著《中医病理学》，1955年著《中国医学史略》、《中国医学通俗史话》、《中药药理学》，1956年完成《伤寒论语译》。

1956年9月，北京中医学院诞生，任应秋调至该院，先后担任科研办公室主任，院务委员会委员，古文、医史、各家学说教研室主任等职。此间著述甚丰，先后编著了《金匮要略语译》、《阴阳五行》、《中暑》、《各家学说及医案选》、《五运六气》、《病机临证分析》、《各家学说讲义》等书。

1973年，他修订出版了《濒湖脉学白话解》，1976年著《中医舌诊》，1978年《医学启源》校勘出版。《医学启源》是宋金时代医学家张元素的名著，原本已经绝版好几百年，仅有刻本亦极为少见，且错讹很多。任应秋勤力校勘，历时五年，勘定改补1200余条，使该书得以近乎原貌，为研究易水学派学术思想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也是中国近10余年来古籍整理的重大成就之一，受到海内外中医学者的称赞。

1980年，任应秋完成并出版了他的巨著《中医各家学说》。此书是他30年研究的结晶。全书共60万字，以医学流派为纲，介绍了105位杰出医家的学术思想和成就，并首创中国医学从先秦到民国有七个流派之说（即医经学派、经方学派、河间学派、易水学派、伤寒学派、温热学派和汇通学派）。该书为中国医学发展史从思想、理论、师承、治验、影响与局限等许多方面，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创造性的总结，为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任应秋曾担任《医学百科全书·中

医基础理论分卷》和《中国历代名医精华》的主编，并主持编纂了《中医气血资料类编》、《十大医经类编》、《内经章句索引》等书。

任应秋在临床上也具有丰富的经验，治愈过许多危重病人。

任应秋还担任了大量的社会工作。曾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九届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医药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医药）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卫生部学术委员会委员，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兼中医组组长等职。

1980年任应秋赴日讲学，受到日本医学界的欢迎和敬佩。1981年又与日本同道共同主持了“中日伤寒学术讨论会”。1982年10月，他和中国中医界其他知名学者共同倡议，并在医圣张仲景的故乡河南南阳市主持召开了规模盛大的“全国首次仲景学术讨论会”，日本医界亦派出两个代表团参加，为振兴中医在全国造成了良好的气氛。他还与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和香港的许多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为广泛扩大中医在世界的影响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晚年，他还特别关心中医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对改革中医药管理体制等问题，向中共中央和卫生部积极提出建议。

任应秋是中国当代中医学家中的一位巨匠，他先后涉猎了6000多种古今医籍，亲手写了数万张资料卡片，著书30多部，发表论文300余篇，共凡1300余万言。1983年，卫生部和北京中医学院特地为任应秋从医50年举行了隆重的庆贺仪式。1984年10月17日，任应秋因患肺癌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

王　良

王良，字眉白，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生，浙江杭州人。幼年随父宦游入川，定居巴县。10岁时入法文学校学习，毕业后考入法国在安南（越南）开办的河内医学院，攻读7年，于1912年毕业。次年回国，在云南、四川等地从事医疗工作。求学期间，一兄一妹先后死于肺结核病；从医期间，更见不少结核病人，因无有效药物治疗被夺去生命。他深感结核病对人民的健康危害极大，是中华民族的一大祸患，决心以毕生精力，献身于征服结核病的医学事业。

1925年前后，王良从法国医学刊

物上得知已发明预防结核的卡介苗，决定去法国直接向卡介苗的发明者卡尔默特（Calmete）及介兰（Guerin）学习。1931年4月，王良从上海启程赴法，几经辗转来到巴黎，进入巴斯德研究院卡介苗实验室，在介兰的亲自指导下，从事卡介苗的研究工作。他用两年时间完成了预订的科研计划，写出了《结核菌现时的培养及分离法》等4篇研究结核菌及卡介苗的培养与促进生长方面的论文，其中3篇在法国发表，一篇在国内发表。

1933年王良携带卡介苗种返国，集资在重庆建立了四川最早的现代医学科研机构——微生物实验所，并创设了中国第一个卡介苗实验室，成为把卡介苗菌种引进到中国的第一人。在从事卡介苗的实验研究的同时，为推广应用卡介苗，充分发挥预防结核病的作用，他四处奔走宣传，免费给婴幼儿接种，并进行健康访视。他还先后发表了《重庆自行卡介苗接种婴儿的概况》等多篇报告和《卡介苗之培养及制造》等数篇论文，对卡介苗传代、培养和制造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后，由于国民政府勒令停止制造和接种卡介苗，微生物实验所于1936年被迫停办。但王良以坚定的科学信念，坚持对菌种进行培养、传代和保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王良的研究工作给予了极大的信任和支持，1951年在重庆成立了西南卡介苗制造研究所，委任王良为所长。他以高昂的热情，参加卡介苗的培养、制造，并将自己的部分实验仪器，无偿地献给研究所；同时组建了地区接种站，开设培训班，培养了大批接种人员，使卡介苗的预防接种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1956年，西南卡介苗制造研究所并入卫生部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后，王良任副所长兼卡介苗室主任技师。他数十年如一日，始终保持主要实验亲自操作，助手所做试验逐一核对、详细记录的严谨作风。在科研选题和设计上，从不考虑个人名利，坚持以应用为主，联系实际的原则，在对提高卡介苗质量等方面的研究中，又取得了新的突破。

卡介苗质量的根本问题是活力问题。王良通过对卡介苗培养基中PH的变化进行反复测验和化学定量分析，他主张培养基中的麸酸钠由8%改为6%，甘油由60%改为50%，这样更适合卡介苗的生长。同样，他用优选法测验冻于卡介苗保护液中的蔗糖含量，实验证明：10%有抑制卡介苗活力的作用，而8%则无影响。在计数方面，他设计了一些试验方法和统计学处理方法，使操作者称便；他还提出将菌液静止8小时后，再观察菌苗的均匀度更为准确，此法载入1956年卡介苗制检规程。这些试验研究，对提高卡介苗质量均起到一定作用。王良还长期从事对卡介苗菌种的选择及菌株诱导方面的研究，并多次

对国内外各菌种进行实验比较，注意观察卡介苗在小鼠脾脏的繁殖力和小鼠脾脏的酯酶活力及变化，取得了重要科研成果。先后发表了《巴西及丹麦卡介苗株接种动物的免疫力比较》、《分离卡介苗纯菌种的实验》等多篇论文。王良还对卡介苗免疫机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通过对酶的活力进行分析，发现不同菌株所含酶的活力是不同的。他对免疫动物的血象也作了观察，从多方面证实了卡介苗的非特异性免疫。

1983年4月，中国防痨协会在成都召开了《王良主任技师从事卡介苗工作50年学术报告会》，介绍、表彰了王良在科学研究上的成就和贡献。1985年，王良在成都逝世。

王良生前还曾任第二、三届四川省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防痨协会四川分会名誉理事长。

李安宅

李安宅，字仁斋，笔名任责。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出生于河北省迁安县（今划入迁西县）。1917～1923年李安宅先后在河北遵化县中学及天津的基督教青年会夜校学习，1923年赴济南，入齐鲁大学。1924年转入北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26年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年冬，党组织派他在苏联驻张家口领事馆担任英文秘书，1927年他又返回燕大社会学系继续学习，1930年以后他失掉了与党组织的联系。

1927年李安宅于燕大社会学系毕业后，留校先后任社会学系和哲学系助教，国学研究所编译员，他的研究重点在社会学与民族学（人类学），为他毕生从事这两门学科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运用社会学原理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现象，发表了一批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为当时的学术界所注目，其中有《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研究》、《以中国为例评孟子论心》等。他还著有《美学》和《意义学》。后者是一本探讨理智语言意义的论者，同时，他还翻译了一些著作。

1934年李安宅赴美国进修民族学。1935年7月他到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名叫祖尼（zuni）的印第安人部落进行了民族学调查。写成《印第安人祖尼的母系制度》（英文本），详细叙述了祖尼部落母系制度的结构与演变。1936年李安宅去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深造，将大量的国外民族学著作介绍到中国来。他翻译并在国内出版了英国民族学家、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的马林诺夫斯基所著《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和《两性社会学》。他编译的有《巫术与语言》。由于

他的翻译介绍，使功能学派在中国社会学界与民族学界中有很大影响。

1936年末，李安宅返国，继续执教于燕京大学，先后在社会学系及研究院任讲师、副教授，直到1938年。他除了担任繁重的教学任务外，还撰写社会学与民族学论著数十篇。1938年以《社会学论集》为名，由燕京大学出版部出版。

1938年，李安宅应顾颉刚之邀，与夫人于式玉一道赴甘肃夏河县的拉卜楞寺进行社会调查。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李安宅住进寺院，潜心学习藏语藏文及佛学知识，整个调查用了3年，通过这些考察，李安宅在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就，写成了《藏族宗教史之实地考察》（又名《拉卜楞寺调查报告》）。全书共20余万字，分为5章。英文译本1982年始由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该所所长中根千枝教授说："在此之前，还没有看到过像这样详细而深入的报告。"而汉文版则于1989年在国内出版。由于本书所反映的拉卜楞寺，在藏区黄教寺庙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这本调查报告，对研究藏传佛教，有着重要的价值。

1941年李安宅来川，任成都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他发起筹建华西边疆研究所，于1941年正式建立该所，由他兼任所长。华西边疆研究所的研究重点是藏族，李安宅聘请了藏学家任乃强、谢国安和刘立干等来所工作，他还于1944年夏赴西康北路，其"研究对象为黑、花、红、白四种教派，前后达半年之久"。他主持华大社会学系与华西边疆研究所直到1947年，他治学严谨，从不发空论。在此期间，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关于边疆问题的以《边疆社会工作》为代表作，该书分析了中国边疆社会的特点，并提出开展边疆社会工作的途径与方法，所提见解很有针对性，至今犹有参考价值。关于藏学方面主要的有：《拉卜楞寺的护法神——佛教象征主义举例》、《萨迦派喇嘛教》等。而《西康德格之历史与人口》则是他赴该地进行实地考察后的调查报告。此外他还写出了《川甘数县边民分布概况》的调查报告。

1947年，李安宅再度赴美，任耶鲁大学研究院客座教授，主要讲授他研究藏学的心得。1948年去英国，任伦敦大学研究员，广泛吸取了国外藏学的新成果。1949年返回祖国，继续任教于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不久便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1950年初，当他得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急需藏学方面的人才时，便毅然主动地报名参军。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闻知此事，亲自会见了他。当年2月，李安宅在成都参加了十八军，任研究员，实际担任部队藏学顾问的工作。1950年10月他随军进驻昌都。次年1月，任昌都解放委员会委员兼文化组长。此时他还兼任西南民族事务委

员会委员。1951 年秋，李安宅随军进入拉萨，他在西藏工作直到 1955 年，先后任拉萨小学副校长、西藏军区干部学校教育长等职。

1956 年李安宅内调返川，任西南民族学院教授兼副教务长。1959 年，李安宅到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民族调查组工作。他主持完成了 1905 年至 1911 年间赵尔丰任川滇边务大臣时的档案的初步整理工作，对于这一阶段的近代史和藏族史的研究，都极为有用。

1963 年，李安宅调四川师范学院任英语系教授、系主任兼副教务长，长期担任英语的教学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李安宅遭到迫害，“文化大革命”之后，其冤案得以澄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李安宅已属高龄且患眼疾，但他仍十分关心社会科学的发展并不断提出好的建议，他先后被推选为四川省政协委员、中国社会学会顾问、中国民族学会顾问、中国民俗学会顾问等职。

1985 年 3 月，李安宅与世长辞。1987 年 4 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建立了“李安宅、于式玉教授遗著整理编辑委员会”，使其精神财富得以传之后世。

谢锡璨

谢锡璨，字荣达，生于 1903 年 6 月 25 日（清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一日）璧山县人。14 岁入重庆求精中学，1921 年毕业后，考入湖南湘雅医学院，攻读医学专业。1928 年转入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医科（次年与牙科联合为医学院），1931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被保送入北平协和医院学习放射科及骨科专业。1934 年回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先后任讲师、主治医师、副教授。1939 年考取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放射专业研究生，翌年转赴美国洛杉矶儿童医院进修，兼任骨科主治医师及该院护士学校骨科教师。

1941 年谢锡璨回国后，历任华西协合大学教授、外科主任、附属医院院长、医学院代院长；1944 年又出任齐鲁、华西大学联合医院院长。时值抗日战争艰苦阶段，华大附院惜字宫女医院被敌机炸毁，外籍医教人员纷纷撤离回国，他克服各种困难，全力主持繁重院务，想方设法在联合医院收治男女各科病人。

抗战胜利后，设在重庆高滩岩的原中央医院撤返南京。谢锡璨抽调联合医院的部分医务人员，于 1946 年前往

重庆，接管中央医院，任副院长并主持院务。他不辞辛劳，使医院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开业门诊，并收治住院病人。为了方便病人就医，相继在两路口、飞来寺、磁器口开设了门诊部。又创办护士学校，建立医疗器械修配厂，培养了一批护士和技师。为配合重庆大学医疗系的教学实践，还创办了沙坪坝医院（该院后来交重大管理）。

1948 年，谢锡璨返回成都任省立医院院长。当时该医院设在青龙街原南熏中学校址内（今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设备简陋，经费、用房严重不足。他一面求上级拨款，一面四处奔走，筹集资金，费尽心力建起了一座两层楼房的门诊部，又修建了手术室及一些平房，使省立医院能维持正常的医务活动。成都解放前夕，他掩护了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并将省立医院全部财产清册，交给了中共地下党员夏发祥。同时，还组织员工加强医院的保卫工作。到成都解放，省立医院未受任何破坏，军代表接管时，出纳室交出的库存基金全部为银元现洋。此事，曾受到军代表大红报表扬。

建国初，谢锡璨被任命为川西医院院长。1951 年参加土改，任卫生工作队队长。1953 年就任四川省人民医院院长，着手在青羊宫购地新建医院。同年，成都组建了以骨科和胸科为主的四川省抗美援朝外科手术队，由谢锡璨任队长，杨振华为副队长，奔赴朝鲜前线，在第十四前沿兵站工作并培训军医人员。当时，医院屡遭轰炸，生活和工作条件都极为艰苦，医疗队边工作边教学，任务紧张繁重。谢锡璨曾因劳累过度，高血庄突发被送回国疗养，当病情稍有好转，即再度入朝，到志愿军第二基地担任骨科战场教学工作。1954 年，谢锡璨应邀到开城访问，在经验交流会上，作了“志愿军医疗工作的优越技术和操作技能”的报告，备受与会者赞扬。是年，志愿军召开卫生工作总结大会，谢锡璨又向大会提交了“兵站医院处理骨折伤员”的论文。在朝期间，医疗队共收治伤员 10620 人，其中手术治疗 432 人，挽救垂危伤员 150 余人，同时在短期内培训了一批志愿军医护人员。

1954 年回国后，谢锡璨继续担任四川省人民医院院长兼骨科及外科主任医师，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医疗工作与研究中，在骨科治疗上屡屡获得突破。他医术精湛，特别擅长骨科矫形和放射诊断。建国后，谢锡璨最早在西南地区开展先天性髋关节脱位、先天性马蹄内翻足、先天性斜颈、小儿麻痹后遗症畸形等病的研究与治疗。当时国内大部分医院对这些病都束手无策，但他却潜心钻研，在短期内就攻克了难关，取得了明显的疗效。骨关节结核是骨科常见病，20 世纪 50 年代初，多数医生都采用比较保守的治疗方法，如包石膏、卧石膏床等，疗效差，疗程长。谢锡璨

创造性地采用积极手术疗法，如对脊柱结核，采用脊柱融合术、脊柱结核病灶清除术等方法治疗，缩短了疗程，提高了疗效。谢锡璨对祖国医学在医疗实践中的作用极为重视，他招收一批名老中医到省人民医院工作，建立了6个中医专科，又亲自召集并领导省内名老中、西医，研究骨科中西医结合临床经验，在骨科界积极推广小夹板治疗骨折的先进疗法。他发表的论文《骨髓炎之疗法》及编著的《矫形科手术图谱》等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谢锡璨重视人才培养和使用。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安排有培养前途的吴德成、黄克维等人去美国深造。建国后，除接收各医院送来培训的医师外，还主持开办骨科专业进修班，造就了一批骨科技术骨干。

谢锡璨还为四川省人民医院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心血。从医院迁址新建伊始，他就亲手绘制医院建设蓝图，从选点、设计、施工到中西医各部的设置，环境布局等，都一一亲自组织和参加。以后他又在开办省人民医院护士学校和医疗仪器维修机构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使该院逐渐发展成为一所配套完整的较为现代化的医疗机构。

“文化大革命”期间，谢锡璨深受“四人帮”迫害。恢复职务后，他不顾重病缠身，一心扑到工作上，不久即沉疴不起。1979年改任省人民医院名誉院长。1985年10月8日病逝于成都。

谢锡璨生前为第一、二届四川省人大代表，第三、四、五届四川省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先后担任过中华医学会成都分会理事、副会长及骨科学会主任委员。

刘雪庵

刘雪庵，又名雪盦，谱名廷玳，笔名晏如、晏青、苏崖。铜梁县人。1905年11月7日（清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一日），生于一教师之家。自幼喜爱文学、历史、音乐。中学时受“五四”运动影响，思想进步。1924年进入成都私立艺术专科学校，学钢琴、小提琴、作曲等。1926年回到铜梁创办了养正中学，提倡音乐、美术和话剧，还演出了田汉的《获虎之夜》，自任主角。1928年，他创建“戊辰艺术社”，公演进步话剧，举办音乐会与画展。刘雪庵因此受到当局追查，被迫于次年逃往上海。

刘雪庵在上海考入中华艺术大学，师从冯雪峰、洪深等名师学古典文学及

中国戏剧。1930年2月，他参加了鲁迅等人发起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1930年秋，刘雪庵转入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范科，师从作曲系教授黄自学习作曲理论达七年之久。“九一八”事变后，他创作了一系列抗日爱国歌曲如：《出发》、《前进曲》、《前线曲》、钢琴曲《中国组曲》。1932年4月他编辑出版了爱国歌曲集《前线去》。1935年起，他相继为进步影片《父母子女》、《满园春色》、《桃花扇》、《十字街头》等谱写了主题歌。他还在蔡元培主持的《音乐杂志》和《新夜报音乐周刊》从事编辑工作。发表了一批理论性的文章如《读“墨子非攻”释义后》、《由〈出征歌〉说到歌曲的改良》、《音乐与个人》、《电影歌曲应该注意的问题》。他还编写了一套《中等学校音乐教科书》（共6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有他创作的歌词《新中国的主人》、《总理逝世纪念》、《农家乐》等10首。

1935年，他参加了进步音乐组织“歌曲作者协会”。同年他领导了国立音专“一二·九”爱国游行和请愿。1936年5月，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之弟、音乐指挥近卫秀麿到国立音专访问。刘雪庵作为学生代表，发表了义正严词的讲话，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径表示严正抗议，他的发言得到学校爱国师生的高度赞扬。但是，他创作的《何日君再来》（黄嘉谟填词）、《早行乐》却是与当时民族存亡的严重形势相悖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刘雪庵与黄自、贺绿汀等人一起创立了“中国作曲者协会”，志在“宣传鼓动抗日救亡运动”，会址就在刘雪庵家中。他还出资办起了《战歌周刊》（后改为《战歌》）这是中国惟一的抗战音乐刊物。它以“中华全国抗敌协会”的名义出版，发表了很多有影响的上乘作品，比如：贺绿汀的《游击队歌》，夏秋之的《歌八百壮士》和刘雪庵本人创作的一些作品。抗战期间，刘雪庵写出了不少杰出的音乐作品，如《长城谣》、《流亡三部曲》之二、之三，《上前线》、《听祖国的召唤》、《中华儿女》、《我爱自由歌》、《捷报》、《自由神》、《忆南京》，这些歌都曾唱遍祖国的山南海北、前线后方，成为载入中国人民革命史册的时代之歌。他还为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配乐，写插曲，为影片《孤岛天堂》、《保家乡》写主题歌，为影片《中华儿女》写插曲。从1938年到抗日战争胜利，他相继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教官，国立音乐学院副教授，璧山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艺术系教授。

抗战胜利后，刘雪庵随社会教育学院返苏州。他投入民主运动，成为苏州“民盟”组织的负责人。这一时期，他为影片《万象回春》写了主题歌，为《天堂春梦》、《何处不相逢》写了插曲。还创作了《西子姑娘》等歌曲，均灌制

成唱片出版。

建国后，刘雪庵相继担任了无锡苏南教育学院艺术教育系教授、系主任，江苏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系主任，北京师范学院、中央音乐学院等院校的教授。他曾当选为无锡市人大代表。1956年，他创作了钢琴曲《飞雁》。他先后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谈创作与批评》、《音乐中的民族形式问题》、《不怕跟内行吵架》等文章。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此后，他翻译了俄文版的法国著名歌剧《卡门》的歌词。他曾为毛泽东诗词《满江红》、《菩萨蛮》等谱曲（未能发表）。

1979年，刘雪庵出席了第四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1980年，他与金山合作，为历史剧《屈原》谱写音乐插曲。1982年他不幸双目失明，1985年3月15日病逝于北京。

李伯钊

李伯钊，笔名戈丽，女，重庆人。1911年3月20日（清宣统三年二月二十日）生。父李汉周是同盟会会员，母杨凤仙，除辛勤操持家务外，还常给女儿讲英雄豪杰故事，在李伯钊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1924年，李伯钊考入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萧楚女当时在该校执教国文，他经常用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主办的《中国青年》作为教材，启发学生走向革命。在萧楚女的引导下，她参加了重庆平民学社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经常听杨闇公、萧楚女等的讲演，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教育。1925年春，李伯钊发动同学抗拒国家主义“醒狮”派的新校长到校，结果被学校开除。这年夏天，她由同学廖苏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接着，中共党组织送她去上海大学学习。不久，又派她到上海浦东区担任共青团地委宣传委员，并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平民夜校执教。1926年6月，李伯钊因准备参加工人起义被捕。她坚贞不屈，巧妙地保护了组织和同志，后被组织营救出狱。同年冬，中共党组织派她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毕业。这年夏天，在国际少共第五次大会上，她担任中共代表团的翻译，受到周恩来、蔡畅的表扬。1929年，李伯钊和杨尚昆在莫斯科结婚。次年冬，李伯钊从苏联回到上海。

1931年春，中共中央派李伯钊赴闽西革命根据地，担任闽西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兼彭（湃）杨（殷）军事学校

政治教员。这年秋天，她奉命到达瑞金，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并先后任中央红军学校政治教员和《红色中华》编辑。1932年春，中央决定组织红军宣传队去慰问宁都起义的赵博生、董振堂部队。李伯钊和康克清、贺子珍一道，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起义部队中讲演和演出节目，使他们懂得为谁打仗。李伯钊和胡底、钱壮飞共同创作了话剧《为谁牺牲》。同年，在苏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期间，李伯钊将《黑奴吁天录》改编为话剧《农奴》，每次演出，台下观众都群情激愤。

1933年，李伯钊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意见，和沙可夫等组织工农剧社总社，创办高尔基戏剧学校，李伯钊任校长，这是中共创办的第一所艺术学校。李伯钊又担任了中央苏维埃政府教育部艺术局长。在这一时期，李伯钊还创作了话剧《战斗夏天》，编写了《残忍》和《扩大红军》等剧。

1934年秋，长征开始。最初，李伯钊和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一起参加中央工作团。她创作了《打骑兵歌》，鼓舞红军的士气。工农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她调红军总政治部任宣传干事，和陆定一合作写了《一、四方面军会合歌》，歌颂两支红军会合后的伟大胜利。

一、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胜利会师后，制定了共同北上的作战计划。1935年8月，李伯钊随右路军通过草地到达巴西后，中共中央派她率领火线宣传队到四方面军工作，当时张国焘企图分裂党中央，欺骗四方面军南下，李伯钊被迫二过草地。她冒着危险去看望朱德，了解到张国焘闹分裂的情况，在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她及时向二方面军的领导任弼时和贺龙作了汇报，并随二方面军三过草地。在红四方面军时，她设法拿到了张国焘在松岗开会另立“中央”的会议记录，后来她把记录交与彭德怀，为中共中央清算张国焘的罪行提供了重要材料。此后她仍在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做宣传工作。

1936年，中国文艺协会在保安成立，李伯钊被选为理事。1938年她和周扬、艾思奇等组织鲁迅艺术学院，任党组成员兼学院编审委员会主任。这时她创作了歌剧《农村曲》，由吕骥、向隅作曲。这是一部描写农村反汉奸斗争的歌剧，不但在抗日根据地广泛演出，还曾由抗敌宣传第一队在湖南、广西等国民党统治区演出，获得好评。1939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李伯钊赴敌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科长，她招收天津等地流亡学生，筹建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任校长和总支书记。在这时期，她创作了《老三》和《母亲》等剧，其中《老三》发表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上。1940年，李伯钊回到延安，任中央文委地方文化科长。1942年进中央党校学习，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会上作了“敌后文艺

工作”的发言。毕业后留中央党校，任文艺工作研究室主任，这段时间，她还完成了反映老解放区土地革命的长篇小说《桦树沟》。1948年李伯钊去石家庄任中共中央华北局文委委员、华北文联副主任。后参加了北平军管委员会工作，任文艺部副部长及人民文工团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伯钊担任中共北京市委文委书记，在彭真的支持下，筹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这是一个包括歌剧、话剧、音乐、舞蹈的综合艺术团体，李伯钊任第一任院长。她团结焦菊隐、洪深、张权、于是之等一大批著名文学艺术家，齐心合力，把北京人艺办得生气勃勃，有声有色。老舍刚从美国回来，她热情关怀老舍，支持老舍创作了著名话剧《龙须沟》。她非常关怀曹禺，又虚怀若谷，向曹禺请教有关戏剧艺术的问题。1951年她调到中央戏剧学院，先后任学院党委副书记、书记、副院长和院长。她尊重知识分子，从政治上和生活上去关怀帮助他们。20世纪60年代初期她抵制“左”的冲击，恢复教学秩序，加强业务学习，提高教学质量。为统一党委成员的思想，她主持召开了30多次会议，反复研究讨论，最后形成了一个座谈会纪要，使戏剧学院沿着正常轨道顺利发展。

李伯钊在担任繁重的行政工作的同时，在创作上也取得重大成就。1957年她校改了1954年写成的长篇报告文学《女共产党员》，交工人出版社出版。在这部报告文学中，她充满革命激情，叙述了帅孟奇和敌人进行英勇斗争的故事，书出版后，被译成多种国家文字。“文化大革命”前此书即发行60多万册，到1979年，已进入了第25次印刷。

20世纪50年代初期，李伯钊创作了歌剧《长征》，这是一部气势磅礴的史诗，红军战士无坚不摧的英雄形象，动人心弦。在歌剧中，毛泽东第一次出现在艺术舞台上，对在戏剧艺术中描写革命领袖，作了有益的探索。

“文化大革命”中，李伯钊全家都受尽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后来她和杨尚昆带着小儿子被软禁在山西临汾。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她仍然坚持要把反映长征的话剧写出来，一家三口往往坐到深夜，共同构思。她以惊人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伏案创作。1979年全家回到北京，在树元、李滨和她小儿子杨绍明的协助下，历时三载，八易其稿，写出反映长征的大型话剧《北上》，作为党的60周年纪念献礼，在首都舞台演出。话剧《北上》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波澜壮阔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反映了张国焘挑起的是“北上”还是“南下”的争论，展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力挽狂澜的大无畏精神。1985年4月17日，李伯

钊在北京逝世。

李伯钊生前曾任全国文联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全国妇联一、二、三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曾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第五、六届常委。

尧茂书

尧茂书，乐山人，1951年4月4日生。自幼喜游泳。14岁时参加乐山市岷江游泳竞赛，在数千人中，夺得第28名。1966年他初中毕业，进乐山《跃进报》印刷厂当照相制版工。1971年，调到西南交通大学印刷厂负责照相制版工作。通过自修和读职大，他完成了高等教育学习，撰写的论文获得嘉奖。1978年，调任该校电化教研室专职摄影员。从此，他与摄影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拍摄祖国的壮丽河山，成了他生活中的追求目标。许多画报和杂志，发表了他的摄影作品。他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四川分会会员、中国铁道出版社特约摄影记者。

尧茂书还热爱探险。1979年，日本探险家植村首漂亚马逊河的报道，激发了他首漂长江的念头。他计划通过首漂，去探索长江源头的奥秘，沿江考察山川风貌、野生动物、民情风俗和物产资源，拍部电影，出一本摄影集和一本探险文字记录，打破植村所创的漂6000公里，落差3200米的纪录。

为了实现首漂长江这一伟大目标，1984年尧茂书说服新婚不久的妻子刘建蓉作了人工流产手术，他们节衣缩食，为首漂积攒经费。同年9月，他自费前往青海，经西宁、格尔木，越唐古拉山，到海拔5000多米的沱沱河上游考察长江源头情况。次年2月，他又到金沙江虎跳峡考察，并在大渡河、岷江部分河段作了试漂。

1985年春，尧茂书得知美国著名探险家坎·沃伦将率探险队来华漂流长江，完成“最后的伟大征服”。这一消息使尧茂书激动万分。他认为首漂长江应该由中国人来进行，他向西南交大和国家体委写了《关于对长江进行漂流探险和拍摄工作的报告》，并奔赴北京，寻求支持。他拿出和妻子的全部辛苦积蓄，定制了两条橡皮船和保温救生服，并想尽一切办法，筹集其他漂流器材。他的哥哥姐姐们都伸出了支援之手。1985年5月出发前夕，两位助手都打了退堂鼓。尧茂书毫不动摇。他三哥尧茂江请假专程送他去长江源头。

1985年6月中旬，尧茂书兄弟俩携带漂流器材和行装，长途跋涉，来到海拔6000多米的长江源头格拉丹冬雪山姜古迪如冰川。当地区委给予了热情支持。尧茂书取出鲜艳的五星红旗、交大校旗和交大校友会徽章，戴上四姐尧显峰为他绣织的标有“中国长江”、“CHINA”的绒帽，登上长江源头冰川，情不自禁地高喊：“我们来了！我们龙的传人来了！”他和三哥将红旗插上峰顶，用电影机摄下了这些非同寻常的镜头。

6月20日，尧茂书和尧茂江登上“龙的传人号”，在长江源头沱沱河纳清曲下水，开始了首漂万里长江的壮举。沱沱河上游水浅，船常搁浅，尧茂书穿上保温救生衣跳进冰水中推船前进。沿途人畜绝迹，餐餐干粮冷食，吃不到蔬菜，喝不到清水，强烈的紫外线，变化无常的风雪和冰雹，以及荒原里凶猛的野兽，时时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他们轮流摇桨，兼程漂流。6月23日，他们到达了长江第一桥——沱沱河大桥。尧茂江因假满，带着拍摄的电影胶卷和资料离去。大哥尧茂森又抱病从四川乐山专程送来食物用品。他看到尧茂书的消瘦模样，十分心疼，劝道：实在不行，就不要继续漂了。尧茂书坚定地说：“我熬得住！就是拼着一死也要首漂长江！”

7月2日，尧茂书告别大哥，进入了风急浪恶的通天河。途中，险象环生，他搏浪斗天，坚持漂流。7月13日，他漂经嘎多神山时，拜神的藏民以为是“神怪”降临，纷纷叩头，向船扔羊腿和酥油糌粑。7月16日，他漂抵川、藏、青三省区交界的直门达。至此，他已漂流了1300公里，海外侨胞发来贺电，称他首漂之举，大长我民族志气，向他致敬。在玉树州，尧茂书受到热情欢迎。《光明日报》记者郑国庆采访了他。西南交大曾国强给他带来食品、器材和领导及同志们的问候祝贺。他深受鼓舞，信心更加坚定。

7月23日，尧茂书漂向金沙江段。过三堆河口后，水流突然变得异常险恶，橡皮筏冲撞颠簸，迭遭险厄。7月24日下午，尧茂书在直门达下游玉树县相古村通珈峡附近翻船落水，被激流卷走，为首漂长江壮烈地献出了生命。他的壮举，强烈地震撼着亿万炎黄子孙的心弦。人们称赞他是“天地一壮士，骑龙掣鲸人”，“漂流长江第一人”。他未竟的事业，已由“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于1986年11月25日完成。人们在他遇难的地方建立了一座纪念碑，民政部批准他为革命烈士。中共四川省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